话说中国千古之谜系列

黄山书社

中国帝后之谜

张剑光 邹国慰 周志明 主编

张剑光　男，上海人。博士、教授，历史学硕士生导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化典籍系主任、古籍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中国经济史研究。已出版《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三千年疫情》、《入土为安——中国古代丧葬文化》等著作，合著《人类抗疫全记录》、《太湖教育史》等编写，主编《中国帝王之谜》，参加《中国太湖史》、《太湖教育史》、《全宋笔记》、《五代史资料汇编》、《上海乡镇志丛刊》等古籍丛书的点校工作，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五十篇。著作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邹国慰　男，浙江人。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后在职攻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现为教育部委办《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编辑、上海师范大学地域研究所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在《南京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中国古代史论文十多篇，合作主编《中国帝王之谜》。

周志明　男，上海人。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研究生毕业。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女子文化学院院长助理。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与人合作著有《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漫话》、《中国古代禁毁小说大全》等，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话说中国千古之谜系列

黄　山　书　社

中国帝后之谜

张剑光　邹国慰　周志明／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帝后之谜/张剑光,周国慰,周志明主编. —合肥:黄山书社,2005.7

(话说中国千古之谜系列)

ISBN 7-80707-166-4

Ⅰ.中… Ⅱ.①张…②周…③周… Ⅲ.①皇帝-生平事迹-中国-古代-通俗读物②后妃-生平事迹-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Ⅳ.K8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84851号

总 策 划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图书拓展中心
上海三石图书
策 划 桑行之 李 彬
责任编辑 石 松
特约编辑 金 山 李 冰
装帧设计 张志全

·话说中国千古之谜系列·

中国帝后之谜

主 编/ 张剑光 邹国慰 周志明
出 版/ 黄山书社
地 址/ 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 230063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合肥东方红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40×960 1/16 印张 18.75 插图 126 字数 250千字
版 次/ 2005年8月第1版 200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册
定 价/ 2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主编	张剑光	邹国慰	周志明
撰写	张剑光	邹国慰	周志明
	杨英姿	黄满仙	张祎皎
	张　静	赵　航	张　洁
	张　丽	袁凌杰	郑春生

序

如果说，世界上有一门无人不参与、无人不受影响的学问的话，那就是历史。

每个人，无论他（或她）是否愿意，实际上都是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他（或她）的一切活动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尽管不一定被以文字记录下来，甚至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复原的信息。即使是完全没有历史意识的人，也避免不了历史的影响，一般来说，他（或她）在一生中总要追溯家族或个人的往事，也不能不受到这些往事的影响。一个人的经历再丰富，所处的时代再重大，与人类悠久的历史及其壮阔的波澜相比就显得极其渺小，微不足道。正因为如此，历史能给人理念、知识、智慧、乐趣和享受，是其他学问所无法替代的。另一方面，要了解一个个人、群体、社会、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也必须从其历史入手。不了解其历史，就无法理解其现状，也难以产生真实的感情，维持必要的信念。所以梁启超曾有这样的说法："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

但到目前为止，时间还是不受人类控制的客观存在。除了少量遗迹遗物外，人们无法直接观察过去存在过的事和人。尽管历史是过去曾经出现过的事实，但想了解历史，只能通过能够显示或反映这些存在的信息（主要还是文字）的记载。随着资讯的发达，文字以外的信息，如照片、图像、音像、实物等今后也会占越来越大的比重。但无论如何，历史都不可能是以往直接、简单的复原，只能是后人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所谓"意识"和"选择"，不仅是指历史的叙述者，而且也应该考虑历史的接受者。同样的史实，不同的叙述者完全可能选择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侧重点，运用不同的叙事方法，寄托不同的感情，同时也应该考虑针对不同的对象。

历史学者应该明白，绝大多数历史爱好者了解和学习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是为了获得信念、知识、智慧和乐趣，所以必须根据他们的需要，提供他们便于接受、乐意接受的读物，而不能一味强调学术性和专业

性。近年来，戏说历史充斥于影视，固然使历史学家不无忧虑，但另一方面也正说明民众对历史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如果我们“正说”历史时也能写得生动可读，引人入胜，何愁缺乏读者？也就不必担心真正的历史不为人所知了。

这套《话说中国千古之谜系列》共九册，达数百万字，分别是《大唐王朝之谜》、《大宋王朝之谜》、《大明王朝之谜》、《大清王朝之谜》、《中华民国之谜》、《中国宫廷之谜》、《中华国宝之谜》、《中国王陵之谜》和《中国帝后之谜》。作者都是上海高校的历史教师或专业研究人员，我与他们虽然素不相识，但了解了这套书的概况后，感到他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尽了一位历史教师的职责——不但要在课堂上教历史，还应该向全社会普及历史。

或许有人以为，近年来图鉴、故事体的历史普及读物已经出版过不少，如上海就有辞书出版社的《中华文明传真》、人民出版社的《中华文明通史图鉴》，最近出版的《话说中国》更是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这些高质量的读物大多简明扼要、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备受读者欢迎。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根据不同读者的需要加以选择；在确保学术水准的同时，尽可能采用生动活泼的叙述方式；在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上，注重知识性和趣味性——是这些读物的共同特点。只要做到了这些，这类书应该多多益善。而对我们这个拥有上亿读者的国家来说，对我们这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来说，已经出版的这些书是远远不够的，何况不同的作者和不同的读者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所以我相信，这套书也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至于书名所说的“谜”，只是一种叙述的方法，作者提供的还是“谜底”——历史真相。其实有的谜早已不成其谜，已有公认的答案；有的却不只一个谜底，还有的至今尚无谜底，或许永远不会有谜底。这不是作者偷懒，或故意留一手，历史就是这样——是千古遗憾，也是永恒的魅力。读者有兴趣，不妨自己也去找找谜底！但历史本来就是个大迷宫，小心别走进死胡同。

葛剑雄

2005 年 7 月

前言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出过很多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帝王和王后。有学者说，帝王是历史的产物，帝王也是历史的缩影，此话千真万确。自盘古开天辟地开始，从三皇五帝到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以及还做着皇帝梦的袁世凯；从女娲到吕后、武则天，直至清朝的慈禧太后，这些生活在社会最高层的至高无上的人物在历史上留下了他们的痕迹，成为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神秘的帝王、王后们是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缩影。

历史的创造者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英雄人物，历史的创造者无疑是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是他们创造了整个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充分地看到帝王、帝后们对历史的推动或阻碍作用，甚至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时候，他们决定着历史发展的走向和进程。中国的历史，专制的帝王之权高于一切，决定一切，涵盖一切，支配一切，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艺术和思想宗教，都必须和这种专制之权的发展相紧密一致，否则就会失去存在的条件。人们探索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和治乱分合，可以很轻易地发现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处处渗透着帝王活动的影子，与帝王和他们的王后们的个人智慧、文化素养、意志品德等有着直接的关系。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历史简史和一部帝王活动史，是互相融合交错的。高踞社会之巅的帝王的活动，影响着历史的进程。

帝王、王后们生活在高墙大院的禁中，普通的人们很难接近。他们的活动范围很小，他们为国家建立的丰功伟绩，他们为了王权而发生的权力争斗，他们生活上的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我们只能通过几本正史去了解。我们对帝王们充满着新奇的心理想要去了解他们，我们不能囿于古代几个编史书的人的观念去理解帝王们的所有举动。拨过历史烟云，我们发现帝王和王后们也是一些有血有肉有灵魂动感情的生灵，在神圣的光环下被遮盖住的音容笑貌原来也是多彩多姿。尽管时代的久远影响了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产生了一团又一团的历史迷雾。

恩师程应镠先生曾经说过:“历史人物的研究,是应当重视的。论世知人,是古代一门大学问。研究历史人物,是这门学问的一个重内容。……研究历史人物,有助于我们培养人才的借鉴。”这是他在《历史研究》1984 年第 2 期上发表的《谈历史人物的研究》一文的结论。我曾经听他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宣读这篇文章的主要思想,听他在课堂上娓娓对我们讲解,在那时却没有很好理解,说来实在惭愧。

斗转星移,自从进入大学历史系开始学习以来,算起来已有 25 年的时间学习和研究历史,却几乎对人物没有进行过深入研究。曾经做过几个人物的经济思想的研究,但研究的重点是思想而不是人。几年前,从政治史的角度写过一篇人物研究的论文,是关于唐睿宗的。在读书的过程中,发现学界对唐睿宗的认识总是言犹未尽,白纸黑字的表面下其实仍有许多内情。睿宗的下台与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有关,政坛上存在唐睿宗、太子李隆基以及太平公主三派势力,各有一批大臣紧随其后。三派力量相互较劲,相互牵制,相互使用手段打击对方的势力,结果李隆基派联络住了禁军而取得了全面胜利,睿宗被迫当了太上皇。写这篇文章是受了已故的著名史学家汪篯先生的启发,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开元时的名相姚崇和张说之间不和,结果张说被贬,“这一重公案必有其重大背景,不可仅以姚崇的嫉功作为解释”。顺着他的思路,我写成了这篇文章,结果很轻易地发现原来张说一直是睿宗集团的人员,而姚崇是太子李隆基的得力干将。玄宗革命成功,任宰相的姚崇不将张说贬官才怪了,这当然不是用个人恩怨可以解释的。开元四年,太上皇睿宗死了,玄宗的皇位就再也无人挑战了,于是睿宗集团的人一个个先后回到了京师。开元七年,张说也被任命为宰相,毕竟他的办事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他的文章写得实在漂亮。

这篇文章的完成,给我许多启发。中国帝王、王后们有多少隐在史书背后的事实还没有被揭示?有多少在流传的故事被我们曲解了?有多少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的英雄还躺在泪雨血河中等着我们去瞻仰?是啊,作为历史工作者,我们肩上的任务还有很多。

去年,恰好有出版社的朋友提出要编一套《话说千古之谜系列》,其中有一本是《中国帝后之谜》,希望我能接下这个题目。我觉得很荣幸,也感到很激动,因为这和我最近一段时间的想法有共同的地方。于是,我钻进了图书馆的故纸堆,埋首于古人今人的历史著作中,上下求索,沉湎于治乱相替、生

动多姿的中国历史中，苦苦搜寻帝王、王后们活动的遗痕和谜底。

在写作本书时，我得到了邹国慰和周志明两先生的大力协助。两位是我过去的老同学，多少年来一直耕耘在文史研究和教学第一线，他们和我一块儿拟提纲、立条目、定样稿，在这里非常感谢他们，没有他们俩人的尽心出力，此书不可能按时完成的。杨英姿、张丽、张静、赵航、张洁、郑春生、黄满仙、张祎皎、袁凌杰等主要撰稿人，有的是我的老朋友和同事，有的是我的学生，大家都尽心尽力，及时地完成自己的条目，非常感谢他们。稿子完成以后，由我和邹国慰、周志明共同审阅，纠正了一些问题，但肯定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希望读者们能帮助我们一起改正。书中如有不当之处，责任全在我们几位主编。此外，黄颖、王一士、王涵琪、徐鑫明等同志在搜集资料上给予了我们很大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张剑光

2005 年 7 月于上海桂林路科技园

目　　录

登极继位

民族始祖　炎黄二帝来源之谜 …… 001
谣言何来　赵匡胤夺取政权之谜 …… 007
太后的顾命　宋太宗即位之谜 …… 010
历尽艰难　宋孝宗即位之谜 …… 015
挤压残杀　元太宗蒙哥即位之谜 …… 020
“父子”关系　明仁宗即位之谜 …… 023
四大贝勒　皇太极争位之谜 …… 027
先帝遗诏　康熙继位之谜 …… 031
一串玉珠　雍正登极之谜 …… 033
扬长避短　咸丰继位之谜 …… 037
垂帘听政　光绪登极之谜 …… 041

文治武功

疏导和壅防　鲧禹父子治水之谜 …… 045
沦没于泗水　帝王九鼎之谜 …… 049
发现了甲骨文　商王盘庚迁都之谜 …… 052
不世之才　齐桓公首霸之谜 …… 055
退避三舍　晋文公称霸之谜 …… 060
庸夫之不若　梁武帝博学之谜 …… 064
相互融合　孝文帝改革旧俗之谜 …… 067
东行西幸　隋炀帝开凿运河之谜 …… 071
武术祖宗　宋太祖练武之谜 …… 074
嘉气满中京　金完颜亮迁都之谜 …… 076
龙蟠虎踞　忽必烈定都之谜 …… 079
龙兴之地　明成祖迁都原因之谜 …… 082
治理黄河　清康熙帝南巡之谜 …… 086
人杰地灵　清乾隆帝南巡之谜 …… 088

政坛风云

不避猜疑　周公称王之谜 …… 092
准确系年　周厉王专利之谜 …… 096
雪耻报仇　勾践卧薪尝胆之谜 …… 099
同姓一家　汉吴王刘濞叛乱之谜 …… 103
书生影子　王莽复古之谜 …… 106
王与马，共天下　晋元帝依靠王导之谜 …… 110
边战边和　唐高祖向突厥称臣之谜 …… 114
情有独钟　武则天长住东都洛阳之谜 …… 117
兄弟之情　宋辽皇帝结义之谜 …… 121
心惊肉跳　明太祖朱元璋文字狱之谜 …… 124

死因疑案

狼狈为奸　秦始皇死因之谜 …… 129
两位夫人　隋文帝死因之谜 …… 132
欲盖弥彰　北汉国主遇刺之谜 …… 136
烛影斧声　宋太祖赵匡胤死因之谜 …… 139
雄心壮志　金完颜亮惨死异地之谜 …… 142
上帝折鞭处　元宪宗死因之谜 …… 145
有此曲笔　明建文帝踪迹之谜 …… 148
受了刺激　清顺治帝失踪之谜 …… 152
谣言四起　清雍正帝暴死之谜 …… 156
纵情享受　清同治帝死因之谜 …… 161
天京缺粮　天王洪秀全死因之谜 …… 167
备感绝望　袁世凯死因之谜 …… 170

荒唐君主

层层积累　纣王残暴之谜 …… 176
道古以害今　秦始皇坑儒之谜 …… 180
游荡乡里　刘邦流氓习气之谜 …… 185
贾后的心病　晋惠帝痴呆之谜 …… 189
狂暴成性　北齐文宣帝酗酒淫乱之谜 …… 194

看破世相　梁武帝舍身入寺之谜 …… 198
千古唾骂　石敬瑭称儿皇帝之谜 …… 201
弑君自立　金完颜亮嗜杀之谜 …… 205
削木构宫　元顺帝昏庸之谜 …… 208
群奸蛊惑　明武宗豹房之谜 …… 211
醇酒美人　清咸丰帝好色之谜 …… 215

宫中硝烟

一个冤案　汉武帝杀太子之谜 …… 219
琼萼凋春　武则天杀孙女之谜 …… 222
逃过一劫　明嘉靖宫变之谜 …… 226
出生低贱　明万历帝立太子之谜 …… 229
疑云迭起　明光宗与三大案之谜 …… 234
真假难辨　明崇祯帝皇子命运之谜 …… 237
年轻之人　南明弘光帝亲审太子之谜 …… 241
一条黑影　清嘉庆被刺之谜 …… 244
违法剃头　清乾隆孝贤皇后丧葬之谜 …… 247
失魂落魄　李煜小周后侍奉宋太宗之谜 …… 250
忍气吞声　宋仁宗曹皇后的道德殉身之谜 …… 252

后妃秘闻

婀娜曼妙　汉成帝皇后赵飞燕之谜 …… 257
浓妆艳抹　胡太后乱魏之谜 …… 260
谁的儿子　北魏孝文帝生母之谜 …… 264
李商隐的诗　武则天出生地之谜 …… 267
太白题诗　杨贵妃荒淫之谜 …… 271
回回女子　元顺帝生父之谜 …… 275
小小玩笑　慈禧太后出生地之谜 …… 2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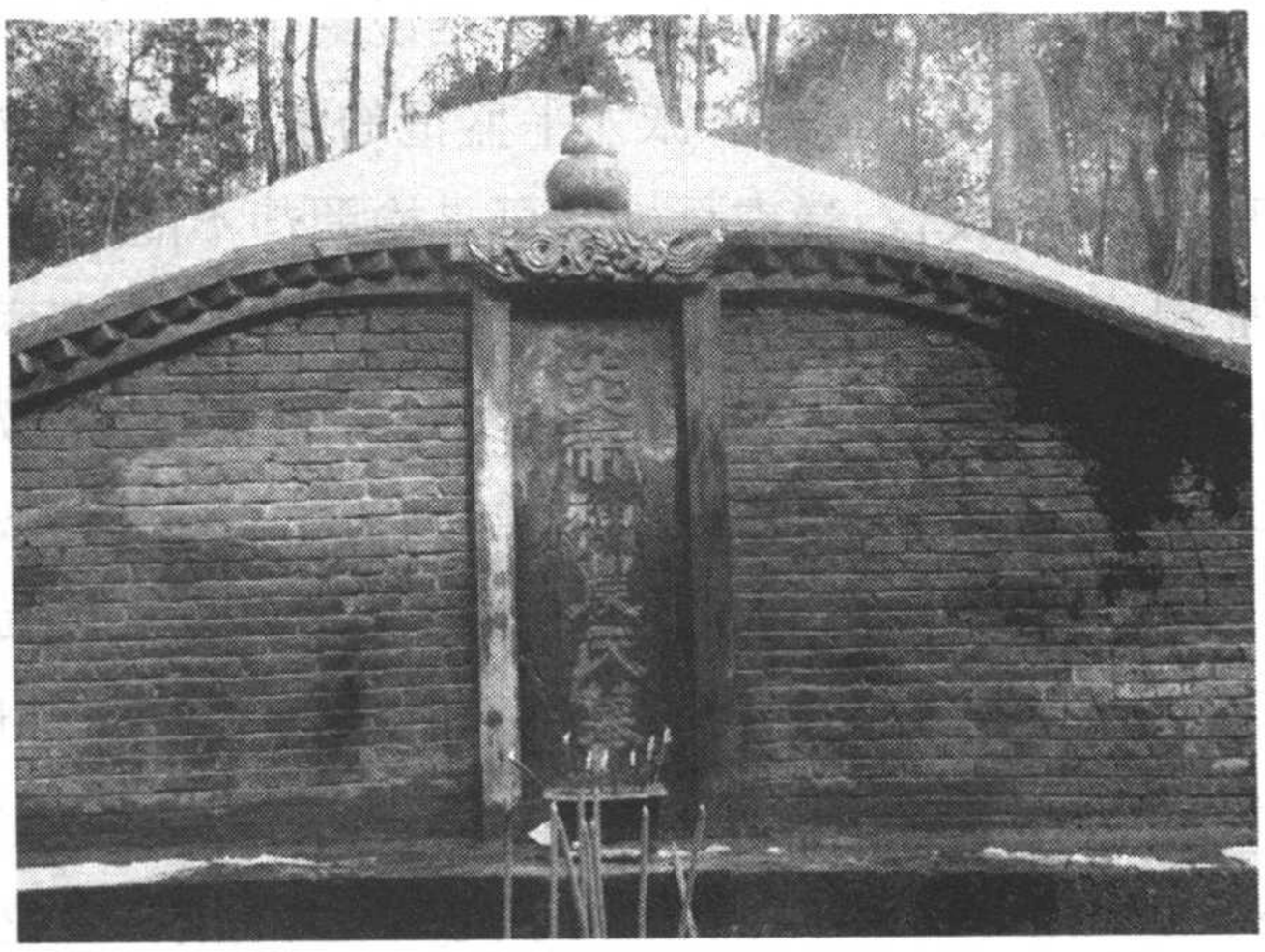
登极继位

民族始祖　炎黄二帝来源之谜

我们常常说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炎、黄二帝是我们民族的始祖。在历史上，炎、黄二帝的记载实在太多，有人认为他们是远古时期的帝王，有人认为他们是两个部落，也有人把他们当作神来看待。那么到底是人还是神？至今我们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

习惯上人们称中华民族为炎黄子孙，而炎、黄是列为五方天神的五帝中的二位。《国语·晋语》，少典氏娶有蟜氏之女，生下黄帝和炎帝，而少典究竟为氏族名还是父名，则众说不一。

过去将炎帝和黄帝，说成是像夏、商、周三代的天子或秦、汉以后的皇帝那样远古时期的帝王。《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国语》的说法有所不同，说黄帝在姬水边长成，因而姓姬。《史



炎帝的事迹，古书中有一些不同的记载，
一般把炎帝与神农氏说成是一个人

记集解》说黄帝号有熊氏，可能是以熊为图腾而得名。在早期部落之间的战争中，黄帝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是有功绩的。功绩还不止于此，《史记正义》说："黄帝之前，未有衣裳屋宇。及黄帝造屋宇，制衣服，营殡葬，万民故免存亡之难"，"教民江湖陂泽山林原隰皆收采禁捕以时，用之有节，令得其利也。"为什么称他为"黄"帝？据《淮南子·天文训》记载："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则而治春；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即祝融），执衡而治夏；中央土地，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也就是说，黄帝为五天帝之中央天帝，是管理四方的中央的首领，又因专管土地，而土是黄色，故名"黄帝"。

关于炎帝，人们认为也为少典之子，与黄帝兄弟相继，但《帝王世纪》认为炎黄之间凡隔八帝五百余年。汉高诱注《淮南子》，说赤帝就是炎帝，少典之子，号神农，南方火德之帝。或说炎帝是生活在姜子一带的部落首领。《世本·帝系篇》把炎帝和神农氏连到了一起，认为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班固说炎帝"教民耕农，故号曰神农氏"。对古老的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

一种传说认为最初炎帝做了华夏族的帝王，黄帝只是炎帝属下的诸侯。炎帝的事迹，古书中有一些不同的记载，一般常常把炎帝与神农氏说成是一个人，如《帝王世纪》即说"炎帝神农氏"，因此，像教民食五谷、创制耒耜等农业发明的功绩，也就自然归于炎帝身上了。据说炎帝一族传了八代，共五百三十年，"无制令而民从"，完全是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但是传到了第八代炎帝榆罔时期，"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可是榆罔却不能阻止，而且后来榆罔也开始不断"侵凌诸侯"，于是，诸侯纷纷脱离榆罔，归顺于黄帝。黄帝修明政治，整顿兵力，鼓励生产，安抚百姓。经过一番准备，率领诸侯在阪泉（相传在今河北涿鹿东南，一说在山西运城）与炎帝榆罔交战，经过三次大战，终于打败了榆罔，黄帝遂取而代之，做了帝王。也有人说黄帝与炎帝本是兄弟，所以双方的部落联盟很快融合为一，后世称炎黄子孙即来源于此。之后，黄帝又经过一系列南征北讨，制服了不顺从的诸侯，天下复归于太平。黄帝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治理天下，得到了人民的拥戴，农业生产得到发展。传说黄帝还创造发明了舟楫、杵臼、弓箭、房屋、门、棺椁、文字，为华夏文明的发展立下了卓越的功勋。



神农大殿

有关黄帝神话传说的主要部分，莫过于黄帝与炎帝、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了。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中，黄帝“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图腾的部落为前驱。以雕、鹖、鹰、鸢为旗帜”，战争的规模显而易见。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则异常惨烈，“血流漂杵”。在这场战争中，双方都施出了神功魔法。起初，蚩尤施展法术，即刻大雾弥漫，人马相对而人影莫辨。黄帝便令风后制造出指南车，识别了方向，将蚩尤打败。随后，蚩尤又请来了风伯、雨师，一时间，风雨大作，急风暴雨把黄帝的人马搅得人仰马翻。黄帝又请来了天女“魃”，止住了暴雨，指挥大军以雷霆闪电之势，冲乱了蚩尤部下的阵形，乘胜捉住了蚩尤并把他杀掉，将其头颅埋在涿鹿。至今在河北省张家口市东南的涿鹿县，还有一座蚩尤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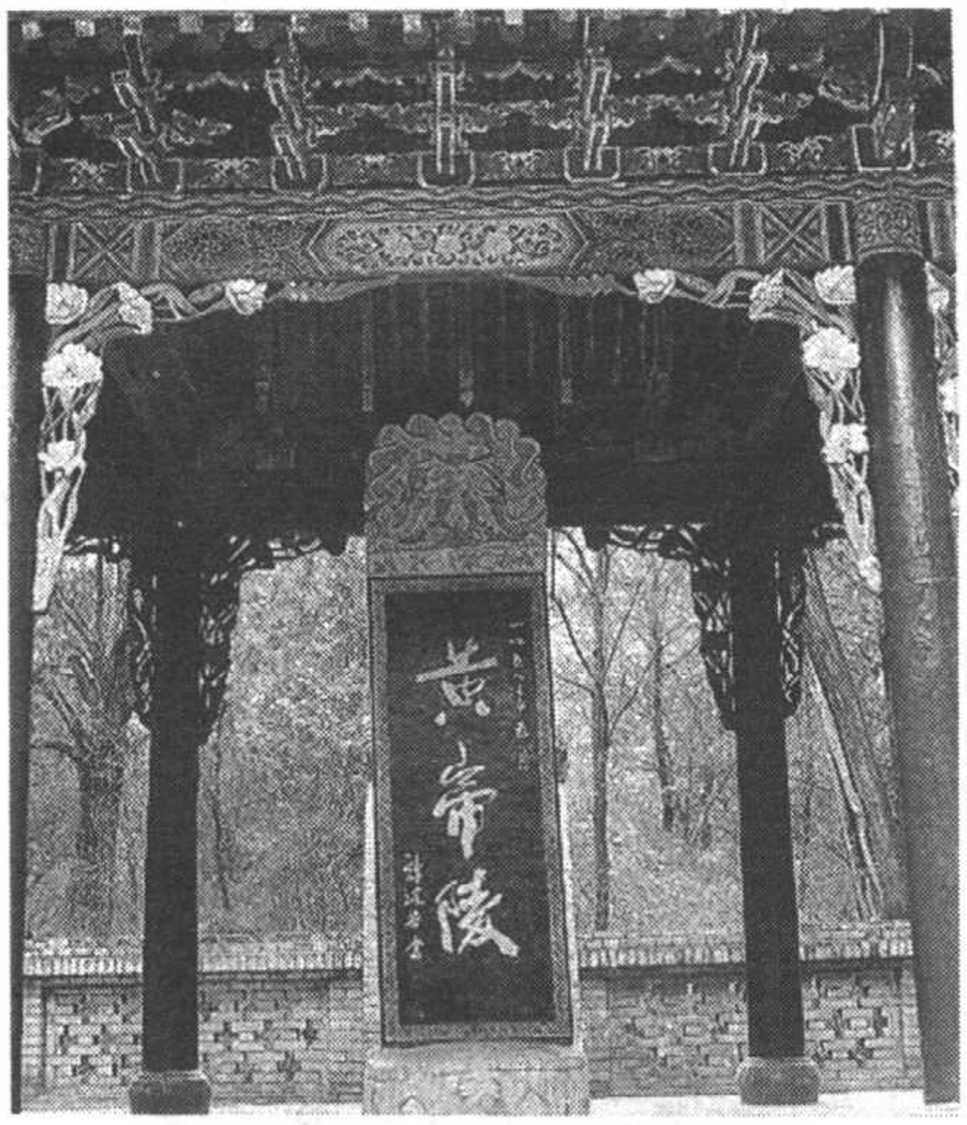
神农像

炎帝、黄帝作为功绩卓著的贤明帝王，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尊敬。炎帝、黄帝死后，黄帝的一些后代子孙如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等，又先后做了帝王，他们不忘炎帝、黄帝对于华夏文明的开创之功，把炎帝、黄帝奉为始祖，率领臣民依时节祭祀、供奉。这样，炎帝和黄帝就成了华夏族的共同祖先了。后来，由华夏族发展而成的汉族、中华民族，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一直尊奉炎帝、黄帝为始祖，于是也就自称为“炎黄子孙”了。

从现代历史科学的观点来说，炎帝、黄帝的时代，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氏族公社时期，阶级和国家还没有产生，也没有如后世那样的帝王。当时，中华大地上分布着许多氏族和部落，这些氏族和部落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有相互通婚的姻亲关系，有祖族与支族及支族之间的血缘关系，有生产生活中的睦邻友好关系，也有相互争战的敌对关系。由此而形成了几个大的部落集团，其中中原部落联盟（即华夏族）最为强盛，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都属于这一部落联盟，炎帝和黄帝还先后担任了部落联盟的首领。

从古史记载的内容来看，有专家认为炎帝族和黄帝族原来都是少典氏族中分化出来的支族。这种祖族与支族的关系，由于后人不理解，故在古书中记载为父子关系。炎帝族从祖族中独立出来后，很快便兴盛起来，成为中原部落联盟中颇有影响力的骨干族，他们的首领炎帝也就成了部落联盟的首领。这种局面持续了很长时间，先后继任的几位炎帝族的首领也都担任了中原部落联盟的首领之职，并且承袭了“炎帝”这一称号。因此，这时期可称之为炎帝时代。几百年以后，炎帝族渐渐衰弱了，黄帝族却强大起来。这个时候的炎帝榆罔利用部落联盟首领的职权，欺凌一些弱小的部落和氏族，这些部落和氏族便逐渐脱离了炎帝族，黄帝遂取代炎帝做了新的部落联盟首领，从此开始了黄帝时代。

一些学者指出，炎帝和黄帝的时代，相当于距今七千年到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这是中国中原远古文化取得大发展的一个时期，原始农业文明繁荣，还有许多重大的发明。这些成就是当时人们共同创造的，可是在历史的传说中，往往把这些成就归之于时代的代表人物，即当时的部落联盟的首领炎帝和黄帝身上，因此他们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圣人，受到普遍尊敬。早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前，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就形成了华夏族、苗族以及当时被华夏族称之为蛮、夷、戎狄的许多兄弟民族。说华夏族为黄、炎之后，这实际上反映了华夏族是由黄帝、炎帝为代表的两个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



黄帝陵

族经过长期发展而成的。所谓帝，只不过是中国原始社会部落联盟时期军事首长的称谓。

有人认为这个传说中的黄帝是个神，但也有人认为黄帝是真的存在过的一个历史人物。黄帝究竟是人还是神？其实学术界至今仍无定论。

我国一些著名的神话研究专家认为，黄帝为一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他起于雷电，最初之神职为雷神，后以雷神崛起而为中央天帝。“相传他长有四张脸，能同时顾及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无论什么地方发生了事情，总逃不过他的眼睛。”最后，黄帝战胜了其他四天帝，而建立了自己的神国。

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统称为华夏族，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前身。黄帝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之后，便教导人们伐木筑屋，他发明了舟车、弓箭，还造字制乐、编历法医书；他的妻子螺祖则教民众种桑养蚕，缝衣作冕，创造了中华的原始文明。直至今天，人们常用“炎黄子孙”来称呼中国人，这也反映了人们对中华民族炎帝和黄帝的追溯与尊奉。

另有专家认为，黄帝是历史上确确实实存在的历史人物。据《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生下来就很神奇灵异，襁褓中就能说话，显示了其与众不同的禀赋。而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则是各部落间战争纷起的年代。黄帝以其聪明才智，将他周围的部落团结起来，结成部落联盟，并成为他们的军事领袖。他修明政治，整顿武备，征伐四方，最终战败蚩尤，兼并炎帝部落，统

一了黄河流域的大片土地。统一后，他制礼仪，施教化，创立法规则典章，作为治世准则，并置官员到各处治理天下。实际上，他是以战争手段结束了各部落联盟间的长期混战，建立了早期国家的雏形，从而开始了中华文明历史的新统一，成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

黄帝部落聚居的地方，历史记载也各有不同。有记载说，他曾居住在河北涿鹿县，史称“涿鹿之野”；又有记载说，他的部落居住在今河南新郑一带，名曰“轩辕之丘”。这说明当时部落大约还没有完全定居，经常迁徙。黄帝部落大体活动于今天陕西、河南、河北沿黄河一带。



黄帝像

更有学者认为，“黄帝”的名称实际上反映了原始农业文明时期，人们对黄土地崇拜的一种特殊感情。黄帝所处的时代，我国华北及全国大部分地区已普遍进入农耕时期。黄帝征服各部落后，非常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他命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大挠造干支、容成造历法，并按天时，审地利，播种百谷草木，并教民节用水火材物，他还专门设立土地种植之官“后土”。这一切都使得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古史记载便称他为“以土德而王”，因土地为黄色，故而称为“黄帝”。这种因对土地的崇拜而衍生的黄色崇尚，在后代的历史中进一步发展。后世的帝王们都要依据黄帝的故事，“数用五，服尚黄”，从而逐渐将黄色演变成为一种权力和尊贵的象征。

炎黄二帝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功不可没。在他们的身上，同时凝聚了许多神话传说的影子。关于黄帝之死，历代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故

事。据说，黄帝并没有死，而是乘龙升天了。现在陕西黄陵的围墙正面，还有一块石碑，上书“桥山龙驭”四个大字。这也反映了人们对他的一种尊敬和爱戴，对他的部族和后代们的美好祝愿。

学者冯天瑜指出，中华民族的远祖，可大致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东夷集团的活动区域大致在今天的山东、河南东南和安徽中部一带，即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和青莲岗文化江北类型分布区。传说中的太皞、射日的后羿及与黄帝恶战的蚩尤，都属于这个集团。苗蛮集团主要活动在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即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分布区，东部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也可归于此集团。著名的伏羲、女娲及三苗、祝融氏，都属于这个集团。华夏集团发祥于黄土高原，后沿黄河东进，散布于中国的中部、北部部分地区，大约相当于今仰韶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分布区。华夏集团以黄帝和炎帝两人为主。这三大集团之间，既有和睦共处的安定，也有大动干戈的战争。后来黄帝兼并炎帝部落，统一其他各部。黄帝、炎帝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祭奠的先祖，华夏集团也因为其连续的胜利，巩固了自己的主流地位，成为中华民族的古老代表。

谣言何来　赵匡胤夺取政权之谜

柴荣死后，年仅七岁的幼子柴宗训即位，主少国疑，政局不稳。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传报北汉与契丹联兵南侵，宰相们决定派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军前往抵御。当大军到达陈桥驿时，部队发生兵变，赵匡胤被黄袍加身。回军开封后，赵匡胤当上了皇帝。这是一场处心积虑准备的兵变？

后周世宗柴荣临死前，因猜忌而罢免禁军主帅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军职，命赵匡胤接任，使他掌握了后周最重要的军权。世宗死后，幼子柴宗训即位，因年仅七岁，主少国疑，政局不稳。

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镇、定二州传报北汉与契丹联兵南侵，宰相范质、王溥决定派赵匡胤率军前往抵御。军队方始调动，京城开封即盛传“策点检为天子”的舆论，惟独内廷晏然不知。正月初三，大军出发，天黑前到达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当晚，赵匡胤酒醉就寝，其弟赵匡义和赵普等组

织策动兵变。忠于赵匡胤的禁军将领纷纷议论，说当今皇帝年幼，将士即使出死力破敌，又有谁知道。不如立点检为天子，再北征也不迟。这些话，使将士中的兵变情绪渐渐高涨起来。赵普见事已成熟，要求诸将严禁士兵剽掠百姓，以安定都城人心，保证“兴王易姓”顺利进行。次日凌晨，众将士手执兵器，来到赵匡胤的寝所，齐声喊道：“诸将无主，愿立太尉为皇帝。”并把象征皇帝登基的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罗拜高呼万岁。这就是众多史书号称的“陈桥兵变”。



陈桥驿位于封丘县黄河北岸，与开封隔河相望，公元960年，
赵匡胤在此发动兵变，使这个不起眼的小镇得以名垂千古

赵匡胤一待黄袍加身，立即率大军回师开封。他当众宣布：回京师后，不得惊犯后周幼帝、太后，不得侵凌后周公卿大臣。兵变队伍进城后，秋毫无犯，市井平静。后周宰相、大臣闻变失色，个个手足无措。侍卫亲军马步军副指挥使韩通欲召集兵士抵抗，为兵变士兵杀死。宰相范质、王溥被抓到赵匡胤面前后，见势不妙，只能相继跪拜，口呼万岁。

就这样，赵匡胤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正式登上皇位，改封后周幼帝为郑王，以宋为国号，定都开封。

长期以来，对陈桥兵变中的许多环节，后人提出了众多疑问。司马光《涑水记闻》说赵匡胤北征前，“京师喧言，出师之日，将策点检为天子”，当时城中富户一看时局要乱，慌忙带了全家往外州跑，只是宫中不知道要发生兵变。如此，未兵变前早有人看出要发生兵变换朝代了。有学者指出，宋人笔记记载说，赵匡胤早年曾到高辛庙占卜，“自小校以上至节度使，一一掷之，

皆不应”。于是自言自语说:“过此则为天子乎?”一掷即中。不论这事的真假,这则在宋朝广泛流传的轶闻,正反映了赵匡胤一直有着当皇帝的野心。《宋史·杜太后传》谈到杜太后得知其子黄袍加身后,说:“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还说:“吾儿生平奇异,人皆言当极贵,又何忧也。”哪有儿子发动兵变当上了皇帝,母亲仍与人谈笑自若的?北方战事,为什么黄袍加身后,不费一刀一枪,立即就太平了?镇、定二州的军情难道不是配合赵匡胤兵变而谎称的?

民国初年,蔡东藩撰写《宋史演义》时,也产生了许多怀疑。他认为陈桥兵变是赵匡胤一手策划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史家但言非宋祖意。吾谓是皆为宋祖所欺耳。”他也提出契丹和北汉的扰边为何不见踪影了?点检作天子的谣言,是从哪里来的?兵变的部队中,哪里来的黄袍?赵匡胤称帝后,为什么首先奖赏策划兵变的功臣?他一针见血地说:“足见宋祖之处心积虑,固已有年”,“第借北征事瞒人耳目而已”。这样的怀疑,在现在通行的一些著作中都能见到,一般都认为兵变是赵匡胤自己一手策划的,契丹入侵是谎报。

近年来,又有一些历史学家对这件疑案进一步探索,发现了更多的疑点。李裕民认为赵匡胤夺取政权是动足了一番脑筋的。当周世宗去世时,赵匡胤刚为殿前都点检,虽有政变的实力,但反对势力甚强,侍承亲军司都指挥使李重进是周太宗的外甥,副都指挥使韩通有勇寡谋,但誓死效忠周室。潞州节度使李筠养兵三万,步军都指挥使袁彦是与赵匡胤为敌的一员虎将。恭帝即位一个月后,赵匡胤开始作政变准备。不久,他设法将袁彦调任为陕西节度使,李重进调任为淮南节度使,任命自己的密友高怀德、张令铎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控制了首都军队的主要位置。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镇、定二州来报契丹入冠,朝廷命赵匡胤率兵出征,此时大权在握,可以发动兵变了,但他并没有发动,原因是对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吃不准,万一其不同意兵变,事情就会变复杂。正月二日,赵匡胤命慕容延钊率前军出发,自己为了不让人怀疑,宣布将于次日出发。四日发生陈桥兵变后,赵匡胤回城登殿做了皇帝,这时慕容延钊仍不知情,继续一心一意向北进发。赵匡胤发动政变,其实是早就有预谋的。

美国学者刘子健先生认为陈桥兵变时赵匡胤在睡觉,醒来已是黄袍加身,那是宋代史料对他的美化,在黄袍上再加上了一件道德化、合法化的外

衣。关于兵变的主谋，清代学者认为是宋太宗和赵普，也有人认为是宋太祖，但从史料来看，太祖是主角，可是他不便自己活动。太宗是皇亲国戚，到处联络，也不怕受人怀疑，他是主要的执行者。至于赵普，与军队的关系较浅，居于次要地位。

顾吉辰先生认为赵匡胤典掌禁兵后，在他幕下组成了以他弟弟光义、赵普、李处耘等人为核心的智囊团，同时又聚集了一批知兵善战、老于兵事的领兵武将。在推翻后周政权的过程中，赵匡胤制造了许多政治谣言。如赵匡胤出发征契丹的那一天，号称知天文的军校苗训，“见日下复有一日”，就说“此天命也”，意谓赵匡胤当皇帝是上天授命的。周世宗之前攻打契丹时，无意中发现木牌一块，上面写着“检点做”三个大字，这无疑也是赵匡胤故意弄出来的。大军临出发北征时，赵匡胤制造京城内策立新天子的谣言，还通过道学家之口，散布“赵点检作官家”的言论。契丹入侵，也是当时伪造出来的。后周末年的这场政治谣言，直接导致了赵宋王朝的顺利建立。至于许多宋人笔记上谈到的赵匡胤是真龙天子，是命中注定的言论，是后周这场谣言的继续和延伸，为赵氏篡权制造合法合理的理论。

当然，也有一部人认为陈桥兵变是无疑可谈的，应以史书记载为准。他们认为镇、定二州的军情不是谎报，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书中全部可以找到。二州的节度使郭崇和孙行友不是赵氏集团的人，在宋初被解甲归田，他们怎么会编造假情报？契丹趁后周主少国乱之际起兵入寇，完全是有可能的。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认为五代时期的皇帝，常由军士拥立，相沿以为故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这样的例子可以找出很多。

陈桥兵变中的黄袍加身事件，是赵匡胤等人预谋的，还是偶然发生的，看来依然是个历史之谜。不管怎样，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赵匡胤夺得了政权并且建立起宋朝，因此人们有理由进行怀疑，并且将不断地争论下去。

太后的顾命　　宋太宗即位之谜

杜太后临终前，与儿子宋太祖约定，将来死后把皇位传给宋太宗。这段由赵普记载的盟书，经太祖亲手放于金匮之内，成了宋太宗继位合法化的最好证据。长期以来，很少有人怀疑“金匮之盟”的真实性。清末，有人提出了

疑问，接着人们纷纷认为杜太后的顾命是伪造的，“金匮之盟”成了一团历史疑云。



宋太宗赵光义

“斧声烛影”事件后，赵光义在太祖的灵柩前悲痛即位，是为太宗。但一些事情总使人有所怀疑，如太祖不曾卧病，为什么会突然死亡？在此之前太祖并没有足以致命的病史，为什么竟然一病而不起？宋太宗在即位当年的十二月就改年号为“太平兴国”，而按常规，新君即位当年应沿用旧的年号，次年方得更改，太宗为何如此迫不及待？一时之间，疑云重重，朝野上下暗中议论纷纷。这时，忽然又出现了“金匮之盟”。

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受卢多逊排挤已罢相的赵普密奏太宗，谈到其母昭宪杜太后临终顾命之事。太宗找到誓书，打开金匮一看，不由得大喜，于是赵普重新得到重用，晋升为司徒兼侍中。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记载道：建隆二年(961)，昭宪杜太后临终前，太祖侍药饵不离左右。太后自知在世时间已不长，就召宰相赵普等入宫受遗命。太后问太祖说：“你知道你为什么能得天下吗？”太祖说：“能得天下主要是靠了祖宗们和太后的恩泽。”太后说：“不是这样的，恰好当时是柴氏让个小孩子主天下，群情不服。如果后周有年纪稍长一点的国君，你怎么能够得到皇位？你与光义都是我生的，你之后应当传位给你的弟弟。四海至

广，能立年纪大一点的国君，这是社稷的福分。”太祖一面哭一面顿首说：“怎么敢不如太后教诲的那样去做。”转身对赵普说：“你把我们说的话全部记下来，不能有所改动。”赵普就在病榻前写成誓书，并在纸末署上自己的名字：“臣普记。”太祖手封其书，将之放到金匮之中，命可靠的宫人掌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金匮之盟。

在这条资料下，李焘又注释道：“司马光《记闻》称太后命传位给二弟，其本意是指太宗及秦王廷美。现在是根据《正史》和《新录》综合成的，而《旧录》原本不载这件事。《正史》和《新录》也称太宗人受顾命，而《记闻》不载，今从《记闻》。”翻看《记闻》的记录，太后是这样说的：“汝万岁后当次传之二弟，则并汝之子也获安矣。”李焘注释的理解是没有问题的。

李焘的记录，是综合了各书编成的。其中《正史》是指成书于宋仁宗时的《三朝国史》，《旧录》指成书于太宗太平兴国五年的《太祖实录》，《新录》则指成书于真宗时的《太祖实录》。另《太宗实录》修于太宗至道三年，其时太宗已死，成书于真宗咸平元年。以下各书除《太宗实录》残存外，其他均已亡佚。

由此看来，昭宪顾命最早的记录是《太祖新录》。在此之前，《太宗实录》已涉及赵普于太平兴国六年密奏昭宪顾命的事情，并像模像样地谈到太宗找到金匮后，打开一看，如获至宝，“遂大感悟”。据此李焘认为顾命时，太宗是不在边上的，后来的史书是进行了加工润饰。

“金匮之盟”的出现，使太宗的继位变得合情合理，使人们原先对他即位的怀疑一扫而光。长期以来，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却变成了称颂宋太祖坦荡无私的具体例证。尤其是明代的一些评论家，都接受了这种说法。

清代后期，学者恽敬对此提出疑问，认为盟约内容是掩饰之说。毕沅的《续通鉴》有两处考异认为《长编》记载是曲笔，决不可信。当代学者也认为“金匮之盟”可能有诈。

史学家张荫麟认为顾命之事有很多破绽。其一，杜太后死时，太祖仅三十五岁，长孙德昭十一岁，杜太后怎么能预知太祖死时德昭仍是幼童？其二，太祖既遵母命，为何将盟誓藏起来对谁也不说？太宗即位五年后，打算对皇弟廷美动手时突然将盟誓公布，其中很有可疑之处。其三，赵普是参与盟誓的，太祖在世时自不能多说，但太宗即位后为什么不马上说明，要待数年之后？其四，太宗时修的《太祖实录》中没有“金匮之盟”，到了真宗时修

《太宗实录》就有了，而且又说太宗也是在场的，史料的记载为何这样矛盾？此外，金匮盟誓全部在秘密中进行，知情者最多只有四个人知道，太祖和太后已经作古，剩下赵普和太宗，想怎样讲就可以怎样讲，谁会知道真相是怎样的。因此他认为“金匮之盟”是假的。

之后，怀疑“金匮之盟”的人蜂拥而起。

有人指出，在宋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皇帝健在，而太后为接班事草遗诏的。即使皇帝没有儿子，也不用太后越俎代劳。杜太后草诏的理由是为了不重蹈周世宗传位幼子丢失天下的覆辙，而太祖身体很好，屡次出兵亲征，太后怎能知太祖必然短命？如有遗诏，太宗临终时必然会布置人打开金匮，即使是突然死亡，皇后和掌管金匮的宫人也应知晓其事，为何要到六年之后才由赵普揭出？如有遗诏，应该全文公布，堵众人之口，却闪烁其词，只有大概意思。太宗既然要利用遗诏证明自己继位是正当的，但又为何自己传给比弟侄年幼的儿子？结论只能是赵普为了投靠太宗，恢复相权，报复政敌，才编造了遗诏。



元代钱选《宋太宗蹴鞠图》

有人认为顾命可能是有的，但太宗公布的盟誓是假的。昭宪临终或许是有此顾命也未可知，但绝无藏于金匮二十余年之久的盟书。另外，昭宪太后顾命没有谈及太宗死后再传位给太祖之子也极悖常理。李焘在长编中实际上已有所怀疑，他说：“始太祖传位给太宗，这是昭宪太后的顾命。有人说昭宪和太祖的本意，是想太宗再传位给弟弟廷美，而廷美再传位给太宗长子

德昭。所以太宗即位后，马上任命廷美为开封尹，廷美之子德恭授贵州防御使，称为皇子，这些都是太祖和太后的本意。”由于赵普在金匮之盟中记录和最终披露者都是他，可以认定伪造者就是他。成书于太平兴国五年的《太祖旧录》对这件事没有记载，此年就发生了这件事，说明伪造就在这一年。宋太宗和赵普伪造这个盟誓的原因，主要是为自己无太祖顾命人继缘饰。太祖死之前，太宗为开封尹，而太祖诸子虽已成年出阁，但均未封王，更无太子之位，太宗实际上居储君之位。然太宗想到自己毕竟是没有太祖顾命，又无正式储君之名，弟继兄不合常例，所以出此下策，寻求合法正式依据。《三朝国史》、《太祖新录》的编撰者当然也是不信金匮之盟的，但为尊者讳，就作了许多润饰，称太宗也是人受昭宪顾命的。

问题是“金匮之盟”既然有可能出自宋太宗篡位后伪造的，属子虚乌有，那么宋太祖自己心中有没有继承人？继承人究竟是谁？

有专家认为烛影斧声事件的当晚，宋皇后突然发现宋太祖死于非命，急命内侍王继隆速召太祖子秦王德芳。当看到召来的不是秦王德芳而是晋王时，宋皇后大惊失色。如果有金匮之盟，宋皇后当不会不知道，就可能不会去召秦王抢先来柩前即位。宋太祖死时秦王德芳已十八岁，不为幼儿。宋太祖如果再能活几年，就会将秦王培养成为一个政治经验丰富的继承人。在许多资料中，可以看到其实宋太祖是在不断地培养秦王，让他多读书，参加各类政治宴会。宋太宗也知道宋太祖的意思，所以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抢班夺权，伪造了所谓的“金匮之盟”。

事至今天，还是有个别人认为金匮之盟是真实的。杜太后遗命是从五代以来现实政治考虑的至理，太祖以长弟为储在客观上是势所必然。宋太祖不将金匮之盟昭告天下，可能是他觉得没有必要改变五代以来不正式立储的习惯，而且可以保留最后的选择。太祖考虑到一旦公开盟约，便大有可能引致家人子弟为营谋帝位而相倾。赵普在太宗登位时，与太宗嫌隙甚深，贸然公开密约，安知是祸是福？揭示金匮之盟时，太宗已登基六年，继统已没有争议，赵普的意思其实是想力谏太宗不可再徇于母命，他力持的是父死子继的正论。太宗如果存心作伪，应该在一登基便干，而且最好令伪说人于死无对证的地步，而没有必要让居心叵测的赵普为他完谎，使自己处于受要挟的境地。

将杜太后的顾命藏于金匮之中，从记录上看是完全有可能的，但从事理

上推断，却多少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即使意见相反，大家还是无法说服对方。

历尽艰难　　宋孝宗即位之谜

秀州小官赵子偁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第六代后裔，公元 1127 年 10 月 22 日夜里，他有了第二个儿子。据说这个孩子生出来时，满屋子的红光直冲天空。小孩子六岁那年，碰上宋高宗选嗣，在数千人中被挑选上，成了皇位的候选人之一。历尽艰难，他终于登上了皇位，他就是南宋孝宗。

宋高宗赵构后宫嫔妃众多，但只有潘贤妃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赵旉。1129 年初，金兵夜袭扬州，正在和宫女淫乐的赵构一下子受了惊吓，从此便留下了不育之症。



宋高宗赵构

高宗到达杭州后，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逼迫赵构退位，立根本不懂事的赵旉为帝。不久，兵变失败，高宗复位，册赵旉为太子。经过这一番折腾，三岁不到的赵旉开始患病。之后的一天，有个宫人一不小心将赵旉房中的金香炉碰倒，落地声把赵旉吓得全身抽搐，病情每况愈下，没过几天便一命呜呼了。

太子夭折后，高宗面临无人继位的窘境。大臣们也感到不安起来，因为储君空缺，必然会引起人心浮动，政局动荡。有人就上书高宗，认为不妨在

宗室后裔中挑选品行贤良的人暂时摄皇太子位。如果高宗生出皇子，到时再退位封藩不迟。高宗接到上书后，大为震怒，觉到这人是在羞辱自己不能生育，下令将此人撤职查办。看到高宗恼怒无比，众大臣就没有人再敢提起这件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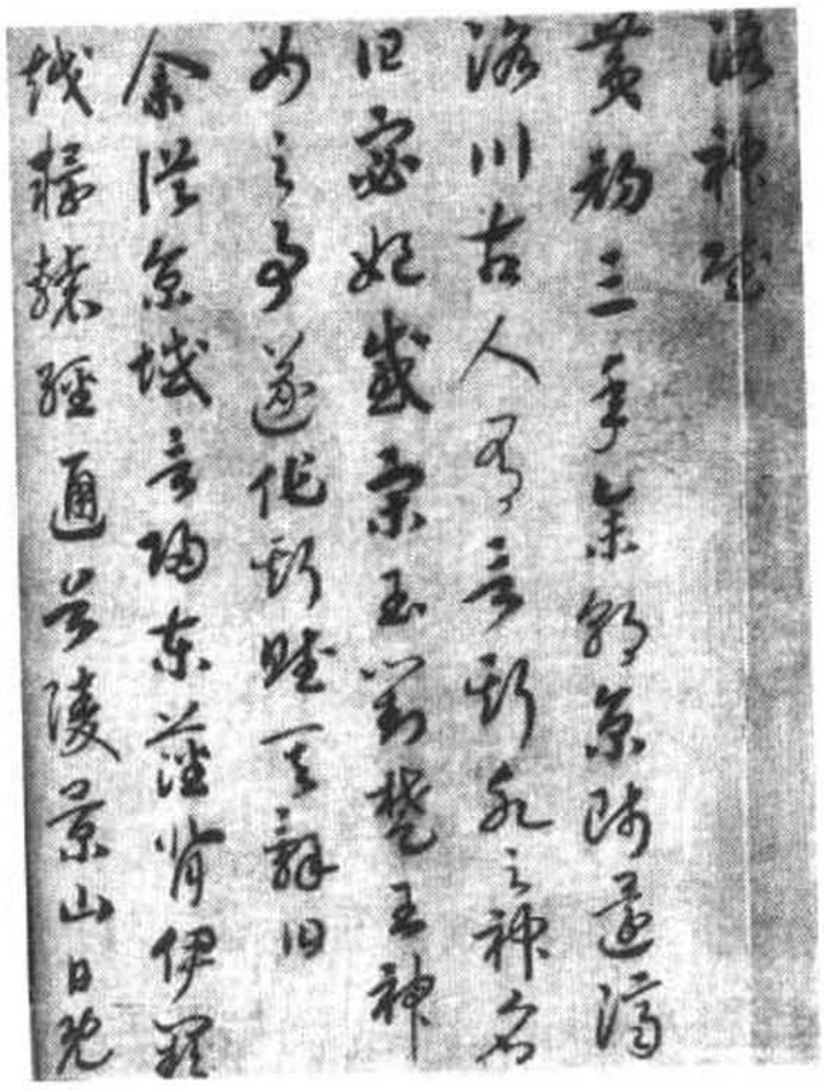
金宋战事相对稳定后，选嗣之事又被提了出来。皇后说她曾做了个奇怪的梦，劝说高宗还是早日选定储贰为好。高宗想想皇位无人继承，终不是办法，于是公开说："太祖皇帝神威英武，但他的子孙却没能承嗣继统。如今多事世乱，他的后裔更是凋零离散。我要效法仁宗皇帝，为天下着想，以慰太祖在天之灵。"

宋太祖死后，弟太宗即位，从此皇位传到了太宗这一系手里，而太祖的后代就默默无闻了。皇位传到仁宗时，因为没有儿子，就选择了自己四岁的侄子赵曙作为太子。仁宗死后，太子继位，他就是宋英宗。这里高宗表明自己态度，要效法仁宗的做法，所选太子最好是太祖这一系的。

高宗有了表示，内外大臣就相继上书，或赞太祖高风亮节，胜过尧舜百倍，或请高宗尽快挑选宗室贤惠者作为太子。高宗一看再拖拉是不行了，干脆表明说要在太祖七世孙"伯"字辈里选一人。为什么一定要选太祖七世孙？因为高宗是太宗六世孙，太祖的七世孙，与高宗在辈分上正好是叔侄关系。

1132 年，朝廷正式派人选嗣。经有关官员的努力，查明太祖七世孙共有一千六百四十五人。在这些人中选出七岁以下小孩十人，再经过一番审查，最后仅剩下两人供高宗定夺。二个小孩一胖一瘦，高宗看了几眼，决定留胖去瘦，令人给瘦小孩三百两银子打发他回家。那个叫伯琮的瘦小孩还没走出殿门，高宗改主意了，说还想再比较比较。二个小孩往前一站，忽然一只猫从跟前经过，伯琮一动也没动，而胖小孩童趣突现，飞起一脚。高宗见状，觉得胖小孩太轻狂，将来是无法将社稷交给他掌管的，于是将伯琮留了下来。从此，六岁的伯琮开始了他漫长的宫廷生活。

伯琮留在宫中的这一年，高宗只有二十六岁，他幻想自己说不定还会生一个儿子。伯琮年纪这么小，将来他的为人怎样也很难说，虽交由婕妤张氏扶养，高宗自己教他读书习字，人也不至于变得太不懂礼仪规矩，但毕竟还要再进一步看看，所以并没有给他正式的名分，只是在第二年让他改名为赵瑗。



宋高宗赵构的书法

1134年，在宫中颇感孤独的吴才人提出也想抚养一个孩子，高宗遂令人又找来一个太祖的七世孙，即五岁的伯玖，赐名为璩。这样，赵瑗就不是惟一的储君候选人了，这引起朝廷内外大臣们议论不断。第二年，领兵在外的大将张浚奏请高宗早定主意，确立正式储君，高宗回答说宫中收养了太祖后代二人，当令他们学习文化知识。至于立谁为储君，支支吾吾没有讲清个所以然。事实上高宗尚存有朝一日自己或许仍能亲生一个儿子的希望，所以不管谁劝他立储，就是迟迟不作表态。

赵瑗九岁那年，高宗在宫中建一座书院，取名“资善堂”，物色了学识和德行名扬一时的宗正少卿范冲和起居郎朱震为他的启蒙老师，进行有系统的读经学礼教育。

七年后，十六岁的赵瑗晋爵普安郡王。看看高宗迟迟不立赵瑗为太子，外面的大臣开始议论纷纷。按皇室规定，赵瑗应独立生活，不能再留在后宫，于是搬进了专门为他建造的郡王府，每月朔望二日入朝参拜。

1140年5月，金兵大举南犯，分两路杀来。消息传到临安，高宗急令岳飞率军御敌。岳飞趁机送上一个密奏，强调要“正国本以安人心”。此前，岳飞曾在入京奏对时与赵瑗见过面，觉得赵瑗英明俊伟。高宗很不高兴，当面对岳飞说：“卿握兵在外，这件事不是你应该管的。”自此他对岳飞疑心加重。赵鼎等人极力主张早立皇子，高宗怀疑这些人可能是另有所

谋，竟将其发配至边地管置。其他的大臣见势不妙，大多三缄其口，不敢再谈及建储之事了。

1143 年底，赵瑗生父在秀州病逝，第二月讣告传到临安。其时赵瑗正在娶亲，接到死讯，左右为难。自己入宫十多年，已作为储君候选人，但现今生父去世，不守丧服孝，也不合礼仪，到底该怎么办？大臣们为这事发起愁来，为赵瑗出主意的不少，各种主张都有，更令赵瑗失去了方向。宰相秦桧对赵瑗从没好感，一直想让赵璩代替赵瑗，这时极力主张赵瑗应该回秀州服孝三年。高宗想想不让他服孝不合祖宗典故，有悖于人情世故，就批准他解职守丧。

三年后，赵瑗服丧毕，仍以普安郡王遥领节度使。几乎同时，高宗加封赵璩为检校少保，进封恩平郡王，出宫就居郡王府。一时赵瑗与赵璩并为郡王，地位相当，号称“东西府”。

吴才人这时已册立为皇后，她常常附和秦桧的意见，想立自己收养的赵璩为太子。从金国归来的高宗母亲韦太后从没有明确表态应该立谁，但从日常的一些言行来看，她是偏向赵璩的。高宗的本意较倾向于赵瑗，认为他俭约孝仁，人挺不错的，但考虑到种种因素，一直无法决断。

随着年龄的增长，赵瑗也经常就时政发表一些看法，由于意见相左，他与宰相秦桧的关系十分紧张。1155 年，秦桧病重，其家人封锁消息，企图让秦桧子代父职，继续执政。赵瑗听说后，马上向高宗报告。高宗其实也觉得秦桧平时所作所为太过头了，正想夺了他的权，于是就亲赴秦家，表面上说是探病，实际上是观察虚实，回朝后马上让秦桧告老还乡。当天夜里，秦桧在忧惧中死去。

秦桧死后，一些大臣再次提出立储问题。晋原人阎安在考进士的策文中大胆地发论数千言，认为高宗挑选太祖后裔于宫中已有二十多年了，对他的考察时间已经很长，但储君却一直未定。恐怕朝廷中的佞臣会暗生异望，朋比结党，成为社稷遗祸。高宗想想确是如此，对阎安的直言深为赞叹，御笔一挥，钦定他为探花。

见到高宗首肯了阎安的意见，大臣们的胆子也大了起来，重新将立储之事提了出来，希望高宗早定主意。这时的高宗对赵瑗仍有些不放心，决定再进一步考察赵璩和赵瑗的优劣。他同时赐给二人宫女各十人，看看他们在女色面前的表现。赵瑗的老师史浩一眼看穿高宗的用意，提醒赵



宋孝宗赵昚是赵匡胤的后代

瑗行事要谨慎。没过多久，高宗又将宫女们召回，逐个派人检查，赐给赵璩的宫女已全不是处女，而赐给赵瑗的宫女却完璧如初。得到这个结果，高宗心中主意已经拿定。

1159 年，韦太后病死，高宗感到已没有人能阻止他立谁为储君了。大臣张焘上言，请求高宗早立储君，两位宗子“谁为君，谁为臣，应当晓谕天下”。高宗回答说：“我也很想立储君，但有种种因素掺杂其间，使我难下决定。明年春天，一定会举行立储典礼。”

1160 年 2 月，韦太后丧事处理完毕，高宗正式宣布：“普安郡王十分贤明，可授少保、使相的职务，爵位进至真王，以示与恩平郡王有所区别。”宰相汤恩退提出，不是皇帝的至亲是不能封真王的，若封藩王可以称为皇侄。现今进封真王，应该确定是皇子的身份。高宗想想事情要做得符合礼制，就干脆立赵瑗为皇子吧。22 日，宫廷内正式举行了隆重的皇子册封仪式，高宗御笔亲书：“瑗可立为皇子，改名玮。”第二天，册立皇子的诏书正式公布天下。史书记载诏书颁下后，朝廷大臣们“动色相庆”，全国欢腾，庆祝持续三十年的立储总算定了下来。

次月，赵璩以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宗正事的身份离开临安，迁居绍兴府。赵瑗历尽艰难，终于成了惟一的皇位继承人。

1161 年，金国完颜亮率军南侵，宋金又一次爆发全面战争。这年 12

月，宋军转守反攻，高宗离京前往建康亲征，赵玮随从前往。在高宗亲征过程中，赵玮表现出了高昂的斗志，亲自安排高宗的饮食起居，帮助整理各种奏章书疏，受到了朝野上下的赞誉。

从建康回来后，高宗发现大臣的心已归属赵玮，遂定下了禅位的主意。1162年5月，高宗颁下一道诏令，宣布立赵玮为太子，开始了禅位的第一步。6月10日，高宗颁旨说自己在位三十六年了，皇太子贤圣仁孝，天下共知，久得民心，皇太子可即帝位，自己称太上皇。次日，高宗退位和孝宗即位的隆重仪式在宫城内同时举行。在相互推让中，已改名为赵昚的皇太子身穿黄龙袍，正式座上了皇帝的宝座。

历经磨难，宋孝宗终于即位了。

挤压残杀　　元太宗蒙哥即位之谜

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继承了汗位。窝阔台死后，长子贵由上台。贵由死后，汗位的争夺趋于激烈。在忽里勒台大会上，术赤子拔都以全局为重，不以长兄的身份和优势的兵力自取宝座，推选蒙哥为汗，使汗位有了归属。

成吉思汗凭借其军事才能，建立了一个规模空前、横跨欧亚的大国。到了晚年，他对自己继承人的问题开始有所考虑。他有四个随他一起东征西讨、骁勇无比的儿子，即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不过四个儿子中，他比较欣赏的是三子窝阔台，觉得窝阔台是个比较合适的汗位继承人。

蒙古人选取接班人按照惯例是幼子继承法，但成吉思汗废除了这一规定，选择谁做接班人由自己说了算。不过新大汗要正式上台，必须在宗亲诸王参加的忽里勒台大会上通过。1227年，成吉思汗病重，他将四个儿子召到跟前，正式提出让窝阔台接汗位，其他儿子要团结一致，互相协助。

其实众子私底下早就在打汗位的主意了，汗位每个人都想要，但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兄弟之间已分化组合了。二子察合台和窝阔台关系较好，长子术赤一看情形不妙，就和四子拖雷卷在了一起，兄弟四人分成



成吉思汗的陵址至今仍是一个谜

了两派。术赤的生母曾被篾儿乞部落俘虏过，返回途中生下了术赤，因而两个弟弟就对他横竖看不入眼，认为与他是同母异父。拖雷对大哥很尊重，两人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成吉思汗生前尽管已决定把汗位传给他，但最喜欢的是拖雷，出征时常带着拖雷在身旁，对他宠爱有加，家里的珍宝财物也全都交给他打理。看到拖雷很有军事才能，成吉思汗又把征集的军队交给他管理，蒙古国大部分的军队在拖雷控制之中。

照理，窝阔台接位的事情应尽早放到忽里勒台会议上讨论，但重重矛盾使得这个会议在两年后才得以召开，蒙古的汗位空缺了两年，由掌握实权的拖雷摄政。总算这个会议召开了，但可以预料的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会议开了 35 天也没有结论，窝阔台的对手毫无疑问是摄政了两年不肯交出实权的拖雷。会上有人提出要按蒙古的旧例让幼子继位，否定成吉思汗的选择，也有人提出还是遵照遗诏让窝阔台即位。这时术赤已病死，拖雷是斗不过察合台和窝阔台两人联手的，看看自己势孤力单，最后只得采取退让的策略，表示支持窝阔台。

元太宗窝阔台上台，使得汗位的争夺一度平息。可是，这样的结局在术赤和拖雷两系的族人中留下了不满情绪，为以后的汗位之争埋下了隐患。

窝阔台继汗位四年后，拖雷就死了，死因说法不一。有说饮酒过度，有说得了急病，另有一种比较可靠的说法是，他喝了愿替窝阔台去死的咒水。1233 年窝阔台亲率大军攻金，拖雷指挥右路军取得了重大胜利。部队回师

时窝阔台得了重病，拖雷侍兄于榻前。蒙古人深信巫术，找来巫师念咒文。巫师说，把窝阔台的病涤除在木杯之中，病就能除去。如果有人把这杯水喝下去，就能代替太宗去死。此时，拖雷为了爱护兄长，便端起杯子喊道："洪福的父亲内定了我兄弟做皇帝，如今如果失去了皇帝哥哥，这么多的百姓谁来管理？这会使金人很开心的。上天啊，饶了我的哥哥吧，让我喝了这杯水去替他见你吧！"说罢，将咒水一饮而尽。窝阔台病好了，拖雷告辞启程，几天后就死去了。许多人认为很明显在这杯咒水中窝阔台是做了手脚的，毒死了拖雷。因为拖雷很有军事才能，他的存在就是对自己的威胁，而且这样做也可以把汗位保持在自己一系之下。

窝阔台因饮酒过度，仅在位十三年就死了，不久察合台也亡故。窝阔台死后，由皇后脱列哥那哈敦监国。这位颇有权术的皇后目光短浅，心胸狭隘，斥贤崇奸，弄得内外离心。1246 年秋天，她召集诸王举行忽里勒台大会，让自己的儿子贵由接承了汗位。

长辈之间的仇恨，也传到了后代的身上。术赤儿子拔都不肯出席忽里勒台大会，上台后的贵由仇恨万分。1246 年贵由即位后，马上发动战争想消灭拔都。贵由患有慢性病，这时借口他的旧营霍真地区气候很适宜他的身体，遂发军前往。当贵由大军接近拔都所在地叶密立时，拔都感到事态严重，坐立不安。拖雷妻原与拔都友善，得知定宗贵由的真实意图，迅速派人通知拔都。拔都遂打出迎接大汗的旗号，发军东进。两军相近，贵由突然死去。什么原因，或说是贵由被拔都害死的，或说是饮酒斗殴而死，至今仍是在个疑案。

贵由死后，贵由妻斡兀立海迷失监国，欲立窝阔台之孙失烈门为汗，理由是窝阔台当初曾有遗诏想立失烈门。

拖雷妻唆鲁禾帖尼很有才干，四个儿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木哥个个能征善战。在与拔都连手后，她想立自己的儿子蒙哥为汗。她很有人缘，各方面的关系处理得十分妥当。拔都是这一辈中的兄长，遂召集诸王选新汗。1251 年 6 月，忽里勒台大会召开，贵由子脑忽、忽察和失烈门等人故意迟到。会上拔都、蒙哥等人提出太宗遗诏早就应该遵行，但太宗窝阔台系为什么以前要立定宗贵由？致使海迷失哑口无言。讨论到最后，拔都说："拥蒙哥登基，胆敢违反者斩。"于是将蒙哥推上了汗位。7 月，蒙哥举行了登基大典，这样汗位从窝阔台系转了过来。

宪宗蒙哥上台，对窝阔台和察合台的后裔放不下心来，感到威胁随时存在。不久有人告密，说窝阔台和察合台的后代诸王要阴谋武装叛乱。是否真有其事，是个历史之谜，但蒙哥宁愿认为这是真的，于是马上下诏赐死海迷失及失烈门母哈特合赤，谪迁失烈门到没脱赤，杀叛将七十多人，流放想叛乱的诸亲王，巩固了自己的汗位。

汗位要紧，兄弟之间就不顾亲情，互相挤压残杀，这无论如何是成吉思汗所不愿看到的，也是他想不到的。

“父子”关系　明仁宗即位之谜

朱棣和太子朱高炽之间矛盾重重，朱棣不断地找太子的岔子，还残杀东宫官员，而朱高炽是逆来顺受，被动应付。父子矛盾最终是否导致了成祖想更换太子，而高炽一系官员是否更换了成祖的遗诏，这些都成了无人知晓的历史谜案。

明朝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武功赫赫的明成祖朱棣驾崩于亲征漠北的返京途中，是年六十五岁。八月，太子朱高炽即位，是为仁宗。关于仁



明成祖朱棣杀了侄子建文帝，自己当了皇帝

宗即位的内容,《明史》抄录于《明太宗实录》和《明仁宗实录》,云成祖至榆木里时,大渐,“遗诏传位皇太子”。“八月甲辰,遗诏至,遣皇太孙迎表开平。”丁巳,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洪熙元年。从表面上看,仁宗的即位是十分平稳有序的,根本不见围绕着皇位是否有过争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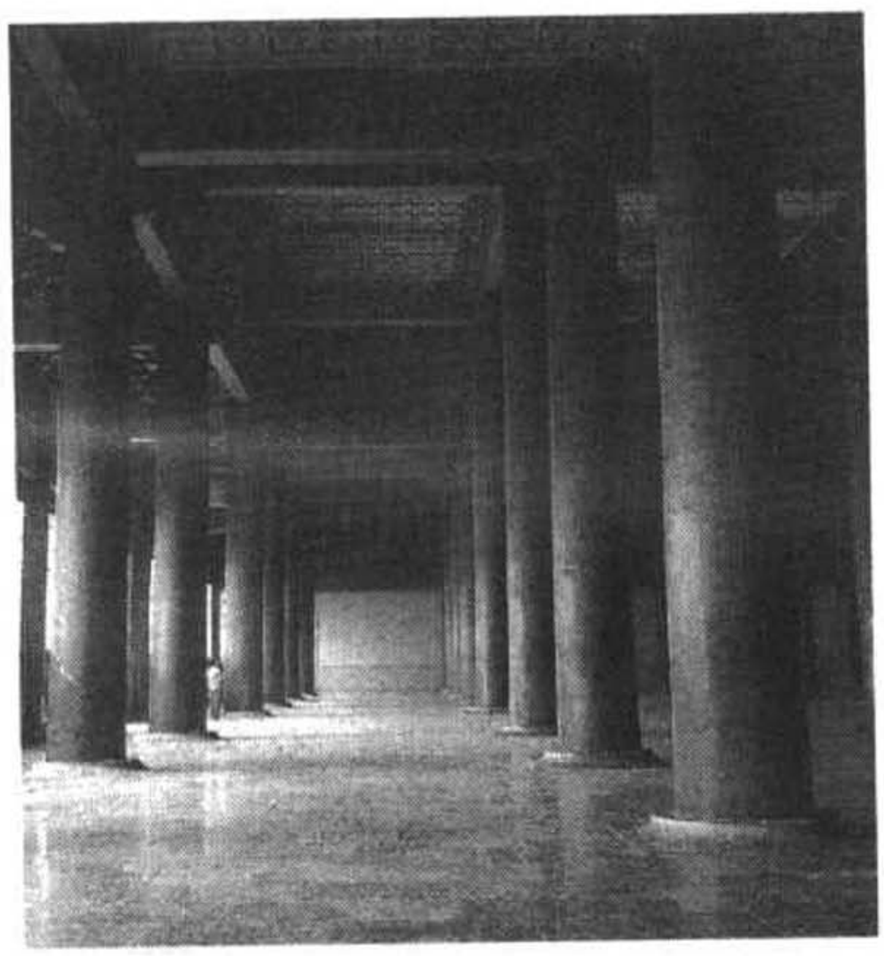
朱高炽是朱棣的长子,洪武二十八年(1395)立为世子。成祖发动靖难之役,他留守北平。建文元年(1399)十月,以万人拒官军五十万,北京城赖以全。明成祖夺得皇位,朱高炽为他稳定后方立下了重要功绩。明成祖即位后,立嗣建储使朱棣很费脑筋。根据明初规定,“立嗣以嫡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成祖仁孝徐皇后共生三子,长子朱高炽理所应当即皇太子位。不过朱棣并不想让朱高炽成为储君,理由是他并不喜欢朱高炽宽厚温敦的性格。朱棣自己的皇位本是抢来的,他当然知道自己父亲朱元璋因为确定了嫡长子、长孙继位的原则,选择了优柔寡断的建文帝作为继承人,结果连皇位都保不住。现在轮到他自己选择储君,他怎么会选一个与建文帝相同性格的朱高炽?朱高炽体态肥胖,不能骑射,成祖真是恨铁不成钢。

成祖在三个儿子中最喜欢的是二儿子朱高煦,因为他的性格与成祖十分相像。就私心而言,他又钟爱于小儿子朱高燧。但朱高煦屡立战功,多次救成祖于危难之中,成祖曾许诺夺得皇位后立他为太子。他性格十分机智,周围聚集着一大批在靖难之役中立了大功的大臣,这些武臣很想让他做太子,因而一再在成祖前讲他的好话。不过,成祖以前怎样的许诺和偏心,大多数文臣士大夫是不能理解接受的,他们认为“立嫡以长”的规矩是不能破坏的。永乐元年九月,群臣不断上表请立世子朱高炽为皇太子,分封到各地的成祖几个兄弟也不断上疏,但成祖以“长子智识未广,德业未进”来搪塞,不想马上表态。不过各方大臣并不就此为止,还是不断上奏,成祖迫于舆论压力只能在第二年三月以朱高炽为太子,四月封高煦为汉王,高燧为赵王。

太子虽立,但成祖并不喜欢这个太子。凡是这时起劲地主张立太子的人,事后都受到了成祖的严厉惩罚。如解缙当初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后来被成祖说成是“私谒太子,无人臣礼”关了起来,之后又被锦衣卫活埋于雪中冻死。都督陈铭、工部左侍郎陈寿、刑部侍郎思温、北京行部左侍郎马京等都因为与太子的关系被立个什么罪名,关进监狱被折磨致死。大理寺右丞耿通因替太子讲了几句话,成祖说他是“坏祖法,离间我父子,不可恕,其置之极刑”。其他如夏原吉、杨士奇、杨溥等人,都曾因太子的事情而

进过监狱。重臣中能够平安无事的，要么党附汉、赵二王，要么对立太子之事保持缄默而不讲一句话。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朱棣不喜欢的是朱高炽成为皇位继承人，而不是不喜欢作为儿子的朱高炽。他为了身后朱氏皇权的稳固，才不愿传位给性柔懦弱的长子。事实上，太子所做的许多事反映出了这种性格弱点，明成祖是十分恼火的。如永乐九年北征蒙古刚回到南京，他就到右顺门览百司的奏牍，发现太子御案上的镇纸金狮被随意搁置于案侧，几乎要坠落至地，成祖教训太子说："天下虽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谨，小不谨而积之，将至大患。小过必改，小不改而积之，将至大坏，皆置危之道也。"简直到了小题大做的地步。永乐十二年，成祖北征回国，太子遣人迎接车驾慢了一点，"且奏书失辞"，成祖逮治了大批东宫官属，但这实际上是在给太子一个警告。成祖对太子很有意见，他多次让大臣私底下监视太子，"密令审查太子事"。



十三陵中，朱棣的长陵是第一个建成的，其中棱恩殿是长陵地面建筑中的主要建筑

根据上述内容，有人认为从当时的实际情形来看，明成祖最后有可能是想废储的。在最后一次亲征漠北时，还未达到军事目的，他大约预感到在世之日不多了，就决定要班师。七月十四日，他问内侍海涛，到北京还要几日。他曾经五次亲征，对出塞的来程去途早已熟悉，而问回京的时间无非是反映了他返京的焦急心情。晚年他身上的疾病已经发作，可能他预感到不祥的事情将要发生，所以急欲赶回京去处理皇位继承的大事。

《明太宗实录》记载，成祖在返京途中，曾对杨荣、金幼孜说："东宫历涉年久，政务已熟，还京后，军事悉付之，朕惟优游暮年，享安和之福。"既然成祖如此相信太子，那么让太子即位就可以了，他也不应有什么身后之忧而急于赶回京城了。即使有什么事要交待，写个遗诏就可以了，而问题是成祖死前并未立过遗诏，因为如果他中途立遗诏，必会被身边心向着太子的大臣篡改。有学者认为，《明太宗实录》中抹杀了成祖与太子之间几乎已不可调和的矛盾。

《仁宗实录》记述了明成祖刚死时的情形：成祖刚崩，中官马云等皆"苍黄莫知所措"，于是就秘密召杨荣、金幼孜入御幕，讨论丧事。有人想用成祖的口气写成敕，遣人驰报，杨荣说："皇帝在位称赦，如果死了还称赦一看就知是假的。"乃命"中官备以大行皇帝崩逝月日并遗命传位之意启皇太子"。对这段话进行分析，发现成祖死时仅太监数人在身旁，临死前未留下任何遗言，其次，如果有遗言留下可能对皇太子是不利的，所以太监们不惜冒乱命的风险，伪托成祖手笔写敕安排太子即位。

拿到遗诏的仁宗最初以为朱棣原谅了他，留下遗言使他顺利即位，但当太监讲给他听事情的经过，他百感交集，感激地加赐杨荣为工部尚书，并兼前官，享食三俸。

上述观点认为仁宗的即位究其实带有一定偶然性，成祖是违心立朱高炽为太子的，他一直有废储之念，在临终前决心改换皇位继承人，但因中途崩殂，未能如愿。由于太监及杨荣等伪造了遗诏，结果是违反成祖意愿，使仁宗顺利即位了。

不过也有一些人对仁宗的即位过程有不同看法。这种观点也同意明成祖偏爱高煦和高燧，但永乐十四年(1416)高煦因事差一点被废为庶人，永乐十八年大臣孟贤等曾想毒死成祖拥高燧为帝，高燧尽管没有被杀头但失去了成祖的信任。成祖死前，朱高炽的两个竞争对手已经无力再与他相争，因而用改换储君来解释成祖临死前急忙赶回京是欠妥的。

这种观点认为自朱高炽立为太子，成祖每次离京朝中政务都是由太子来处理。成祖晚年重病缠身，长期不能临朝理政，朱高炽成了事实上的统治者。从整个永乐时期来看，朱棣与朱永炽两人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充当的角色也不同，军政重务的决策大权由朱棣掌握，高炽只负责日常政务，因此朱棣是主角，而朱高炽是配角。正因为高炽多次受命监国，手中握有很大一部



明仁宗朱高炽是朱棣的长子

分实权，周围又有一批实权人物的辅佐，使性格多疑、权欲极强的朱棣产生了一种失落感和危机感，便对高炽采取限制和防范的措施，有意听信和纵容高煦等人的诬陷，不断寻衅关押和诛杀太子的东宫官属，以打击和削弱太子的政治势力，巩固和维持自己的专制统治。这样说来，明成祖和朱高炽之间的矛盾不涉及到储君位置问题，而仅是皇帝和东宫之间的矛盾。

成祖死，朱高炽在杨荣等人的配合下，从容应变。接到杨荣的消息，他一面安排正常的悼念活动，一面密召北征大将军率数千骑兵回防京师，迅速控制了局势，保证了皇位的顺利交接。

明仁宗朱高炽从立为太子到正式即位，的确有很多事情十分奇怪。太子和父皇之间的复杂关系，为他的即位充满了悬念。这些矛盾的实质究竟是怎样的，应该说我们今天还不能完全搞得清楚。

四大贝勒　皇太极争位之谜

努尔哈赤死后，四大贝勒应该轮流执政。但轮流执政的制度没有形成，最后登上皇位的是皇太极。皇太极是预定的接班人，还是众望所归被大家推举的，或像大家所说汗位是从兄弟手中抢来的？皇太极的继位真有许多疑点吗？



努尔哈赤是清朝开国皇帝

清太宗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母为孝慈高皇后。史书上说他仪表奇伟，聪明过人，脸色红润。1615 年，努尔哈赤将最初设立的黄、红、蓝、白四旗扩建为八旗，二十二岁的皇太极为正白旗主旗贝勒。第二年，后金建立，努尔哈赤令四大贝勒共理政务，皇太极是四大贝勒之一。四大贝勒每月一人轮流值事，共同处理国家大事，权势显赫。他常随太祖征讨，运筹帷幄。1626 年，努尔哈赤死，大贝勒代善以皇太极才德冠世，与其他贝勒一起请皇太极嗣位。皇太极推辞再三，但众人继续坚请，他只得遵从众人的意思在沈阳即位。1636 年，他改国号为大清，改族名女真为满洲，自称宽温仁圣皇帝。可以这样说，努尔哈赤是清朝的开创者，而皇太极是清朝的奠基人，他是清朝开国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人物。

后代的人们对皇太极的继位有许多疑点，人们常常会问：大贝勒代善为什么自己不即位而非要拉了其他人一起请求最小的皇太极登基？皇太极自己说是不能违反众人的意愿而勉强嗣位，这样的一套做法是否有过分做作的嫌疑？对此，许多人见仁见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女真族选择继承人与汉人不同，汉族的嫡长子继承制并不为他们认同，谁有才能，谁就有可能得到汗位。努尔哈赤最初挑选的继承人是长子褚英。

褚英十八岁时因作战勇敢被封为洪巴图鲁，即大勇士的意思，深受努尔哈赤的器重。二十七岁时封为阿尔哈图·土门，意为有谋略之人，实际上是努尔哈赤赞赏他善于动脑子。不过，褚英性格急躁，年轻气盛，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得罪了不少人。不久，众贝勒及大臣有意发难，一再在努尔哈赤前说他的坏话，努尔哈赤渐渐对褚英有了看法。有口难辩的褚英焚表告天，诉说自己的冤情，又被人告发是在诅咒努尔哈赤，不明就里的努尔哈赤于1613年愤然下令处死褚英。这样一来，皇太极就有了继位的机会。据朝鲜史籍《鲁庵文集》说："老汗临死前说：皇太极能完成我的意愿。"如此说来，皇太极的即位是努尔哈赤的意思，是顺理成章的。

不过有一种观点认为皇太极的继承汗位并不是努尔哈赤的意思，而是由诸贝勒共同推举的。努尔哈赤在褚英死后，未立嗣子，但确立了八旗制度和四大贝勒共理朝政的制度，即继承汗位的人必须由诸贝勒共同推荐。努尔哈赤死的当天，代善长子劝代善说："四贝勒（指皇太极，皇太极在四大贝勒中年龄最小）才德冠世，特别得到先帝的看重，而且众人对他也诚心悦服，他应该继大位。"代善认为确是如此。第二天，诸贝勒议事时，代善提出动议，请皇太极即位，各位贝勒也表赞同。中间确有相互推让的局面，皇太极前后有三天不同意即位，而代善等人硬是拉着他登上了汗位。与各个时期刀光剑影的争抢形成鲜明对比的这种推举，并不是不可置信的，而是极有可能的。因为后金民族崇尚武功，而皇太极从小就出征打仗，努尔哈赤曾经说过："皇太极将来是父兄的依赖，就像身体上一定要有眼睛一样。"这样看来，皇太极的军事才能确是超过其他人，谋略、威望也是在其他人的之上，代善在诸贝勒中的资格最老，他一推举，其他人跟着呼应，才能卓著的皇太极就被推举了出来，这并不足为怪。

也有观点认为皇太极的汗位是从多尔衮手中抢来的，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先生就持这种看法。朝鲜著作《春坡堂日月录》说："努尔哈赤临终前，对代善说：九王（指多尔衮）应该继位，但他年纪很轻，你可以当摄政王，以后传位给九王。代善认为这可能会使他人认为自己有夺位的嫌疑，遂立皇太极为汗。"蒋良骐的《东华录》记载了多尔衮自己的话也说"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意指皇太极是篡夺汗位的。一些人由此推断皇太极为了从幼弟多尔衮手中夺汗位，不惜让多尔衮的母亲大妃纳喇氏殉葬。持相反观点的人认为努尔哈赤痛恨多尔衮的母亲，多尔衮年纪又这样小，他无论如何是不会

被立为继承者的，这恰恰是多尔衮在为自己后来的“擅作威福”寻找理由。皇太极继位后，对多尔衮这个小弟弟关心有加，尽力提拔，两人之间感情深厚，夺位之说是无从谈起的。

也有观点认为无论是多尔衮还是皇太极，都不是努尔哈赤生前立的嗣位者，皇太极之所以能登上皇帝，是他通过激烈争斗，力克竞争对手而得到的。四大贝勒之间，二贝勒阿敏是皇太极的堂兄，其父舒尔哈齐获罪被圈禁至死。阿敏自己也犯下大过，自然没有资格也没有条件争夺汗位继承权；三贝勒莽古尔泰是皇太极的五兄，有勇无谋，生性鲁莽，军力较弱。他的生母富察氏曾因过失获罪，莽古尔泰竟亲手杀死母亲。他的名声比较差，可做统兵大将，但不能做一国之君，更没有条件争夺汗位。大贝勒代善有资格、有条件也有可能继承汗位。代善性格宽柔，深得众心，且军功多、权势大。努尔哈赤曾预示日后由其袭受汗位，说：“百年之后，我的幼子和大福晋交给大阿哥收养。”大阿哥就是代善。皇太极虽怀大志、藏玄机、有帝王之材，但同乃兄代善争夺汗位的继承，各方面均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不得不暗设机关。代善由于与纳喇氏的关系，被皇太极使了计谋，让他在努尔哈赤前失去了信任，所以实际上皇太极是夺了代善的汗位。

最后一种观点，实际上还是比较可信的，因为皇太极用贬低他人的办法取得了汗位，而即位后，不敢大意，又用尽心计对付三大贝勒。努尔哈赤规定的四大贝勒轮流执政，至皇太极时，因三大贝勒都是兄长，朝贺时，他们和皇太极都南面并坐，实际上仍是共同执政。公元 1629 年，皇太极以三大贝勒轮月执政，实在不好意思太辛苦三位兄长，让三大贝勒以下诸贝勒每人都按月理事，实际在削弱三大贝勒的权力。稍后，又设八大臣、十六大臣与诸贝勒共同议政。二贝勒阿敏因征朝鲜后不想回来，被皇太极历数十六大罪状幽禁起来，1640 年死于幽所。三贝勒莽古尔泰在朝廷里与皇太极发生争吵，又拿出刀在手里摆弄，被削贝勒名号。不久又改各大贝勒朝贺时与皇太极并坐的体制，仅皇太极一人南面中坐，莽古尔泰忧愤而死。代善因为宴请了莽古尔泰的妹妹，使皇太极大为震怒，代善几乎被削去贝勒名号。其他各旗贝勒人人震恐，只得服从皇太极的威势。代善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皇权的威胁，1635 年，皇太极宣布了代善的四大罪状，革去贝勒名号，削夺职位。至此三大贝勒全部清除，皇太极已没有对手了。

无论是文治武功还是机谋，皇太极的确比其他三位贝勒要技高一筹，因

而成为赢家是必然的事情。1636 年，皇太极众望所归地被拥立为皇帝，定国号为清。

先帝遗诏　　康熙继位之谜

顺治帝失去爱妃，悲痛过度，匆匆地离开了人间。他临死前，皇宫里最要紧的事情当然是商量继位者的问题。当时，一位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话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应该挑选生过天花有免疫力的皇子继位。顺治认为汤若望的意见很对，于是决定立玄烨为皇太子继承皇位



康熙帝八岁即位，据说与他生过天花有关

爱新觉罗·玄烨，清世祖顺治帝的第三子。1661 年，失去爱妃悲痛过度的顺治帝又得了天花，确诊不治后，马上召学士麻勒吉、王熙至养心殿，撰写遗诏，安排后事，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选一个适当的继承人。正月初七子夜，顺治死，颁遗诏于天下。遗诏是这样的："太祖、太宗创垂基业，所关至重，元良储嗣，不可久虚。朕子玄烨，佟氏妃所生，年八岁，歧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在这个诏书中，还决定以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保翊幼主，佐理政务"。初九日玄烨即位。那么，遗诏中为什么会定玄烨即位的？

康熙皇帝被立为皇帝，完全与天花有关。

顺治帝共有八个儿子，其中有四个早已夭折，剩下的也都年岁幼小。最大的是次子福全，时年仅九岁，三子玄烨时年八岁。顺治帝生前在指定继承人选上并没有一定的意向，临终前想想皇子们都很小，难以控制局面，遂想到了一位从兄弟，但是孝庄皇太后和各位亲王坚决反对，他们都认为应该从皇子中选择一位继承者。但皇子有四个，应该选谁呢？论长幼，当立皇二子福全；论嫡庶，四位皇子的出身差不多。但皇三子玄烨的母亲佟佳氏的地位似比其他三妃高一些，因为那三位妃子的父亲，史书均没有记录他们的名字和官职，而佟佳氏之父佟图赖是辽沈旧人，多年从征后为开国功臣，并升任定南将军，汉军正蓝旗都统。孝庄皇后最欢喜三皇子，而顺治认为福全年长，理应立他为帝。满洲亲王大臣中有人认为玄烨母亲佟佳氏是汉军旗人，没有满族血统。在最后的争论中，顺治帝的母亲孝庄太后选择了玄烨而没有选择比玄烨稍长的福全。玄烨的被立，尽管与他自小表现出的品质和灵敏聪颖有关，但这并不是主要的，根本的原因是与天花有关。

当时备受顺治帝信任，并被其称为“玛法”的钦天监监正、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观点发生了重要作用。他认为：应立已出过天花的玄烨为继承人，因他对天花已有终身免疫力，可免其再遭不幸，而福全没有得过天花，没有免疫力，得时时小心提防着这种可怕的病症，难免会像顺治帝一样出现悲剧。在当时，天花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传染疫病，如果有人染上天花，必须实行严格的隔离，连皇子和公主们都不例外，许多皇子和公主就是得了天花后不治而死的。现在汤若望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作为立嗣君的根据，为祖宗社稷着想，孝庄皇太后不能不认真考虑汤若望的意见。这一点，在顺治帝临死前得到了首肯，而孝庄太后也是十分赞同的，所以得过天花成了玄烨登上帝位的重要条件。

那么，玄烨是在什么时候得过天花的？

玄烨出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当时北京城内天花泛滥成灾，满族王公亲贵吓得到处躲藏，连皇帝也不例外。为了避痘，出生不久的玄烨在内务府正白旗汉军包衣曹玺之妻孙氏的携带下前往皇宫西华门稍北的一座府第居住。孙氏是玄烨的保姆，就是后来写《红楼梦》的曹雪芹的曾祖母，数十年后的康熙对这一段经历仍记得十分清晰。康熙六十年(1721)曾颁谕说：“今王大臣等，为朕御极六十年，奏请庆贺得礼。钦惟世祖章皇帝，因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

歉之处。”不过玄烨在这场天花流行中仍然未能幸免，但染天花后，多亏孙氏精心照料，不久即痊愈回宫。康熙自小就在祖母孝庄太后的照料下成长，所以他的祖母尤其喜欢他。

得过天花的康熙皇帝，脸上留下了不太显眼的痘痕，见过他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后来在给法王路易十四的报告中对康熙的长相有过详细描写，说他“威武雄壮，身材匀称，而比普通人略高，五官端正”，“鼻尖稍圆，略带鹰钩状，虽然脸上有天花留下的痕迹，但并不影响他英俊的外表”。《俄国使团使华笔记》中有荷兰人伊兹勃兰特·伊台斯对康熙容貌的描述，也说康熙脸上有麻点：“康熙与其同时代人路易十四一样，脸上有麻子。选择康熙作为他死于天花的父亲顺治皇帝的继承人，部分原因是康熙已生过天花，故可望张寿。”

决定让玄烨继位后，顺治帝仍有些不放心，所以他改变了辅政王摄政制度，采取了削弱宗室辅政王的权限，由自己谕定的非宗室亲信大臣辅政，所以他让索尼等四人为辅政大臣，由他们协助母后辅助小皇帝。

用今天科学的眼光来看，当时选择玄烨是完全正确的。

一串玉珠　　雍正登极之谜

康熙皇帝有皇子三十五人，能继承皇位的有好几个，最后皇四子胤禛取得了胜利。不过人们对这个胜利有很多怀疑，有人认为是他改动过诏书，抢了皇十四子允禵的位子，也有人认为他是弑父夺位。持相反意见者认为胤禛是合法继位，有康熙遗诏可作证明。

康熙共有皇子三十五人，排序的有二十四人，成年且受册封的只有二十人。康熙十四年(1675)，康熙决定册立皇太子。同年的十二月，他立年仅一岁半的皇二子允礽为皇太子。长大后的允礽能骑善射，有时随父出征，有时在京代父办理军国政务，但他日渐养成骄纵恣行的性格，使康熙大为恼火。1708 年，康熙废允礽，并怀疑他参与了与索额图一起的篡权活动。但当时康熙的其他皇子们的势力都已形成，对皇位继承都虎视眈眈，且阴谋陷害皇太子的事情屡有发生，康熙也发现自己可能听信了谗言，遂于 1709 年又复立

允礽为皇太子。三年后，康熙发现太子在结党不轨，并暗中派人观察自己的行动，便再次将皇太子废黜，并永远禁锢在咸安宫。此后，诸王大臣要求重新册立太子，均遭康熙驳回。

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帝在畅春园斋戒期间，突生疾病。康熙临终前，急召皇子和大臣至御榻前，宣布："皇四子人品贵重，一定能继承大统，应该让他登基，即皇帝位。"皇四子就是清世宗胤禛，登基后改元雍正。

对雍正的继位，历来为人们注目，但这是很难搞清楚的一个问题。一些研究清史的著名专家如孟森、王锺翰等认为雍正是矫诏夺位的，今天我们看到的康熙遗诏是伪造的，这种观点出现较早，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

矫诏夺位说认为康熙帝对胤禛并无好感，他最中意的继承人其实是皇十四子允禵。康熙五十七年(1718)，康熙决定西征准噶尔，正式任命允禵为抚远大将军。由于当时西征之役意义重大，涉及到清朝今后的安危，大将军的位置实际是众皇子逐鹿的对象，而十四子担任这个职务，是破格的措施。出发前，康熙还亲自行礼，举行授大将军仪式。康熙还对青海蒙古部落的首领说：大将军是我皇子，确系良将，他有带兵的才能，所以让他掌生杀重任。你们众人的所有军务，都要遵照大将军的指示。这些话实际上说明了允禵已是康熙心中选定的皇嗣。在康熙的最后四年，允禵在政治上逐步成为十分显赫的人物，越来越多的王公大臣和督抚大吏将他作为实际上的皇太子看待。允禵的气质、品格受到康熙的重视，康熙用各种方式树立允禵的威信，抚爱他的子女，视为政治上的知己，双方感情深厚。然而康熙帝于 1722 年突然死去，传位给允禵的计划也以失败而告终。

不少人认为雍正是矫诏嗣位的，他将"十"字改成了"于"字。胤禛在位时就有人在一部叫《大义觉迷录》的书中说："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成于字。"也有人认为雍正将"禎"改为"禛"。十四阿哥允禵原叫胤祯，康熙遗诏传位给胤祯，却被改成"胤禛"，从而造成雍正继位。与这种说法相近的一种观点更进一步认为雍正本不叫胤禛，只是为了符合诏书上的"胤祯"读音，改名为胤禛。另一种说法是康熙在临死时说传位给十四子，但因舌头蹇涩，当说到"十"字时，略一停顿，再说出"四子"。负责记录的步军统领隆科多是胤禛的舅舅，故意传旨说皇上单召四皇子见驾，有意漏说"十"字。

还有一些人认为，雍正死后不埋在清东陵而重新开辟一个陵区，说明他

得位不正，他是没有脸面也不愿意和他的父亲康熙葬在一起。

也有人认为雍正是发动了一场政变，弑父得位的，这种说法清朝时期已有流传。《清朝野史大观》说，康熙帝垂危之际，只有胤禛一人在身旁，康熙帝欲召见诸王大臣和皇子，以托付后事，但无一人前来，他心知有变，用尽全身力气将手腕上的一串玉珠掷向胤禛，不久就传出皇上驾崩的消息。而《大义觉迷录》说康熙病重时，雍正递上了一碗参汤，康熙就一命呜呼了。后代学者进一步推测说参汤里的毒是隆科多下的，当康熙中毒不省人事时，他一面马上派出军队控制局面，一面传假遗诏，宣布康熙已传位给胤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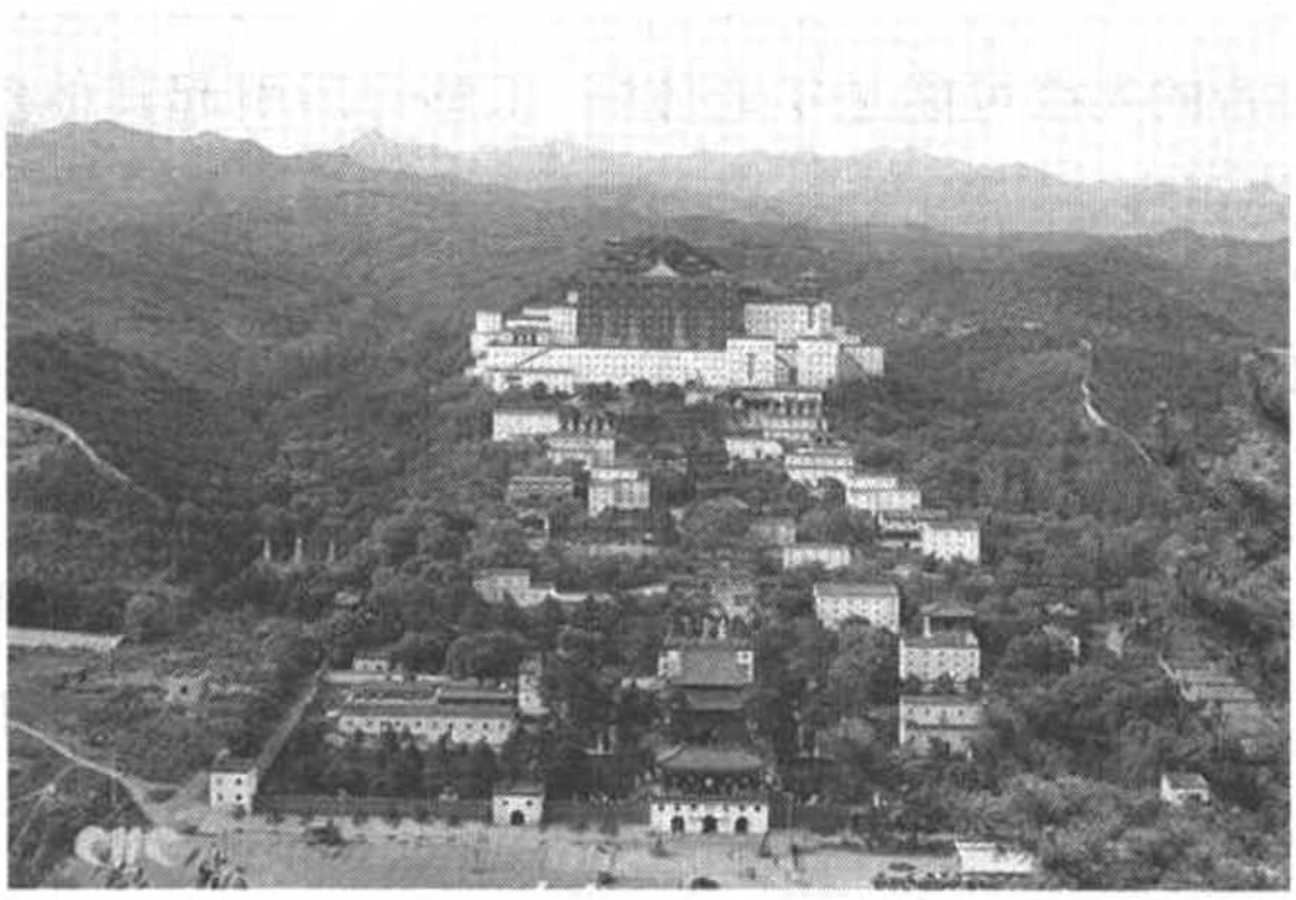
有相当一部分的学者认为雍正弑父说是不能成立的，康熙被毒死更经不起推敲。康熙一向怕被害，他在年老时更对周围的情况小心提防，谋害他谈何容易。他曾经说过他对人参是不感兴趣的，因此在人参汤里投毒是不可能的。康熙帝的死因可能是年老体弱，患感冒后引起其他疾病并发后不治而死，是寿终正寝。

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开始，有一部分人渐渐认为矫诏说也是不能成立的。康熙的遗诏是用满文书写的，用满语宣读，不可能被篡改。至于说遗诏原文是“皇位传十四子胤祯”，它的书写方法不符合清朝制度。因为皇帝的儿子一定要称为皇子，如果有传位胤祯的诏书，就应写作“皇位传皇十四子胤祯”，若将它的十、祯二字加以改易，则原文变为“皇位传皇于四子胤禛”，显然不通，反倒暴露出作伪者的阴谋，这样清世宗就不能以此继承帝位了。清世宗原名就叫胤禛，这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说他为了与诏书中的“胤祯”对上号而盗用了“胤禛”，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在反对矫诏说的同时，他们认为雍正是合法继位。康熙与十四子允禵之间，父子情深，但远不能说允禵就是皇嗣。如果当时真有诏书传位给他，篡位者雍正焉敢把真命天子容留于世，不仅在位不杀他，遗诏不讲杀他，从容使嗣子乾隆封他为王？实际上，康熙十分喜欢胤禛，他八岁时就跟着康熙出塞北巡，十岁时受封贝子，三十二岁时由贝勒晋封为亲王。他先后有二十二次参与了祭祀，次数之多，居诸皇子之冠，他有比其他皇子更多的机会过问国家政治、钱粮和皇家内部事务。

在立储问题上，康熙很不成功，为此弄得焦头烂额，到晚年更是心灰意冷。康熙六十一年春三月，胤禛请皇上到自己的赐园圆明园，在牡丹台景区用膳，观赏盛开的牡丹。宴席上，康熙见到了胤禛的儿子弘历，康熙帝对这

位皇孙特别喜爱，降旨将他宫中抚养。从此，康熙为他选定了武术教师，教他学习射箭和使用火器，还教他读书，讲解文义。这年四月，康熙帝巡幸塞外，十多位皇子随驾前往，皇孙弘历也在这个行列中。经过半个月的跋涉，到达避暑山庄。这时康熙安排弘历住到离皇帝寝宫烟波致爽殿很近的万壑松风殿，这是连皇子们也享受不到的殊荣。康熙批阅大臣的奏章时，弘历侍立一旁，康熙为他准备了书案，在边上学习。康熙还在弘历的生母面前不止一次地称赞这个当时还是雍亲王福晋的儿媳妇是有福之人。康熙曾说弘历“伊命贵重，福将过予”，如此喜欢弘历，他如不将帝位传给弘历的父亲胤禛，而传给别的皇子，这样的话又从何说起。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康熙传位胤禛，实为顺理成章之事，并非夺嫡。



承德避暑山庄

人们指出，雍正是受到皇父康熙信任的，还派他到天坛代行祭天大典，这说明康熙临终之前有意让雍亲王继承皇位。保存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的《康熙遗诏》，上面清楚地写着：“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这份遗诏与《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的记载一模一样，是完全真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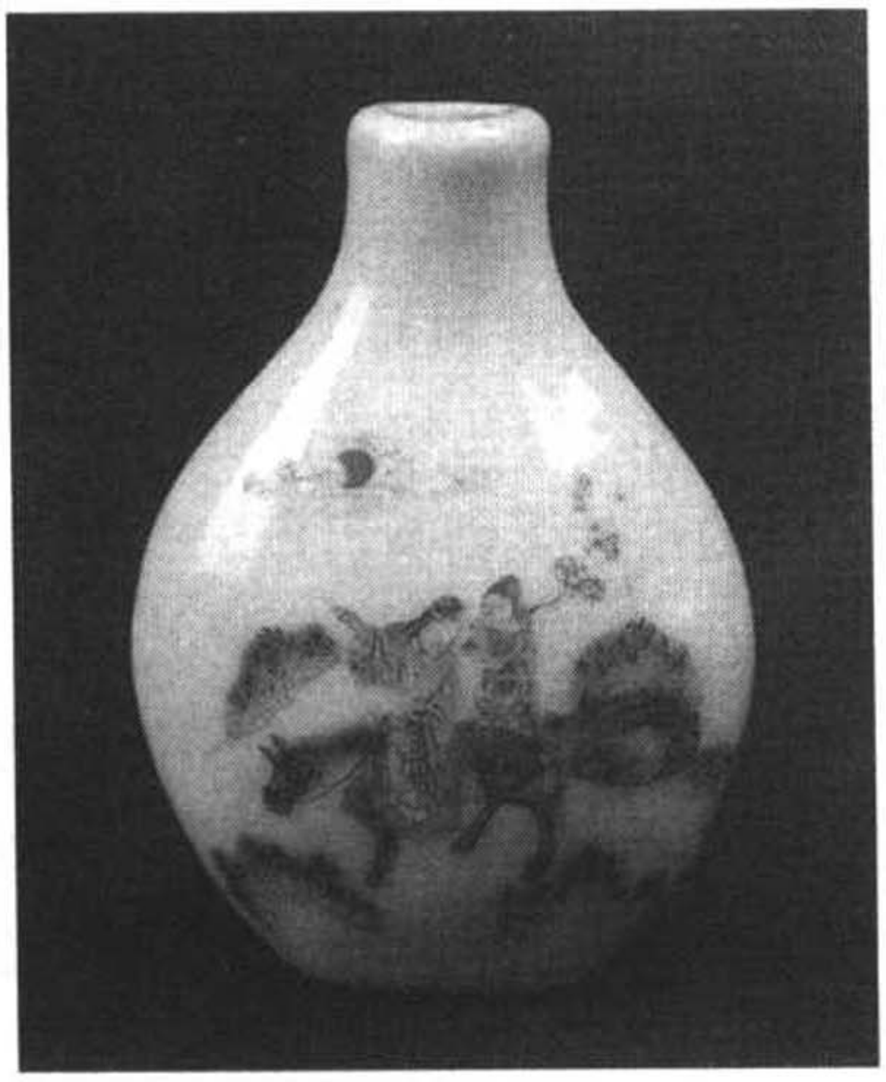
但反对者认为这份《遗诏》是假的。遗诏署的时间是康熙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是康熙逝世的那天，然而雍正是在十六日才公布出来，而且只宣读了满文体，引起御史汤保等人参奏宣读诏书的鸿胪寺官员，指责他们没有宣布汉文本。实际上当时汉文本还没编好，无从公布。这个诏书一看就知是雍正搞的，根本不是康熙的亲笔，也不是他活着的时候完成的，所以不能作

为他指定胤禛嗣位的可靠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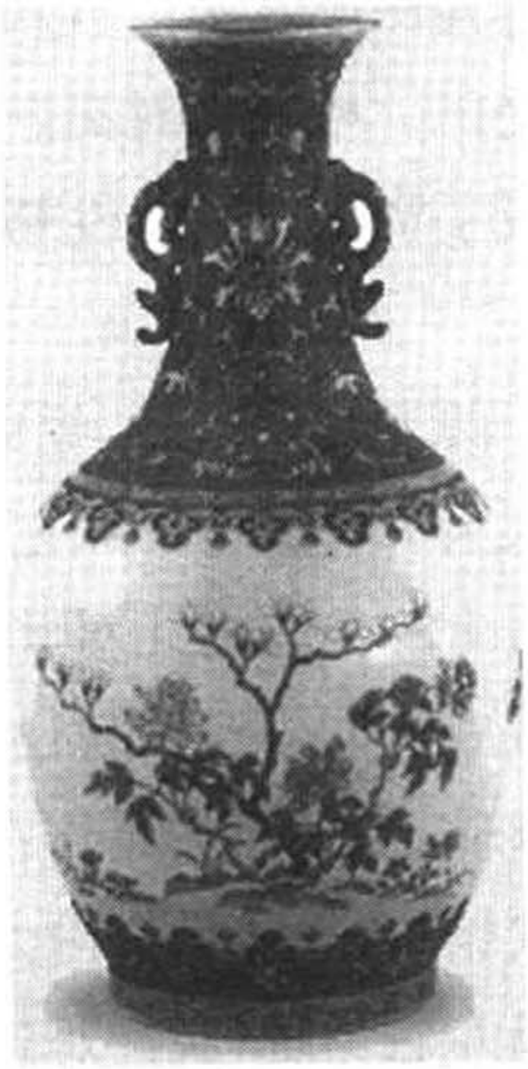
真真假假，展现在读者前的观点是眼花缭乱。雍正的登基可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扬长避短　　咸丰继位之谜

咸丰皇帝是清朝最后一位通过秘密立储继位的皇帝。道光共有九个儿子，但最喜欢的是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訢。皇四子仁孝，皇六子聪颖，长期以来他在两个儿子中无法决定立谁为储君。晚年在南苑校猎和病重中的召见，两位皇子不同的性格和表现，使道光最后下了决心。



清道光《骑驴问道图》烟壶



清代道光年间粉彩花卉纹瓶

道光皇帝一生共有十个公主、九个皇子。其中长子奕纬死于道光十一年(1831)，终年二十三岁。二子奕纲、三子奕继夭折早殇。四子奕詝生于道光十一年长子奕纬死后的两个月。皇五子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过继给嘉庆第三子绵恺为嗣，袭郡王位。皇六子奕訢，是诸皇子中颇受道光钟爱的一个。道光晚年，又陆续得了皇七、皇八子和皇九子，但都年幼无知。

道光即位后，并没有按清朝惯例马上着手秘密建储。他为什么没有将长子奕纬立为嗣君，至今仍是一个无人知晓的谜团。不过从道光后来在立储时极为谨慎的性格来看，可以这样进行推论，他是希望在决定接班人时有更多的挑选机会，并不是像一些人说的是犹豫不定。因为奕纬之后，二子、三子幼殇，可以选择的嗣君只有奕纬一人，是否建储并没有意义可言。道光十一年以后，随着奕纬的过世，几个小皇子的出生，道光才面临着建储这个本应早就解决的问题。在奕訢为长的几个皇子中，道光眼光注意的主要是皇四子和皇六子。

生于道光十二年(1832)的奕訢，母亲为道光妃博尔济吉特氏。奕訢六岁时，道光皇帝专门为他配备了老师进行正规教育，他聪明好学，渐渐在文化课程和骑射训练中比其他皇子接受更快。奕訢在众皇子中，与皇四子奕詝关系最为密切，两人仅相差一岁，同在上书房读书，同时接受武艺教育，兄弟感情深厚。奕詝自六岁入学，道光为他挑选的老师是以公忠正直著称的杜受田。杜受田对奕詝的学习抓得特别紧，朝夕纳诲，连续十余年，使奕詝养成了贤惠正直的性格。道光二十年(1840)，奕詝的母亲钮钴禄氏因病去世，才十岁的奕詝就由奕訢母亲博尔济吉特氏抚养，两兄弟天天生活在一起。两人好学钻研，经史子集张口能背，模仿前人写几句古诗也像模像样。两人天天一起练习武艺，奕訢还在武林高手的指导下创制出枪法二十八势，刀法十八势。道光对此欣喜万分，特地赐其枪为“棣华协力”，赐其刀为“宝镎宣威”，同时还把自己的一把白虹刀送给他作为礼物。道光后期，一考虑到立储，他的眼光始终在奕詝和奕訢两人身上转，但又踌躇不决。因为如论文武韬略，奕訢在奕詝之上，如论人品，奕詝品行端正，而且又是长子，道光很是左右为难，犹豫难定。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道光最后决定把皇位传给奕詝？

正当道光颇费心思之际，出现了两件小事，两个皇子的不同表现使道光最后作了定夺。有一件事是记载在《清史稿·杜受田传》中。清朝的皇帝每年都在南苑进行打猎，道光也不例外。道光晚年的一天，南苑校猎又举行了，道光带了众皇子到南苑骑马奔驰。众皇子也可以借此机会在父皇面前好好表现一番，以显示自己高强的武艺。奕訢从小擅长刀枪射箭，今天为了在父亲面前展示自己的特长，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勇猛冲突，箭无虚发。校猎结束，各位皇子在道光面前纷纷出示自己的战绩，奕訢自然是捕获最多，心



恭亲王奕䜣

中不无高兴。再看奕訢，讷讷地站在一旁，两手空空，一箭未发。道光感到十分奇怪，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奕訢答道：现在是万物苏醒的春天，鸟兽开始繁衍孳育，我不忍心伤害这些生灵，来违反万物的生长规律。奕訢的这通话，使道光十分高兴，赞叹道："这些真是皇帝应该讲的话。"奕訢仁义道德的言论，与道光的传统和标准比较接近，使道光立储的天平明显倒向了奕訢。

另外又有一则故事，与上面的这件事如同一辙，也谈到了道光是怎样在奕訢和奕䜣两人中分出高下的。清人笔记说奕訢的老师是杜受田，奕䜣的老师是卓秉恬。道光晚年生病时，有一天想召见两位皇子，打算通过最后考察以决定把皇位传给谁。两位皇子也知道已到了最后紧要关头，遂问计于自己的老师，如果道光问话，应该答些什么。卓秉恬告诉奕䜣说：如果父皇问你什么事，你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卓秉恬这样讲的意图实际上很明显，因为奕䜣人很聪明，反应也快，知识丰富，他可以凭借自己的才华压倒奕訢。而杜受田分析了两位皇子的实际情况后，认为皇四子应该扬长避短，用自己的特长来使道光产生好感。他对奕訢说：如果你的父皇问起国家时政，你在这方面的智慧才识是远远不能与皇六子相比的。要取胜，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当父皇在谈及自己年老多病，可能不久于帝位时，你什么也不用说，只要一个劲地伏地流泪，表现出你对父皇的孺慕之诚。道光召见时，奕訢按着老师的话去做了，道光很开心，他认为奕訢实在太仁孝了，于是决定

将皇位传给奕訢。

上面两则故事，可能有虚构的成分，如根据《清史稿》，卓秉恬实际上并没有任奕訢的老师，故事的内容情节也是不同，但所阐述的道理是一致的。打着仁孝贤惠旗号的皇四子奕詝，在多次竞争中击败了才智聪颖但急于表现自己的皇六子奕訢，最后被立为储君。

不过，另有一种讲法说道光最初已立奕訢为储，但后来又改变了。《清稗类钞》中说：道光晚年倦于政事时，就想到要立皇储了，他见皇子中恭王奕訢最为成皇后宠爱，所以打算立他为储。他事先写好了奕訢的名字，放置在乾清宫正大光明殿匾后。有一个太监在阶下偷偷看着道光写字的样子，见到最后一笔特别长，就怀疑道光写的名字是奕訢，太监将这件事讲给人家听后，道光立奕訢为储的消息就传开了。道光听到后，十分心烦，就把铁盒重新取了下来，更换了奕詝名字。照这种说法，奕詝得到皇位，完全出于偶然，道光本意是选择奕訢，因其事外泄，才改立奕詝。此事的真相其他史书上没有记载，今天已很难清楚，但奕訢有宠且有希望继立为君，这应是事实，两人的被立机会十分相近。



道光秘密立储御书，是我国现
存惟一由皇帝亲笔所书关于
皇帝承袭传位的立储档案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六月十六日，道光正式秘密立储，对此李鹏年先生在《雍正创建秘密立储制度》一文中有详细描述。道光在一张 9.5×21.6 厘米的四扣折纸上用红笔以满汉文字合书“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以汉

字书“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写毕，道光用两层颜色略有深浅的黄纸包好。里面的那层黄纸背面用红笔写着“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字样，并有亲笔签名。外层黄纸的背面用红笔写着满文的“万年”字样，道光又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件事做好后，道光又书写遗谕两份，交待死后要办的事情。道光的立储御书和遗谕分别被密封在两个匣子内。收藏立储遗书的那个匣子特别讲究，质地为楠木，长32公分，宽16.7公分，厚8.7公分，锁和钥匙都是铜质的，雕塑有精美的蝙蝠翔云图。匣的三面启口处均贴有封条，两端封条上有道光亲笔签名，正面封条上也有道光亲笔签名和亲书“道光二十六年立秋”字样。道光的立储遗书和遗谕的两个匣子至今都保存着，它们是国内目前发现的惟一一份可窥见清代秘密立储的实物。之后各皇帝，不再实行秘密立储，因而它的价值不可估量。

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十四日，道光皇帝即将走完他的人生历程，他在圆明园召见了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等人，让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等在众大臣面前打开小匣子，宣示御书、遗谕。同时宣示了一份道光的亲笔朱谕，这份朱谕是道光病重时在圆明园慎德堂书写的。其内容为：“皇四子奕詝著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这样，从法律上讲道光将奕詝扶上了帝位，任何人不可能也不应该产生什么异议。

道光去世，奕詝即位，他就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七代皇帝——咸丰。咸的意思是普遍，丰的意思是富足，两个字合起来是希望天下丰衣足食，但从后来的历史来看，咸丰是一位无胆识、无远略、无才能、无作为的皇帝，道光的选择其实是一个十足的错误。

垂帘听政　　光绪登极之谜

同治病死后，他的堂弟载湉被立为嗣君。同治没有儿子，所以挑选了年仅四岁不识人事的载湉为接班人？为什么选中这个小孩，这和皇太后慈禧有关系。因为载湉不但是慈禧亲妹妹的儿子，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年龄小，不能理政，慈禧可以继续垂帘听政。



同治皇帝死时还不到二十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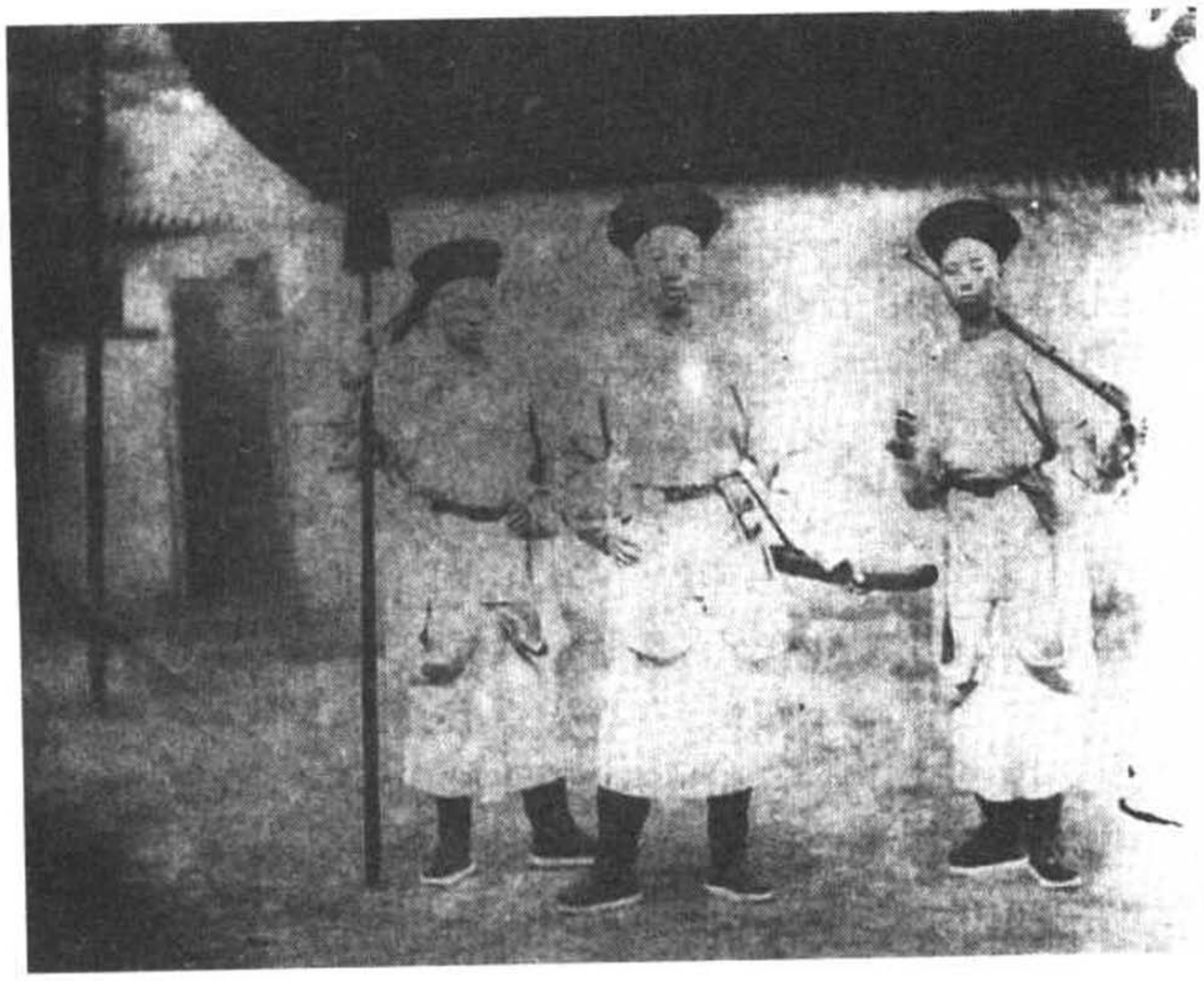
祺祥政变以后，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但实际权力全在慈禧太后手中，批阅奏章、裁决政务，都由她一人操纵。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惟一理由是皇帝年纪小，不能亲理朝政。六岁即位的同治帝，并不能处理国家大事，所以慈禧太后全部替他操办了。同治长到十六岁时，按前朝惯例皇帝应该亲政，可慈禧太后视权如命，根本不提归政之事。直到同治十一年(1872)，同治帝已十七岁了，慈禧才不得不宣布明年归政。但多年以来，慈禧的党羽早已形成，势力很大，同治名为亲政，实际上大权仍在慈禧太后手中。皇帝一有什么自己的看法，慈禧就进行干涉，两人之间矛盾不断发生。

1874年同治得重病去世，问题一下子出来了，因为十九岁的同治没有儿子，立谁为皇帝就显得十分重要。慈禧肯定会在皇室中选择一人即位，但问题是在这么多皇室人员中挑选谁呢？假若选一位年富力强的，说不定满清的积弱之势会得到一定的改变，中国的国运会走向另一条道路。假若所立仍与同治一样是个小孩，国家政权继续为慈禧所控制，清朝的腐朽统治仍会延续，人民的苦难就更没有尽头了。而充满权力欲望的慈禧自然是选择后者，她才不会去管国家是否兴旺，人民生活是否幸福。

从当时的清皇室来看，咸丰帝的哥哥奕纬是道光帝的长子，他的一系在同治死时，已经孙子都有了，奕纬孙溥伦按辈分是同治的侄子辈。咸丰的弟弟也即道光的第五子奕誴，这时也是人到中年，有几个儿子。慈禧如果从国

家大局的高度考虑立君，可以当皇帝的人选其实不少，按代代相继的原则，比同治低一辈的溥伦接位也未尚不可，但最终的结果是慈禧并没有这样做。

同治一闭眼，慈禧以两宫皇太后的名义随即召开了御前会议，与众王大臣商议择立嗣君的问题。根据参加这个会议的翁同龢的记载，在会议上，慈禧问大家："以后我再继续垂帘听政怎么样？"有大臣说应该以宗庙社稷为重，请选择一个才能贤俊者立为皇帝，然后太后再垂帘听政。慈禧说："文宗（咸丰帝）没有儿子，现在突然遭此变故，如果继承者是一位年龄较长的，他是不会允许的。必须挑选一位年纪较小的皇室子弟，可塑性强，教育起来也十分方便。现在我们马上定一个，一旦决定后就不能改变。我们二位太后意见是完全统一的，你们众大臣一定要认真听好。"随即慈禧报出了醇亲王奕譞的名字。突然听到自己的儿子被立为皇帝，奕譞大吃一惊，激动得碰头痛哭，昏迷伏地，边上的大臣扶也扶不起。众大臣听完太后的话后退下，旋即到军机处拟旨，向全国颁布。接着慈禧又宣布："溥字辈子弟不应该立为嗣君，奕譞的长子，现在已经四岁了，而且与同治是至亲，我想让他继统。"



这是奕譞（中）年轻时的一张照片，摄于1863年

在御前会议，慈禧主张立幼，又亲口提出要立奕譞的长子载湉为其意中之人，众大臣那里敢说什么，新皇帝的上台也就这样定局了。从翁同龢的记载来看，会议之前，慈禧早就有了继续垂帘听政的打算，她并不愿意让政权落入别人的手中，她想独揽政柄，做大清国事实上的主宰。慈禧在这么多人

中选择四岁的载湉，不可能是载湉自身有什么特别的资质，而肯定是另有原因的。

从皇室辈分排，载湉与同治是同辈，是同治的堂弟，这样并不影响慈禧继续保持她皇太后的身份，对继续垂帘听政并不造成妨碍。其次，载湉年幼，继续垂帘的理由最充分，慈禧可以堵住外面大臣的嘴巴。再次，载湉之母，乃醇亲王的嫡福晋，是慈禧的亲妹妹，从慈禧这个系统而言，不仅载湉是咸丰的亲侄子，而且是慈禧的亲姨侄，关系比一般人更密切。有了这样的双层关系，对于载湉的驾驭比他人也就更容易。当时，慈禧还特别颁发了一道懿旨，为她立载湉进行辩解。她说同治没有儿子，不得已才以醇亲王奕譞的长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等到嗣皇帝生了皇子，就能继承同治为嗣了。

在同治死后的皇位更替中，一个不识人事的四岁小孩当上了皇帝，他就是后来的德宗景皇帝，年号光绪，共在位三十四年。就这样，光绪靠了慈禧的淫威和阴谋手段当上了皇帝，慈禧仍得以独掌朝纲，继续垂帘听政。

这真是慈禧一言定大统！

文治武功

疏导和壅防　　鲧禹父子治水之谜

我国最早的史书的记载，鲧奉命治水，用水来土掩的办法，结果失败被杀。禹继父职治水，结果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大获成功。但有人提出，鲧真的是因治水失败而死的吗？大禹治理了整个黄河流域吗？

在四五千年以前，黄河流域频繁地暴发洪水，给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较大的灾难。当时的情况是洪水浩荡，汪洋一片。《孟子·滕文公上》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尚书·尧典》也谈到："汤汤洪水方割(害)，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这么大的洪水必然造成房屋倒塌，田地被淹。到了禹生活的时代，还是"十年九潦"。面对肆虐的洪水，中国古代先民与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传说。

相传共工氏族就是长期与洪水作斗争的氏族，他们的图腾、首领名号，都用水族动物表示，可见他们的生活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居住的地区，十分之七是水域，陆地只占十分之三，长期与水打交道的历史，使他们积累了一些经验。他们在首领的带领下，采取从土丘上取土填充低洼地的办法，加高自己的居住区，从而避免了洪水的侵袭，减少了损失。可是，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要想靠原始的木器、石器、蚌器工具，将居住地加高、加固到足以防御较大的洪水侵袭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将自己的居住地加高后，会逼使水流冲向其他的氏族或部落，这就引起了其他氏族、部落的反对，后来，唐氏族干脆把共工氏族灭掉了。不过，共工氏族遗存下来的后裔，还在后代的抗洪斗争中发挥了作用。

尧作部落联盟首领的时候，水患也很严重。尧召集各部落的首领，共同商讨治水之策，大家共推鲧领导治水。鲧借鉴了共工氏族治水的经验，把共工氏族加高整个居住区的做法改为在居住区周围修筑土围墙，这样就大大



尧帝，姓尹祁，号放勋

减少了工程的土方量。因为他修筑了较高的围墙，后世遂留下“鲧筑城”、“鲧作三仞之城”的记载。有了这种土围墙，不仅可以防御小的水患，遇到稍大一些的洪水，也可以采取临时加高加厚土围墙的办法，保住村落。后来的传说中，把这种水涨墙高的事实加以神化，说成是鲧从天帝那里偷来了一种可以自己生长的“息壤”，用来阻挡洪水，所以在洪水到来之时，土围墙就不断增高了。当时修土围墙，是采用夯筑的办法，并不十分坚固。遇到大洪水或被洪水长时间包围浸泡，还是不免一溃，伤亡是很惨重的。后来，舜作了部落联盟的首领，以治水无功的罪名把鲧处死了。

舜处死鲧后，又任命鲧的儿子禹领导治水，并派商族的始祖契、周族的始祖弃、东夷族的首领伯益等人协助他治水，据说共工氏族的后裔四岳也参加了治水工作。禹对于父亲治水无功被处死十分伤心，同时这件事也坚强了他克服困难、制服洪水，完成先父遗业的决心。他认真思索了前人治水的经验和教训，然后带领着助手们进行实地考察，以便找出最佳治水方案。在考察过程中，他们风餐露宿，跋山涉水，察看山川水势，并在沿途作了许多标记，有的是在树上砍凿出痕迹，有的是在地上堆积一些石块，给日后治水标示出大致的施工基准线。根据考察的结果，禹决定采取以疏导为主的治水方案，他带领着百姓，利用枯水季节疏浚河道，把挖出的泥土堆到岸边的高地上。这样，到了洪水季节水流就可以顺畅地流走，岸边的居民区也不易受到洪水的威胁了。

治水的工程持续了许多年，《孟子·滕文公》记载“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史记·夏本纪》记载禹“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总之，治

水工程是既漫长又辛苦的。长年在外的辛劳，使禹的脸晒黑了，人累瘦了，连小腿肚子上的汗毛都磨光了，脚指甲也因长期泡在水里而脱落了。有时在泥水中干活，浑身泥乎乎的，看起来像只熊，后人遂有“禹化为熊”的传说。

经过多年的奋斗，禹率领人们疏通了黄河流域的一道道水系，消除了一处处洪水的隐患。在这一系列的工程中，最艰苦、最困难的要算是“凿龙门”和“辟伊阙”了。龙门在今山西省河津县和陕西省韩城县交界处，是黄河出晋陕大峡谷流向中游平原的一个关口，由于岸边有两座大山夹峙，河道变窄，水流不畅，易暴发洪水。禹带领人们用简单的木制、石制、骨制的工具，凿宽了河道，消除了隐患。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的伊阙，也是经过一番开山掘谷的奋战，才使水道畅通的。

治水的成功，使人们重新拥有了正常安定的生活，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因此人们非常感激带领大家治水的禹，尊称他为“大禹”，传颂着他的事迹。后来，舜就把部落联盟首领的职位传给了大禹。

上述治水的传说，发生在尧、舜任部落联盟首领的时期。这时期正是中原龙山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原始农业文明很发达，人们在临近水源的河谷地带开垦了大片农田，兴建了众多的居民点，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然而，这一发达的原始农业文明又有其脆弱的一面，河谷地带固然利于开垦，也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但同时它又十分容易受到洪水的侵袭。而在尧、舜的时期，偏偏降水量增加，暴发了几次大洪水（小的水患就更多了），给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许多人死于洪水之中。后世关于洪水的记载，正是以这些水患为蓝本的，只不过在长期的传说中被夸大了很多。面对洪水的侵袭，人们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从中吸取了不少经验教训，并没有从适宜耕种的河谷地带退却，而且继续发展了自己的文化。

大禹治水的成功，古代文献中说成是治理整个黄河流域，这是一种大大夸张了的说法。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看，不要说治理黄河，就是把一条小河流导入江、海，也是不可能的。因此，禹治水的功绩，可能是修筑了一些堤堰阻挡洪水，对某些小河道进行了局部疏导，以及洪水到来时引导人们迁往高地躲避等等。大概在大禹的时代，持续了约一百年的多雨时期已经过去，转入了较为干旱的时期，洪水因之减少，人们也把它当作是大禹的功绩了。长期以来，传说中的大禹，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远古时期治水英雄的代表，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与大自然斗争的顽强精神的化身。



大禹陵

已如上述，鲧禹父子两人，一个是治水失败者，一个是治水成功者；一个因“绩用弗成”而成为治水罪人，一个却是人们讴歌的英雄，这在古代的史书中已有明确的描绘，自东汉以来，这样的说法盛行不衰。不过也有很多人认为事实并非如此，鲧并不是因为治水不力被杀，大禹治水的方法也不见得比鲧高明到什么地方去。

闻一多先生在《天问疏证》中对大禹治水已有怀疑：“早期治水传说，鲧禹人分二法。”但他认为父子两人用的治水方法是一致的。近年来，有很多学者更是对闻一多的观点进行了详尽的论述，认为鲧禹治水，方法相同。他们治水采用的方法都是湮（堙），即填洪水，在他们那个年代，不单是他们还不懂得疏导和壅防，其他人也不懂。正因为如此，在当时论治水之功时，人们鲧禹并称，到了三代时将鲧禹并祀为神。他们认为在早期的神话传说中，鲧禹并无贤愚之别，功过之非，在那个时代决定了他们治水方法的相同。然而，鲧禹两人却有着不同的遭遇，原因并不在治水而出于政治的原因。鲧作为新兴势力的代表，他的所作所为大概都在破坏着这些因袭的习俗和制度。唐虞之际是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晚期向奴隶制过渡的时期，在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点上，往往是适合旧传统、旧习俗、旧势力的人物时时得胜，而进取者、革新者不免一时受挫，甚至付出血的代价。今天所见的鲧禹事迹的传说，大都见于先秦诸子和汉儒们“言必称尧舜”的著作中，所有的罪恶过失当然都加到了鲧的头上，所有的功德圣业都加到了禹的身上。

持这种观点者认为，人们认为鲧只堙不导，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堙和导

是相辅相成的两种措施，单纯用哪一种都不会有成效，堙和导是在治水过程中根据不同情况采用的不同方法，不能一味用堙的办法。在鲧之前，最早开始用堙的方法来治水的是鲧，以尧为代表的守旧势力因为对鲧部落中发生的变革看不顺眼，因而鲧被加上了“以乱天常”的罪名，这就是上古治水中崇禹贬鲧的原因。

更有一些学者对大禹治水深有怀疑。近代西方史学家夏德在《支那太古史》中，对史书中说大禹的“决九川，距四海”认为根本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开挖长江、黄河和汉水的工程量，比修万里长城的工程量还要大，这根本是不切当时实际的。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大禹治水仅是当时的人们利用水利，求得生活的安全和生产的便利的情况下产生的，治水的目的只是谋求安全的栖息之所，并不是大规模的疏浚河道。

关于鲧禹父子治水的故事，大多来自远古传说，因而在许多细节上仍是一头雾水，难以理清。

沦没于泗水　帝王九鼎之谜

传说大禹治水成功后，铸造了象征王权的九鼎。尽管王朝在不断更迭，九鼎却始终从一个国王的手上传到下一个国王的手上。没有九鼎，就不能算是个真正的国王。然而，到了秦汉之间，九鼎却不见了踪影，由此人们怀疑九鼎到底真的存在吗？

传说大禹治水成功后，又铸九鼎。这不仅表明我国青铜铸造技术是十分高超的，而且还可以看到大禹是违反了部落联盟的传统，建立了家天下的国家，因为天子九鼎，九鼎是王权的象征。后人将争夺政权称为“问鼎”，建立政权称为“定鼎”，就是因为三代以来，九鼎一直被视为王权象征的缘故。

根据《左传》鲁宣公三年记载，夏朝初年，令九州州牧贡铜，铸造九鼎，事先将全国各地山川奇异之物画成图形，然后分别刻于鼎身。九鼎铸成后，陈列于宫门之外，使人们一看便知道所往之处有哪些鬼神精怪，以避凶就吉。据说此举深得上天的赞美，因而夏朝获得了天帝的保佑。九鼎一出世，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其实，透过神话因素，就不难看出它的政治价值。夏以

九州之铜铸成九鼎，再以九鼎象征九州，无非是要表明自己乃九州之主，实现了天下一统。此后，九鼎便成了三代传国之宝。传说夏亡之后，鼎迁于商，商亡之后，鼎迁于周，表明天命之所归。

春秋时期，随着王室力量的衰落，强大的诸侯对九鼎便产生了觊觎之心，而由楚国首先发难。《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八年（前606），楚庄王带兵攻打陆浑之戎，路经洛邑，特意摆开阵势，显示武力。周定王连忙派大夫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庄王咄咄逼人，劈头就问九鼎大小轻重如何。王孙满冷冷地说："在德不在鼎！"接着又不紧不慢地回顾了九鼎转手的历史，并说如果本质美好光明，鼎虽小而犹重，反之，虽大犹轻。他进而指出："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庄王碰了一鼻子灰，只好作罢。这也就是成语"问鼎中原"的来历。

到了战国后期，周王室已是奄奄一息。据《战国策·东周策》所载，周显王时期，秦国兴兵临周，企图夺取九鼎。周求救于齐，迫使秦国退兵。但强秦岂肯善罢甘休，后来秦昭王终于灭掉了东周。

围绕着九鼎，有两个问题后人至今难以弄明白，一是大禹是否铸鼎，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相连，即九鼎的最后下落。

上引《左传》说九鼎铸于"夏之方有德"之时，而《史记》把铸鼎的时间略有提前，说成是"虞夏之盛"之时，并明方大禹是收了九牧之金而铸九鼎的，本意是象征九州。《墨子》说鼎铸于夏后启时。上述说法大体相近，得到了后代许多人的赞同，基本上认为鼎是大禹所铸，时间在夏朝建立的时候。

怀疑者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并没有从周室夺到九鼎，相反关于九鼎失踪的传闻倒是有鼻子有眼。汉灭秦，也没有见到鼎。刘邦登位时，秦王子婴交出的只有皇帝玺。《战国策》说周得九鼎时，每一只鼎要有九万人来搬运，九只鼎要有八十一万人来运输，这可能吗？近代古史辨派学者认为《战国策》多夸大之辞，禹铸九鼎是不可能的事实。

也有学者根据当代的考古发掘，认为在夏代以前的一些原始社会遗址中，已经出土过铜器和青铜器。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学术界公认是属夏王朝时期的，曾出土铜爵、铜凿等各式形状的铜器，并且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坩埚片、铜渣和陶范，证明夏人是完全有能力制造铜器的。至少从技术层面而言，禹铸九鼎是可能的。仅凭古史传说中的一些缺陷而否认禹铸九鼎，恐怕也不见得是绝对有力。

传承到周朝的九鼎哪里去了?

一些学者发现《史记》中的说法前后不统一。周、秦二本纪都说秦昭王五十二年(前255),在周赧王死后,终于"取九鼎入秦"。《秦始皇本纪》说九鼎在迁往咸阳的途中,有一鼎被大风刮到今江苏的泗水中。据此,除一鼎外,八鼎有可能被搜刮到了秦国宫殿中,应当失于秦亡之后。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也说:"周赧王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飞入泗水,余八入于秦中。"然他将秦昭王取九鼎的时间较《史记》本文提前了41年。《史记·封禅书》又说:"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那么九鼎早在东周末年便已遗失,与秦无关。后来,《汉书·郊祀志》也是兼收两说,但又说"周显王之四十二年(前327)……鼎沦没于泗水彭城下"。以后秦始皇出巡路过彭城(今江苏徐州)时,派了上千人泗水打捞,结果如同竹篮打水,未能如愿。这说明九鼎并未入秦,至少有一鼎是不知去向。

到了清朝,全祖望、沈钦韩等学者对上述传统说法公开表示怀疑,并作了新的探索。王先谦在《汉书补注·郊祀志》中除引用全、沈二家之说外,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其主要内容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一)周人为防止大国觊觎,加上经济困难,采取了毁鼎铸钱的下策;对外则诡称丢失,不知去向。(二)史载秦灭周取鼎,为时人揣度之辞,并非事实。(三)秦人谬传九鼎沉入泗水,秦始皇也受到愚弄。这些说法足以发人深思,但未必即为至论。

九鼎既然被周人视为天命之所在,也就只能与社稷共存亡,岂有因大国觊觎而自行销毁之理?况且九鼎铸于夏初,器形不会太大,楚庄王就曾以鄙夷的口吻说:"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史记·楚世家》)可见九鼎之"重",只存在于传统的神秘观念之中,而不是实物本身的价值。东周统治者能为少量之铜而毁鼎铸钱、甘心自隳天命吗?

细审古籍中有关记载,对九鼎遗失的时间和地点虽然说法不一,但并无已被销毁的材料。因此,我们有理由寄希望于考古工作的进展。九鼎如失于东周灭亡之前,那么埋没于关东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如失于秦末,那么埋没于关中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要是项羽破秦后载归彭城,那倒极有可能"沦没于泗水彭城下",但与《汉书》记载的年代又相距甚远。如能将这些问题考辨清楚,对于寻找九鼎的下落,也许不无裨益。

照笔者看来,九鼎作为王权象征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但它作为我国

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却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因此九鼎的文物价值和象征意义是不可估量的。我们相信九鼎一旦重见天日，必然会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发现了甲骨文　　商王盘庚迁都之谜

商都在汤灭夏朝之前迁徙八次，在灭夏以后又连续迁移五次。商朝从建立至灭亡，约五百年左右，首都迁移如此频繁是很耐人寻味的。至商朝第十九位国王盘庚时，将商都从奄迁到黄河以北的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附近）。此后，十二代商王都以殷为都城，再也没有迁都之举。

商朝从建国到灭亡，约为五百多年，但前一半时期内却迁了五次首都。最后的二百七十多年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所以商朝又叫殷朝，有时候也称为殷商或者商殷。商朝定都于殷是从盘庚开始，盘庚是商汤的第九代孙子，商朝的第十九个王。商朝曾经屡次迁都，盘庚定都于殷，不再迁徙，反映了这时候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畜牧业，人们要求定居下来。

商汤灭夏之前，把统治中心迁到了亳（今河南濮阳县）。亳位于商族活动区的南部边界地带，再向南，就是夏人的势力范围了。汤灭夏之后，为了便于统治夏国的遗民，又在位于夏的中心地区的今河南省偃师县修筑都城，定都于此。这是商王朝建立后修筑的第一座城池，它仍以“亳”命名，史称“西亳”，以与原来的亳城相区别。从汤到大戊九位商王都以此为都。从仲丁继位为王开始，商朝的都城频繁迁徙，仲丁时迁都于隞（今河南荥阳县），河亶甲时迁都于相（今河南内黄县），祖乙继位后迁到庇（今山东鱼台县），南庚又迁都于奄（今山东曲阜）。从仲丁到盘庚只有十王，却迁了五次都，平均两王一迁，频率是很高的。

盘庚决定迁殷，是经历了一番斗争的。

盘庚即位前，商王朝已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在商王太甲以后，商朝历代的君主和奴隶主贵族们，生活都很腐化。他们迷信鬼神，又特别喜欢喝酒，是十足的寄生虫，自己不劳动，一切事情都驱使奴隶去做。在奴隶和奴隶主之间，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奴隶们大批逃亡。在王室贵族当中，争夺王位越

演越剧烈，有的人说应当兄终弟及，有的人说应当父死子继。叔侄之间，兄弟之间，常常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把国家搞得个乱七八糟。

各种内部矛盾削弱了商朝，生产荒废了，一些小国和少数民族不再受商朝的节制，加上水涝、干旱等等自然灾害，使得商朝这个奴隶制国家简直维持不下去了。

正在这个时候，商朝的第十八个王阳甲死了，阳甲的弟弟盘庚做了王。盘庚是个有心计的人，他善于观察形势，觉得国家不能再照老样子维持下去了，应当找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来缓和这些矛盾，挽救商朝的衰亡。他的办法就是把都城迁到殷，开垦荒地，长期定居下来。



甲骨文

盘庚考虑迁都的原因主要是殷地的土地比较肥沃，自然灾害比较少些轻些，在这里建设都城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其次，盘庚认为迁都以后一切都得从头做起，奴隶主贵族不能过分享受，这样社会矛盾就可以缓和。而且迁都可以避开危险的反叛势力，都城一旦安全，统治就可以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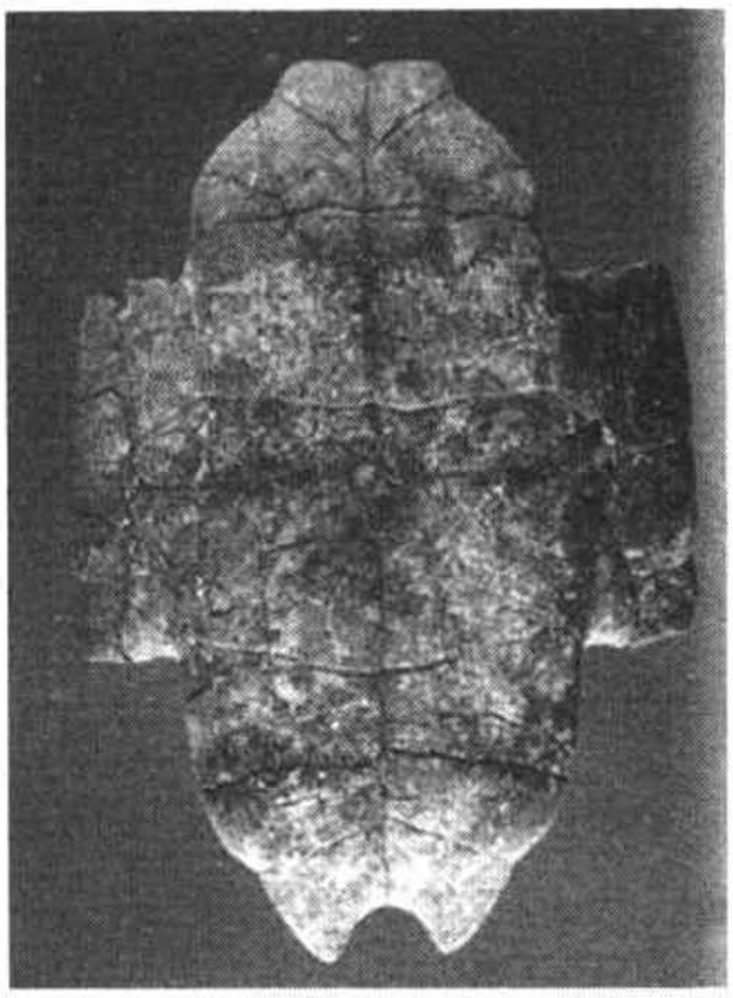
可是迁都的决定招致了许多人的反对，反对的人主要是奴隶主贵族。他们害怕到了新的地方不能照旧享乐。盘庚是个办事十分坚决的人，不会因为有人反对就改变主意。他把奴隶主贵族召集起来，对他们发表了两篇训诰。第一篇训诰是劝说，告诉大家搬家到殷去的好处。他说："以前上天降下大灾难时，先王们都为了臣民的利益而迁徙。现在我也和先王一样，希望你们都能得到安乐的生活，并不是因为你们有罪而惩罚你们。我要遵照先王关心臣民的样子，关心你们，保佑你们，带着你们去寻求安乐的地方。你们如果不与我同心，先王的在天之灵便要责罚你们，降下不祥来了。"第二

篇训诰是威胁，用强硬的口气，警告大家一定要老老实实地服从迁都命令，否则就要进行严厉的制裁。

盘庚用了软硬兼施的手段，终于把首都迁到了殷。可是斗争并没有结束。老百姓到了一个新地方，生活不习惯，吵嚷着要回老家。奴隶主贵族就乘机起哄，煽动大家要求搬回老家去。盘庚又发表了一篇训诰，用强硬的语气制止住了奴隶主贵族的反对。他说："先王谨遵上天之命，开国以来已经迁都五次了。现在如果不听从上天之命迁都的话，谈什么继承先王的事业呢？"他知道臣民口出怨言是由于当权的大臣在煽动，便严厉警告说："我看得很清楚，你们在浮言煽动，只是我没有表示出来罢了，你们就放肆起来。你们在自己祸害自己。我不论关系亲疏，谁做好事就受赏赐，谁犯罪就要受惩罚。国家能治理好，是你们大家的功劳。国家治理不好，由我一人承担责任。今后你们别乱讲话，否则到惩罚时，后悔就来不及了。"

过了几年，局面才安定下来。奴隶们在这里被迫没日没夜地劳动，把殷建设成了一个十分繁荣的都市。从此，商朝的都城就固定在殷城，政治上比较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也有更大的发展。那时候，铜的冶炼技术大大提高，青铜器的制作范围更加扩大。殷城附近就有一个很大的青铜器作坊，有上千个奴隶在作坊里劳动。奴隶们用铜、锡、铅三种金属做原料，冶炼铸造了成千上万件斧、钺、戈、矛、刀、镞等武器；鼎、爵、觚、壶、盘、盂等饮食器皿和斧、锛、凿、钻、铲等生产工具。许多青铜器造型优美，花纹图案十分精巧，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形成了后来著称于世的青铜器文化。有一个很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高 133 厘米，长 110 厘米，宽 78 厘米，重 875 公斤，已经被考古学家从殷墟遗址中发掘了出来，完整地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这是世界上到现在为止发掘到的最大青铜器。从商代的青铜器也可以看出，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是以奴隶为主体的劳动群众创造出来的。

在殷墟遗址中，还发掘到大批乌龟的腹甲和牛的肩胛骨，上面刻着许多文字。这种文字和现在的不同，是我国已经发现的最古的文字，叫做甲骨文，一共有四千多个单字，大多已经被考古学家辨认出来。当时殷朝的王室贵族很迷信，做什么事情都要先采用龟甲和牛骨进行占卜。刻在龟甲和牛骨上的，大都是占卜的原因和结果，以及后来是否应验等等的话，这些卜辞记载着殷朝的许多大事，为研究殷商的历史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刻有甲骨文的动物腹甲或肩胛

盘庚迁都，一度复兴了商朝，使得殷商这个奴隶制国家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放出了灿烂夺目的光彩，成了当时世界上的文明大国。

史学家通常以盘庚迁殷为界，把商代历史分为前后两期。盘庚迁殷后，发扬商汤的政治传统，使商王朝再度兴盛，出现了百姓安宁、诸侯皈依的局面，长期以来威胁着商北部、西部边界的那些部族，也在商王朝的打击下退缩、收敛，有的重又向商表示臣服。

盘庚开创的中兴局面，到了武丁时得到进一步发展。武丁对西方、北方的少数部族发动了一系列的征伐战争，消除了北方、西方的威胁，商的势力范围大大扩展。武丁以后，商王朝进入了一个持续发展的时期。

在盘庚以后的二百多年间，商朝不仅不再有迁都之举，而且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殷墟文明，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不世之才　齐桓公首霸之谜

春秋是我国上古社会的转型时期，“礼崩乐坏”，周王朝急剧衰落，失去了控制列国诸侯的力量。各国诸侯各自为政，他们之间的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在我国中原地区出现了一个由大国争霸的局面，而齐桓公是春秋争霸的第一人。那么他是怎样成为春秋首霸的？

周平王东迁洛邑后，直接控制的地区有方圆六百里左右。之后随着不断地分封，控制的地区逐渐减少，军事力量也很虚弱，和一个诸侯国相差不多。这时的周天子只是在名义上保留着“天下共主”的地位，实际上已失去了号令诸侯的力量。其时，有几个诸侯国在相互攻伐的兼并战争中先后强大起来，他们或者借拥戴周天子而号令一时，或者凭强势称霸一方，由此而出现了春秋时期的霸主政治。最早获得霸主地位的，就是齐桓公。

齐桓公名小白，是前任国君齐襄公的弟弟。他能够当国君作诸侯，曾有一番颇有戏剧性的惊险经历。

齐襄公在位时，齐国国势渐渐强盛起来，但齐襄公却是个荒淫无道的国君。他的异母妹妹文姜，是鲁桓公的夫人，在尚未出嫁时两人就乱伦通奸。后鲁桓公与文姜回齐国时，齐襄公与文姜再次勾搭，为鲁桓公发现。齐襄公干脆派大夫公子彭生把鲁桓公杀了，从此文姜就留在齐国不回去了。

齐襄公处理政事蛮横武断。他曾因私愤降低了堂弟公孙无知的待遇，又不按期派人去替代戍守葵丘的大夫连称、管至父，还曾几次错杀无辜。他的异母弟弟公子纠与公子小白怕发生祸乱而逃往国外。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人，公子纠就在管仲与召忽的辅助陪同下投奔鲁国。公子小白的母亲是卫国人，就在鲍叔牙的辅助陪同下就近投奔莒国。公元前 686 年，齐国果然发生内乱，公子无知和连称、管至父率众攻入宫中，杀死齐襄公，无知自立为齐君。不久齐国大夫雍林又杀死无知，齐国一时出现了没有国君的情况。

无知被杀死后，与公子小白亲近的齐国大夫高氏、国氏赶忙暗中派人去报告小白，请他速回国接替国君之位。鲁国听说后，也赶紧派兵护送公子纠回国，希望公子纠能先抢到王位，将来能够对鲁国产生感激。于是，兄弟二人之间的一场特殊赛跑开始了。

当初逃离齐国时，小白有鲍叔牙追随左右，公子纠有管仲、召忽辅佐。鲍叔牙与管仲本是多年的好友，如今各为其主，护侍着各自的主人往回奔。鲁国不仅出兵护送公子纠回齐国，而且为了不使公子小白由莒国顺利赶回临淄与公子纠争夺国君之位，派管仲率军去拦截小白。管仲赶到莒国通往齐国的大道上，正好碰上公子小白一行人路过。管仲弯弓搭箭，向小白射去，正中其身，只听小白大叫一声，倒在车上，一动不动。管仲以为小白必死无疑，遂赶回去报告鲁国。鲁国以为诡计得逞，没有人再与公子纠争夺君位了，便放下心来，送公子纠的军队也减慢了速度，悠哉游哉地向齐国进发。

六天以后，鲁国送公子纠的队伍终于来到齐国国都临淄附近。不料，小白早已先期赶到，当上了国君。原来，管仲那一箭正好射在小白的腰带钩上，根本没有伤着他，而小白却假装被射死，骗过了管仲。随后，小白一行日夜兼程地赶回国中，在大夫高氏、国氏等人的拥立之下，小白成了齐国的新国君，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齐桓公。齐桓公当然不能容忍公子纠再来争位，遂派军抵御鲁军。一战之下，鲁军大败。鲍叔牙又率军追到鲁国，逼迫鲁国杀死公子纠，召忽见势不好，也自杀身亡。鲍叔牙又叫鲁国交出管仲，然后将管仲押在囚车中带走。

齐桓公本想亲自杀死管仲以解一箭之恨，可鲍叔牙却说："我只有辅佐您夺得王位的能力，而要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就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做得到的。管仲的才能远在我之上，您如果想称霸诸侯，就非管仲不可。"齐桓公是个胸襟宽宏的君主，听了鲍叔牙的话，便打消报私仇的念头，任用管仲为相国，鲍叔牙的地位反在管仲之下。

管仲确实是一个不世之才，他任相国后，协助齐桓公在经济、内政、军事等方面进行改革，使齐国的鱼、盐和铁矿资源得到开发利用，农业、商业得到发展，国家强盛，军力增强，具备了称霸中原的物质条件。

齐国被管仲治理得国富兵强后，齐桓公下一步就想称霸诸侯了。在他当上国君的第五年(前 681)，有一天他对管仲说："现在咱们兵强马壮，可以会合诸侯了吧？"管仲说："如今南方的楚国，西方的秦国和晋国都比我们强，可他们都没有能够当上诸侯的首领，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们对周王室不够尊崇，不知道用周王的名义号召诸侯，停止混战。如果我们用'尊王攘夷'相号召，您的声望就会越来越高。"当时的形势是，周天子虽然已经失去号令诸侯的能力，但名义上毕竟还是天下的共主，影响力仍很大，单独一个诸侯国要想取代周天子的地位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由于周王朝的衰弱，夷、狄、戎、蛮等少数民族乘机入侵，严重威胁着中原各国的安全。针对这种情况，管仲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想要通过抵御少数民族的入侵(即攘夷)，取得诸侯国的拥护；并通过尊奉周天子(即尊王)，借助周天子的名义达到由自己号令诸侯的目的，称霸于中原。

齐桓公听管仲说得有理，便问："那该怎样做呢？"管仲回答说："宋国刚经过内乱，至今新国君(宋桓公)还没有得到各国承认。我们不妨利用周釐王刚即位的机会，一来去贺喜，二来请周天子下令，让诸侯承认宋国的君位。

只要周天子同意，我们就可以出面召集诸侯了。”齐桓公马上派使臣朝见周釐王。

周釐王刚上台，见强大的齐国前来贺喜，心里说不出有多少高兴，就把召集诸侯承认宋国新君的这件美差，派给了齐桓公。齐桓公得到天子的命令，便发出通知：三月初一，在齐国的北杏（今山东东阿县北）大会诸侯，共同确定宋国君位。

就这样，管仲借着宋桓公刚即位，需要诸侯确认这个机会，让齐桓公打着天子的旗号，会合诸侯，当上了霸主。开会的日期即将来临，宋桓公先期赶到，他对齐桓公组织这次会合表示感谢。第二天，陈国、邾国、蔡国的诸侯也陆续到了，但是其他诸侯还没有来。齐桓公对管仲说：“诸侯没有来齐，改个日期吧！”管仲说：“第一次会合诸侯，不能失了信用。所谓二人成众，已经来了四国，照样可以开会了。”

三月初一，大会按时举行。五国诸侯会见完毕，齐桓公说：“我奉了周天子的命令，会合各位，一起商量怎样扶助周王室。今天这个大会，得先推选一个人为盟主，请大家公议。”几位诸侯交头接耳相互议论起来。有人说，宋国的君位还要靠各国来确定，怎么能当盟主呢？正在为难之际，陈宣公说：“天子把会合诸侯的使命交给了齐侯，当然应该推齐侯为盟主。”各位诸侯都表示赞同。齐桓公谦让一番，就大大方方地坐到盟主的位置上去了。他率领大家先向台上虚设的天子座位行了礼，然后宣读盟约。盟约约定，尊重王室，扶助弱小国家，共同抵御夷狄入侵。还写明哪一个国家要是违背了盟约，其他各国要联合起来，共同讨伐它。对盟约的内容，各国诸侯都表示同意。接着，管仲走上台来，对大家说：“鲁、卫、郑、曹四国，不听天子命令，不来参加大会，这是对天子的不忠，应该兴师问罪。”齐桓公接着说：“敝国力量不足，请各位多多帮忙。”陈、蔡、邾三国齐声说：“一定照办。”只有宋桓公一声不吭。

当晚，宋桓公回到住地，对大夫戴叔皮说：“齐侯仗着自己强大，全不把我放在眼里，刚刚当上盟主，便指挥起我们来了，这怎么得了！”戴叔皮说：“齐国要是称了霸，宋国就要倒霉。咱们这次来不过是为了确定您的君位，如今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还等什么？咱们回去吧。”宋桓公听了，急忙收拾行李，连夜走了。第二天，齐桓公听说宋桓公不辞而别，大怒，要派兵去追。管仲说：“本来是请人家来会盟，现在人家走了，我们派兵去追，没有这个

道理。”

齐国召集诸侯，威名大震，各国听说后，都想依附齐国。卫、曹两国还派人来赔礼道歉，并且保证下次一定参加会盟。

此后，齐桓公在每次重大的政治军事行动前，大都先向周王报告，取得同意或授权，再以奉周王之命的名义进行。表面上是尊崇周王，实质上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权。

周釐王二年(前 680)，齐桓公派使臣去周天子那里告状，说宋桓公目无天子，不听号令，请天子出兵，讨伐宋国。周釐王答应了齐桓公请求，齐国遂派兵浩浩荡荡开到了宋国边界。大夫宁戚对齐桓公说：“主公奉天子的命令会合诸侯，最好是先礼后兵，您让我先去劝宋桓公讲和，怎么样？”齐桓公一心想让各国诸侯真心服他，便传令军队停止行动，让宁戚去见宋桓公。

宁戚见了宋桓公，深深地行了个礼。宋桓公动也不动，好像没有看见一样。宁戚见此情景，抬起头来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宋国真危险啦！”宋桓公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宁戚反问宋桓公：“在您看来，您和周公，谁更贤明？”宋桓公回答说：“周公是圣人，我怎敢和圣人相比？”宁戚说：“周公在周朝最强盛的时候，听说有人来见他，即便正嚼着饭，也急忙把饭吐出来，去会见客人。就是这样，他还怕失了礼。可是您怎么做的呢？宋国这样衰弱，国内接连发生杀死国君的事情，您的君位并不牢靠，就算您像周公那样礼贤下士，有本事的人恐怕也不愿意到您这儿来，何况您还这样傲慢呢！宋国的处境还不危险吗？”宋桓公听了宁戚这一番说，忙说：“我没有治国经验，先生不要介意。”宁戚说：“如今王室衰落，诸侯谁也管不了谁，篡权杀君事常常发生。齐侯不忍心看着天下这样混乱下去，这才奉了王命，在北杏会合诸侯，好不容易确定了您的君位，订立了盟约，不想字迹没干，您就暗地里跑了，您的眼里还有天子吗？现在天子大怒，派齐侯兴师问罪，您原先不服从天子的命令，现在又和天子的军队对抗，触犯了众怒，不用打，战争的胜负不是明摆着吗？”宋桓公忙问：“先生有何高见？”宁戚说：“依我看，您不如送点礼，和齐国会盟，这样，天子和盟主都高兴，仗打不起来，宋国也就安全了。”宋桓公又说：“眼下齐国兵马已到，哪里还会同意讲和啊？”宁戚安慰他说：“齐侯一向宽宏大量，不会记仇的。”宋桓公忙派使臣，带着礼物，和宁戚一起到齐桓公那里去认错。齐桓公很高兴，将宋国送来的礼物，转送给天子的使者，并同意了宋国重新入盟的要求。

周釐王三年(前679),齐桓公又约会没有去北杏会盟的卫、郑、陈以及中途跑掉的宋国在鄄地(今山东范县西南)会盟。他又派出使者去朝见周天子,请周天子来认定宋国的君位,随后齐桓公又代表周天子召集宋、鲁、陈、蔡、卫、郑、曹等诸侯国开会,并订立了今后要互相帮助、安定王室、抵御外族的盟约,组成一个中原的诸侯国联盟。就这样,通过多次召集诸侯会盟,齐桓公事实上成了盟主。

以后,几次发生山戎攻打燕国,狄人攻打邢国、卫国的事件,齐桓公都组织诸侯国派出军队前去救援。可是卫国、邢国等比较弱小,没等到援军前来,就被狄人灭掉了。齐桓公率诸侯联军打败狄人后,又帮助两国营建新国都,恢复了两国的社稷。从此,齐桓公在中原国家中的威望更高了。

位于南方的楚国,虽然也是周王朝的诸侯国之一,但因为文化比较落后,又有披散头发、衣襟开向左边等不同于中原国家的习俗,一直被视为荆蛮之国。春秋初期,楚国逐渐强大起来,开始向北推进,威胁着周王室及中原国家的安全。公元前656年,因为楚国攻打郑国,齐桓公就率领齐国及宋、鲁、陈、卫、郑、曹、许等八国军队征讨楚国,并代表周天子责备楚国不按时进贡祭祀时用的包茅。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楚国只好表示继续尊奉周天子,进贡包茅,并在召陵(今河南省郾城县附近)和齐国为首的八国订立盟约,解除了对郑国的包围,双方言归于好,各自撤军回国。

齐桓公率领诸侯军队逼退楚军,阻止楚国北上的势头,进一步加强了在中原国家的霸主地位。后来齐桓公又联合诸侯国阻止周惠王废太子的企图,维护了太子郑(即后来的周襄王)的王位继承权。周襄王即位后,感激齐桓公的恩德,派使者给他送去祭肉、珍贵的弓箭和车子。齐桓公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在诸侯面前夸耀自己的霸主地位,在葵丘(今河南省兰考境地)大会诸侯,订立盟约,共同辅佐王室。史书记载说:春秋五霸中,以齐桓公最盛。齐桓公九次召集诸侯大会,其中以葵丘之会最盛。

退避三舍　　晋文公称霸之谜

春秋各国中,能接替齐桓公称霸诸侯的是晋文公重耳。晋文公从四十三岁起逃难,到即位的时候,已经六十二岁了,经历了苦难的十九年。当了

国君以后，他整顿国内政治，发展生产，安定人心，晋国很快成为春秋一霸。

进入春秋，各国纷争不息，而齐桓公曾经九次召集诸侯大会，声势浩大，成为公认的春秋首霸。此后，能够与齐桓公霸业比肩的，要数晋文公重耳了。

晋国位于今山西省，最早是西周初年周成王分封给弟弟叔虞的封国，当时方圆只有百里左右。晋国在献公当政时开始强大起来，把部队由一军(一万人)扩充到两军，先后灭掉周围的霍、魏、耿、虢、虞等国，并打败了东山的赤狄，使国土扩展到今山西省的大部分和陕西、河南、河北的部分地区，成为与齐、秦、楚并列的四大强国之一。这为后来晋文公成就霸业奠定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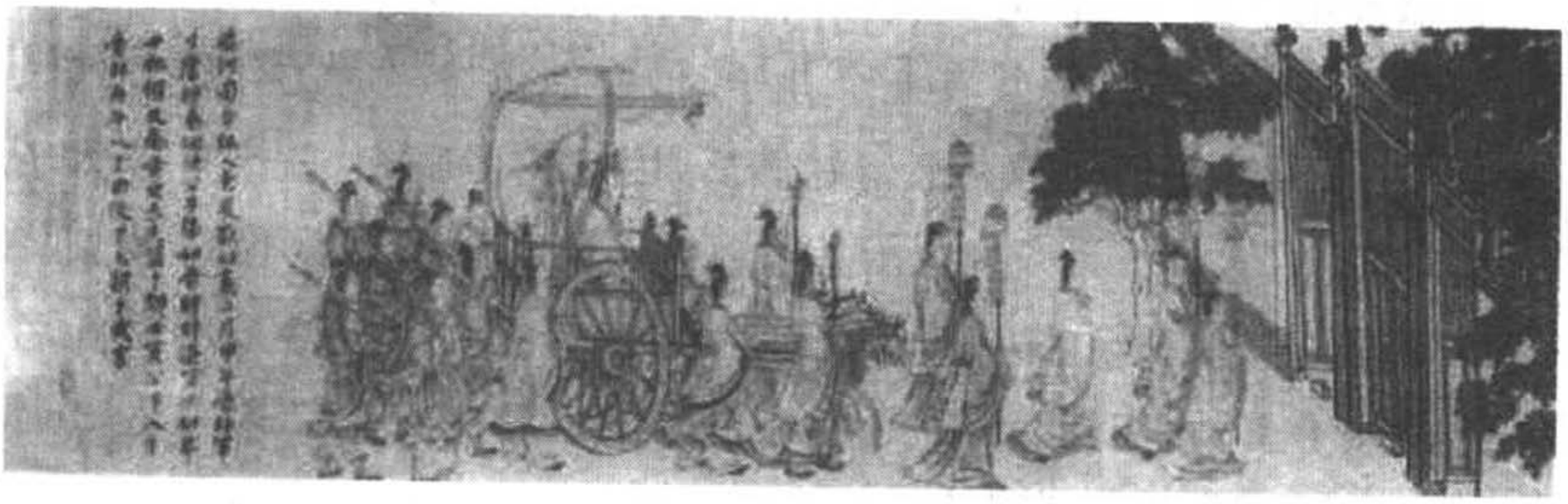
晋献公是一位较有作为的国君，可是他没有处理好君位继承问题，给晋国造成很大损失。晋献公共有九个儿子，最初他也按当时的传统立嫡长子申生为太子，可是后来娶了骊姬姐妹俩后，因为宠爱骊姬，就废掉了太子申生，改立骊姬生的儿子奚齐为太子。骊姬对这种安排还放心不下，恐怕将来献公死后，奚齐会斗不过那些哥哥，于是就设计陷害长子申生和有贤能名声的另两个儿子重耳、夷吾，诬告他们想害死父亲晋献公。结果申生被逼自杀，重耳、夷吾被迫逃亡到国外。

事情的发展并未如晋献公、骊姬所料。公元前 651 年，献公病逝，死前他曾托嘱相国荀息辅佐奚齐，可是奚齐即位仅一个月就被大夫里克杀死。荀息改立骊姬妹所生的卓子，两个月后，又被里克杀死。荀息见无法完成晋献公的遗命，便自杀了。于是里克等大夫迎回逃亡到秦国的夷吾，拥立他做了国君，这就是晋惠公。晋惠公即位后杀死了里克等大臣，又对帮助他回国的秦国背信弃义，引起国内外的不满。十四年后，晋惠公死去，在晋国大夫的支持下，秦国又帮助重耳回国做了国君，这就是晋文公。

重耳从受谗害出逃到回国即位，过了十九年的逃亡生活，经历不少磨难。最初，晋献公听信骊姬的谗言，即派兵去捉拿重耳、夷吾。重耳正在翻墙而逃，追兵赶过来就是一剑，幸好只砍掉了一段袖子，才让重耳侥幸逃走。重耳带着贤士赵衰、狐偃、狐毛、贾佗、魏掌和一些随从逃到狄国。重耳的生母就是狄国国君的女儿，有着这层亲戚关系，重耳虽然没有在国内做公子时生活得那样好，也还是受到了款待。狄国离晋国很近，重耳住在这里，是准备一旦时机到来，可以很快回国谋取君位。晋献公去世，晋国大乱，里克杀

奚齐、卓子后派人来到狄国请重耳回晋即国君之位。重耳看到晋国政局混乱，杀机四伏，不敢回国，就坚决谢绝了里克等人的请求。晋惠公即位后，看到重耳在国内有很高的声望，也感受到了威胁，便在即位后第六年派人去刺杀重耳。重耳见势不妙，遂离开狄国前去投奔齐国。

去齐国的路上，经过卫国。卫文公觉得重耳不过是个落难的公子，没有接待他们。再往东走到五鹿（卫地，在今河南省濮阳县南）时，重耳饿得走不动了，就向田里的农夫讨饭吃。农夫见这些贵族模样的人反而向自己讨饭，就把土块放在陶碗中递了过去，那意思好像是说：你要的粮食就是在它上面长出来的，请拿去吧。重耳很生气，赵衰连忙说："这是上天赐予您土地的征兆，应该接受下来。"重耳这才转怒为喜，接受土块后继续赶路。



晋文公复国图卷

重耳到了齐国后，齐桓公厚礼相待，还把侄女姜氏嫁给他，并赐予二十辆车马。二年后，齐桓公去世，齐国内乱，诸侯也屡次前来攻打，重耳想靠齐国帮助来实现大业已是不可能，因此重耳的谋臣狐偃等人和其妻姜氏都劝重耳另投靠别的国家。重耳在这里过惯了舒适安逸的生活，早把返国大业忘得一干二净，竟想在齐国终此一生。后来狐偃与姜氏等人用酒把重耳灌醉，才用车载着他离开齐国。

重耳一行从齐国到了曹国。曹共公对重耳很不礼貌，还因为听说重耳"骈胁"（肋骨相接成一块）而在重耳洗澡时偷看。这样，重耳一行离开曹国到了宋国。宋襄公知道重耳是个贤能之人，就用国礼来接待他们，送马八十匹。可是宋国是个小国，刚被楚国打败，宋襄公受了重伤，无法帮助重耳回国，只好请他们另外投奔大国。这样重耳一行又来到郑国，但受到郑文公的冷遇，于是他们又前往楚国。

楚国是个大国，楚成王又想向中原地区发展，见晋国的公子来到，便用

国君之礼接待他，生活方面也安排得十分周到。有一次，楚成王问重耳将来准备怎样报答，重耳觉得晋国不像楚国那样出产各种珍禽异兽、丝帛玉器，实在想不出用什么报答为好。可是楚成王一再追问，重耳便说："我愿意晋国和楚国长期友好，如果不得已发生了战争，我们晋军一定退避三舍（一舍为三十里）。"楚国大将子玉听了很生气，恨不得把重耳立即杀死。楚成王说："重耳贤能，随从的人都是国家栋梁之材，有可能回到晋国主持国政。这是天意，怎能杀他？"

几个月后，晋惠公夷吾病故，正在秦国作人质的太子圉私自跑回国继位，秦国十分不满。秦国于是到楚国接来重耳，并与晋国国内支持重耳的大夫取得联系，然后派兵送重耳回国，杀死了太子圉，重耳即位为君，称晋文公。公子重耳出亡十九年，这时已是六十二岁的一个老头了。

重耳在逃亡生活中，几次受到冷遇、非礼，还有几次险遭杀身之祸，直到这时才回国做国君。这些年的遭遇使他受到锻炼，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又拥有一批忠实的贤臣良佐。即位后，他废除旧的债务，减轻赋税，赈济穷苦，发展农商，因此国家很快繁荣强盛起来。在此基础上，晋文公开始谋求霸主地位，他接过了齐桓公"尊王攘夷"的口号，公元前 635 年，派军队打败了与周襄王争夺王位的大叔带和他引来的狄人军队，帮助周王返回国都洛邑，恢复王位。公元前 633 年，又在城濮（今山东省鄄城县西南）打败了被中原国家视为"荆蛮"的楚国，从而确定了霸主地位。

城濮之战是由楚国攻打宋国，宋国向晋国救援而引发的。开始，晋文公不愿意与帮助过自己的楚国作战，便攻打与楚国友好的曹国、卫国，迫使楚国解除对宋国的包围。楚将子玉原来就对晋文公不满，这时见晋国又与楚国为敌，便坚决要求攻打晋军。楚成王劝说不住子玉，便让他率领楚国的精锐部队去与晋军作战。晋文公遵守诺言，率军后退了三舍，然后联合齐国、秦国，在城濮与楚将子玉交战，大败楚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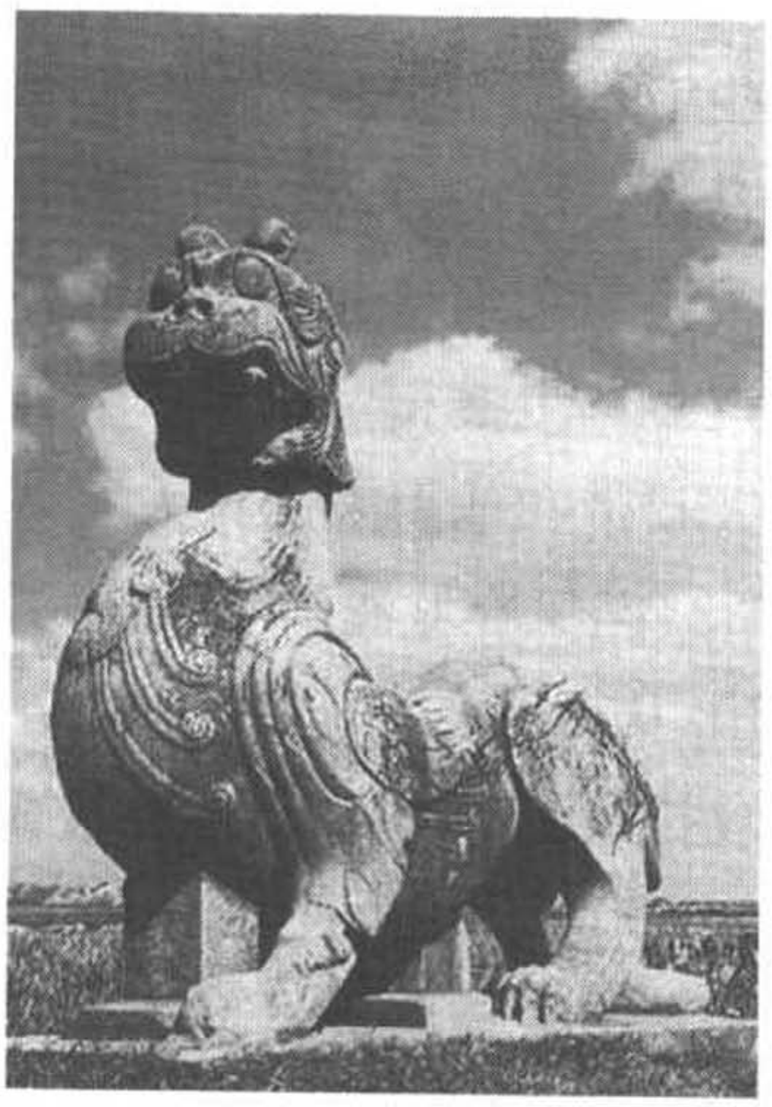
城濮之战后，晋文公把俘虏的楚军士兵献给周王室，表示自己是在为周襄王而战。周襄王派王子虎赐给晋文公象征着征伐之权的弓矢和虎贲（武士）三百人，正式承认晋文公为霸主。

历经磨难的晋文公终于获得了诸侯们日思夜想要达到的最高地位，得到了人们的尊重。

庸夫之不若　梁武帝博学之谜

梁武帝萧衍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十分引人注目。他是个博学的皇帝，曾把佛学、儒学、玄学三种理论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和运用。在他统治前期，他在政治上的才能也有所显露，不过人们对他并不认同。

在南朝历史舞台上，梁武帝萧衍扮演的角色颇引人注意。他的年寿很高，活到了八十六岁；在位时间也不短，长达四十七年。老天这种优待，不要说南北朝其他帝王没有人能享受到，就是在历代众多的国君中也找不出来几位。



梁代石刻

学者们评论，萧衍早年显示出来的军事才能，与南朝各国的另外三位开国皇帝即刘裕、萧道成和陈霸先比较，不相上下，难分伯仲。南齐明帝时，萧衍还只是个官职不高的冠军将军，但能率军连破敌帅王肃、刘昶，威名远震魏廷。魏孝武帝敕文说："闻萧衍善用兵，勿与争锋，待吾至。若能擒此人，则江东吾有也。"（《南史·梁本纪》）以后他升任雍州刺史，看到皇帝萧宝卷昏庸无道，乱兆已现，就建议据有形势之地的哥哥萧懿起兵。萧懿不听，终为俎上肉。而萧衍却能面临危险，巧用计谋，使奉旨诛讨的萧颖胄倒戈。在

联军东进途中，他又屡次为犹豫反复的盟友鼓劲打气，并严厉驳斥萧颖胄想向北朝借兵的错误主张。萧衍毅然挥师打到建康，只经一年便完成了灭齐建梁的大业。

称帝后，萧衍多次下诏废除南齐的严刑苛法，并加强对各级官吏的督察，以整肃吏治，劝课农桑。他还准许漂移他乡的流民返乡，同时蠲税三年，若不乐还者也可在侨居地著土落籍。萧衍又下令将一部分国家公田和无主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贫民，并严厉制止豪家富室从中渔利，多占公田。这些措施，对于改善小农处境，发展经济确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在处理统治阶层内部关系上，萧衍采取了不同于前朝的政策。他虽然也杀掉了禅位的逊帝，但对南齐的宗室注意区别对待。他只是消灭了萧鸾一枝，而对萧道成嫡系子孙极为宽大并努力笼络。

对于开国功臣，他也没有像前朝那样，急于“烹狗”、“藏弓”，大行杀戮。在用人上，他一方面仍然使高门士族保持着特权地位，以争取他们的拥护；另一方面又从寒士和庶族中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参与机密，行使真正的权力。高门士族不过是他朝廷中的高级摆设。这难怪让有的士族抱怨萧衍“爱小人而疏士大夫”了。萧衍的上述作法，大体有利于政治稳定，符合统治阶层内部各集团力量升降变化的情况。

萧衍的长处是在学术文化方面。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他遗世的专著近三十种，内容涉及经学、诸子、兵书、诗赋、医学、佛法、音乐等很多方面，卷帙数量之巨，足以骇人，仅《通史》一部就有四百八十卷。至于由他主持编纂的书籍则数量更大，就学术和文才而言他当属一代宗师。群臣遇到书中的疑惑，皆由萧衍亲自裁决。

佞佛是梁武帝统治走下坡路的重要原因之一。萧衍极力提高佛教的地位，鼓吹“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为正道，其余九十五种为外道”，实际已宣布佛教为“国教”。他还亲披袈裟，“躬事讲说”，为弘扬佛法大造舆论。他三次戏剧性地到寺院“舍身为奴”，然后由国库开支和公卿捐施，用大量的钱财将其赎回。萧衍大事营造佛寺佞佛所造成的恶果，皆由百姓们饱尝。统治者加紧剥削榨取，逼得民众卖儿鬻女，流亡四散，转死沟壑。随着“天下户口减落”，梁朝国势日衰。

萧衍反对刘宋、南齐的骨肉相残，但又走到了另一极端，优容子弟达到溺爱的程度。六弟萧宏恣意聚财，仓库爆满，光藏钱的房间就有三十多间，



南京曾经是梁朝的首都

计三亿钱有余。其他物品的库房则近百间。萧衍知道后，不但未加责备，反而大事夸奖。侄子萧正德纠集恶徒公开杀人劫货，他装聋作哑，不闻不问。萧正德叛降北魏，后又潜逃回来，他只是哭着教训一顿，不给惩罚。萧宏身为统军元帅，竟因遇雨弃军而走，致使损失士卒五万、器械无数，结果也没被法办。但萧衍对百姓则日渐苛刻，“陷辟者接门，囹圄随满”。为此，一老人曾向他拦路诉说：“陛下为法，急于黎庶、缓于权贵，非常久之术！”

进入晚年，萧衍性格变态，只愿听好话，不能受批评。有一次臣下上表要求纠正官吏贪残害民、风俗淫奢、大兴土木等弊政。他勃然大怒，一方面拼命表白自己的清廉，另一方面则大骂臣下是害群之马，威胁说如果表中所列事例有任何误差，都要严惩不贷。这样一搞，朝臣谁也不敢向萧衍说真话了。

侯景是北朝品质恶劣的小人，因为与东魏权臣高澄发生矛盾，投降西魏不成，才向梁武帝求援的。好大喜功的萧衍拒绝臣下的劝告，派出主力去助战，结果梁军元帅被擒，全师覆没。梁武帝转而同东魏议和，出卖侯景，给侯景南下造反提供了借口。在侯景围困建康的一百三十多天里，梁朝的方镇、将军们所统率的勤王军，陆续到达城郊的有三十万人。但他们一律顿兵不进，作壁上观。待侯景破城后，他们或降或散，没有发挥任何救援作用。而其中的主要人物恰恰就是萧衍所溺爱的“骨肉”。

元代著名史家胡三省，对梁武帝前后期截然相反的举措大为不解：“萧衍举事于襄阳，智计横出。及遇侯景，庸夫之不若。岂耄邪？抑天夺其鉴也？”怪天，没有丝毫道理；说老，倒是条理由。其实，权力本是一味腐蚀剂，

而表面无限的君主权力，其腐蚀性尤强。随着时间的流逝，什么盖世英雄、超级天才都可能被它剥蚀干净。梁朝的灭亡，是以萧衍为首的统治集团日益腐败的必然结果。

既如上述，如著名学者周一良等人认为梁朝统治的五十年，使南方政治、军事、文化得到较高的发展。梁武帝的用人在当时有着积极意义，他重视吏治，善用兵，是应该肯定的。他的最大弊政在崇尚佛教上。

但也有学者不这样认为，他们指出梁武帝是一个伪善而残暴、愚蠢而贪婪的统治者，他采用各种方法来维持自己的特权，是东晋以来最坏的统治者。郭沫若认为他对士族宽容照顾，重用一批不涉世务、不学无术的寄生虫，政治是腐败的。

有的学者认为梁武帝在历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但不能把他想像得太高。他统治时期，政治黑暗腐败，对江南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责。他好大喜功，昏庸无能，对江南经济造成极大破坏的侯景之乱负有直接责任。他的历史地位，其实只有在文学史上值得一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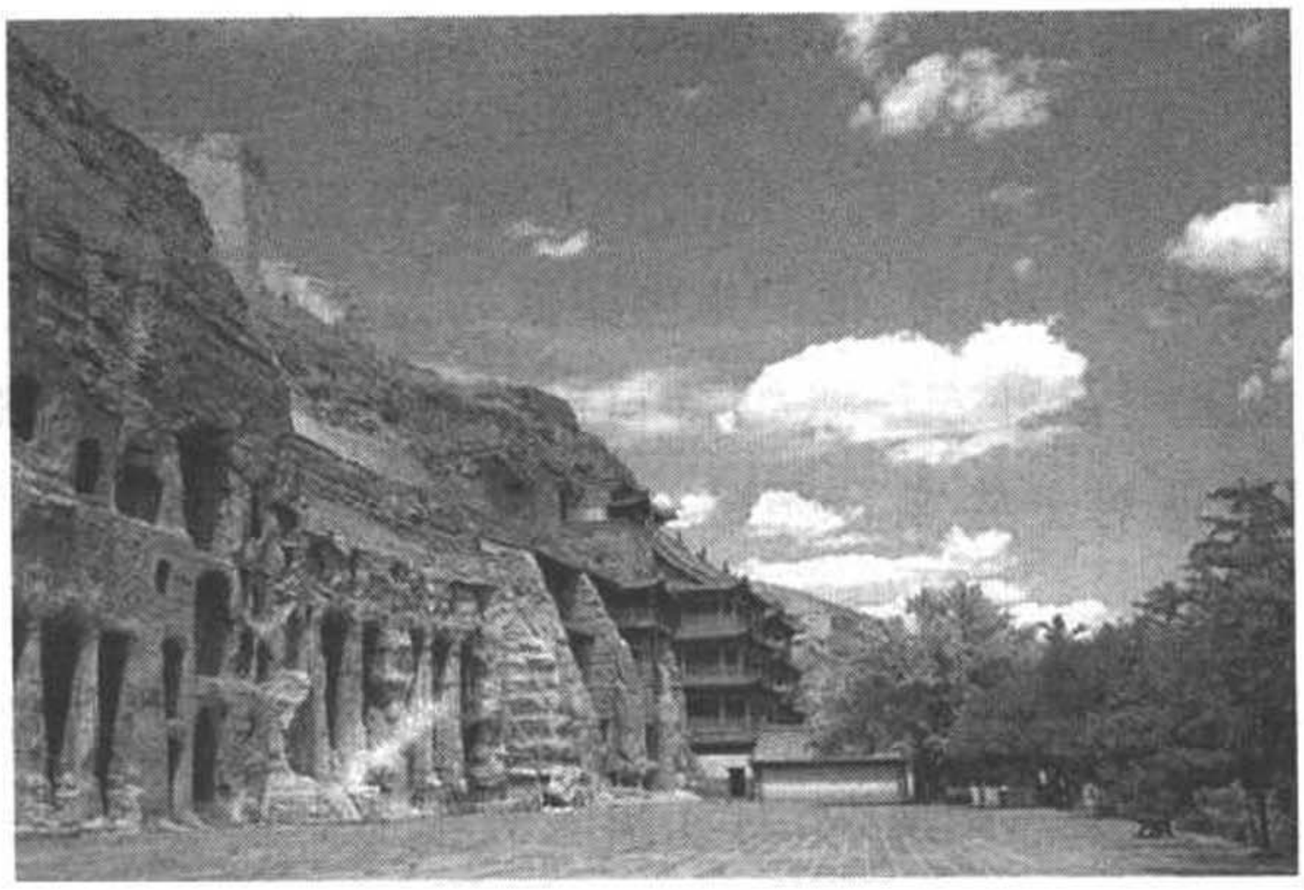
我们眼中的好皇帝应该是一个治理国家的好手，而不希望他是一个艺术家或学者。有时，我们对皇帝的评价真是两难，既希望一个皇帝有鲜明的性格，又希望他能理性地治理国家。皇帝是做不到两全其美的，因而后人对皇帝的评价也不可能达成一致的。做皇帝有时也很难！

相互融合　　孝文帝改革旧俗之谜

公元 493 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开始了对旧俗的改革，积极推行汉化。公元 499 年，亲政只有九年的孝文帝去世了，然而其取得的成就却是十分可观。孝文帝对鲜卑旧俗的革除，不仅对北魏的发展影响极大，而且对我国整个历史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后，经过三代，帝位传到拓跋宏手里，这便是著名的孝文帝。冯太皇太后去世时，孝文帝二十四岁，他那有名无实的皇帝已经做了第二十年。太后生前不仅亲自决定一切，有时甚至还虐待皇帝。一次，她脾气发作，大冷天把皇帝关在空屋子里，三天不给饭吃。她还打算

把他废掉，改立咸阳王拓跋禧（孝文帝弟）做皇帝，后因东阳王拓跋丕（宗室中辈分最长之人）和大臣穆泰、李冲等人的力谏才作罢。然而，孝文帝对祖母并不怨恨，对拓跋丕等人心存感激。



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时期

历史上，母后掌权时用的人，幼君长大后一般都会将其全部除掉。但魏孝文帝并不这样，例如李冲，跟他的祖母冯太后有极亲密的关系，孝文帝却丝毫不以为意，仍视其为股肱之臣，朝廷大政大都和李冲商量，“君臣之间，情义莫二。”这种情形，历史上好像没有相近似的例子。

魏孝文帝对祖母的孝顺是出于衷心。太后死后，他滴水不沾达五天之久。他以改革旧俗、实行汉化著名，这其实与他秉承祖母的教导是分不开的。群臣见他在大丧中哀伤过甚，劝他节哀，他的答辞中有几句极可注意。他说：“祖宗情专武略，未修文教；朕今仰禀圣训，庶习古道……”由此可见，孝文帝认为在冯太后以前，魏的君主只晓得用兵打仗，冯太后才开始振兴文教，他本人受到太后的教导，才懂得“古道”。所谓“古道”，即治国必须依照汉魏的规制。他的这段话，已是在无意中宣布，要把冯太后开始的改革进行下去。

孝文帝在太和二十三年（499）就去世了，他亲政的时间只有九年，然而取得的成就却是可观的，然而他与守旧势力的斗争却是特别的艰巨。

孝文帝非常希望能了解南朝的典章制度。太和十七年（493），机会来了。南朝齐国的雍州刺史王奂因故被杀，他的儿子王肃逃奔北朝，孝文帝在邺接见他时，谈得非常投机。王肃谈萧氏有可乘之机，劝孝文帝南征，同时也谈起了治国之道和南朝的典章制度。两人越谈越有劲，相谈一个晚上丝

毫不感到疲倦。从此以后，孝文帝对王肃的器重礼遇，丝毫不逊于亲贵重臣，有时谈话还命左右回避。孝文帝把他比为春秋时的伍子胥，君臣之间也自比为刘备与孔明。

了解了汉朝制度确有优越的一面，孝文帝开始改革了。首先是关于迁都。王肃投魏的那年，就是孝文帝决策迁都洛阳的同一年。这年五月（即在接见王肃以前五个月），他打算以伐齐为名，行南迁之实。七月，北魏公开宣布准备伐齐。八月，孝文帝率大军从平城出发，渡河到达洛阳。

孝文帝先到旧时的太学，参观《石经》。过了几天，命先头部队继续进军。次日，孝文帝全身戎装，上马出发。群臣在马前下拜，像是有什么请求的模样，孝文帝一看就知道大臣们想说什么，但他装出没有看出来："如果不伐南朝，当迁都于此，王公以为如何？"其中一位便应声道："如果陛下放弃南征，迁都洛阳，这是臣等之愿，苍生之幸，再好也没有了。"于是群臣都高呼万岁。当时，许多旧人都不愿南迁，但更怕南征，但想想既已南行至此，只得赞成，不敢再生异议。这好像是一出预先排好的戏，而李冲和个别宗室是预定的角色。随着大家欢呼万岁，迁都洛阳也就定了下来。

孝文帝是要把改革旧俗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太和十八年十二月，他宣布士民禁止穿胡服，一律改穿汉人的服装。十九年五月又下诏：在朝廷上不得讲鲜卑语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一律改说汉语，并且规定三十岁以下在朝廷做官的人不会汉语的要免官。在这一年里，孝文帝还推行了其他几项措施。

有位亲王病故，他的妃子先已去世，葬在北都。有关方面请示：亲王该葬在哪里。孝文帝指示："迁洛的代人，死后都葬在邙山。凡丈夫已葬在代郡的，妻子死后可以回葬北方；丈夫在洛阳去世的，不得还北方就妻。"他还下诏："迁洛的百姓，死后葬在洛阳，不得回北。"于是迁洛的代人，其籍贯都改为河南洛阳了。此外，他在洛阳设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训教培养贵族子弟。汉地使用金属货币，而少数民族组成的北魏以前是不用铸币的，这年孝文帝令铸太和五铢钱，命公私使用。

太和二十年(496)正月，孝文帝又宣布实行一项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激烈的措施：改变鲜卑人的姓氏。鲜卑姓多为复姓，如拓拔、独孤、丘穆陵等，汉姓则为单姓。孝文帝带头改拓拔为元。同年，孝文帝又下令鲜卑与汉族士族之间通婚。他率先娶李冲等五家汉族官僚和士族的女儿为妃，又命自己的六个弟弟各娶汉人士族之女为妻。



云冈石窟

孝文帝是要彻底革除旧俗，把南朝的典章制度全部照搬过来。他的改革促进了汉族与鲜卑族的融合，在历史上有着巨大贡献。然而在当时却引起了一部分鲜卑人的强烈反感，其中也包括太子元恂。元恂不过是个十四岁的孩子，却成了反对革除旧俗的先锋。他身体肥胖，嫌河南太热，一直想回北方。八月中旬，他乘父亲到嵩山去的机会，带着左右心腹逃往平城。临走时，还亲手把高道悦杀死。小领军元俨领卫兵拦截，闹到天黑，方才平息。次日一早，尚书陆秀飞马出城，向孝文帝报告。孝文帝大惊，令严守秘密，并且故示镇静，不立即赶回去。他回宫后，召太子来见，痛加训责，还与兄弟咸阳王元禧两个轮流动手，把元恂打了一百多棒，然后命人把他扶出去禁闭起来。这一顿打得着实是重，元恂躺了一个多月才能起床。

闰十二月，孝文帝把元恂废为庶人，安置在河阳无鼻城，派兵看守。次年三月，御史中尉李彪秘密上表，说他仍在谋划作乱。孝文帝令人带毒酒到河阳，逼他自杀，其时年仅十五岁。

从长远看来，孝文帝的改革是成功的。鲜卑人南迁后，汉人和鲜卑人在血统上相互融合，风俗上、生产上互相学习。他的政策顺应了历史潮流，而那些企图阻碍历史潮流进展的势力，不管当时怎么强大，但最后总是要遭历史淘汰。

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孝文帝去世，享年仅三十三岁。太子元恪即位，是为世祖宣武帝。根据一些史书记录，6 世纪初的宣武帝景明、正始年间，北魏文风大盛，燕、齐、赵、魏之间，教授者不可胜数，其弟子多的达千余人，少的也有几百人。这虽然是在太和以后的事情，然足以说明孝文帝改革以后北

朝文化日益发达的事实，大河南北已经完全摆脱了西晋末年丧乱以来停滞落后的状态。出现这样的局面，与孝文帝的革除旧俗有着很大的关系。

东行西幸　　隋炀帝开挖运河之谜

隋炀帝杨广在位仅短短14年时间，却主持完成了东都洛阳的修建、大运河的开通，并且三征高丽、三巡江都。他生前的所作所为颇受人们的关注，而开凿大运河是杨广所做的事情中受后人争议最多的一件。美丽的江南风光是他开河的主要原因？

隋炀帝杨广于仁寿四年(604)弑父自立。第二年，他便下令开凿运河。整个工程前后共分四段进行：大业元年(605)，在北方修通济渠，从洛阳西苑通到今天的江苏淮安；同年，又疏通扩大了山阳邗沟，这条宽四十步的运河的修成，仅用了半年时间；大业四年(608)，开凿了永济渠，这条河流是通济渠向北的延伸，主要利用沁水的河道，南接黄河，北通涿郡；大业六年(610)又在长江以南开了一条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引江水穿过太湖流域，直达钱塘江边的余杭(今浙江杭州)。整条大运河的开通，前后只用了不到六年的时间。它沟通了海河、黄河、长江、淮河、钱塘江五大水系，以东都洛阳为中心，西通关中盆地，北抵华北平原，南达太湖流域，长达千里。这样巨大的工程，在古代科学技术并不很发达的情况下，是很难想像能够快速完成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隋炀帝要开凿这条大运河？

多数人认为，隋炀帝开通运河的直接目的是想去巡游他向往已久的江都风光，附带的目的是加强对不久前征服的东南地区的控制和转输该地富庶的物资以增强中央政权的力量。运河开通以后，首先就是供炀帝荒淫奢靡的巡游。持这种看法的人指出炀帝不但喜欢扬州这个雄藩大郡，而且嗜好扬州的春江花月。他的《春江花月夜》诗说："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写出了扬州临江的秀丽风光。有人认为唐代诗人张若虚著名的"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就是受了他的影响。炀帝另有《江都宫乐歌》、《泛龙舟》、《幸江都作》、《迷楼歌》等诗篇，都是他留恋江都、欣羡江都的作品。



开凿于隋代的京杭大运河

持这种观点者都比较强调隋炀帝一贯奢侈的生活作风。因为开凿这条大运河动用了全国大量的劳动力，是当时隋朝徭役繁重的主要因素，其间甚至出现男丁不够，以妇女充数的现象。史书上也用“力竭转输，身填沟壑”这样严重的词语来形容当时劳动人民的苦难。而且，运河开通之后，隋炀帝先后三次巡幸江都，每一次都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力，一路上的穷奢极欲为许多民间小说和戏剧所津津乐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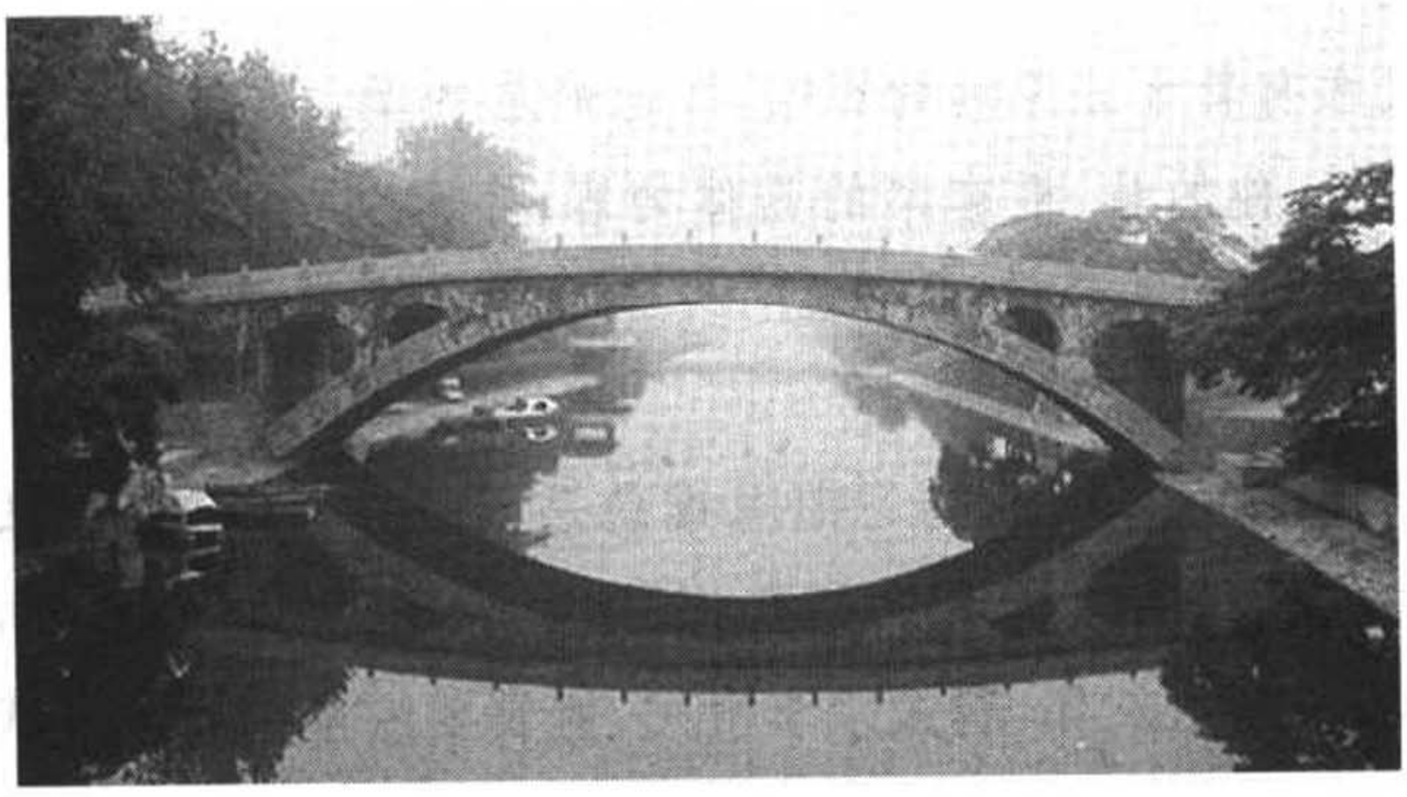
但不同意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炀帝开河并不见得只是为了游幸江都。根据《隋书》记载，炀帝并不仅仅巡游过江都，还曾巡游过西北各地，到过突厥与吐谷浑边境。这种巡游有玩的成分，但主要应是出于政治与军事的考虑。难道他为了好玩就愿意到沙漠地里去走一遭？隋炀帝曾三下江都，但绝不是单纯的去看琼花，而是着眼于扬州所具有的重要经济政治地位。认为炀帝开河仅是为了玩，恐怕是说不过去的。

一些人认为隋炀帝开凿运河的主要目的是出于当时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需要，与杨广个人贪图享乐无关。他们指出，隋代开运河，炀帝并非首创。早在开皇四年(584)，国家仓廪空虚，隋文帝希望在水旱之年，国家能有充足的粮食储备。为了方便漕运，他在下令建造大量仓库的同时，从潼关到长安，引渭水，开凿了广通渠。开皇七年(587)，为了进一步扩大漕运，隋文帝又开凿了山阳渎。由此可见，国家当时的确需要开凿运河，而隋炀帝开运河仅仅是隋文帝开运河的继续。开通运河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沟通京师洛阳

与江淮的交通，便利漕运。

江淮以南地区经过三国以来几百年的发展，已经逐渐在全国经济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荆州和扬州均富甲一方，整个南方也成为全国鱼盐杞梓以及丝麻布帛的主要供应地，但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却在洛阳。所以，运河一旦开通，就能把全国的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联系起来，把富庶的江南财富以田赋的方式加以征集，并通过运河转输到洛阳。另外，在隋朝建立以前，中国长期处于南北朝分裂的阶段。江南从东晋开始就形成了门阀士族的特殊势力。隋朝建立以后，陈朝的残余势力一度与中央对抗。开凿大运河有助于中央对南方的控制，加强中央集权。

也有人认为隋炀帝鄙夷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终至亡国，因此自己反其道而行，“东行西幸，靡有定居”。在运河开通后，他的确曾经三次巡游江都，但是这三次都有其军事和政治上的动机。



建于隋代的赵州桥，是目前所见最古老的石拱桥

第一次巡游江都，隋炀帝是想要通过文化的联络巩固政治的统一，有一定的文化性质。这次巡幸，他的船队前后二百余里，挽船的士兵有八万人。自己御乘龙舟高 45 尺，长 200 丈，上下 4 层。如此不惜巨资造船，其目的是在向尚有离心意志的南方宣扬中原王朝的“皇威”。他的随从中有大批僧尼、道士、蕃客等政界、宗教界人士和宿学鸿儒。第二次巡幸则是杨广追求军事征服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军事意义。当时隋朝打算兴兵辽东，炀帝想从南方补充军事人才，征调南方的经济为辽东战争服务。而他第三次巡幸江都究其原因实属于政治逃难。这一次的巡幸没有了以往巡幸的显赫和狂热，其时隋朝政治动乱即将到来，炀帝征高丽失败，政治意志消沉，在江都他

的确十分荒淫。史书说:“炀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宫中百余房,各盛供张,实以美人,日令一房为主人。江都郡丞赵元楷掌供酒馔,帝与萧后及幸姬历就宴饮,酒卮不离口,从姬千余人也常醉。”但若仔细地翻阅史书,就不能说炀帝的巡幸纯粹是为了寻欢作乐的,开凿运河的主要目的应该也不在此。

隋炀帝开凿运河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个人一己之欲,还是为了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三言两语是很难争辩清楚的。不过,如果我们看到运河在历史上的贡献,看到运河直到今天仍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那么我们对炀帝开河目的的理解就会更加深刻。

武术祖宗　　宋太祖练武之谜

皇帝在中国武术史上留下赫赫名声第一人的是北宋太祖赵匡胤。他对中国民间武术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以他命名的拳、棍在历代武术著作中时有可见。不过,他的拳、棍套路的具体内容,今天仍是有待体育史专家研究的一个谜团。

看多了武打小说,我们的习惯思维总是以每一个朝代的开国皇帝都是武勇过人的,能亲自跃上战马执锐挽强、摧坚陷阵。不过能上阵督战打仗的皇帝不少,如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但真要说他们有多少武艺功夫,这是应该打个问号的。如果要问在中国帝王中,谁真的是武艺高强有过人之处的,恐怕没有人会想到竟然是宋太祖赵匡胤。武打小说、电影电视中描写的一些明清帝王精通武术的故事,其实并不足为据,至于一些以帝王命名的拳种套路,更是依托附会,戏说而已。

赵匡胤是河北涿州人,出身将官世家,武艺高强,胆识过人。他二十多岁时投靠郭威。郭威篡夺后汉政权时,他是积极的拥护者。后周建立后,他被迅速提拔起来,官至忠武军节度使。此后,他跟随周世宗南征北战,破北汉军,攻南唐,屡立奇功,升任殿前都点检,成为禁军的最高统帅。周世宗去世,他发动陈桥驿兵变,夺得政权。在他一步步走向帝位的过程中,他的武功起了很大的作用,使他能团结一大批文臣武将,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

赵匡胤的武功主要在拳、棍二个方面。赵匡胤的拳后代称为太祖拳,在

明代的一些武术兵书中有详细介绍。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在《纪效新书》卷一四《拳经捷要篇》中说:“古今拳家,宋太祖有三十二长拳,又有六步拳、猴拳、化拳,名势各有所称,而实大同小异。”从这段话中看出,宋太祖最擅长的长拳有三十二种套路,此外他也精通六步拳等其他三种拳法。戚继光的枪法老师唐顺之说宋太祖的长拳套路中特别善于用腿,当时称为赵家拳,由于实战中很有效果,后代人认为是“神拳”。

宋太祖的长拳具体拳势有哪些,其实到明代已大多失传,但在戚继光《拳经》中谈到的“探马势”肯定是太祖长拳的一势,而且很有可能是代表性的招式。《拳经》说:“探马传自太祖,诸势可降可变。进攻退闪弱生强,接短拳之至善。”这种拳势可能是在进攻过程中的防守招式,是应接对方短拳的最有效一招。唐顺之说“凡打法行着多从探马起”,即开打时首先用探马势,因为这是一个有着多种变化的招式。戚继光又说:“挪更拳法探马均,打人一着命尽。”探马势和其他拳势相结合,就能一拳致人于死地,毫无疑问它是长拳中的精华。一直到明代,有很多人仍在传习太祖长拳,尤其是山东人情有独钟,江南学武艺的人也很感兴趣。

宋太祖还擅长棍术,相传有“一条杆棒打天下”的说法。明代小说《水浒传》第一回中说太祖“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水浒传》的许多说法来自于南宋时人们的记录,应该是有所依据的。如宋人蔡絛《铁围山丛谈》曾谈到太祖没有发迹时,常手握一杆纯铁棒,功夫很深。铁棒很重,而宋太祖膂力过人,时间一长,棒上还有手指痕迹。蔡絛是北宋末年蔡京的孙子,小时能有机会出入皇宫,还亲自看到过这杆铁棒,他的说法肯定是比较真实的。明人《飞龙传》是专讲宋太祖发迹的长篇章回小说,它的前身是宋人话本《飞龙记》,里面也讲到宋太祖善于用棍,打遍天下豪杰无敌手。

宋太祖的铁棍挥舞起来很有讲究,明代人称为“腾蛇棒”,认为是棍棒中的第一等。从这个名字中可以看出,宋太祖舞铁棍的速度极快,外行人看起来像飞动的蛇一样扭过来扭过去。清代人说太祖棍法有三十六路,是棒法的开山祖,虽有言过其实的嫌疑,但宋太祖精于铁棍,并且发展出了一定的套路应是可以肯定的。

宋太祖不但自己精于武艺,骁勇敢战,而且还将拳棍武术传习给手底下的士兵。宋朝人编的《宋朝事实类苑》说宋太祖训练部队有独到的方法,他将武术灌输给将士们,使士兵以比试武艺和角力斗殴获胜为荣,武艺高超的

给予奖励。他身边聚集着数十位武林高手，个个身体健康强壮，每人同时能对付好几个人，上下山坡像飞马一样快。这数十位高手都是他亲自挑选的，平时他们与宋太祖相互切磋技艺，一起练功。宋太祖的拳棍可能就是通过这批人流传到世间，越传越广。以宋太祖命名的拳、棍明清以来时有所见，在今天的河北、山东和东北的一些地区，仍有自成门派的太祖拳或以太祖命名的拳法，相传民间的九龙棍、蟠龙棍等都与宋太祖有关，一些武术门派在举行活动以前常会祭祀艺祖赵匡胤。

虽然我们今天还不知道宋太祖拳棍的具体套路，但不能否认宋太祖是历代皇帝中精通武艺的第一人。不知道金庸的武打小说为什么从没提到过他。

嘉气满中京　　金完颜亮迁都之谜

完颜亮称帝前，金朝的首都在上京会宁府，完颜亮上台后就决定迁都燕京。迁都的原因，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有认为这是海陵王的远见卓识，有认为是当时的客观条件决定了上京不适宜再作为首都，有认为完颜亮纯粹是为了讨伐南宋。到底哪一种为真？



阿城是女真族的肇兴之地，是金朝的开国都城

海陵王完颜亮称帝前，金朝的首都在上京会宁府，即今天的黑龙江省阿城县南的白城。这里原是按出虎水一带完颜部的最初居住地，金太宗在这里建立都城后称会宁府，是金朝前期的统治中心。

完颜亮即位后，有一天他在宫中设宴招待大臣。酒过三巡，他问汉臣说："我栽种了莲花二百本都没有活，这是什么原因？"汉臣说："上京地寒，只有燕京地暖，可栽莲。"兵部侍郎何卜年说："燕京地广土坚，人物蕃息，是礼义之所，可迁都。北番上京，黄沙之地，不是帝王居住之地。"海陵一听觉得有理，便动了迁都之意，随即下求言诏，让大臣、百姓各抒己见。当时上书的人大多数认为上京僻在一隅，交通不便，应该赶紧迁往燕京。

有了舆论支持，天德三年(1151)四月，海陵下诏迁都。这时有关部门图画燕京宫室制度，依阴阳五行规划营建。海陵批评说："国家吉凶，在德不在地。假使居住的是夏桀和商纣，即使是很好的地方又有什么用处？如果是尧、舜来居住，要卜什么好地方？"他让熟通汉人文化的尚书右丞相张浩全权主持燕京城的营建。

张浩在燕京地方官的帮助下，用工三年，仿汉人宫室制度修建了燕京城。当时城四周长达九里三十步，天津桥之北的宣阳门为正门，门内东西分设来宁馆、会同馆，是接待宋、西夏等国使臣的国宾馆。都城中的内城，是皇帝的宫城，宫殿九重，三十六殿。皇帝宫殿居中，皇后居后，太监内省在东，妃嫔在西。内城之南，东为祭祀祖先的太庙，西为政府行政机构尚书省。在内城西门玉华门外，有同乐园、若瑶池、蓬瀛、柳庄、杏村等游乐场所。

天德四年(1153)三月，经过两年的准备，完颜亮决定正式迁都。他亲率满朝文武及中央全套机构，在"銮舆顺动，嘉气满中京，辇路宿尘清"的乐声中，迁入燕京城。不久，他改燕京为中都大兴府，又改汴京为南京，中京为北京。

这样的一次迁都，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认为他抛却了祖宗的发迹地，有违礼法。许多皇族不肯搬到燕京，身为正宫太后的徒单氏从一开始就反对这样做。完颜亮一方面对这些人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另一方面他逐步分割和缩小上京路建制，使之失去原有的重要地位。他去上京之号，只称会宁府，削除上京的京城建制，最后于 1157 年将上京的故有宫殿与"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尽行捣毁，"夷其址而耕种之"，使宫殿区变成了农田。

花了大力气建设燕京，并将大批女真贵族南迁，将上京的祖坟也迁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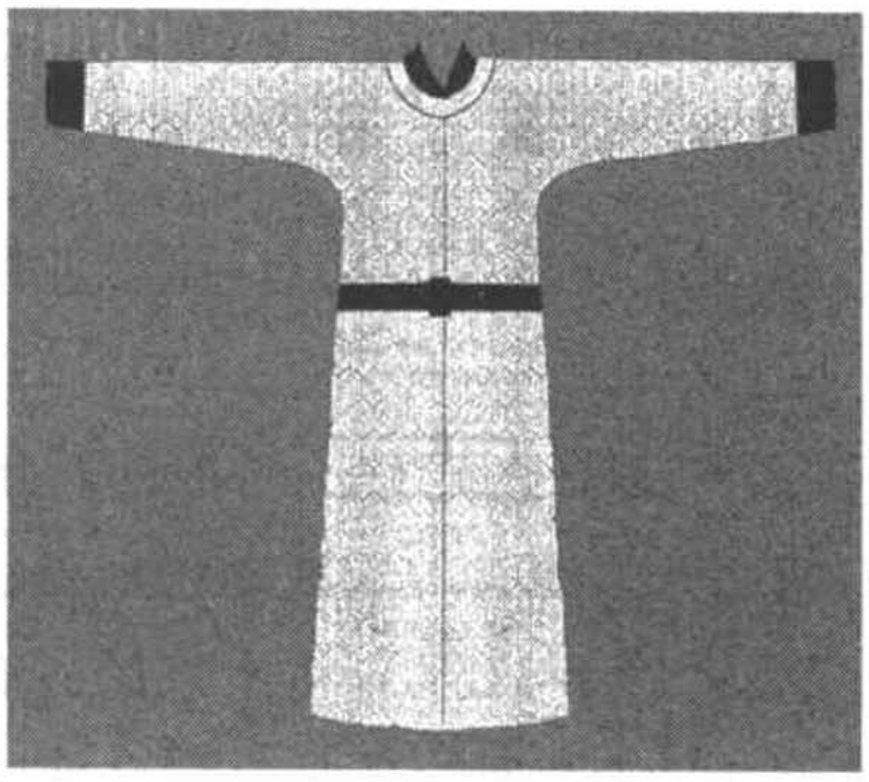
燕京西南的大房山，金朝的政治中心由女真故地转变成了中原汉人居住的地区，完颜亮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一般认为，完颜亮时期金朝的疆域十分辽阔，经济文化发展在南而不在北。当时的上京实际上已偏在一隅，失去了驾驭全国的地位，不利于中央和地方在政治经济上保持密切的联系。完颜亮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进一步学习汉文化，打击女真贵族守旧势力和便于进攻南宋，遂毅然迁都燕京。

有人指出，迁都能够加强金王朝对中原汉人的直接统治。换了个首都，旧贵族的保守势力相对薄弱，完颜亮想改革，只能这样做。这时的上京已经蜕变为守旧倒退势力的老巢、争权角逐的深渊。各州府到上京路程较长，上贡转运，花费很大，迁都能解决好些问题。从地理位置上说，燕京易于据守，南可洞观南宋，北可防御蒙古，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迁都体现了完颜亮的超众才干和远见卓识。

真是如此？一些人认为事实并不是这样。

在燕京建都的，其实并不始于完颜亮。早在辽代，燕京就建为南京析津府。完颜亮迁都的目的很单一，就是为了伐宋。他的真实想法是先迁燕京，再迁汴京，他并没有长久在燕京驻下去的意思。从实际自然地理环境来看，燕京绝对不是“易于据守”之地。为了迁燕京而毁坏上京的旧宫殿、大族宅第，是完颜亮对自己民族和祖先没有感情，同时统治重心南移，冷落、忽略了当时最需要开发的东北地区。因此把迁都燕京说成是完颜亮的远见卓识，是一大历史功绩，这是很可笑的。



金代贵族服饰

还有人的观点比较折中，认为一方面上京的确已不适应作为金朝的首都，不但城市人口增加过快，而且物资供应由于都城偏北造成转输不便，不利于及时处理和高丽、西夏、南宋的关系。另一方面，迁都确有南下灭宋的直接目的，因为燕京户口安堵，人物丰庶，燕京三面环山，有险可守，向南便于控制华北平原。当时大多数大臣也认为“惟燕京乃天地之中，宜徙都燕以应之”，因此迁都是完颜亮适应主客观形势发展的“有眼光的抉择”。

今天来看，迁都的真实原因，只有完颜亮自己最清楚了，后人都是在猜测推理。说他迁都是同保守派决裂，自觉地走中原封建制的道路，这应该全是后人的想法，完颜亮是不可能有这样伟大的。但迁都一点也不考虑当时的客观形势，也不是事实。问题的关键，我们并不需要纠缠在迁都的原因上，而要看到迁都对金朝社会到底是否有利。如果积极的因素为多，那么又何必去管他迁都的原因是什么。

不知读者是否同意笔者的这种想法？

龙蟠虎踞　忽必烈定都之谜

公元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在开平称帝，至元八年(1271)建国号为元，次年迁都大都。从此大都开始了作为元代唯一正都的历史。有人说是他丧失了对漠北的控制力，有人说是他为了方便统治南方。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在即位十多年后决定正式迁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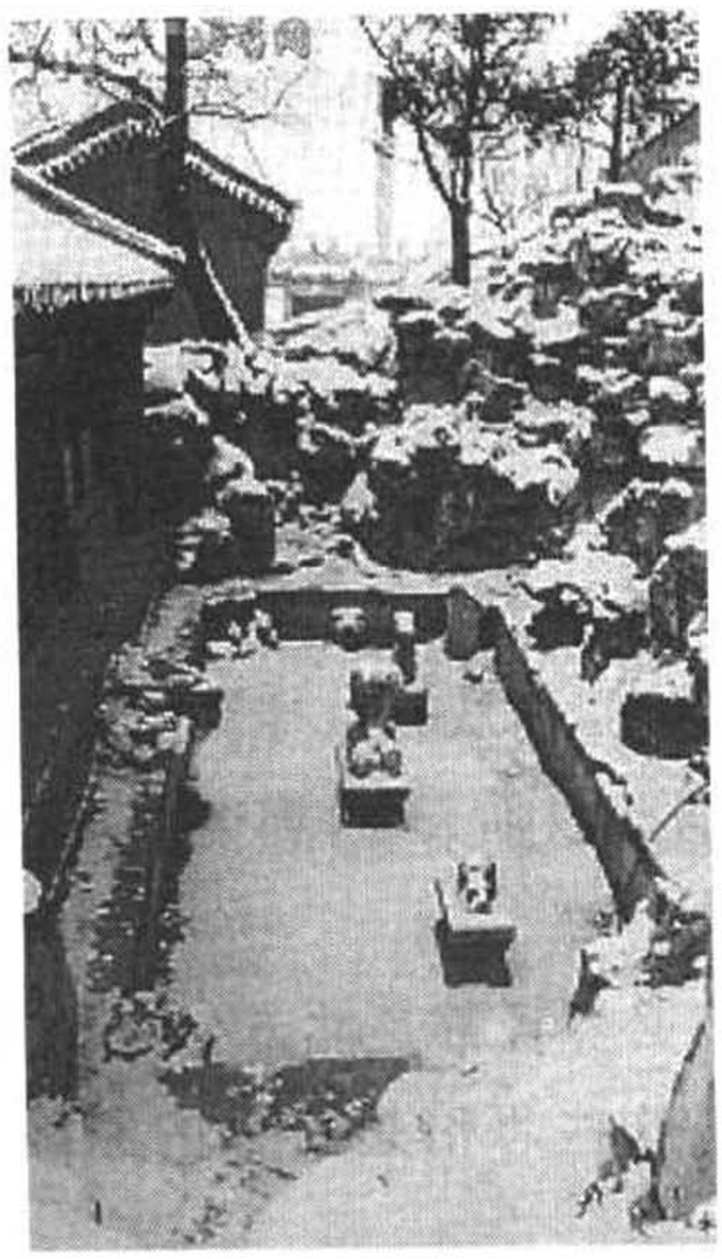


元世祖夫妇像

元世祖忽必烈是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第二个儿子。他的母亲唆鲁忽帖尼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常征召儒士到漠北去为她的孩子们讲学，因而使忽必烈从小就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二十多岁时，忽必烈与燕京大庆寿寺的海云禅师过从甚密，海云将他的弟子子聪推荐给忽必烈，经常向他请教。子聪俗姓刘，名侃，后改秉忠。之后，忽必烈又召纳了赵璧、郝经等众多儒学名师在身边。

1251 年，忽必烈的哥哥蒙哥接大汗位。其因在蒙哥争夺汗位的斗争中推戴有功，受到器重，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统领陕西和河南地区。接受刘秉忠的建议，忽必烈在漠南大兴汉法，试行仁政，取得了较大的效果。这一切引起了蒙哥的猜忌，一部分宗亲大臣也进行挑拨，认为忽必烈在拉拢中原人心。1257 年，蒙哥借口忽必烈腿疾而收回了他的兵权，同时设立钩考局，派人到陕西、河南检查财赋，借机铲除忽必烈的下属党羽。儒臣姚枢进言对忽必烈说："大汗在国是君，在家是兄，你难与之抗衡。不如将妻子儿女送归汗廷，表示自己没有异志，或许可消除大汗的怀疑。"忽必烈依言将妻女送到和林，自己又去亲见蒙哥，说明自己在漠北的所作所为。行汉法使忽必烈看到了汉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他知道只要行汉法，就能得到汉族人的支持。

1260 年，蒙哥率军进攻南宋四川钓鱼城时，病死在军中。这时忽必烈正率军在渡淮攻打鄂州。消息传来，许多人认为他应撤兵北归，夺取汗位，而忽必烈认为不能无功而返，仍渡过长江，进围鄂州，与宋军贾似道对峙。这时忽必烈得到妻子的密报，其弟职阿里不哥正在谋继汗位，他就采纳郝经的意见，接受贾似道求和的要求，率师北归，于这年年底回到燕京。1260 年，忽必烈不顾蒙古传统惯例，在开平自行召开忽里勒台选汗大会，在塔尔察儿等一部分王族的支持下，登上大汗宝座。蒙古大汗的产生要经过忽里勒台会议推选，而且要有成吉思汗家族各支系、诸王贵族参加，在鄂嫩河、克鲁伦之地举行才算合法，被推选人必经过一番形式上的推辞，才能即汗位。而忽必烈的上台，仅召集了自己的亲信诸王，没有给予有选举权的其他各系诸王们时间和机会来行使权力，因此他的即位许多蒙古贵族认为是不合法的。几乎同时，阿里不哥在和林也召开大会，受到另一部分贵族的拥护，宣布即大汗位。于是蒙古汗国出现了两个都自称合法的大汗。



当年忽必烈的御汤池，如今已被大雪覆盖

从总的来看，支持阿里不哥的蒙古贵族更多，但忽必烈发挥了自己在军事上的才能。他发兵迅速控制了川陕地区，亲征和林，封锁了运输线，使阿里不哥无法从汉地获得粮食而陷于困境。之后，阿里不哥多次战败，财力物力越来越贫竭，渐渐众叛亲离，西北诸王纷纷倒向忽必烈，阿里不哥最后不得不到上都向忽必烈投降。

击败阿里不哥，并没有消灭隐患，终忽必烈有生之年，北方诸王叛乱此起彼伏，从未停止。先是海都等一些守旧的蒙古藩王主张蒙古旧俗，反对忽必烈行汉法，多次兴兵问罪，一度占领哈剌和林，之后昔里吉和乃颜等也先后叛乱。这些事件在说明忽必烈作为蒙古大汗的权威可能在消失，他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也在丧失对漠北的控制力。

阿里不哥虽然已经击败，但不能保证他不东山再起，东北、西北诸王也不能全部消灭，在这样的一种政治背景之下，忽必烈觉得定都和林就有冒险的成分，而把它作为中原的屏障，作为缓冲地带来抵御北方不断的叛乱，是再好不过了。所以在战胜阿里不哥之后，1264 年 8 月，刘秉忠建议忽必烈定都燕京，忽必烈马上赞同，下诏修治宫室城池，作为中都，这时的中都已事实上作为忽必烈的政治中心了。

北方政局略为稳定后，忽必烈开始了进攻南宋。1267 年他再度攻宋。

占领襄樊后，灭亡南宋的时机也告成熟。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统治宋地，如何有效地对西夏故地和大理、西藏等地进行管理，忽必烈及其身边的智囊团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迁都。

早在蒙哥汗时，忽必烈就经营漠南，培植了强有力的汉族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还未登位时，大臣霸突鲁就说："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以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所以迁都之议从即位不久即已开始。之后由于自己在蒙古贵族中的威望减弱，而从有效控制中原之地考虑，于 1272 年正式迁都。他自己也说："朕居此以临天下，霸突鲁之力也。"说明迁都是考虑了很长时间的。

至于一些观点认为忽必烈迁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封建化的结果，迁都是考虑到了经济上的因素，这些恐怕是迁都的原因之一，但肯定不是主要原因。

龙兴之地　明成祖迁都原因之谜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曾把首都建在汴都关中，只是年事已高，又不想劳民，才没有下决心从南京迁都。明成祖朱棣上台不久，即着手迁都北京。朱棣与北京有着特殊的关系，迁都的原因显得十分复杂。也许他决定迁都是各种因素的综合。

明太祖朱元璋起兵后，就有儒士对他说："金陵古称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如果"定都建康，拓地江、广，进则越两淮以北征，退则划长江而自守。"明朝刚建立，为有效控制各地，朱元璋一度曾想定都汴梁，"以金陵为南京，大梁为北京，朕于春秋往来巡狩"。这时大臣纷纷进言，或认为长安可作为都城，或认为洛阳更好，河东、汴梁也不差。直到洪武十一年(1378)，才正式下令以应天府为京师。学者们认为定都应天，朱元璋更多的是从经济上着眼的。不过，定都南京他不是十分满意，他曾说："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又衰，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他有迁都的意愿，却最后没有完成，只能留给他的子孙们去做了。



朱棣当上皇帝后，决定把国都迁到北京，于是修建了故宫，
此后数百年间，故宫一直是明清两朝帝王居住的地方

建文帝即位，为处理国内矛盾，还无暇顾及都城位置的是否合理。

登上帝位不久，明成祖朱棣决定要迁都北平。从永乐四年(1406)起，他就派官员到湖广、四川、江西、浙江、山西等省采集木材、石料。同时，全国优秀工匠及百万民工也被征集到北平，参照历代建都成规，仿照明太祖南京宫殿的样式，对北平进行大规模改造。在北平改建的过程中，为了保证将来都城的物资供应，从永乐九年起，开始了对运河的大规模治理，会通河的整治是其中最主要的工程。

永乐十九年(1421)，北平的改建基本完成。以紫禁城为中心，外面环绕着周长 18 里的皇城，再外是周长 45 里的京城，宏伟壮丽，超越前代。这年正月，成祖及文武百官迁到北平，诏令改北平为北京。此后，北京就成为明清两朝的京城。

使人有所疑惑的是，南京的确是龙蟠虎踞之地，有长江天堑，完全可以成为一国的都城，明成祖为什么还要迁都？

自明末以后，人们论述明成祖迁都往往从北京的地理位置和物产丰富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如郑晓在《今言》中说："京畿负重山，面平地，饶鱼盐谷与果窳之利，又转漕东南，财货骈集，天险地位，足制诸胡。"古人常认为北京是朱棣的龙兴之地，物产丰富，供给方便，朱棣的迁都也是必然的。

近代以来，人们对迁都问题的认识走向深入。著名史学家吴晗认为迁都是抵御蒙古人入侵的需要。以北京作为一个政治、军事中心，就近指挥长

城一线的军事防御，抵抗蒙古的军事进攻，保证国家的统一，从这一点来说，“明成祖迁都北京是正确的”。很多人都支持这种观点，认为明成祖迁都与当时边防形势有关。朱棣有二十余年的藩王生涯，他在北方筑城、屯田，与北元打了多次仗，感到北平是天时地利之所在。他深深地体会到北元残余势力的威胁，当他一登上皇帝宝座，就马上确立了开拓进取的国策，在与北元接近的地理位置建都，把全国政治中心放在战争的前线，与元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求得边防的安宁和王朝的巩固。北平的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可以俯视大河上下，兼顾漠北，还放眼于东北的黑龙江、贝加尔湖一带，以及西北的哈密或更远的地域。



故宫内的戏楼畅音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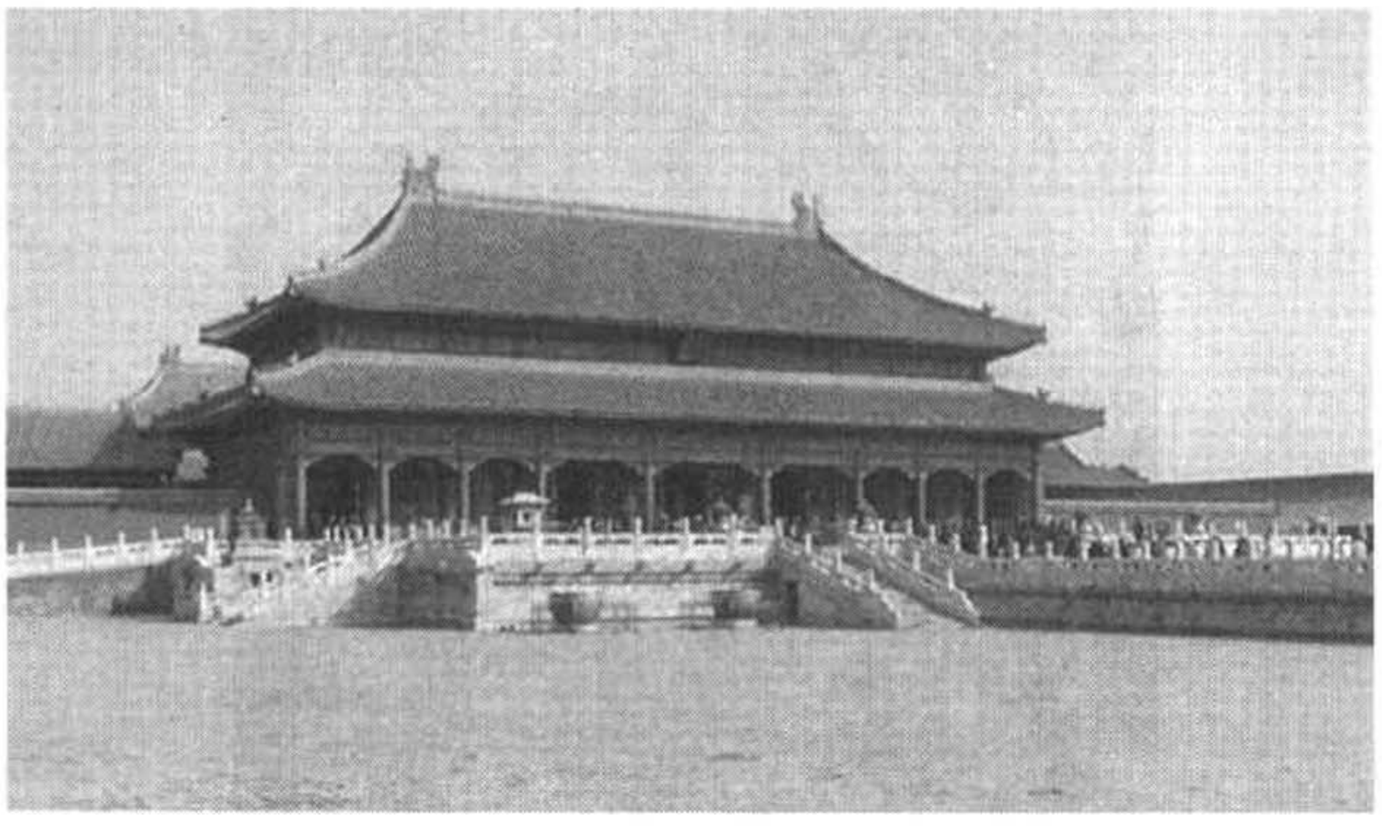
另有一种意见基本赞同明成祖迁都的重要因素是为了巩固北部边疆。永乐元年九月，贵州镇远侯顾成对朱棣说，云南、两广远在边陲，民间虽有变乱，不足系心。东南海道，虽倭寇时常出没，但都是一时的剽掠，只要令海防部队严加提防，也不足虑。而北部的故元势力会成为明朝的主要威胁。朱棣对顾成的建议十分重视，从此以后他有了迁都的准备。维护北部边疆的稳定，造福子孙后代，看来是他迁都的主要原因，因而他就不惜耗费巨大的物力、财力、人力疏通运河，为北京输运粮饷。他营建北京宫殿、迁都的主要动机，并不是考虑北京的经济、交通等条件，而主要出于当时政治、军事的需要。

不过这种观点认为迁都的因素是综合的，还有其他原因，如北京是燕王发迹之地，朱棣起事时的宿将谋臣，多为燕邸、北平都司及燕山三卫所属的

将校，功成之后难免有恋乡之情，长期驻在南京就不太合适。另一方面，朱棣的靖难，表面上看义正词严，但其得位后大量戮杀建文帝的臣子和家属，按照封建伦理，难免有失忠、恕、仁、义之嫌，这给朱棣的心理带来了一种不安的感觉。因此离开南京，将京师建立在自己熟悉的北京，心理上也会得到某种平衡。

有人指出，朱棣迁都的目的是很不简单的。他要迁都，不仅因为北京曾是他的藩邸，是他兴王创业的基础，还因为应天是他父亲朱元璋和侄子朱允炆做皇帝的地方。朱允炆是朱元璋所立的合法皇帝，却被朱棣用武力推翻。如果朱元璋死而有灵，他不会发怒吗？朱棣坐在他们两位曾经坐过的位子上心里是不会安宁的。当他面对祖宗的陵寝想到死后要葬在朱元璋身旁时是会感到自惭无颜的。朱棣很讲究迷信，即位后多次请番僧大做法事，有一次法会做了七天七夜，他不就是想在冥冥中得到朱元璋的原谅吗？这就是为何他早在正式迁都之前便开始在北京营建陵寝的原因。另外，初登大位时，朝野汹汹，天下不稳，无人知道建文帝在哪里，朱棣十分担心反对势力会东山再起，因而很有必要巩固自己的基础地盘。为此他一方面大规模地向北京移民、屯田，安抚流民复业，另一方面又调集各地精兵至北京，以加强守卫力量。毫无疑问，永乐帝迁都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皇位。

持这种说法者还认为，关于北京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的说法不足为据，因为这些条件北京和南京相比并不见得有多少优越，或者说还不如南京。而迁都为了把首都建在抗击北元的最前线，确保边境的安宁和王朝的巩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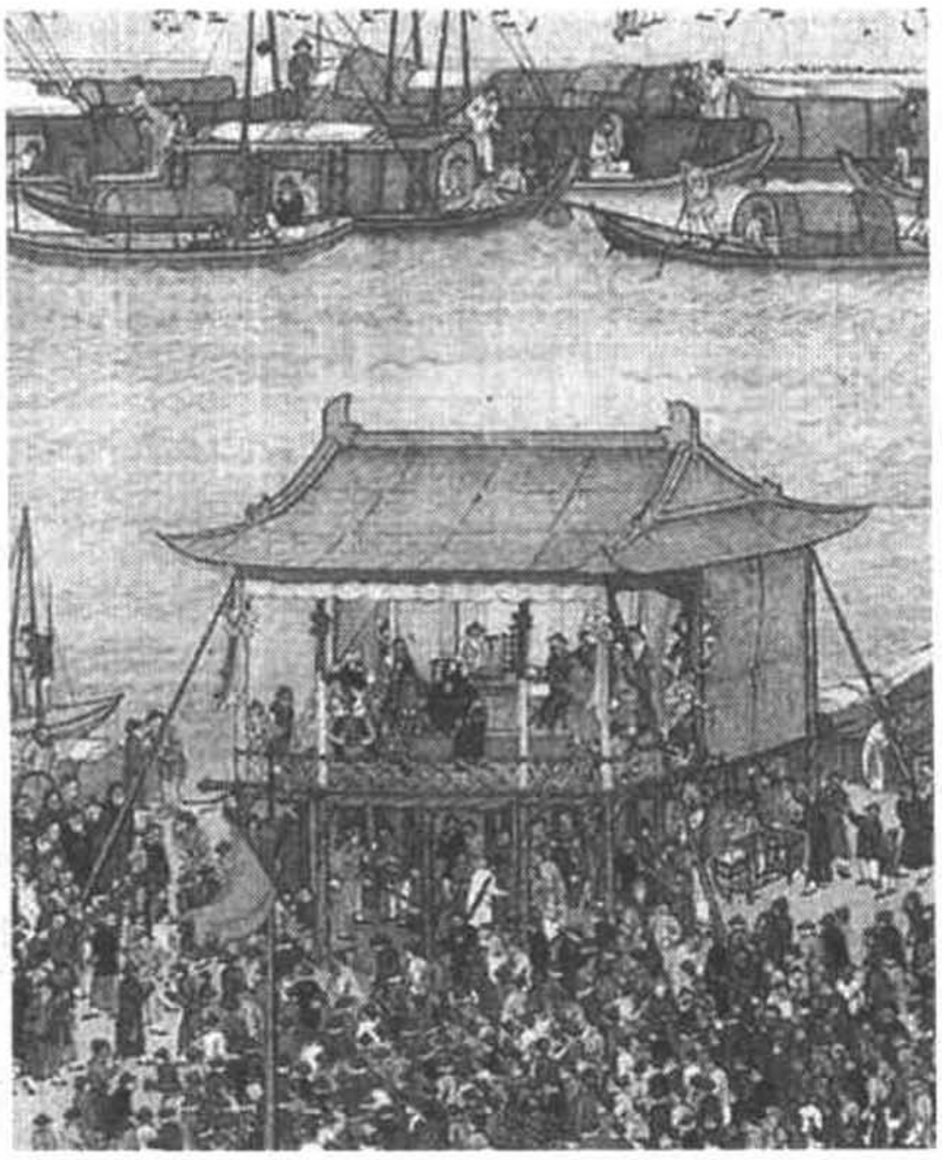
故宫

这应是符合当时的历史。但朱棣有一个“英雄之略”，即他想“控四夷以制天下”，使“远方万国无不臣服”，他一生的大量活动都是为了这个总目标。忽必烈及其子孙是在这里君临天下的，雄心勃勃的永乐皇帝正是要追随他们的足迹，建立一个举世无匹的庞大帝国，为此他多次率师出塞，又遣将南征安南，而迁都就是为了实现朱棣英雄之略的重要举动。

永乐帝迁都至今已近六百年，为什么要迁都恐怕只有他自己才讲得清楚，这已经成了一个留给历史学家们争论的谜案。问题是如果我们看到了迁都对明王朝的安宁有那么多积极作用的话，那么为什么要迁都其实已显得不怎么重要了。明清两代直到今天，北京一直作为政治中心，其实已经说明永乐帝的迁都是十分正确的。

治理黄河　清康熙帝南巡之谜

康熙皇帝即位后，曾六次南巡。如此频繁南下，其目的何在？从表面上看，康熙南巡也是为了欣赏各地的山水风景，甚至有人说他是想到江南看美女，但他南巡的主要目的应该在治理黄河、优容文人上，是为了稳定统治、安抚民心和促进生产。



《康熙南巡图》

清朝康熙皇帝即位，曾先后六次南巡。历代皇帝到各地巡幸是经常发生，这是帝王的一项重要礼仪活动。但康熙皇帝在1684年、1689年、1699年、1703年、1705年和1707年连续六次南下，就使人对他南下的目的有些怀疑了。有人认为，康熙南巡主要是“赏玩川泽”，是“艳赏江南”，说白一点是为了欣赏江南的风光和美女，如果这样，他就与历史上的隋炀帝差不多。那么康熙到底为啥要一次又一次地到南方去？

一些人认为，康熙每次南巡其实都是有目的的。康熙继位以来，农民军余部和南明小朝廷等各种力量的强烈反抗不断，直到1862年才镇压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摧毁南明小王朝，俘获永历皇帝，统一了全国。但不久，又爆发了长达八年的三藩叛乱，直到1682年才平定三藩，1683年收复台湾，清朝为巩固政权而进行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才告结束。至此，明末清初以来的战争进行了半个世纪，连年的战争使得人口急剧减少，土地大量荒芜，经济萧条，恢复与发展生产已成为当务之急，康熙也明白到能否发展生产直接关系到政局的稳定。接下来，一次又一次的南巡，实际上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促进生产，安抚民心。

康熙南巡的最重要一件事是治理黄河。当时黄河从河南开封南下，经徐州、宿迁入海，黄河与运河在苏北的清河县相交，淮河、睢水流入洪泽湖内，也在清河县泻入黄河。那里河流交错，水情复杂，经常泛滥，河南、安徽、江苏、山东数省受害不断。康熙六次南巡，前三次主要是为了调查了解灾情，后几次是为了亲自部署治河。

1684年，康熙来到治河重镇宿迁，作出了开挖海口、疏泻下河地区积水的决定，并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负责这项工作。第二次南巡时，康熙提出了自己治河的总设想。但这段时间内的治河成绩，康熙并不满意。1699年的第三次南巡，康熙亲自测量、规划、部署。次年，他任命两江总督张鹏翮为河道总督。1703年，为了检查张鹏翮的工作，他又第四次南巡。这次南巡中，他两次乘船下河，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1705年，康熙又来到黄淮流域视察，见到当时的治河工程后，他说“朕心甚为快然”，对下属工作比较满意。1707年的第六次南巡是张鹏翮要求的，康熙乘船来到清河县，查看了那里的地形，并测量水位、流量，对工程中的技术性失误进行了纠正，对治河工程中毁坏民田的事情十分愤怒。

康熙南巡的另一重要目的是“观览民情，周知吏治”。南巡的山东、江



康熙第一次南巡就到山东曲阜孔庙举行祭孔典礼

苏、浙江等东南沿海各省，历来是中国封建经济文化兴盛之地，士绅集中，康熙就谒明陵，祭孔子，召见学者，奖励文学。1864 年，他第一次南巡时亲赴曲阜，举行隆重盛大的祭孔典礼。他还不断举行各种考试，增加江浙一带入学名额来奖励文学。1705 年，他南巡到江宁，决定选拔一些皇宫内的书记抄写人员，这对于江南读书人来说，可以直接为皇帝服务，将来晋升的机会较多，所以报名者十分踊跃，仅苏州一地的考生有五百多名。每次南巡，他还要召见还乡旧臣或亲临他们的府第，为其题匾题联，以示优容。

在南巡过程中，每到一地，康熙确也特别喜欢游览“景物雅趣、川泽秀丽者”，他说自己喜爱秀丽山川的兴趣与一般百姓是一样的，而且要欣赏很长时间。不过从总体上说，他南巡的主要兴趣并不在山水和美色，而在于如此稳定统治，如何发展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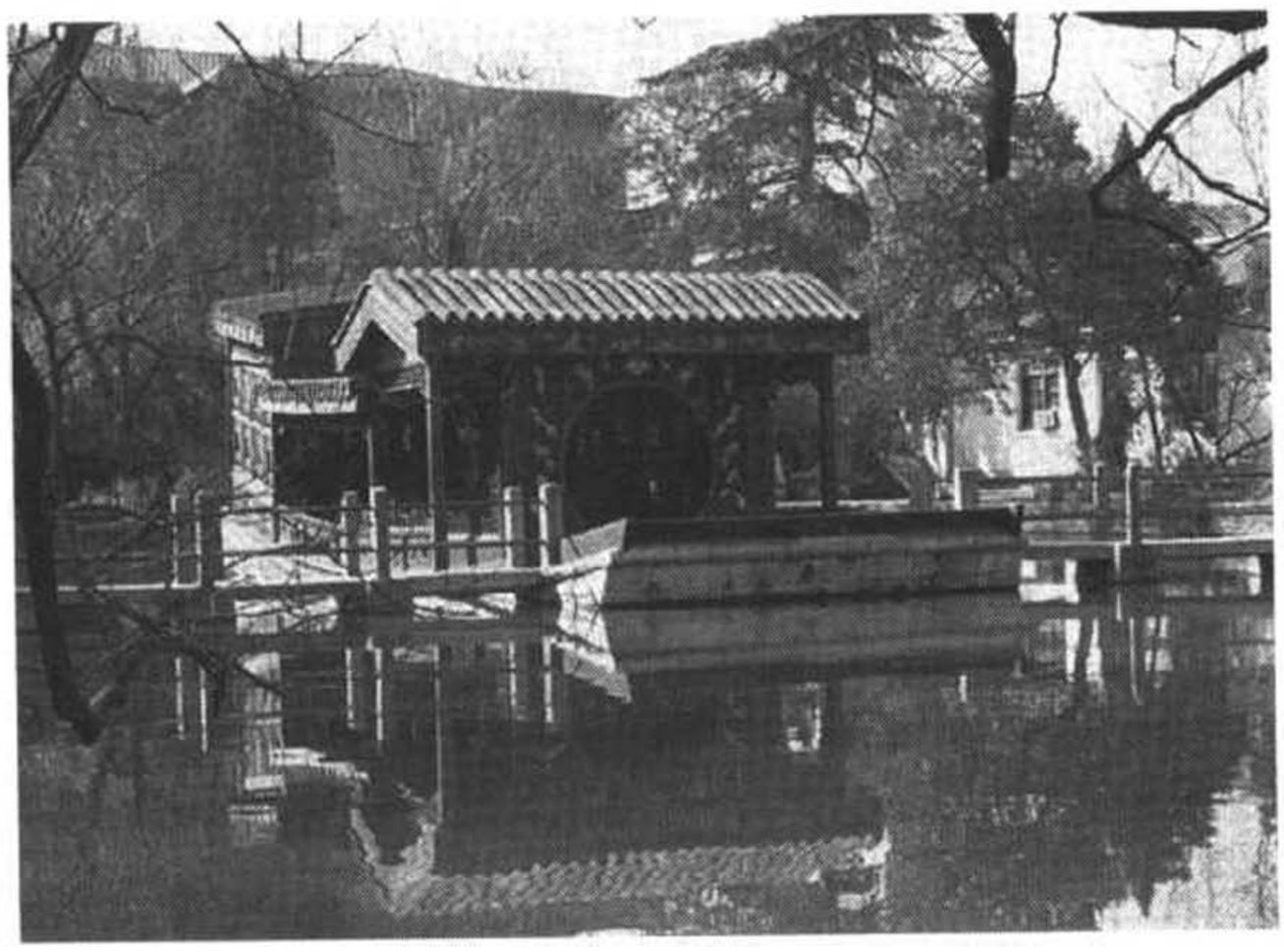
大清朝兴盛的根基奠定于康熙时期，康乾盛世就是在这样一种谨慎理政的前提下出现了。

人杰地灵　清乾隆帝南巡之谜

清高宗乾隆是清帝国鼎盛时代的一位有为之君，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继承其祖先康熙、雍正的基业并将之发扬光大。在其执政的六十多年间，曾先后六次下江南巡视，把南巡作为加强专制统治和发

展经济的一个重要措施。乾隆是民间传闻最多、被文艺作品演绎最多的皇帝，他的六下江南被影视剧津津乐道，戏说成分十分浓烈。

乾隆帝曾经六下江南，这是他一生各种巡幸活动中最为引人注目和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是他本人当初最为欣慰而在事后又深表忏悔的一桩大事。乾隆南巡从 1751 年开始，至 1784 年结束，历时三十三年。其中前四次带了皇太后、皇后和众多妃嫔，兴师动众，随同的王公大臣、章京侍卫官员等达二千五百多人，巡幸的船队有一千多艘，首尾相接，旌旗招展。每次南巡前，都有周详的计划，派出官员勘察沿途道路，修桥铺路，修葺行宫。各色人等及船只都要预先回避，沿途各处派兵守护。巡幸所经过三十里外的地方文武官员都要着朝服前来接驾，一切供顿极尽铺张豪华。乾隆花费了大量的精力组织这样的南巡，其目的是什么？



乾隆南巡时，足迹曾到过南京

有人认为，六下江南的目的是“艳羡江南，乘兴南游”。难道真和电视连续剧中戏说的相一致？乾隆是太平之君，习于骄奢，而当时的江宁、扬州，苏州、杭州等城市相当繁华，经济发达，而且江南风景优美，江南名胜甲天下，乾隆是以闲情逸致去“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如果详细看一下乾隆六次南巡所走的道路，发现他都是沿运河南下，经扬州、镇江、常州、苏州，再到达杭州，然后折回，绕道江宁，他喜欢的地方往往是江南最富裕的地方，人杰地灵。如果纯是为了国家大事进行南巡，他也不会带了皇太后、皇后一

起下江南了。在第四次南巡结束后，他对东南地区的大臣说，圣母年纪已经很大，而到江浙要经历数千里路程，住宿也很麻烦，“非所以适颐养也”，南巡对皇太后来说是颐养天年，那么对乾隆来说是领略风光也完全讲得过去。实际上当时的一些大臣也是这样认为的，如当时有人上谏疏，希望皇帝明年不要巡幸索约勒，因为“索约勒非江浙胜地可观”。标榜自己主要是为了工作而去南巡的乾隆大为恼怒，批驳说：“你的这句话十分荒诞。且南巡之举，难道只是为了游览山水这样一件娱乐活动？上年我沿途巡视，主要是为了解民间疾苦，疏泄河道，今年农业大丰收，你难道看不到吗？”



故宫倦勤斋是乾隆退位后的住所，内部装饰十分豪华

另有传闻，说乾隆到江南是为了查清自己的身世。乾隆南巡往往到杭州后回转，实是他只想到海宁去。从第三次南巡起，后四次巡视乾隆均住到海宁陈元龙的儿子陈邦直的家里，升堂详问家世。传说乾隆是海宁陈氏所生，雍亲王将自己生的女儿与陈氏家的儿子对调了一下，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帝。这一说法多少有点牵强，虽在民间大有市场，但与史实有较大出入。问了陈氏祖先的情况，就怀疑起询问者是被询问者的后裔，这样的推理前提和结论之间是没有必然关系的。

大部分人认为，乾隆南巡的目的其实不是单一的，他六下江南的活动，除游览名胜外，还着眼于社会政治、经济等国家大事。乾隆十四年(1749)十月五日，乾隆正式决定要巡幸江南，然后他谈了一番要巡幸江南的理由，主要有：要了解江南军事、政治、河务、海防情形及闾阎疾苦；心慕圣祖康熙南

巡受到百姓夹道欢呼的盛况，他也要领略一番受万民欢呼拥戴的风光；奉皇太后游览江南秀丽山川，睹丰美民物。

从乾隆南巡的实际来看，他主要是着眼于安定社会、笼络官绅、维系民心。他南巡时，蠲免了江苏、安徽等省积欠的地丁钱粮数千万两。他关心文教，选拔人才，量授官职，特命增加江浙地区府州县学岁试文童录取名额，对巡幸各地现任及退休的官员普遍加恩。为了安定社会、笼络汉族士商，他还察访吏治民情，惩办贪官污吏，督察黄淮河务，兴工修筑海塘，赈济灾民，整饬军旅，等等。

从乾隆南巡的主要活动看，其治国谋略还是用了许多心思的，施政措施的确也缓和了朝廷与江南汉族士人之间的局部社会矛盾。不过六次南巡所花费的开支达2 000多万两，靡费之大、时间之长、动用人力之多都开创了新的纪录，可以认为南巡在清王朝开了政治腐败的先河，这大概是乾隆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

政坛风云

不避猜疑　　周公称王之谜

周武王逝世，周成王即位，年纪还小，难以承当统民治国的大任，而周王朝建立的时间尚短，政权还不够稳固，于是就暂时由周公旦代替成王治理国事，史称“周公摄政”。周公辅助成王得到了人们的交口称赞，但针对辅政过程中的一些史实，有人提出了疑问，周公是否称王？



河南洛阳周王城遗址

周武王推翻商朝，建立了周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周武王实行了分封制，即把自己的儿子亲戚、有功之臣封为诸侯来分管各个地区，封侯可以拥兵，但必须随时听候天子的调遣，定期向天子纳贡、朝贺。这一制度允许封侯世代相袭，但天子对封侯有赏罚予夺之权。分封制实行后，各诸侯国如数纳贡，定期朝拜，西周王朝蒸蒸日上，奴隶制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周武王由于积劳成疾，没多少时间就病倒了。临终前他把年幼的儿子诵和军国大事托付了周公。周公为武王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把他安葬了，然后又把诵扶为天子，即周成王。因为成王年少，一切军国大事均由周公代理。周公

旦是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他辅佐周武王完成灭商大业，建有殊勋。周王朝建立后，周武王把曲阜（在今山东省）一带分封给他，在这里建立了鲁国，因此他又被称为“鲁周公”。周公天资聪明，才华出众，从小又是在王室中长大，受过先王不少教诲；另外，武王生前与他感情极深，所以如今周公治理起国政来，不仅得心应手，而且非常卖力。为了治理好国家，他想尽一切办法网罗人才，帮助他办事。

周公的权力大大增加，引起了管叔、蔡叔等人的猜忌和不满。他们到处散布流言，说周公摄政是想取代成王，自己做天子。这些流言欺骗了不少人，连长期与周公共事的召公也对周公产生了怀疑。

在这种情况下，周公认为首先要取得国家重臣召公和太公望姜尚的支持，他向召公和姜尚剖白了自己的心迹，说：“我甘愿冒篡国的嫌疑，代替年幼的成王摄行国政，就是怕周国立国不久，天下人心不服，一旦发生叛乱，就可能使周国丧失土地或者亡国，我们将没脸去面对先王。我们周族的事业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获得初步成功，如今武王过早地死去，成王年纪还小，我代行国政，就是要继承祖先开创的事业，使周朝更加强盛。”姜太公、召公等人被周公的一片诚心所感动，不再怀疑他了。很多人听了周公的解释，又见他确实尽心尽力地为国家办事，也就不很相信管叔鲜和蔡叔度的谣言了。召公和姜尚理解了周公的用心，对他摄行政事给予全力支持。



河南洛阳周公庙

武王早逝、成王幼年继位的变故，周公摄政引起的猜疑，管叔、蔡叔等人散布流言造成的混乱，给年轻的周王朝带来了一些困难，也给不甘心灭亡的

商族贵族以可乘之机。果然，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勾结管叔、蔡叔、霍叔，率领着徐、奄、熊、盈、薄姑等过去隶属于殷王朝的东方小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

周公、召公和太公望姜尚，奉成王之命，率师东征，一举击败了叛军，杀掉了武庚和管叔鲜，把蔡叔度等人流放到远方。接着，周公、召公又共同率师东进，征讨那些跟随武庚叛乱的东方各国，灭掉了徐、奄、熊、盈、薄姑等国。这次东征，整整用了三年时间，战争的艰苦、激烈，是难以想像的。

牧野之战后，商王朝虽然灭亡了，但是商遗民的势力还很大，成为威胁周王朝安全的隐患。而且东方一些原商王朝的属国中反周的势力也很强大，周王朝还无法控制这些地区。周公东征，不仅平息了武庚等人发动的叛乱，而且打垮了东方的反周势力，使周王朝的统治扩展到东方，控制了徐、奄、薄姑等地。为此，周成王对卓有功勋的周公赐嘉禾褒奖，对抓获了徐、奄、熊、盈、薄姑五国国君的召公也予以奖赏、慰劳，对屡立战功的姜尚则授以在东方广大地区得专征伐的特权。周公东征，还为彻底解决商族遗民问题创造了条件。平叛之后，周公一方面继续对商族遗民实行怀柔政策，把商的旧都附近的遗民保留下来，分封给原来商王朝的贤臣微子启，建立了宋国，让商族的香火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则把很多商遗民赏赐给卫、唐、康等国诸侯，作为周人的奴隶。这样就把商遗民分割成几部分，并置于周人的控制之下，彻底消除了隐患。

周公不避猜疑，以摄政的方式辅佐成王，避免了王位更替过程中出现的政治空白，并彻底粉碎了武庚和管叔、蔡叔、霍叔等发动的叛乱，使年轻的周王朝得到巩固，为西周初年的“成康（周成王、周康王）之治”奠定了基础。周公还提出“封建诸侯，以藩屏周”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广泛分封兄弟和亲戚，建立了七十余个诸侯国，成为周王朝实施统治的重要据点和保卫周王室的屏障。这一措施改变了武王灭商后一段时间内“天下未集”的混乱局面，使周王朝成为一个疆域超过商王朝的巩固的奴隶制大国。

东征胜利后，周公认为发生这次叛乱的主要原因是周朝的首都太偏于西部。距离从商殷那里得来的土地太远，所以决定在东边建立一个新的都城。经过占卜，周公认为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是个好地方，于是决定在这里建立东都。

周公严格遵守文王、武王的遗训，办事节俭，不搞铺张浪费，东都没有商

纣鹿台一类的豪华建筑，但是规制宏大，单体建筑十分宏伟。它的内城为9里见方，外城达27里，光是内城面积就有81平方里，一共花了九年多时间才建成。周朝从此有了东西两个都城，原来的都城镐京称为宗周，表示那是周朝祖宗营建的地方。新建成的东都，定名叫成周，表示那是周朝建成以后修建的。成王依旧在镐京居住，东都由周公坐镇。从此，周朝开始了长期稳定的局面。七年之后，成王长大成人，周公又自动将国政还给周成王治理，以一个臣子的身份继续辅佐周成王。这样的做法受到了后人的广泛称赞。

周公为了周朝的事业，用尽了毕生精力。他把自己的经验写成文章，留给后人。周公死后，周成王用最隆重的天子礼节，把他葬在文王陵和武王陵附近，表示周公完成了周文王和周武王没能完成的事业。

周公辅助成王的事实得到了人们的交口称赞，但针对辅政过程中的一些史实，有人提出了疑问，周公是否称王？

有学者认为周公在辅政过程中是称王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从金文和文献中称公又称王的例子来看，周公确是既称王又称公。从《蔡尊》等器物上周公为王的原始记载来看，由于周王朝所刚刚取代的商王朝的承袭方式，常用的是兄终弟继之制，结合以父死子继之制，弟弟承继君位是正当的。新建立起来的王朝如果循用前代王朝成规的话，周公本来可以继武王为王，其称王是很自然的，而且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山东曲阜是周公的封地，他的儿子伯禽代父受封建立了鲁国，所以曲阜也有周公庙

但针锋相对的意见认为周公根本没有称王。从上古文献《诗经》、《尚书》、《史记》、《汉书》等来看，并无周公摄位称王之事。周公因成王年幼而摄位之说不可靠，从成康时代的铜器铭文中成王平叛武庚之乱、二次克商的史实看，成王既能率师东征，可见其时成年无疑。在一些器物的铭文中“王”与“周公”互见，说明二者绝非一人，“王”指的是成王，周公称王说不攻自破。其次，汉唐旧注均以为《尚书·洛诰》篇所记乃周公致政成王之事，仔细探研文义，其实此篇主要记载洛邑告成，成王在新邑举行改元之礼，既无摄政之事，也无致政之文，汉儒误解篇中首、末两句文义，从而认为周公是称王了。从古文献中得知，周代在天子居丧期间，由冢宰当国，摄行国事。武王崩后，天下未宁，成王正值居丧期间，礼当冢宰摄政。周公即为大宰，总摄政事，自是常事。一些史书上所谓的“周公践阼称王”，实际上就是冢宰摄政。

周公的辅政，成了后代宰臣们学习的榜样，但如果曾经称王，那么这个榜样的成色就有了一些折扣。但不管怎么样，尊重事实是研究历史前提，是否称王还有待于历史学家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准确系年　　周厉王专利之谜

中国有确切纪年是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这一年召公和周公合作，共同执掌周王权力，处理国政。在此之前的历史，只有王号而没有年代，从共和元年开始，后来的历史都记载了国王或皇帝在位的年数，使中国古代的历史有了准确的系年。

公元前九世纪中叶，西周王朝曾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国中没有天子，国政由周公、召公两个贵族共同主持，史称“共和行政”。导致这起事件发生的起因，是周厉王的“好专利”和暴虐。

按古代的习惯成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山川林泽和荒野名义上自然是归周天子所有，任何个人不得私自占有。由于山川林泽数量太大，周天子也无暇顾及，民众可以随便使用。

西周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一些山川林泽和荒地已被开垦出来加以使用，成了贵族和国人的私田。随着占有欲的增加，



周厉王时期的散氏盘

他们还把原来占有的国有土地逐渐私有化，当成了私田。周厉王在位时，这个问题日益严重，而周厉王为了满足自己奢侈的生活，总是想不断聚敛更多的财富。当时周王朝有一个叫荣夷公的大臣，很有敛财的本事，他为周厉王出主意：重申土地国有的传统法度，明确山川林泽、荒地及其中生产的各种产品都是国王的专有利益。这样，周厉王便在土地国有的招牌下，公然侵夺贵族的私田、产品和奴隶，变为王有，而一般平民也不得在山林中砍柴打猎，不得在河流中捕鱼。这种作法激起贵族和国人的不满，社会矛盾激化，他们作诗指责厉王："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复夺之。"

一个叫芮良夫的大夫劝谏周厉王不要听信荣夷公的话，废除有关"专利"的各项规定。可是周厉王为新增加的大量财富迷住了心窍，根本听不进芮良夫的肺腑之言，不仅没有疏远荣夷公，相反还提拔他做了朝廷的卿士。

周厉王实行"专利"的做法激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上上下下议论纷纷，尖锐的批评直指周厉王，史称"谤王"。大臣召公听到这些批评议论后，急忙跑去报告厉王，并告诫厉王：百姓已经无法忍受了。周厉王听后大怒，他找了一个卫国的巫师，让他暗中监视国人，一旦发现有人发表"谤王"的言论，立即告发，一律处死。在这样的残酷镇压下，很少有人敢再"谤王"了，各地诸侯也不再来镐京朝见。到后来，镐京城里的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连话都不敢说了，只能用互相使眼色的办法，表示一点对厉王的不满。

周厉王见用卫巫"弭（止息）谤"的办法很有成效，十分高兴，他对召公说："我已经止住了那些批评议论，没有人再发表谤王的言论了。"召公指出："您并没有平息人们心中的不满，只不过是堵住人们的口，不让他们说出来

罢了。您要知道，堵住人们的口比堵塞奔流的河水还危险。堵住的河水一旦冲垮了堤防，就会造成很大的灾难；堵住人们的口，不让他们发表意见，一旦人们的愤怒爆发，就会给国家造成危险。”可是，一意孤行的周厉王根本听不进去。

周厉王实行“专利”，增加了王室的收入，却损害了贵族及国人的利益，因而丧失了民心。在周厉王推行的高压政策下，人们敢怒而不敢言，表面上看国中平安无事，实际上一场大的动乱已经在酝酿中了。

周厉王实行“专利”的第三年，表面的平静状态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国都中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国人暴动，城中的国人、工匠和部分贵族一哄而起，手持棍棒、斧头，冲向王宫，要杀死厉王。厉王闻到风声，赶紧逃跑，东渡黄河，一直逃到彘地（今山西省霍县东北）。后来厉王再也不敢回镐京，直至死于彘。

愤怒的国人在宫中没有找到周厉王，便把仇恨发泄在他的家人身上。这时有人发现周厉王的儿子太子静逃进了召公家中，于是国人包围召公的家，要求召公交出太子静。召公的先辈世代都是周王朝的重臣，召公本人也对周王室忠心耿耿，他虽然对周厉王不听劝谏导致这场灾难十分怨愤，但为了周王室的利益，还是藏起了太子静，而让自己的儿子换上太子静的衣服，把他假装成太子静交给国人，结果被国人打死了。

周厉王出逃在外，“太子”又被杀死，太子静虽得到保护，但一时也不得公开身份来接周王之位，周朝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朝廷中没有国王的政治空白期。周国的贵族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举行一次特别会议，会上决定由德高望重的周公和召公共同代行国政，史称“共和行政”。共和行政期间，革除了周厉王推行的一些弊政，各种矛盾得到缓和，周王朝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

共和行政十四年（前 828），周厉王在彘死去，谁来继承王位的问题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时召公把当年让自己的儿子代替太子赴死的真相讲了出来，并把在自己家中躲藏了十四年的太子静带到贵族们面前，提出仍由他继承王位。太子静当年还是一个小孩子，周厉王的暴政本来就与他无关，只是国人一时迁怒于他而已。现在经过召公十四年的培养教育，太子静已成为一个颇具才干的青年，于是贵族们一致拥立他做了国王，他就是周宣王。



毛公鼎是周宣王时期的青铜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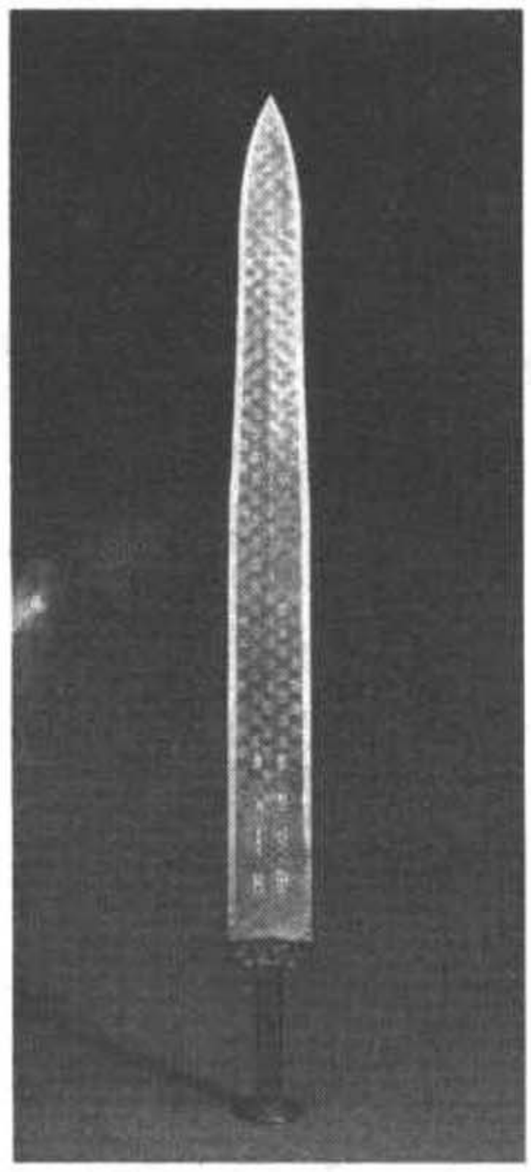
周宣王即位之后，在周公和召公的辅佐下，继续革除厉王时的弊政，他要求大臣在处理政事时，要广开言路，使下情上达；又警告他们在征收赋税时，不要中饱私囊，鱼肉百姓。这些禁令还被郑重地铭刻在毛公鼎上。周宣王励精图治，努力恢复西周初年先王建立的好传统，使国家逐步强盛起来，在对不服统治的周边少数民族部落的征伐中，取得了巨大胜利，周王朝的威望也提高了。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宣王中兴”。

“共和行政”不仅在结束周厉王的暴政、开启周宣王时的中兴局面中有着不可抹杀的功绩，它还作为历史上最早有明确纪年的开端而受到史家的重视。在此之前的历史，只有王号而没有年代，从共和元年开始，后来的历史都记载了国王或皇帝在位的年数，使中国古代的历史有了准确的系年，这是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共和元年这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年份，就是公元前 841 年。

雪耻报仇　　勾践卧薪尝胆之谜

政治斗争是极其复杂的，有时瞬息万变，忍受暂时的屈辱，磨炼自己的意志，寻找合适的机会，也就成了一个成功者所必不可少的心理素质。春秋

时期，兵强马壮的越国在与吴国的战争中被吴军打败，越王勾践被迫到吴国官廷中服了三年的劳役，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勾践被吴王赦免归国以后，力图报仇雪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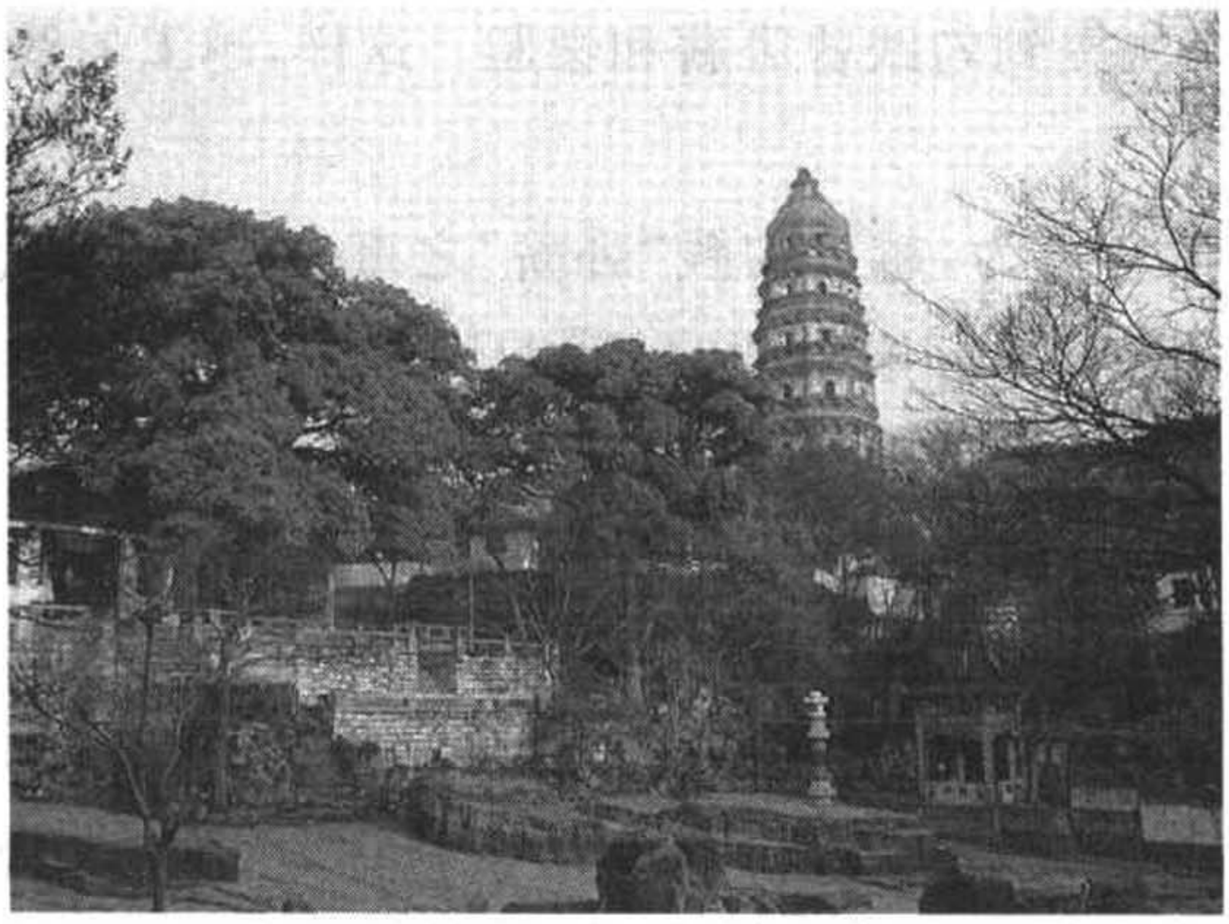
越王勾践剑

春秋中期以后，越国开始强盛起来。公元前506年，越王允常乘吴国伐楚之机，率军偷袭吴国，从而挑起了吴越两国的战端。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死，其子勾践继位，吴王闽间又乘越国王位更代的时机兴兵伐越，不料又被越国打败，吴王阖闾被越将灵姑浮用戈刺中，受了重伤，回国后不久就死了。阖闾死前遗言，要太子夫差代父报仇。从此，两国的仇怨越结越深。吴王夫差即位后，在伍子胥、孙武等人的辅佐下，日夜训练军队，准备为父报仇。越王勾践想趁吴国未做充分准备时打击吴国，大夫范蠡劝他不要轻启战端，勾践听不进他的话，公元前494年发兵进攻吴国。吴王夫差接到报告后，调发全国的精兵迎战越军。双方在夫椒山（在今江苏省吴县西南太湖中）交战，越军大败，越王勾践带着残兵败将五千人逃回会稽山（在今浙江省中部绍兴市东南），又被吴军追上团团围住。

勾践到此时才后悔没有采纳范蠡的意见，只好再请范蠡出计解围。

范蠡说:“现在只有带着厚礼低声下气去求和了,如果不答应,就只好把自己抵押给吴国,亲自去侍奉吴王。”大夫文种又说吴国太宰伯嚭很贪财,可以通过贿赂他去求和。于是勾践让文种带着美女和宝器私下里献给吴国的太宰伯嚭,由伯嚭带着去见吴王夫差。文种向吴王叩头说:“希望大王能够赦免勾践的罪过,勾践愿把国中所有的财宝献给大王;如果大王不肯饶恕的话,勾践决心杀掉自己的妻子儿女,烧毁财宝,率领他那五千人马与大王决一死战,大王恐怕也要付出相同的代价。”这时,伯嚭也在一旁劝吴王说:“赦免越王让他做臣子,这对吴国有利。”于是吴王夫差不顾伍子胥的劝阻,同意了越王的请求。从此,越国成了吴国的属国,勾践和范蠡都被带到吴国为吴王服役。勾践回国之后,决心复兴越国,报仇雪耻。为了不忘亡国的痛楚,激励自己的斗志,他在屋中吊了一个苦胆,出来进去、起立坐下、吃饭睡觉时,都要尝一尝苦胆的味道;他疲倦了要休息时,不用床铺,不垫被褥,而是把硬柴叠起来睡在上面,以使自己的筋骨感到疼痛。经过这样十多年的磨炼,再加上各项措施的得力,越国终于灭了吴国。这里有一个问题,越王勾践用以激励自己的两种手段——卧薪(柴)和尝胆,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事呢?

查阅记载越王勾践事迹的历史资料,在《左传》的“定公”和“哀公”两部分中,曾大量记述越王勾践的事迹;《国语》中有《吴语》和《越语》上、下共三篇,详细记载了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战争胜败的经过。但在这两本史籍中,完全没有关于越王勾践曾经卧薪尝胆的记载。其次,西汉时司马迁《史记》



苏州的虎丘和勾践有着不解之缘

在《越王勾践世家》中，也仅记越王勾践曾经“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而绝没有关于越王勾践曾经卧薪的事。到东汉时，袁康、吴平作《越绝书》，赵晔作《吴越春秋》，专门记述春秋时吴越两国的史事。这两本书在先秦古籍的基础上，又掺入了一些小说家的怪诞离奇的传闻，其可信程度已大打折扣。但前书既没有说到卧薪，也没有提及尝胆；后书中的《勾践归国外传》，也仅说越王勾践“悬胆于户，出入尝之，不绝于口”，而根本没有卧薪的事。这样看来，尝胆之事，最早出现于西汉的《史记》；而卧薪之事，到东汉时还没有记载。

据专家考证，卧薪和尝胆连在一起，作为一个成语来使用，最早见于北宋苏轼所写的《拟孙权答曹操书》。这是一篇游戏性质的书信体文章。北宋的苏轼为三国时的孙权起草了一封答曹操的书信，信中苏轼设想孙权在三国鼎立时曾“卧薪尝胆”，它的内容原与勾践是不相干的。到南宋时期，吕祖谦在《左氏传说》中，曾谈及吴王夫差有“坐薪尝胆”之事。明朝张溥在《春秋列国论》中又说：“夫差即位，卧薪尝胆。”以后，马骕在《左传事纬》和《绎史》两书中，都把卧薪尝胆说成是吴王夫差的事情。与此同时，南宋的真德秀在《戊辰四月上殿奏札》一文中，黄震在《古今纪要》和《黄氏日抄》两书中，又说越王勾践曾卧薪尝胆。这样说来，“卧薪尝胆”的词语原是由北宋的苏轼提出，从南宋到明朝，此事是夫差还是勾践所做，尚没有定论。到明朝末年，梁辰鱼写传奇剧本《浣纱记》，渲染了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二事。清朝初年，吴乘权编了一本简易通俗的史书《纲鉴易知录》，书中写道：“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卧薪尝胆。”不久，又刊刻了明末作家冯梦龙写的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书中也多次提到勾践曾卧薪和尝胆。这样，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也就愈传愈广。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越王勾践“卧薪”之事，在东汉时代成书的《吴越春秋》中还是有记载的。该书的《勾践归国外传》说：越王勾践当时“苦身劳心，夜以继日。目卧则攻之以蓼。”什么是蓼？清人马瑞辰在《毛诗传笺通释》卷六解释说：“蓼，辛苦之菜也。”“蓼”这种苦菜积聚得多了，就成为“蓼薪”。《诗经·东山篇》有这样的话：“有敦瓜苦，蒸在薄（蓼）薪。”意思是说，圆圆的苦瓜，生在众多的蓼菜中。勾践为了磨炼意志，准备的蓼菜一定很多。“攻之以蓼”，也可以说是“攻之以蓼薪”。这样，上述《吴越春秋》中的语意就十分明显：勾践那时日夜操劳，眼睛疲倦得

想睡觉(“目卧”),但他忍耐克服,用苦菜(“蓼薪”)来刺激,打消睡意。尝胆是让味觉感到苦,卧薪是让视觉感到苦。“卧薪”的目的是在折磨眼睛而非折磨整个身体。后人把“卧薪”说成是睡在硬柴上,那是对《吴越春秋》意思的误解。

卧薪尝胆的故事若是真的,何以历史记载出现得这么晚,又好像是后人故意编造和误传的;若说它是假的,却又流传得这么广,这多少给人以一种两难的感觉。历史上的许多事情,今天往往无法全面理解,我们只能无奈地留给后人去解答了。

同姓一家　　汉吴王刘濞叛乱之谜

西汉初年,吴王刘濞领导的吴楚七国之乱,实质上是汉朝中央政权与地方诸侯政权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益尖锐的结果,但是引起七国之乱的导火线却是吴王刘濞的儿子与景帝少年时的一场游戏引起的,令人不可思议。

汉景帝三年(前154),由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菑川王刘贤、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的联合叛乱终于爆发,史称七国之乱。

叛军以“清君侧”、“安刘氏”、诛晁错为名,军势浩大,闽越、东越也曾发兵追随。据说赵王刘遂甚至还私下派使者联络匈奴,希望能够发军策应。吴王刘濞倾全国兵力北进,又号令国中,宣布寡人年六十二,亲自作统帅,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国中凡年龄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者,皆动员从军。吴军调发二十余万人,于广陵发军,渡淮而进,与楚军会合。又派遣使者致书各诸侯国,公布晁错罪状,希望各国合兵诛之。

刘濞宣称此次起兵的缘由,是汉王朝有贼臣专权,蓄意侵夺诸侯国土地,歧视虐待刘氏骨肉,使国家社稷受到危害。而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他号称吴国可以动员五十万精兵,再加上南越军队随从北上的,又可得三十万人。

这是一篇重要的政治文告,其文词之狂傲,表明出了吴王刘濞的个性。

吴王刘濞是刘邦的哥哥刘喜的儿子。二十岁时，曾经从刘邦平定黥布反叛，被刘邦立为吴王，封地有三郡五十三城。根据司马迁《史记·吴王濞列传》的记载，当年汉高祖刘邦在分封同姓王时，分封到刘濞的时候，刘濞跪拜受印。刘邦又召刘濞近前，仔细端详其面相，说道："看你的面容，有反叛之相。"心中不免暗自悔恨，但是已经举行过仪式，不便悔改，于是手拊其背又说："再过五十年，有人将在东南方向发起变乱，难道就是你吗？不过，你要记住天下同姓为一家，一定要老老实实，不得反叛！"刘濞顿首保证说："不敢。"

七国之乱是汉朝中央政权与地方诸侯政权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益尖锐的结果，但是，七国之乱最先由吴王刘濞发起，又发生在景帝年间，与景帝少年时的一起由游戏引起的死亡事件有关。

《史记·孝景本纪》记载说，汉景帝刘启在汉文帝刘恒的儿子中，既不是长子，也不是少子，为窦姬所生。刘恒在代地时，王后曾经为他生了三个儿子，但王后和这三个儿子都先后去世，于是刘启得以继立。《汉书·外戚传上·孝文窦皇后》的记载稍许有些不同，说到代王王后生子四人。王后在刘恒尚未即帝位时就已经去世，此后所生四子也先后病死。窦姬所生刘启年龄最长，于是得以立为太子，窦姬随即也被封为皇后。

窦姬是清河郡平民女子，吕后当政时，以良家子身份被选入宫。吕后决定出宫女赐诸侯王，每位诸侯王五人，窦姬也在名单之中。因为出身清河，希望能够前往赵国，可以离家乡近一些，于是求人嘱托主持此事的宦官，将名籍一定安排在前往赵国的五人之中。不料主事宦官疏忽遗忘，误置名籍于代国，并且得到了吕后的批准，已经无法改动。窦姬悲伤涕泣，埋怨宦者，不愿前往，但无奈之下只能成行。来到代国之后，代王刘恒最为宠幸的就是窦姬。她先为代王生下女儿刘嫖，惠帝七年(前188)又生下刘启。在这一系列的阴错阳差的情况之下，西汉王朝进入了文帝时代。

前180年，汉文帝从代地进入长安，继承帝位。几个月之后，刘启被立为太子，当时他只是一个九岁的儿童。秦汉时期，儿童一般都玩一种类似于现在棋类的智力游戏，在西汉皇室内部，年少的王子、公主也有此类的游戏可玩。司马迁在《史记·吴王濞列传》中有过这样的记载：汉文帝当政时，吴太子曾经进京晋见，与皇太子刘启一起宴饮博戏。双方在博戏时发生了争执。吴太子是一个性格蛮横的少年，言行之中对皇太子并不

恭敬，还出言不逊，言语中多有冲撞。皇太子愤怒，操起类似于棋盘的“博局”掷击吴太子，竟然将对方击杀致死，尸体被送回吴国安葬。吴王怨怒，认为天下同宗，死在长安就该葬在长安，何必再送回吴国安葬。自此吴王不遵藩臣礼，称病不朝。

文帝推想刘濞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的原因，一定是因为吴太子的缘故，见到吴国使者前来，马上抓起来询问。后来刘濞再次派使者到长安向天子致礼，汉文帝又询问使者。使者答道：其实吴王确实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但是朝廷多次审讯吴使者，吴王心中惶恐，因此称病。请求陛下忘记吴王以前的过失，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汉文帝于是释放了吴国使者，又赐予吴王几和杖，以其年老，准许他可以不必上朝。

吴楚七国之乱爆发时，曾经以“博局”掷杀吴太子的汉景帝刘启年三十四岁，时吴王刘濞已经拒绝上朝二十余年。汉景帝刘启与他的父亲汉文帝不同，他外尚无为而内崇刑名，好忌恨，苛薄寡恩，对于诸侯王割据一方、各行其是早已有所不满。继位之后，他重用晁错，更定法令，推行强干弱枝的政策，削夺诸侯封地收归中央，以尊天子而安宗庙。诸侯国中，其时吴国国力最强。吴王虽年过花甲，但老谋深算，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又与景帝有杀子之仇，得到这个消息，旧仇新恨一起迸发，于是联合楚王等六个刘氏同姓王共同起兵，爆发了这起史书所称的吴楚七国之乱。

景帝三年正月，吴兵渡淮，与楚兵会合，派使者送信，号召各诸侯起兵，并许以高额赏赐。吴楚兵西破棘壁，攻入景帝弟刘武的封国梁境，乘胜而进，攻势锐利。胶西、胶东、菑川等三王合兵围齐。

七国造反的消息传到长安，景帝以周亚夫为太尉，率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以曲周侯郦寄为将，率师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大将军窦婴屯荥阳，监齐赵兵。

周亚夫用以逸待劳，避其锋芒，断吴楚粮道等计策，大破吴楚兵。楚王兵败自杀，吴王濞逃到丹徒，投东越军中，为东越人所杀。吴楚叛乱起于正月，三月以失败告终。栾布率兵至齐，击破三国兵，三国引兵归国。胶西王自杀，胶东、菑川、济南王被处死。齐地诸王起兵历时三月，事败皆死。赵王本与匈奴相约，现今诸王兵败，匈奴当然不肯入边。不久赵王受到栾布的围攻，兵败自杀。至此，七国之乱全部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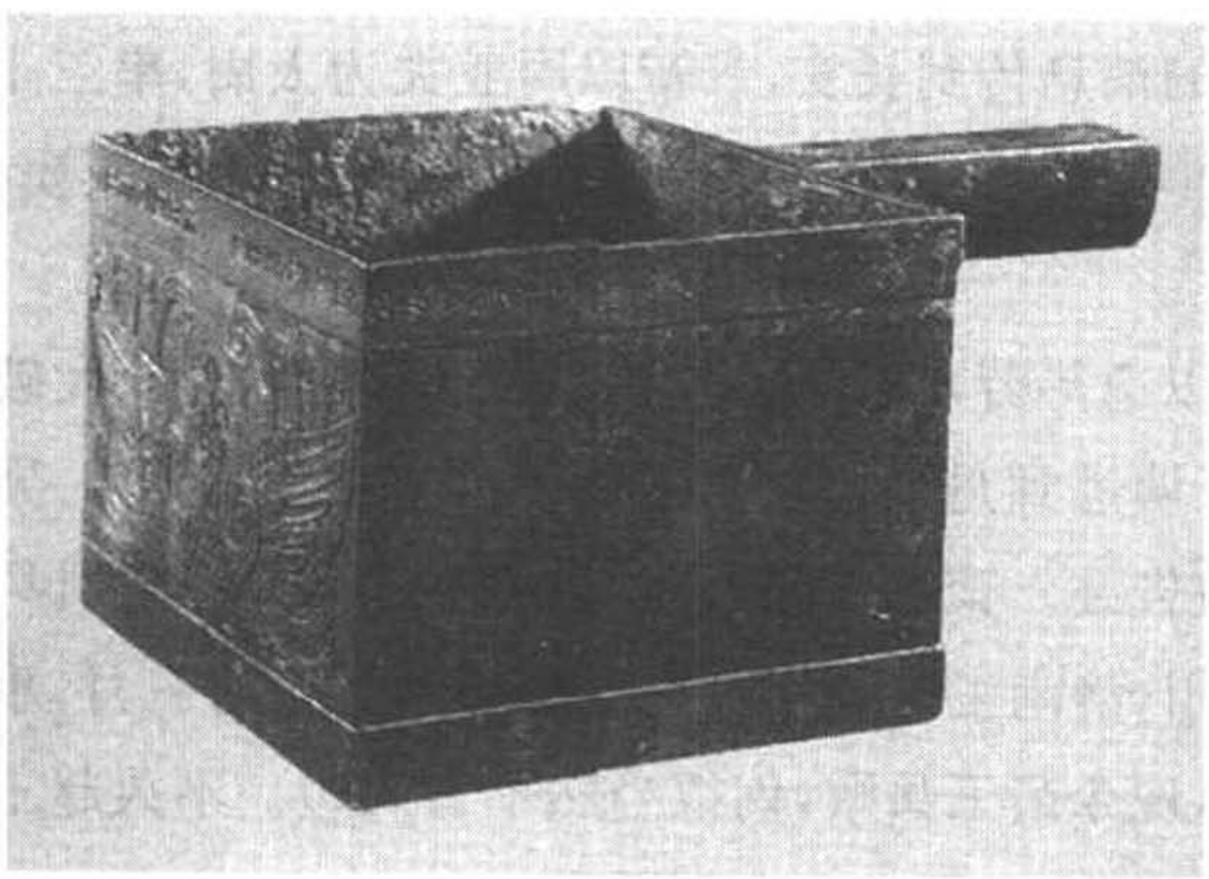
书生影子　　王莽复古之谜

西汉末年，王莽控制了政权，树立党羽，诛灭异己。公元5年十二月，王莽立孺子婴为帝。他自己仿效周公辅佐周成王的故事，以摄政名义居天子之位，朝会称“假皇帝”，臣民称“摄皇帝”。三年后宣布即天子位，自称是黄帝、虞帝的后裔，改国号曰“新”。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兵不血刃”取得政权的人，可又为这个政权充当了殉葬品。

王莽这个人物，应该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争议最多的人物之一。王莽，字



王莽嘉量



王莽铜方斗

巨君，生于公元前45年（汉元帝初元四年），死于公元23年，即王莽称帝时的地皇四年。王莽的显赫和他的家族有着直接的关系，他的姑姑是汉元帝的王皇后。

在西汉与东汉王朝之间，曾经有过一个短短的朝代，这就是历时十八年的由王莽建立的新朝。一般的历史书籍往往不专门提到它，认为这是西汉和东汉之间两个朝代的衔接过渡阶段，是汉朝的暂时中断。其实，这的确应当算作是一个独立的朝代，因为王莽是正式称帝建年号的，而且在这短短的十八年中，王莽颁布实行了许多重要的政策法令，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周公恐惧留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一首诗，给了王莽一个非常正确的评语，那就是王莽的沽名钓誉和虚伪。王莽上台前后，曾经进行了改制，虽以效仿西周制度为主，多托周公事，但并不单托古文经，而是今古文兼用，托古于整个经学。同时，他的改制并不是简单抄袭旧典，而是因革舍益，变动极大。因为托古，有人认为，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位书生皇帝。但也有人不同意，提出改制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在政治上树立王莽的威望，以达到篡汉建立“新”朝的需要，因而王莽是个没有水平的政治家而已。

王莽在改革中的经济思想是人们很难弄得懂的一个谜案。直到今天，人们的评价意见分歧很大。有人认为王莽建立的新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的一个怪胎，而王莽的经济思想，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怪胎。怪胎自然是没有生命力的，因而新朝也就是短命的。

王莽在建立新朝以后，曾在经济上实行改制。在他谦恭下士的时候，标榜要进行土地改革，所以有许多孔孟之徒拥护他。针对西汉后期土地兼并和奴婢买卖十分严重的情况，王莽宣布实行王田制。他找到的理论根据是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和孟子的“百亩之田，树之以桑，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孔孟儒家的思想，对王莽的影响很大。在王莽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叫师丹的，便是一个主张土地改革最急切的人。两人按照《孟子》的井田制一夫一妇授田百亩的原则拟订了一个计划，并向全国宣布。王莽圣旨说，从今以后所有的田地属于国家，民间不得买卖，田多过九百亩的，要分出来送给穷本家、穷亲戚。至于根本没有田，而又缺乏阔本家与阔亲戚的，并不另外设法赏田给他们。诏令颁布以后，分田授田的规定最终无法实行，只是冻结

了土地和奴婢的买卖。有很多人评论说这项制度实质上是要以土地国有制代替土地私有制，这种变革绝不是什么前进，而是历史的倒退。

王莽曾有一道圣旨说，奴婢从此不许称为奴婢，而改称为“私属”（私人的附属品），与田地同样不许买卖。但实际上，奴隶并不能恢复自由，王莽也不是想为了解放奴隶而来颁布这道法令的。对奴隶来说，永久被捆在一个主人家里当附属品，还不如准许主人买卖他们，说不定能换到一个较有良心的主人家里。因此，人们认为王莽只禁私奴不禁官奴并且极力扩大宫奴的做法，绝不是什么真正的进步。

最不成功的改革要数他的金融政策。王莽发行了许多大钱，定值甚高，而实际含铜量不够，以为融化了三五个小钱铸成一个大钱，刻上当十当百的字眼，百姓就肯当它是十、百来用。当看到老百姓不吃他的一套时，他便严厉处罚。要是有谁学他的榜样私铸大钱，就要被罚作奴婢。有人认为王莽的货币改制，在他的各方面经济改制中牵动面最大，破坏作用最剧烈。实行的五均六管专卖政策多是汉武帝时代所推行过的，但王莽却不顾主客观条件变本加厉地加以推行，结果自然只能是东施效颦，适得其反。

一些人认为，王莽作风勤恳，励精图治，颇有名君之风范，可惜其变法过于泥古不化，仅 14 年便告全盘失败，新朝也随之灭亡。他过分复古不合时宜。王莽醉心古制，不顾一切实行，致令社会经济倒退。政治上的改革更是不必要，他一心复行古制，官名屡改，工作却不变，根本全无意义，其重行封建，更是违反了数百年来中央集权国家的趋势。故过度复古是王莽变法的致命伤。王莽过分自信与重法。他出身儒生，重视理想，重法而不重人，所以集中精力于制度的规拟，却忽略实际的施行问题。他只埋首于制法，其他政事却一概不问，明显是矫枉过正。过分自信，是其失败的一大关键。他缺乏治国策略，纯属书生政治。王莽谦恭下士，获一时好评，但在政治运用上却显得虚伪与沽名钓誉。他行新政一遇挫折便宣布停止，使前功尽废，亦徒增滋扰。加上他执行不善，见害而不见利，失败自是必然。

根据当时政策的实际效果，一些人认为王莽改制对社会没有带来任何有益进步的成分，而是一场扰动全国十几年、害死全国人口近一半的巨大历史灾难。也就是说，按照这样的看法，他们把王莽的变法彻底否定了。

不过也有不一样的认识。

著名学者胡寄窗指出，由于王莽对经济问题具有一定的观察力，故能对以

前的思想家在这方面的成就加以综合利用，并在某些方面有较深刻的或独到的认识。他认为我们应该肯定王莽对当时存在的一些重要社会经济矛盾已大致有所认识，并企图全面地予以解决，虽然他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并不一定正确，也未收到什么效果。就整个中国古代来说，其他的改革家大都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一个方面如农业、工商业上进行改革，而王莽几乎在这些方面都接触到，特别是对农、工商业的改革更是齐头并进，这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另有人认为，王莽对土地问题的认识是符合实际的。王莽实行的五均六管政策，显示了他对由封建国家控制垄断性生产事业必要性的认识，这一点已经可以与桑弘羊的经济思想相媲美。因此，“在中国经济思想上，王莽应占有一席地位。”

除经济以外，王莽在政策、法令上也实行托古改制。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他也是花样百出。匈奴有五十多年未曾造反寇边，始终称臣听命，而王莽偏要激怒他们。他做了皇帝后，觉得少数民族的首领也称王，是不符合大一统的传统的，于是，他派人出使匈奴，收回汉朝原来给的印玺，换给新朝的印章，匈奴的单于也知道“玺”是皇帝专用物，而“章”则是臣子用的。于是，单于想要回印玺，但被使者弄碎，单于盛怒之下发兵南下。王莽也四处征兵应敌，结果匆忙中召集的各地士兵毫无战斗力，打仗不行，骚扰百姓却很在



王莽复古改制时所铸的刀币金错刀

行。在后代人来看，这简直是没有事情找事情做。匈奴果然强烈不满，举兵反抗，王莽动员了全国的军队远道出征，如此一番折腾，花了不少钱，结果一次胜仗也没有。徒然劳民伤财，与匈奴争战了十年光景，反而引起内部的盗匪此起彼伏。

西汉全盛时，从没有盗匪问题。到了汉成帝的时候，流寇不断涌现。在王莽对匈奴的长期战争以后，人民苦于征调，纷纷逃役入山，所谓的“盗匪”数量上越来越多，遂成为新的社会问题。在王莽地皇三年(公元 22)，有几十万涂红了眉毛的流民，冲进潼关，威胁长安，他们的外号是赤眉；另有一批人是躲在绿色树林中的，称为绿林，这些人其实都是铤而走险的农民。最厉害的要算河南南阳一带刘秀和他的哥哥刘缜所领导的新市兵与平林兵了，新市与平林是两个镇市，王莽派了 30 万大军前去攻打，反被他们打败。

对外受制于匈奴，对内见逼于群盗，王莽的环境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但是他绝不认错，总是怪别人不好，怪老天不公。他以为老天遗弃他了，便率领大小群臣与老百姓向天大哭，希望集体的哭声可以感动上苍，无奈上苍毫无反应，诸生、平民因随其哀哭而得到封官者有数千人。

王莽究竟死在谁的手上，我们弄不清楚。有人说他是被一个卖菜的老太婆砍死的，也有人说他是被长安的恶少年杀死的，也有人说是死在商人杜吴手里。那时候，刘秀及其所拥戴的更始皇帝刘玄，已经进抵长安了。

王莽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人认为他与一般的篡位者不同，在王莽身上有着浓厚的书生影子。在托古改制问题上，他一方面是在拉拢人心，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他对古代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真诚的向往。否则，他也不会明知仿效古制并无多大收拢人心的作用，却还是要坚持这样做。在符命问题上，他确实是有借此做皇帝的目的，但在内心深处他还是比较相信的，否则每到紧急关头，他为什么总是求助于神灵，怎么会没有奋起抵抗和另求其他办法呢？所以，在王莽的身上，既有虚伪、奸诈、残忍的一面，又有书生真诚、教条、死板的一面，只是作为一个篡位的皇帝，他的这一面很难被人发现。

王与马，共天下　　晋元帝依靠王导之谜

琅邪王司马睿在江东即皇帝之位时，竟然要拉着王导到御座上同坐，共

同接受百官的朝拜。没有王导，司马氏无法在江东立足。但“共天下”之后，司马睿又感到十分的不舒服，因为他不想把自己的权力与他人一起分享。在权力面前，皇帝变得十分自私。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和惠帝、怀帝同一辈分，十五岁世袭琅邪王。永兴二年(305)，东海王越起兵讨伐河间王颙和张方，命琅邪王司马睿留守下邳，这是琅邪王司马睿走上政治舞台的开始。司马睿本与东海王的参军王导关系密切，这时急需得力帮手，便向东海王要人，让王导担任主管军事的司马。王导字茂弘，琅邪临沂人。临沂王氏是著名的士族大姓，东晋南朝所谓的“王谢门第”，就以王导为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南迁各士族的代表人物。他和琅邪王司马睿同龄，这年虽只三十岁，然而早就满腹经纶，是个见识宏远的政治家。

怀帝永嘉元年(307)，即八王之乱结束后的第一年，东海王越执掌政权，他派宗室诸王出镇襄阳、长安、邺几个北方重镇，司马睿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去镇守江南的建业。同年九月，琅邪王司马睿到达建业，王导也跟随同来。这是后来晋朝在江南立足，保存半壁江山的起点。江东是孙吴的故土，强宗大族的势力根深蒂固，江南的吴郡顾氏、义兴周氏、山阴贺氏等势力都很强大，原广陵相陈敏就是被这些大族共同推翻的。司马睿到建业时，不过在陈敏覆灭之后半年的光景，他要立定脚跟，不取得江东大族的支持是不行的。于是他以王导为谋主，所有大大小小的事务都向王导征询意见。

司马睿资历不深，江东世族、名士都不把他放在眼里，看不起他，已经上任一个多月，竟然没有一个有名望的世族主动到府里来参见。王导对此非常忧虑，为此设计了一个戏剧化的场面。他让琅邪王司马睿坐着八人抬的大轿出行，参观秋季在水边求福去灾、祛除不祥的“禊祭”，他和时任扬州刺史的堂兄王敦以及北方一些名士骑马簇拥，在轿后随从，队伍整齐威严，以炫耀司马睿的尊显威严。这一着果然有点效果，名士纪瞻、顾荣等见后大为惊异，赶忙跑出来在路边拜谒。但是要争取这些人，单靠威风是不行的，必须使他们心悦诚服。琅邪王司马睿一看时机很好，遂派王导亲自去顾荣、贺循两家江南最大的世族府第，请他们出来做官，两人应命而至。于是在他们的带动下，江东人士纷纷出仕，逐渐拥护琅邪王司马睿了。司马睿终于取得

了江南世族的合作。

琅邪王司马睿任用顾荣为军司，加散骑常侍，一切军国大事，都向他咨询；用贺循为吴国内史，纪瞻、周玘、张等江东名流也都委以重任。

王导劝琅邪王重要事情要同江东士族商议，为他不断出谋划策。琅邪王如有过失，王导能及时谏阻。琅邪王初到建业时，常因酒醉误事，王导提出后，他就接受改正。王导治国，以清静为原则，劝琅邪王减少耗费，收到了安定邦国的效果，他们的君臣关系越来越好。琅邪王曾对他说："卿是我的萧何。"王导却答道："大王要建立不世的功勋，一统天下，需要管仲、乐毅那样的人才，区区国臣（司马睿是琅邪王，所以王导是诸侯国的臣子）怎能比拟前人！"他并不居功，屡劝琅邪王广择贤能，显示出一个胸怀宽阔的政治家的气度。

当时渡江南下的人士，每到空闲的日子，常常互相邀约到江边的新亭饮酒聚会。有一次饮酒宴会之后，众人思念故土，相对流泪。王导不哭，他正色道："我辈应当共同努力为国效劳，克复神州，何至于像楚囚一般，相向哭泣呢。"楚囚原指春秋时被俘到晋国的楚人钟仪，后来用以指处境窘迫的人。王导认为在国事艰难的时候，重要的是振奋精神，在战略上蔑视困难，去打开局面。如果只是相对哭泣，一筹莫展，在意志上自己先击垮自己，怎么能战胜困难呢！众人听后，都揩干眼泪，向他谢过。

愍帝在长安即位后，因其名司马业，建业这个地名因避讳从此改为建康。愍帝曾命琅邪王睿大举北伐，琅邪王不曾应命，只因祖逖的要求，让他独自率领部曲渡江北上。单看这件事情，似乎琅邪王睿和王导都不想"克复神州"。然而他们当时的处境实在困难，大举北伐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南方来说，一是力量单薄，二是内部矛盾重重。王导努力争取南方士族的合作，但总有一部分人不愿意真正合作。特别是过江的北方人增多后，这不可能不引起一部分南方人的疑虑，在愍帝建兴元年（313），还曾发生了周玘等一些江南氏族起兵乱政的事件。但事后，晋政府对周氏一族并不追究，后来还让周勰做临淮太守。司马氏和中原大族要做到同江东大族合作，实在不容易啊！处境如此，他们只能集中精力来稳定东南地区。

对琅邪王司马睿来说，至少在东晋草创时期，只能以王导为主要依靠对象。西晋亡后的次年（317）三月，琅邪王在建康即位称晋王，改元称建武元年，史称东晋。建武二年三月，愍帝遇害的消息传到建康，晋王才改称皇帝，

他就是晋元帝。

大兴元年(318)，司马睿即皇帝之位时，竟然要拉着王导到御座上同坐，共同接受百官的朝拜，王导当然不肯，坚决推辞。对元帝而言，这其实也是故作姿态，然而他非依靠王导不可，王氏兄弟在东晋政权中的地位，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清楚。

晋元帝依靠王导，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王导的堂兄王敦是个实力派。王敦字处仲，曾被东海王越任命为扬州刺史。元帝到江南后，扬州刺史刘陶死了，元帝就命王敦再担任这个职务。他和王导，一个为地方实力派，一个执掌朝政，元帝仗着他们，才巩固了统治，在东晋王朝中，司马氏有其位，而王氏家族有其权，王家与司马家几乎达到“平起平坐”的地步，所以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非常如实地反映了东晋初年的政治状况。

元帝在建康立定脚跟已经很不容易，要把号令发到扬州以外的地方并使之生效，自然更加困难。永嘉五年(311)，江州刺史华轶就以没有看到来自洛阳的诏书为理由，不服从琅邪王的命令，闹到不得不用武力解决的地步，而扬州刺史王敦做了讨伐华轶的主将。他攻杀华轶，又督率陶侃、周访等平定杜弢，稳定了长江中游地区的统治。长江中下游地区都稳定了，琅邪王睿管辖的地区就大体上与孙吴的疆域相同。元帝即位，加封王敦为江州牧。大兴元年(318)，任命他为荆州牧，因王敦不肯接受，改为荆州刺史。从此他坐镇荆州，掌握长江上游地区的军政大权，“共天下”的局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以后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对每个君王来说，他所追求的就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统治效果，要的是无限至上的独裁权力，这种与大臣平起平坐的局面实在是一种实力不济的无奈，只要有机会，或者说政权如果得以稳固，那么东晋皇帝首先要做的就是除去这个内心隐疾。晋元帝统治一旦稳固，遂对王导逐渐产生了猜忌的心理，对王敦更是疑虑重重，想的就是早日结束这种痛苦的共享。随着王敦成为跋扈的大军阀，起兵作乱，最后病死，王导虽然仍位居高职，但实际权利就转到了与其共同执政的中书令庾亮手中。

历来史家往往从王导不曾恢复中原、不能阻止王敦叛乱等问题着眼，贬低王导的功绩。他们都没有抓住王导的主要贡献。而陈寅恪先生则另有评说，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中说：“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

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

同时我们评价“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还要看到，东晋立国实质上是两汉魏晋以来的文明得以延续的关键。东晋和继续它的宋、齐、梁、陈四代，共计262年，尽管这五个朝代都是局处江东，然而中原人士都视之为文化正统所在。

边战边和　　唐高祖向突厥称臣之谜

公元618年，太原留守李渊与子李世民及刘文静、裴寂等起兵，引军西进，攻克了长安，建立了唐朝。其时北方有个强大的突厥族，还扶植了几个割据小政权，李渊该如何利用突厥的势力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成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策略问题。有人说他向突厥称臣了，有人说根本就没有称臣这回事，有人说他是求和不称臣。究为如何？



唐高祖李渊

南北朝后期，北方兴起了一个强大的马背上的民族——突厥。618年，当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就遇到了一个难题，唐军如欲南下，突厥就很有可能乘机捞上一把。为解除突厥的威胁，唐高祖想方设法要解决突厥问题。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提出李渊曾向突厥称臣：“独唐高祖起兵太原时，实称臣于突厥，而太宗又为此事谋主，后来史臣颇讳饰之，以至其事之本末不明显于后世。”换句话说，李渊是接受了突厥可汗的

封号。

太原起兵前，秦王李世民等曾“改旗帜以示突厥，师出有名，以辑夷夏”，表示自己的政治立场。秦王等欲改白旗并求得突厥人同意，而高祖认为最好改成绛白相杂的旗帜。白旗是突厥用的颜色，而绛色是隋朝所用，是当时中夏国旗的颜色，唐高祖想表示他维持中夏的地位，而不是纯粹向突厥称臣。在高祖集团中，向突厥称臣的主谋是唐太宗，具体前去执行的是刘文静。突厥始毕可汗与刘文静曾经相约，立唐高祖为可汗，突厥约束刘武周，唐军南下时不能乘机侵袭太原。

陈寅恪的观点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如台湾著名学者李树桐认为唐高祖从未向突厥称臣过。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载李渊手疏与突厥书，封题署云：“某启。”司马光《通鉴考异》在隋恭帝义宁元年(617)六月条下认为温氏有所避讳，实际上唐高祖在这时已称臣于突厥。李树桐认为“启”字为下达上书中的谦卑称法，在隋唐旧籍中十分多见，并不是称臣的标志。

凡是称臣于突厥者，突厥都送给他狼头纛。狼头纛，是突厥爵位的标帜。当时，称臣于突厥的群雄，突厥都署为可汗和天子，如刘武周称定杨可汗，也称定杨天子；梁师都称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李子和为平杨天子，这些人都接受了突厥的封号。高祖起义攻克长安后，立隋代王侑为天子，自为大丞相进封唐王，他既不称可汗，也未曾称天子，他从不曾接受突厥的封号。他认为高祖曾力排臣下的意见，决不接受突厥所给天子的名义，也就是决不肯向突厥称臣。如果高祖称臣的话，他必定要履行称臣的义务。当突厥送来马匹时，高祖“唯市好者以取其半”，并且对属下说：“乍可绝好蕃夷，无有从其所劝。”从当时的官私记载来看，唐高祖如何从称臣到不称臣，都无踪迹可寻。今天史书上说高祖向突厥称臣，其实是太宗时的一些史臣为讨好太宗而伪造的。

不过李树桐的观点遭到了许多学者的反对。有人认为义宁元年六月李渊的确还未称臣，但他手书时卑词厚礼“启”突厥始毕可汗的目的，是在试探突厥对起兵太原的态度，并透露愿执臣礼的意向。高祖起兵太原时，如果不连突厥，必将成为北方群雄众矢之的，只有称臣突厥，才能换取太原的安全，进军关中时后方才能稳定。但他又认识到公然独立叛隋不利，师出有名方可取得政治舆论的主动，所以他打着“尊隋”的旗号而实际上在反隋，他既用突厥的白旗，又用隋朝的绛旗，用来表示自己的立场，这正是他称臣于突厥

而不同于他人的特殊性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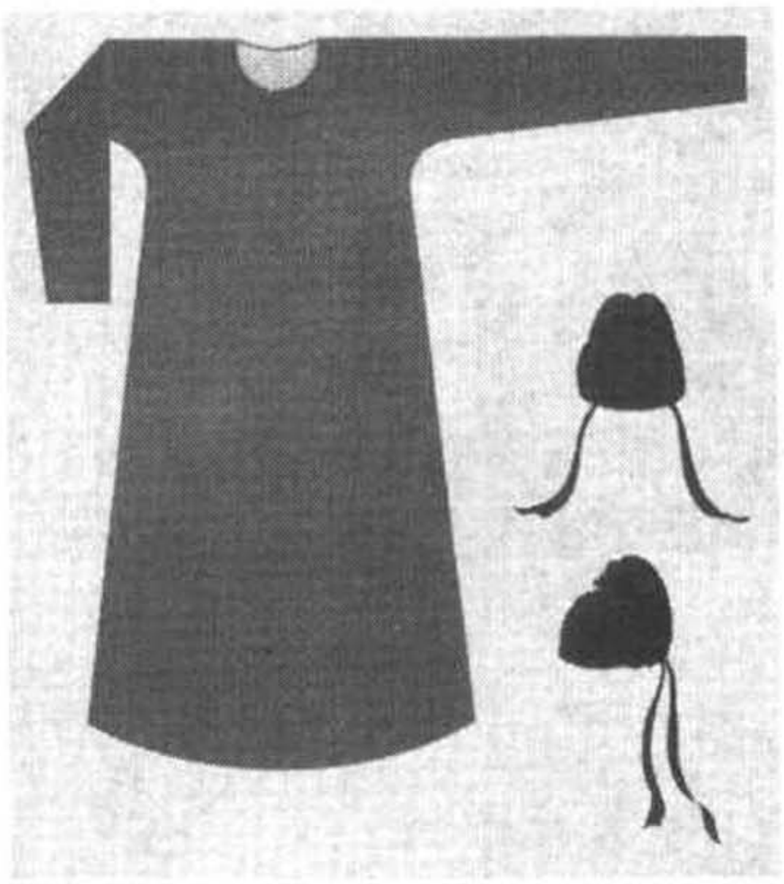
北方群雄称臣突厥的有薛举、王世充、窦建德等十数人，史书载有封号的只有刘武周、梁师都等四人，受可汗封号的仅刘、梁二人，受狼头纛的也仅此二人。实际上称臣非必要受突厥之封号，只有受突厥“可汗”者才授以狼头纛。当时称臣实有三种情况，或未受其封号，或受其封号，或受其狼头纛，在突厥方面当视为亲疏有别。称臣的根本义务是纳贡。突厥很讲实惠，李渊从一开始就和始毕可汗讲定：“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归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这正是他称臣的义务。《旧唐书》说高祖即位后，前后对突厥的“赏赐”不可胜纪，其实就是指的纳贡。

唐建立后，高祖一方面积极建设与西突厥的友谊，想并力以图突厥，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废十二军，讨论怎样大举击退突厥。武德八年(625)七月，高祖对大臣说：“突厥贪婪无厌，朕将征之，自今勿复为书，皆用诏敕。”许多人认为高祖大概是在这时不再称臣，而用敌国礼。正因为不再称臣，所以突厥此后攻掠频繁，以致太宗刚上台时大举南攻到渭水桥边，长安城门外。

在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外，还有第三种稍微折中的看法。高祖在起兵时用了下对上的“启”，但下对上的文书中“启”不是最高级别，李渊没有把突厥可汗视为至尊的地位。从李渊给始毕可汗信的内容及格式来看，李渊没有奉他为至尊，突厥提出的条件，也没有全部接受，对始毕可汗没有惟命是从。李渊的政策是基本上不失和于突厥，以免产生后顾之忧，表面上利用其力量，实际上使其不能大举南下，免得受制于人。

这种观点认为，高祖向突厥求和与其他割据势力依附于突厥截然不同，如刘武周等人都公开叛隋而自立，接受突厥可汗的封号，突厥还授予狼头纛，而高祖完全不同。他既要起兵反隋，又不愿落叛逆之名，既要解除突厥的威胁，又不愿依附于突厥，他绝不借助突厥的力量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唐政权建立后，突厥不仅恃功自傲，对高祖颇为无礼，而且还屡次兴师动众，举兵南下，阻止高祖发展势力，统一全国。这时高祖仍实行妥协政策，如突厥使节到长安，高祖是卑躬屈膝，“前后饷遗，不可胜纪”。为平定薛仁杲，他派出专使护送女妓给始毕可汗。武德四年(621)以前，唐高祖是以妥协求和的办法讨好突厥，但次年五月以后，随着力量的增强，高祖对突厥的政策开始软中带硬，边战边和，以战求和，在议和的背后，积极准备抗拒



唐代官吏主要服饰为圆领窄袖袍衫

突厥。

持这种观点者认为武德前期，高祖确是忍辱负重，委曲求和，但对突厥的政策是以巩固、发展唐朝政权为前提的。他总的政策思路是妥协求和而不受制于人，借助于突厥的力量发展壮大自己。

唐高祖究竟是否称臣，看来仍是留给历史学家们的一个课题。不过从这件事中，我们看到了李渊和李世民的足智多谋和才能，也了解了为什么在群雄蜂起的时候，李渊父子能够脱颖而出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唐帝国。

情有独钟　武则天长住东都洛阳之谜

洛阳是唐帝国的两都之一。武则天执政时期，洛阳取代长安的政治地位，成为名副其实的都城。作为一位独特魅力的政治家，武则天这样做有她的道理吗？难道洛阳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发生了变化？我们且听历史学家的回答。

唐朝都城在长安，长安从唐高祖起一直是第一政治中心。此外，唐朝还有一个陪都，那就是东都洛阳。从唐高祖至高宗，主要政府机构和办公地点均在长安。武则天登上帝位之后，除了长安元年(701)十月到三年十月这段时间住在长安以外，其余时间一直住到洛阳去了。



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佛，
据说是以武则天为原型雕造的

两《唐书》记载，武则天于 684 年 9 月改嗣圣元年为光宅元年，并且“改东都为神都，宫名太初”。改东都为神都，看来是想抬高洛阳的地位；而“太初”则意味着一切从新开始。与此同时，武则天又在洛阳立武氏七庙。688 年 2 月还在洛阳建立了明堂。七庙是古代帝王权力的象征，明堂是帝王举行祭祀、朝会、庆祝各种大典的场所。武则天把七庙和明堂建在洛阳，无疑是想要以洛阳代替长安了。此外，691 年 7 月，也就是武则天登上皇位还不到一年的时候，就把关内十万户居民迁到洛阳，至此，武则天要以洛阳为全国新的政治中心的用意已显露无遗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她长住洛阳，并以洛阳代替长安呢？

来自于传统史书的记录一般来说是比较原始可信的，关于这件事却有着一种独特的说法。《资治通鉴》和两《唐书》等史书上都记载，武则天曾与王皇后和萧淑妃争宠，王、萧失势被囚，高宗恻然伤之，对二人表示即将重新处置。武则天知道后，令人杖二人各一百，截去手足，投于酒瓮之中，还骂道：“令此二妪骨碎。”二人数日后死去。此后，武则天便经常在梦中见到她们“被发沥血如死时状”。为了摆脱噩梦的困扰，她先是移居蓬莱宫，但眼睛前面还是经常出现两人身影，不得已，就直接迁居到洛阳。这种说法自司马光开始已流传了很久，但是它看似顺理成章，却有许多漏洞，引起了不少怀疑。

首先，武则天常住洛阳并把洛阳作为政治中心，是高宗死后的事，距离

王、萧二人之死有二十多年了，把二者联系起来成为因果关系，不免有些牵强。其次，就武则天一贯的行为和性格来看，她不像是那种惧怕厉鬼报复的人。移居洛阳之后，她也没有少杀人，有学者甚至认为她杀人杀得“手滑”。因此，史书的说法难以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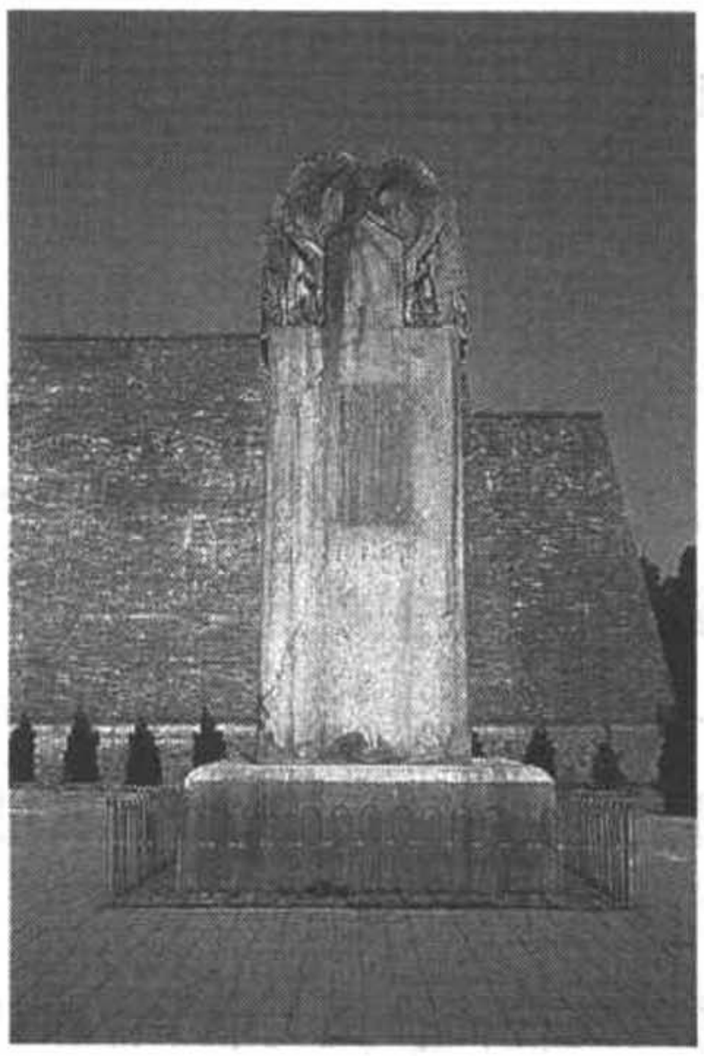
另一种说法认为，武则天之所以长期住在洛阳，“无非为其曾在长安出家，避洛阳可以纵情荒淫享乐起见”。这种说法也有待商榷。因为武则天先后任皇后、皇太后和皇帝，她的一举一动均受人瞩目。她要享乐也好，要掩盖曾在长安出家为尼也好，简单地靠迁居洛阳的方式并不能掩盖过去。更何况徐敬业起兵时，骆宾王起草的檄文中就有“洎乎晚节，秽乱春宫”的词句，可见她的过去早已为天下人所共知，再怎么迁都也于事无补。至于她要享乐，就更不用避人耳目了。且不说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为其面首一事是否属实，光看武氏的作风，她在平定叛乱和治理朝政上，手段之强硬与任何一位男性帝王相比，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如果她要贪图享乐，还会惧怕舆论的制约吗？

有人认为武则天长住洛阳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早在隋炀帝时，留在东都的时间比长安为多。入唐后，唐太宗曾三幸洛阳。其时关中屡遇天灾，农产品供应不足，所以帝王往往移居洛阳，等到关中农产丰收，然后再回到长安。唐高宗曾七次到洛阳去，也主要是这个原因。至武则天，干脆就长住洛阳了。长安的运输远不及洛阳来得方便，而洛阳地处南北运河的中点，交通漕运便利，因此洛阳得到武则天的看重固然不排除有政治及帝王私欲上的原因，但主要是因其经济地位决定的。

还有一种说法，较前面几种而言更为新颖，即认为武氏迁居洛阳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她的目的在于改朝换代，以周朝代唐朝。在封建社会以男子为中心的传统继承制度的局限下，一个女人要夺取王位，做真正意义上的皇帝实属不易，而武则天先后作为皇后、皇太后、皇帝，这一路走来更是比别人多了几分尴尬。虽然她最后成为了一国之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作为李氏之妇，其子为李氏之后，她和李氏之间始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无法改变“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传统思想和以男子为中心的帝位继承制度。她不能与李唐皇朝彻底决裂，不论是贬低或是抬高李氏王朝对她都是极为不利的，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她只能选择另起炉灶，建立新的政治中心，这样一来，既不会侵犯李氏在长安的原有地位，也显示了武氏在

洛阳的另一番至高无上。无疑，这一举动对于协调李氏和武氏的矛盾也是有利的，显示了武则天的政治才能和智慧。

更有一种观点认为，武则天长居洛阳的原因是高宗时期开始的独特的军事和政治原因造成的。高武时期周边地区军事形势较初唐有很大变化，唐朝与东北方、西方、北方的战事不断。唐高宗为了便于指挥与高丽的战争，多次来到洛阳。与吐蕃发生战争后，唐朝面临着东西两条战线，高宗就在两京之间来回奔走。从当时实际来看，洛阳正好位于全国几何中心的战略位置，较之长安更加便于应付各方的种种战事。武则天上台后，在制度上标新立异，别立系统，政治原因遂成为与军事原因并行不悖的长驻洛阳的又一因素。她想抛弃长安，摆脱李唐王朝的大本营和政治、礼仪氛围。当高宗死后，她连高宗西葬都不愿回长安一趟。



武则天死后葬在乾陵

那么，武则天要另外建立一个政治中心，她为什么不选别的地方，而是偏偏对洛阳“情有独钟”呢？持这种观点者认为这是由洛阳自身的各方面条件所决定的。

长安处于关中平原的中部，虽然土地肥沃，农业生产比较发达，但是由于它屡屡为各朝代的都城，城市人口日益增多，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很难满足城内的粮食需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早在西汉年间，政府就大力发展漕运事业，然而由于路途的遥远，加上三门峡一段的黄河河道狭窄，多暗礁，所

以漕运要付出很大代价，往往得不偿失，而位于三河交汇中心的洛阳却与长安截然不同，洛阳尉杨齐哲曾在给武则天的奏书中称洛阳“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行，地当六合之中，人悦四方之会”。可见，当时洛阳在经济发展上的条件的确优于长安。

自古至今，洛阳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它具有经济和军事两大方面的优势，历代帝王都对它非常重视。汉高祖称道：“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隋炀帝也说洛阳是：“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这一切都说明洛阳在帝王心目中的地位，实际它具备了作为一个都城的条件。到了武则天，她特别青睐洛阳，把洛阳作为新的政治中心，应该说是不足为奇的。武则天之后的中宗、玄宗等，又将神都改成东都，重新回到了长安，洛阳的重要性之后渐渐失去，从这点上看，笔者的观点认为武则天长驻洛阳可能是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人物的特殊举动，洛阳本身的地位没有变化，只不过因为武则天的原因才发生了变化。

兄弟之情　宋辽皇帝结义之谜

北宋和辽的皇帝之间存在着一种没有血缘的亲情关系，源于宋真宗的澶渊之盟。当时宋真宗与辽圣宗以兄弟相称，此后双方一直以辈分进行排列。辽朝人十分热心这种结义，宋朝皇帝却觉得面子上无光，虽然表面上没有反对，相反还同意按照这种辈分互相称呼。那么，宋朝皇帝为什么无奈地这样做？原来这是双方之间的一种特殊外交。

五代和北宋时期，北方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契丹贵族建立的国家——辽，双方南北对峙了二百余年。在北南交往过程中，北方辽朝的契丹皇帝们，从一开始就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曾先后与五代时的后梁、后唐、后晋和北汉的皇帝义结金兰，掠夺到了大量的财物，长期占领着雁门关以北、长城以南的十六州广大地区。至北宋，辽宋间的结义仍在继续进行。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太宗、真宗曾多次派兵北伐契丹，想夺回五代后晋时割让给契丹的十六州之地，虽然互有胜负，但北宋在军事上并没

有占到什么便宜。

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契丹大军自幽州南下直逼宋境,宋真宗赵恒无奈之下御驾亲征。由于军事上双方实力相当,这年十二月,宋辽在澶州缔结和约,罢兵修好。和约除规定宋每年要向辽献岁币外,辽国皇帝耶律隆绪尊宋帝赵恒为兄,赵恒尊辽国肖太后为叔母。这样,辽国不但得到了经济上的实惠,而且宋、辽两国皇帝成了兄弟,两个国家成了兄弟之国。此后,直到辽亡的近百年间,辽宋皇帝间的"金兰之好"就一直延续保存了下来,仅是因为皇帝在世时间各有长短,双方之间的辈分常在发生变化,有时两国成为"兄弟",有时成为"叔侄",有时成为"翁孙"。

根据《契丹国志》记载,北宋天圣元年(1023),宋真宗驾崩,派大臣到辽朝告哀。辽幽州的官员赶忙派急递先将消息传到京城,辽圣宗召集了番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都为之掉下了悲伤的眼泪。辽圣宗对宰臣说:"我与兄皇未结好之前,征伐各有胜负。结义至今已有二十年了,我与兄皇同月生,他仅比我大二岁,现在他升仙了,我还能活几岁?"说罢泪流满面。其时宋仁宗赵祯已接位,所以辽圣宗又说:"我听说侄帝年纪还轻,一定不清楚我与兄皇之间的情义,我担心一旦大臣离间,宋朝就会违背和约。"当宋朝告哀使到辽京城后,转达了宋仁宗的意思,辽圣宗很开心,对自己的皇后说:"我看侄帝的来意,一定不会违背兄皇与我的誓约。"又说:"你可先寄信给南朝太后,详述妯娌感情,让南使带回去。"因为辽圣宗与宋真宗是兄弟,所以辽圣宗又下令如果国内各色人等的姓名中有对真宗赵恒名讳冒犯的,一律避讳改掉。从这些记述来看,两位皇帝之间的结义还蛮像真的一回事,至少在表面上辽朝是当真的了。

辽圣宗于1031年病逝,子辽兴宗即位,他与宋仁宗又成了结义兄弟。庆历年间,辽兴宗宴请宋朝使者,说:"南北修好已有很长时间了,我恨不得马上与南朝皇帝兄见上一面,现在只能托你为我带一杯酒到南朝了。"兄弟之间实在太想见面,思念之情难以割舍,辽兴宗干脆就派使者到宋朝送上自己的画像,索要仁宗的画像,以"笃兄弟之情"。辽使带了辽圣、兴二宗的画像到宋朝,再拿了仁宗的画像回去,这时却发生了不幸的事情,辽兴宗因病去世了,这使得辽兴宗临终仍没有一睹仁宗的尊容。

当然表面上感情深厚的"兄弟之义"是一个方面,但从宋朝捞取实惠好处辽兴宗始终没忘记。当北宋与西夏之间战事吃紧时,辽兴宗就向北宋索



宋《女孝经图卷》

要后周世宗从燕云地区夺回的关南十城之地。北宋顾了前面就顾不了后面，只能与辽进行谈判，当然结局是可想而知的：契丹放弃对关南十城的要求，而北宋每年再增加银、绢二十万两、匹。这增加的部分在文件上怎么写？辽朝主张用“献”，宋朝不同意。宋使富弼认为用“献”意味着下奉上，但“南朝为兄，岂可兄献于弟乎？”辽朝退一步，提出用“纳”字，北宋还是不同意，双方就僵住了。最终，由于西部边境战事实在紧张，哥哥北宋无奈只能屈从弟弟的压力，同意用“纳”字。

辽道宗即位后，与宋仁宗的辈分变成了侄子与叔父，宋仁宗这时也称道宗的祖母为“婶母”。辽道宗与其父一样，也想看仁宗长得什么模样，就派使者到南方去求圣容。宋仁宗派使者张升到契丹，让辽道宗先将自己的画像送到宋朝去。道宗坚持己见，一定要先看仁宗的画像。张升对道宗说：“以前圣宗是弟，所以先将自己的画像拿到宋朝让兄看，于礼为顺。现在南朝皇帝是你的伯父，作为侄子你更应该先将自己的画像拿到南朝，伯父然后才会将自己的画像拿到北朝来，这样的先后顺序才是比较正确的。”宋朝坚持要先看辽道宗的像，把辽道宗气得要命，但从道理上看也说得通，道宗也就无计可施了。

宋仁宗死后，又历英宗、神宗、哲宗，宋辽二国从原来的伯侄关系翻过来成了孙祖关系，“辽为翁，宋为孙”，说来就十分滑稽。

从宋真宗澶渊之盟两国皇帝义结金兰开始，直至辽末，宋辽之间并没有

发生大的战事冲突，南北双方基本上维持了近百年的和平友好局面。在这种兄弟、伯侄、翁孙关系的前提下，辽宋之间的官私往来和贸易活动十分兴盛，双方在经济上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这是在结义之前双方可能都没有想到的。辽朝人的传统文化中有收继养子及外姓人入族的习俗，与宋朝的结义可能也是这种文化的一种表现。这种结义，应该说是一种特殊的外交，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客观上对辽国军政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不过上述一家之言是否定论还很难说，契丹和汉民族文化、习俗、观念都有很大差别，要真正搞清他们热衷于结义的真实目的可能还是要从契丹的文化上着手。

心惊肉跳　　明太祖朱元璋文字狱之谜

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间，接连不断地出现了文字狱。官员和士生的文章一不小心就出了问题，因为朱元璋常常怀疑他们在文章中讥讪自己。文字狱的血腥味，使大批文人学士吓得胆战心惊。人们认为文字狱是朱元璋文化水平不高，但对士人特别猜忌所造成的，是文化专制的残暴和黑暗。但也有人认为，很多文字狱其实是不可信的，甚至是伪造的。



明太祖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出生于安徽凤阳的一户贫苦农民家里，从小没有读书，文化水准不高。他的出身和发迹历史使他与文绉绉的士大夫之间有着一条无法弥补的裂痕。这条裂痕的明显表现就是明初出了很多文字狱，使大批文人学士冤枉致死，有人形容为腥风血雨，这其实并不过分。历史学家们认为文字狱是朱元璋推行文化专制的重要手段。

翻开史书笔记，朱元璋推行的文字狱真是不少，而且五花八门。

古代在元旦、冬至和皇帝、皇后的生日及皇后太后上尊号以及册立等重要节日和庆祝活动，各级官员常要上表祝贺。皇帝对官员有特别赏赐，官员须上表谢恩。这些表笺原本是礼节性的文章，对下面来说无非是趁机拍拍马屁，对皇帝来说也是讨个吉利。然而朱元璋不是这样想，他认为从这些文章里可以看出官员们对皇帝和朝廷的态度，因此他对这些文章咬文嚼字，还真发现了许多东西。如浙江某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长官作《谢增俸表》，内有句为“作则垂宪”。朱元璋自己是农民起义军出身，过去被人称为“贼”，所以他对这个字特别敏感，认为“则”与“贼”音近相通，这位教授在讽刺自己，遂下令将他诛杀。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内有句为“睿性生知”。朱元璋年轻时因家里较穷做了和尚，所以他认为这位训导在讥讽他，因为“生”就是在说“僧”，遂将他逮捕诛杀。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作贺表，内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句，朱元璋认为“光”是说他曾经剃过光头，“圣”说他是个僧人，“则”说他是个贼，遂下令诛杀。这样的例子有许多，在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书中记载了十多条，内中涉及的人员全部被诛，但惟有一个例外。

传说蒲州学正张某，洪武年间按惯例作贺表，文中称朱元璋的统治是“天下有道”，赞朱元璋“万寿无疆”。想不到朱元璋倒过来理解，把“道”读作“盗”，“无疆”认为是在咒他失去疆土，认为这个作表人太恶劣了，遂把他逮捕押送到京师，并亲自加以审问。张学正当面辩解说：“陛下有旨：表文不许杜撰，务必出自经典。‘天下有道’是孔圣人在《论语》中说的，‘万寿无疆’引自于《诗经》，说臣谤讪，臣实不服。”朱元璋让人一查书，确是如此，遂无话可说，把他放了。

诗文中的文字狱更是令人哭笑不得。明初文坛上，高启是很受人尊敬的一位，他以散文见长，朱元璋洪武初年曾授翰林编修，修《元史》。洪武三年擢他为户部右侍郎，但高启坚决辞职，情愿回到老家教书，这下可触怒朱

元璋了。高启友人魏观出任苏州知府，在当年张士诚的王府废墟上新造了苏州府衙，按时人习俗请高启写了一篇《上梁文》，内有“虎踞龙蟠”等套话。魏观的仇家知道后，向上报告说魏有张士诚第二的野心。朱元璋速命御史查证，结果魏观被诛，高启腰斩，死时仅三十九岁。

江西丰城有个僧人名来复，洪武初年应召入京建法会。朱元璋赐膳，来复呈诗谢恩，诗云：“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迭滥承上天赐，自惭无德颂陶唐。”这本是一首很好的谢恩诗，但朱元璋的理解却不是这样。“殊域”本指外国，而朱元璋把“殊”字分拆成“歹朱”，认为在骂姓朱的人。“无德”本是作者“自惭”，而朱元璋认为这是来复在骂他，于是下令赐死。

《剪胜野闻》中记载某年元宵，朱元璋微服出游，见街上有人出一灯谜，是一幅漫画，画中一妇人怀抱西瓜坐在马上，马的蹄子特别大。太祖回宫后命人查出灯谜的作者，押到后马上处死。刑部官员觉得很奇怪，不知这人到底有什么罪，奏请开恩赦宥。太祖发怒说：“此人侮辱皇后，大不敬，怎能饶了他。”众人这才明白太祖的意思，原来马皇后出身贫穷，自幼没有缠足，那画被认为是讽刺马皇后大脚；怀抱西瓜是暗示朱元璋、马皇后为淮西人，因为“怀”与“淮”同音。

本国人因文字狱被诛尚可理解，不可思议的是外国人也会受到牵连。洪武二十八年(1359)冬天，朝鲜国派使者柳珣上表贺来年正旦。朱元璋觉得贺表文字疏慢，派兵将柳珣抓了起来。柳称表不是他写的，是本国门下评理郑道传所撰。朱元璋遂传命把郑道传捉来认罪。第二年九月，朝鲜李氏王朝没有法想只能把郑总等三人送到明廷，解释说贺表是郑总等人所撰，郑道传患病无法送到。朱元璋遂把郑总等三人以“乱邦构衅”罪流放到云南。

文字狱让大臣和读书人吓破了胆，一有风吹草动就心惊肉跳。有一个叫邓伯言的诗人经人推荐入京应试，廷试《钟山晓寒》诗。诗中他写道：“鳌足立四极，钟山蟠一龙。”朱元璋看后觉得很好，当庭吟诵，激情之下举手把桌子拍得咚咚响。邓伯言跪在阶下，误以为自己的诗惹得皇帝发怒了，吓得昏过去了，被人扶出东华门才苏醒过来。后来皇帝下旨让他任官翰林，他已惊吓不起了，找个理由回老家去了。山阴文士唐愚士为宰相李善长撰写露布，朱元璋读后发觉写得实在是好，命使者飞骑召他入宫。使者误以为皇帝召唐来是治罪的，就把唐上枷戴锁押到京师。唐自料必死，路过姑母家时还请姑母为他料理后事，哪里想到朱元璋其实是想重用他。



南京明孝陵

朱元璋时期之所以有众多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文字狱，著名史学家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说，在和知识分子的斗争中，朱元璋特别注意文字细节和他自己出身经历的禁忌，吹毛求疵，造成了洪武时代的文字狱。

有人指出，朱元璋很注意征儒辟士，即位前就招聚了一群士人为自己效力，即位后连颁诏书，征辟大批士人兴礼乐、定制度，充实到政府机构。但由于他出身低贱，当过和尚，在士大夫面前总感到矮了一截，心灵深处有自卑感。对士大夫来说，他们对当过和尚做过盗贼的这位皇帝从心底里是不敬服的，并不承认他是得天命的君主，对新王朝的前途也十分怀疑，加上新王朝法律严酷，很多文人都不愿出仕。文人的不合作态度与明太祖之间产生的裂痕，这是明初文字狱产生的重要原因。另外，建立明朝的勋贵和大批武臣对朱元璋重用文士有看法，并想尽办法进行挑拨。有人曾对太祖说："文人鬼点子很多，往往让人受了辱骂还不知道。当年张九四让身边的文人给他起个雅一点的名字，文人给他取了士诚。他哪里知道《孟子》上说：'士，诚小人也。'他被人骂了一辈子还蒙在鼓里。"朱元璋听后一翻《孟子》，果然不错，从此不管是谁的文章他就多长一个心眼，进行详细推敲。由于他读书本就不多，对字音字义、作诗用典一知半解，因而常常能不断"发现"人家讥讪他的文句，于是文字狱就一个接一个地兴起了。

不过有人对上述明太祖文字狱的说法不以为然。如台湾学者陈学霖认为赵翼及其以后学者所论明太祖文字狱案，皆系依据弘治至万历间野史稗乘所传故事，其间抵牾百出，也有荒诞可笑，不可视为史实。他认为赵翼说

的表笺文字狱案本身，虽然可能有其事，然谬误失实不可轻信为真。他认为徐一夔贺表触文字忌讳被斩、释来复呈诗被赐死等，皆系虚构误传。事实上徐一夔没有被斩，来复上诗也没有触怒太祖，他是涉嫌胡惟庸案才致死的。他认为明太祖并不是不学无术、误读表文的人，也没有对他人的表文妄加臆测。有人因为文字狱被诛，很有可能他是涉及到了政治事件，而明太祖想铲除异己，所以故意断章取义，罗织成狱。因为这样的原因，文字狱在官方史书中故意不记载，而民间的野史互相转述俗说耳谈，一传而再，致使传说纷纭，淆乱视听。后代研究明史的人，疏于鉴别史料，遂有误解文字狱案者，歪曲了历史的真相。

如此说来，上面谈到的那些文字狱是不可全部相信的。但哪几则是真的，哪几则是假的，或者哪几则部分是真部分是假，这还得靠历史学家们通过努力工作来为我们揭开谜底了。

死因疑案

狼狈为奸　秦始皇死因之谜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巡视全国各地，至沙丘平台时突然死去。有人说宦官赵高和丞相李斯改动了诏书，推胡亥为帝，逼迫始皇长子扶苏自杀。于是人们用怀疑的眼光来寻找秦始皇的死因，是否真如《史记》所说的是劳累致死？



秦始皇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给各地施加政治影响，开始了一次次到各地的巡视。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巡视全国各地，随行的大臣有丞相李斯和中车府令赵高。秦始皇儿子据说有二十多个，但只有十八子胡亥被允许同行，因为他特别受到秦始皇的宠爱。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这次巡视东至会稽，渡江至琅琊，再取道西返。七月，车驾至平源津，秦始皇病重。由于他忌讳说死，群臣谁也不敢

谈论死的事。至沙丘平台，病情严重。他自知不能治愈，于是命令赵高拟定诏书给长子扶苏，要他把军务托付给蒙恬，速回咸阳治理丧事。诏书写毕，还来不及封口交给使者，秦始皇就去世了。

赵高拿了秦始皇的玉玺大印和遗诏，心中感到十分沉重。当时知道遗诏内容的只有李斯、胡亥和他三个人，其他的大臣一概不知。丞相李斯因为秦始皇死在出行的路上，立太子的事未定，恐天下发生动乱，就命令秘不发丧，把秦始皇的遗体置于辒凉车上，让亲信宦官守护。每到一地，按例进膳，朝廷百官照样还要报告政务，亲信宦官就在车中假托皇帝命令批复百官的奏本。

赵高曾经是胡亥的老师，教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与胡亥关系密切。赵高原是赵国国君的远亲，自幼受宫刑，长大后进宫当宦官。赵高曾经犯大罪，秦始皇命蒙毅去审理。秉公执法的蒙毅判赵高为死罪。秦始皇因赵高办事比较干练，又精通刑狱法令，所以就赦免了他。这时的赵高担心如果按秦始皇所云让公子扶苏接位，与扶苏关系密切的蒙恬、蒙毅兄弟就会受到宠信，并对他不利。为此，赵高策划了一场夺嗣的争斗，决定把胡亥推上皇位。

赵高扣下皇帝的信件，游说胡亥说：“皇上驾崩，没有遗诏封诸皇子为王而只赐信给长子扶苏。扶苏一到咸阳，就将即帝位。公子你却无尺寸之地可以立足，你想过该怎么办？”胡亥说：“贤明的君主了解大臣，贤明的父亲了解儿子。我还有什么好说的？”赵高面露一丝奸笑说：“现在皇位的归属取决于您、我和李斯三人，希望公子要抓住机会。‘臣人与见臣于人，制人与见制于人’，怎可同日而语呢？”胡亥对赵高的奸谋，心存恐惧，但皇位对他的诱惑实在太大，也就不管那么多了。最后只是有点担心：“现今父皇的遗体还在路上没有发丧，此时怎么对丞相说呢？”

赵高知道，没有丞相李斯的支持，他的阴谋是无法得逞的，遂去劝说李斯。李斯起初还以忠于君事自命，但赵高晓之以利说：“无论才能、功劳、谋略、声望以及和扶苏的私人情谊，你李斯哪一点比蒙恬强？公子扶苏即位，必定宠信蒙氏，以蒙恬为丞相。这样，你的荣华富贵不仅没有了，而且你的子孙也将会受到伤害。只有公子胡亥，人非常仁慈可爱，轻钱财，重人才，在始皇的所有公子中没有谁比得上他。我认为继承皇位的应该是他，所以我特地来和你商议，把谁即皇位定下来。”出于对权势的欲求，李斯终于被赵高说服，同意照赵高的意思去办。

三人狼狈为奸，对外宣称李斯接到始皇的诏书，让他立胡亥为太子，又

伪造给长子扶苏的诏书说:“扶苏和将军蒙恬带兵数十万屯边已十多年了,军事上没有丝毫的进展,而死亡的士兵很多。扶苏没有立尺寸之功,反而多次上书对我进行诽谤,心存怨恨。作为人子,你实属不孝之至,赐剑令自杀。将军蒙恬,长期与扶苏共事,却不能帮助扶苏,反而参与他的阴谋活动,作为人臣不知尽忠,也赐死。”他们将诏书密封,盖上皇帝的玉玺,派胡亥的亲信为使者,将信送给扶苏。

使者到达上郡,宣读秦始皇的诏书,扶苏大哭不止,回到内屋就拔剑自杀。蒙恬对使者的诏书表示怀疑,不肯自杀,使者就命法吏把他关押到阳周去。

当时是七月大热天,秦始皇的尸体很快发出臭味来。李斯和赵高让人用车载一石鲍鱼,使人以为是鱼发出的味道。当车驾在由九原沿直道驶返咸阳的路上,传来扶苏自杀的消息,胡亥、赵高和李斯非常高兴,他们知道夺嗣已经成功,遂快马加鞭回到咸阳。一进咸阳城,立即宣布始皇帝的死讯,并公开举丧。胡亥遂名正言顺地以太子登上皇位,史称秦二世。并且任命赵高为郎中令,常在宫中侍奉。

在整个政权过渡中,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而赵高、胡亥是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夺得皇位的,于是人们对秦始皇的死因产生了许多怀疑。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秦始皇的死主要是他巡视的时间较长,得病累死的。但有人不同意,说秦始皇儿子就有二十多位,后宫佳丽一大群,所以秦始皇特别喜欢女色,由于长期纵欲,他的身体很虚弱,加上出巡期间太劳累了,他就一病不起。



秦始皇陵兵马俑

一些人提出秦始皇的死很奇怪，很有可能是一大谜案。秦始皇平时身体很好，从未见史书记载他以前得过什么病。前227年，荆轲突然拔出匕首刺杀他，虽然他大吃一惊，但仍是比较灵活挣脱开来，绕着柱子逃命。要是身体有病，恐怕这次不免一死。临死前在沙丘平台，他还口授诏书给公子扶苏，足见他当时思维仍很清晰，所得的病也不太会是十分严重的。

郭沫若曾写过一篇历史小说《秦始皇之死》，其中描述秦始皇在平源津渡黄河时，癫痫病发作，后脑壳撞在青铜冰鉴上，加重了脑膜炎的病情，人处于昏迷状态；当车赶到沙丘后，宿了一夜，第二天，赵高、李斯发觉秦始皇已死，右耳流出黑血，右耳孔内有一根寸长的铁钉。这篇小说反映出早就有人怀疑秦始皇的死属于非正常的死亡。至于谋害者是谁呢？小说中认为是胡亥。

根据赵高后来的表现，一些人推测秦始皇的死，很有可能与赵高有关，是赵高杀了秦始皇。为了除掉蒙恬兄弟二人，赵高想出了许多歪主意。他用胡亥对抗扶苏，最后靠了胡亥把扶苏和蒙恬兄弟全部杀死。秦始皇在沙丘养病时，使赵高有了谋杀他的机会。因为秦始皇想立扶苏，所以赵高压着诏书不发，想找机会劝说胡亥和私心极重的李斯，一起矫诏杀扶苏。然诏书是无法扣压很长时间的，万一秦始皇身体好转，知道赵高未发诏书，必定会问罪于他。于是他在劝说李斯之前，干脆杀了病中的秦始皇，这样事情就做得如此天衣无缝了。

也有人说赵高的最终目的是要坐在皇帝的宝座上，而他不能像后来支配秦二世那样支配活的秦始皇，秦始皇第五次出巡途中病重，对他来说是天赐良机，只有在秦始皇死后，他才能假传遗诏，于是他一步一步实施着他的计谋。

大体看来，由于赵高在这起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极大，他杀秦始皇是很有可能的。然而这种观点在史料中并没有明显的记载，最多也仅是人们的猜测。秦始皇是病死还是被害，目前尚无定论，如果是被害，赵高又是如何使秦始皇致死的？这些都是历史上的缺页。所以“沙丘疑案”是一个未解之谜。

两位夫人　　隋文帝死因之谜

隋文帝是隋朝的开国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有政治魄力的君主。

他的最后人生历程引起了人们极大好奇，因为一些史书记载他的死亡十分离奇，多年来成了诸多学者关注的一大热点。事实上，隋文帝的死是一件至今没有定论的公案。



隋文帝杨坚

公元581年，杨坚以北周外戚国丈的身份篡夺了帝位，建立了隋朝，史称隋文帝。隋文帝共有五个儿子，均为独孤皇后所生。隋文帝登基后，即立长子杨勇为太子，次子杨广为晋王。

之后，文帝将杨勇废为庶人，立善于伪饰的晋王杨广为太子。仁寿四年(604)四月，隋文帝得病，七月病重，不久死于仁寿宫。

关于文帝的死，目前学术界大致形成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隋文帝之死属于他杀，凶手是他的儿子即隋炀帝杨广。据史书记载，隋文帝杨坚病重期间，尚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等因皇帝病重而入宫侍奉，太子杨广也住进宫中的大兴殿。杨广见文帝的病情危在旦夕，就亲手写信给杨素，让杨素密切注意文帝的情况，并询问今后该怎么办。不料杨素的回信被宫人误送到文帝处，文帝看后非常震怒。

独孤皇后死后，文帝最宠幸的是宣华夫人和容华夫人。宣华夫人陈氏是南朝陈后主的妹妹，人长得很漂亮，号称“江南第一美人”，杨广对她的美貌垂涎已久。当晚，陈夫人在旁侍疾，早晨出来更衣时被杨广撞见。杨广欲

对陈夫人无礼，被陈夫人奋力挣脱。当陈夫人衣衫不整、神色慌乱地跑到文帝病榻前时，文帝气愤异常，大骂道："这个畜生如此无礼，怎能担当治国的大任！"盛怒之下命令柳述说："召我儿。"柳述以为要召杨广，文帝急忙纠正道："勇也。"大怒中的文帝要重立杨勇为太子，废黜杨广。柳述起草诏敕后让杨素过目，杨素是杨广的心腹，自然不肯召杨勇。杨广马上假传圣旨，命亲信左庶子张衡立即入大宝殿侍候文帝。张衡进入大宝殿，就把宫人和卫士全都赶出殿外。一会儿，张衡出殿宣布文帝已经驾崩。一时间，朝野上下议论纷纷，认为是张衡杀死了文帝。至于张衡是如何杀死文帝的，史书的记载有较大的出入，《大业略记》记载张衡以毒药害死文帝，而《通历》记载张衡"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相似的记载还见于《隋书》卷三六《后妃·宣华夫人陈氏传》。

第二天，杨广即皇帝位，为文帝发丧，并派人以文帝遗诏的名义缢杀杨勇。杨勇的十个儿子，长子被当场毒死，其他九个被流放到岭南后，诏令当地官员把他们全部杀死。

文帝死后，陈夫人惊恐不安，忽然收到杨广派人送来的一个金盒子，用纸封口，上有杨广亲笔书写的封签。陈夫人认为里面必是毒药，非常害怕，不敢启封，在使者的催逼下，万不得已才打开盒盖。出乎她的意料，盒内装的原来是几枚同心结。边上的宫人见此都非常高兴，相互庆贺炀帝是不会杀人灭口了。当天夜里，文帝尸骨未寒，杨广就在宫内占有了名分上是他后母的陈夫人。文帝的另一个宠妃容华夫人，不久也被杨广占有。

今天，当我们从史书记载的真实性来看，促使隋炀帝杀害隋文帝的原因是调戏陈夫人不成，这一传说显然是讲不通的。因为早在文帝病重之前，想要夺取太子之位的杨广就与陈夫人打过交道，当时他经常送陈夫人"金蛇"、"金驼"一类的贵重物品，其目的自然是让陈夫人在父亲面前替自己说好话。而开皇二十年更换太子，陈氏也"颇有力焉"，说明他们之间曾经有过政治合作关系。所以，在文帝病危之时，杨广又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陈氏怎么可能开罪杨广呢？基于这一点，有学者认为调戏陈氏一事充其量只是一种偶然性的促发因素，真正导致仁寿四年宫廷政变的原因，是文帝仁寿中的中央政治变动。

在杨广夺取太子之位的进程中，有一个人的作用不可忽视，那就是他的母亲独孤皇后。她是杨广夺宫的主要支持者，也是打击反对杨广势力的主

要力量。但是，独孤后却于仁寿二年(602)去世。她的死，使杨广集团不得不直接面对来自各方面政治反对派的压力。这些压力，首先来自杨秀和杨谅这两个杨广的弟弟。杨秀“性甚耿介”，对于杨广通过并不光明的手段夺得太子之位，他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人；杨谅更是以防御突厥入侵为由厉兵秣马，加强自己的军备，“秀窥岷、蜀之阻，谅起晋阳之甲”，很好地概括了当时的局面。其次的压力是来自朝臣及州郡牧守的威胁，主要人物包括梁毗、裴肃、柳述等，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是杨广的心腹杨素。隋文帝对于梁、裴、柳等人针对杨素的上书和谏言，虽没有尽纳其意，但是的确对他日渐疏远了。在慢慢夺去杨素实权的同时，文帝对柳述等人日渐宠信。这样，仁寿中的这些政治变动使得杨广集团曾经有过的优势再度失衡，拥重兵而“阴怀异图”的杨谅，以及被废为庶人的杨勇，都有可能重整旗鼓取杨广而代之，在这种局势下，为了保护来之不易的太子之位，杨广就不得不先下手为强杀害了自己的父亲。

另外，有学者认为隋文帝并非是杨广所杀，他是病死的。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首先对《大业略记》和《通历》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这两本史书本身存在许多常识性的错误。比如《大业略记》不但把绯闻案的女主角搞错了，而且将二十一日发丧误作十八日。甚至说杀文帝的首犯是宰相杨素，次为左庶子张衡，用的是毒药，这一点也没有任何一本史书能够提供证据。《通历》也是如此，试想在文帝与百官诀别的庄严时刻，身为太子的杨广怎么可能跑到别室去非礼陈夫人？而且文帝明知杨素是杨广集团的核心人物，怎么可能让他去召杨勇废杨广？再者，行凶的手段为“拉杀”，且“冤痛之声闻于外”，这样的暗杀也太过于明目张胆了。基于以上种种疑点，加上《大业略记》的作者赵毅为初唐人，在隋末唐初的特定历史环境中，人们普遍对隋炀帝深恶痛绝，在记述文帝死因问题上不可避免要掺杂个人的思想感情，以期引起人们对隋炀帝的憎恨。《通历》的作者马总生于中唐，他的记载很多地方经不起推敲。既然杀文帝时左右没有人，冤痛之声怎么会闻于外？所以，《大业略记》和《通历》似市井流言，不足为凭。

即使是司马光在《通鉴》中引用了《大业略记》的记载，也慎重地注明“今从《隋书》”。至于《隋书》卷三六《后妃·宣华夫人陈氏传》的记载，也只是宣华夫人的一面之词，并非源于档案材料。北朝隋唐受胡俗影响，存在收纳父妾的风气，再加上如前所述，陈夫人与杨广早有“渊源”，有可能这时两人的

感情发展较深，所以陈夫人被调戏一事的可信度还有待商榷。

除此以外，学者们认为还有许多理由可证明隋文帝并非杨广所杀。自仁寿四年春，文帝已退出政治舞台，这时隋炀帝虽位居太子，实际上已成为摄皇帝。朝廷之事，“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隋炀帝用不着再冒杀父罪名；七月，文帝已病入膏肓，不久即将离开人世，杨广继位已是时间问题，没有必要再弑其父。何况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已对杨广构不成任何威胁；此外，根据文献的记载，自杨广继太子之位起，与其父的关系一直很融洽。他的才干和魄力受到文帝的赏识，两人之间没有利害冲突；再就仁寿宫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杨广与杨素的卫兵一旦控制宫禁与交通，则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杨广应该不会愚蠢到谋杀垂死的父亲，授人以致命的把柄。

事实上大家都可以发现，以隋为鉴的唐太宗君臣，没有一个指控隋炀帝弑父。当年如火如荼的隋末大起义，成千上万的民众揭竿而起，不少隋朝官僚也趁势反叛，在全国上下一派声讨声中，亦没有一人指责隋炀帝弑父这一颇具鼓动性的罪状。被后人指控为杀害文帝的凶手张衡，史书上称他“幼怀志尚，有骨鲠之风”。虽然他曾为隋炀帝夺得太子之位出谋划策，但是到后来由于他反对隋炀帝建造汾阳宫和谤讪朝政而被赐死于家中。后唐高祖李渊认为他“死非其罪”，替他平反，并赐给他“忠”的字号。如果张衡果真是弑君凶手，唐高祖决不会替他平反，因为这关系到国家赖以维持秩序的伦理道德问题。

那么，不是死于他杀，又到底是怎么死的？学者或认为文帝确如史书所说是因病而死，死前作好了后事的安排；也有人认为是因晚年纵欲过度而亡。独孤皇后死后，文帝惑于宣华、容华这两位年轻的女人，身体每况愈下。病重期间，文帝才意识到：“如果皇后在，我不会变成这种地步的。”但这一切太晚了，贪恋女色，导致了他的驾崩。

欲盖弥彰　北汉国主遇刺之谜

北宋太祖赵匡胤乾德六年(968)七月，北汉国主刘钧死，养子刘继恩继位。不久，刘继恩遇刺身亡。一个刚登上位的小国皇帝，遭人杀害，十分可怜。那么杀人凶手是谁？有人说是北汉宰相郭无为，有人说是他的弟弟，即

随后即位的刘继元，有人说就是那个举刀砍下的军将侯霸荣。哪一种比较可靠？

宋太祖乾德六年(968)七月，北汉国主刘钧死，养子刘继恩继位，与权相郭无为不和。宋太祖见有机可乘，于八月派兵征伐北汉。宋军直薄太原城下，屡败北汉兵。九月间，刘继恩遇刺身亡，郭无为另立刘继元为主。

刘继恩死于谁的手？旧史语焉不详，众说纷纭，成为一桩悬案。

一种观点认为北汉宰相郭无为是刺杀刘继恩的元凶。宋太宗时编修的《九国志》谈到继恩嗣位仅六十日，就为郭无为所弒。欧阳修《新五代史》对这件血案记叙颇详：九月，继恩开设宴会宴请诸大臣宗子，饮罢，在阁中睡着了。供奉官侯霸荣率十余人拿了刀进入阁中，把门一关就把继恩杀了。这时，郭无为遣人登上梯子也跟进屋中，杀死了霸荣及其党羽。继恩与郭无为原本关系不太密切，立为北汉主后，继恩想把郭无为赶走，但没有成功，侯霸荣刺杀继恩，一般人都认为这是郭无为主谋。现在霸荣死了，知情者遭到灭口，也就没有人知道了。这里欧阳修仅是怀疑郭无为是幕后主持者，但并没有十分肯定。然这种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包括今天的许多著作都认定刘继恩被刺系郭无为为维护自己的地位而指使侯霸荣所为。

也有人认为刺杀继恩的元凶是他的弟弟，即随即继位的北汉皇帝刘继元。清代王鸣盛根据北汉广运二年所刻千佛碑铭文，探寻其中隐约可见的意思，认为刘继恩被刺，刘继元是主谋，郭无为出的计策，侯霸荣挥的刀，“绎碑情事如见，欲盖弥彰”。不过这种观点受到了今人的质疑，认为就铭文本身而言，所叙空洞，找不出刘继元谋主的明证。而且刘继元一直与北宋为敌，如果他真的是谋主元凶，北宋的官私文件中肯定会大加张扬，但史籍中却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蛛丝马迹。

也有认为侯霸荣本人是刺杀刘继恩的元凶。宋代的《东都事略》等书指出，侯氏刺杀继恩的动机是为了持其首以归宋。当代史学家吕思勉接受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当时就有人说郭无为是元凶，这是“不快于无为者造作之辞也”，这件事与郭无为是不相干的。

那么杀刘继恩的元凶到底是谁？

最新的说法认为杀刘继恩的凶手是宋太祖。但人们禁不住要问，这种说法是否有事实根据？

《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是记述刘继恩被刺最为详尽和全面的资料，在讲到整个被刺过程时，基本上与《新五代史》一致，但语气上却有所变化。在谈到侯霸荣这个人的生平时说："尝为盗并汾间，北汉世祖用为散指挥使戍乐平。王全斌攻乐平，霸荣率所部降之，补内殿直。未几，复奔北汉，为供奉官。于是谋杀继恩，持其首归朝，旋为无为所杀。"这里可知侯霸荣本是绿林中人，受北汉招安，授散指挥使，戍守乐平。散指挥使职务不高，但能接近皇帝，所以地位重要，也很容易得到升迁。不过侯氏被派出戍守，应该是未受重用。不久，侯霸荣率部投降宋朝，补内殿直，成为宋太祖近卫班直中的一员，负责皇帝的安全保卫。问题是此后侯霸荣复奔北汉，表面上看这事不应发生。北汉待其极薄，而宋太祖待其极厚；北汉是"亡国之余"，已日薄西山，而北宋乃中原大国，正呈方兴之势。重投北汉的理由，必是非同一般。其实侯霸荣是负有宋朝方面的特殊使命伪装逃归北汉的。

几乎在同时，宋太祖还派出间谍惠璘称自己是殿前散指挥使负罪投奔北汉，北汉宰相郭无为任他为供奉官。宋朝军队攻入北汉时，惠璘就前往迎接，半路上被北汉军抓住，郭无为知道他是间谍，就把他放掉了。这条见于《长编》的资料是郭无为与北宋勾结极为有力的证据。侯霸荣和惠璘两人都是以殿前近卫的身份来到北汉，又都被郭无为署为供奉官，两人的真实使命都是为了杀死北汉皇帝。

郭无为以一国之尊而与北宋暗通，那么为什么当侯霸荣杀死刘继恩后又将侯杀死？郭其实是狡兔三窟，左右逢源，在情形不利时为保全自己而牺牲他人。宋军于九月二十一日进抵太原城下，八天后侯、郭二人杀了刘继恩，城内城外本成内呼外应之势，但出城迎接宋军的惠璘途中被俘，使宋军无法确知城中侯、郭的具体计划，因而没有作出相应的配合，这就给了刘继恩弟、太原府尹兼侍卫亲军事刘继元一个调兵遣将、控制局面的机会，在这种情形下，郭只能杀侯以灭口。

北宋立国之初，宋太祖就如何进行统一战争考虑了很长时间，最后制定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按照这一战略，北宋先后打下了荆湖、后蜀。但平后蜀后却一反常态，按兵不动，停止了对南方诸国的用兵。开宝元年八月又突然决定对北汉用兵，次年又亲自出征，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这里固然有北汉老国主刘钧病逝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太祖亲自安排了侯、郭、惠在北汉的里应外合。行刺刘继恩成功后，宋太祖曾遣使招降北汉君臣，又另外

赐给郭无为诏四十余道，许授安国节度使，试图从内部搞乱北汉。而郭无为劝刘继元接受宋太祖的诏令，纳款称臣。契丹军前来支援，宋军只能南撤。开宝二年二月，宋太祖胸有成竹地认为可不杀一人取下北汉，亲自带兵出征。宋军到达太原，郭无为于城内遥相呼应，至五月更想带精甲千人出奔倒戈，后因"反状甚明"被抓，"北汉主杀之以殉，城中稍定"。宋太祖策反计划全部被毁，不得不下令撤军。

宋太祖遣侯霸荣刺杀刘继恩，意在溃敌腹心，乱而取之，这是出奇制胜的一道策略。北汉由于得到契丹的保护，宋朝力量还不足以与之相抗衡，最后无功而返。

这种新颖的解释，是否已经找到了杀害刘继恩的元凶？亲爱的读者，你的看法如何？

烛影斧声　　宋太祖赵匡胤死因之谜

宋太祖赵匡胤死后，在许多书中，隐隐约约提出他的死比较蹊跷，于是许多人认为是宋太宗下的手，有的说是在酒中下的毒，有的认为是用斧砍的。也有人认为这些想法是多虑的，太祖之死是他嗜酒造成的，更有人认为赵氏家族本身就有遗传病，太祖是因病而死。这些说法都论之有据，言之成理。可太祖到底是怎么死的？

建立北宋后，宋太祖赵匡胤大刀阔斧，整顿军队，调整了行政机构，集中了财权，从而使中央集权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同时，他先后平定了南方的一些割据政权。正当他雄心勃勃，大展宏图之际，做了十七年皇帝的赵匡胤却于开宝九年(976)十月二十日晚上突然离世，年仅五十岁。对于他的死，《宋史》等官方的记载十分简单，不讲是什么原因。数十年后，民间的笔记小说开始谈及宋太祖之死。由于谈起这件事的笔记小说极为庞杂，不久就越描述越玄乎了。

北宋僧人文莹的《湘山野录》是最早谈起的一本书。书中说：十月二十日这天晚上，天刚暗，星斗明灿，宋太祖满心喜欢。不一会天气突然起了变化，阴霾四起，雪雹骤降。宋太祖命人打开端门，将自己的弟弟开封府晋王

赵光义召来。赵光义来后，太祖让他进了寝宫，两人酌酒对饮，太监、侍婢全部退下。只见烛影下的赵光义不时地在桌子旁站起来，好像一副不胜酒力的样子。二人喝完酒，已是半夜三更，殿前的积雪已积到数寸。赵匡胤拿了斧头刺雪，回过头来还对赵光义说："好做，好做。"之后太祖脱了衣服睡觉了，不一会鼻息如雷霆。当晚赵光义留宿在宫殿内。将近五更时，在宫殿周围的人一点也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太祖已经驾崩了。当天赵光义在灵柩前即位。宣读遗诏结束，近臣瞻仰宋太祖遗容，只见"玉色温莹，如出汤沐"。

很多人认为这条资料不是空穴来风，虽不能说字字准确，但也大致可信，所以习惯上将太祖死的过程称之为"烛影斧声"。

另外，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也记录了宋太祖死时的一些情景，没有说宋太宗是杀宋太祖的凶手，却讲到了太宗是怎样篡位的：太祖刚死时，孝章宋皇后让内侍都知王继隆召太祖子秦王德芳。王继隆知道宋太祖一直有想法要传位给晋王，所以不到德芳的家里，而亲自一人直接来到晋王家里。刚近晋王府，见医官程德玄坐在门口，问他为什么来，德玄说："昨夜二更时，有人到门口来叫我，说是晋王召。到门口一看，却不见人影。我恐晋王有病，所以就赶来了。"王继隆觉得很怪，就告诉他太祖已死。叫开门，两人一块见到了晋王。听到宋太祖死的消息，晋王大吃一惊，犹豫再三，不敢前去，说："让我和家人商量一下。"跑进内屋后久久不出来。继隆催促他说："时间太久了皇位要为他人抢走的。"于是与晋王雪地里步行至宫门。三人来到寝殿，宋皇后听说继隆回来了，问德芳来了没有，王继隆回答说："晋王至矣。"宋后见到晋王，愕然不知所措，连忙改口称"官家"，还说："我们母子的性命，全部托给官家了。"

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是研究宋代历史的一本重要著作，综合了上述这些书而录入，使得"烛影斧声"这个千古之谜更广泛地流传开来。

历代很多人认为宋太祖死得太突然了，而且与这些故事的主角宋太宗赵光义有关。宋太祖之死，是宋太宗下毒手的结果。不过宋太宗是怎样下毒手的，却有各种不同讲法。

有人认为是赵光义在酒中下了毒。《默记》卷上记载，宋太宗曾以牵机药赐死李煜。《烬余录》说，孟昶和钱俶也是被宋太宗毒死的。酒中下毒是太宗的惯用手法，宋太宗与医官程德玄的关系十分特别，可能是德玄用医术帮助了宋太宗登上皇位。

有人根据《烬余录》甲编的记载，认为宋太宗调戏花蕊夫人而被宋太祖发现，一时性起杀了太祖。该书说：宋太宗平日里在太祖面前多次称赞花蕊夫人费氏很有才能。几个月后，蜀主孟昶死。太祖很想看看费氏长得怎样，就马上召费氏入宫。由于费氏十分敏慧，宋太祖十分欢喜她，把她留在身边长达十年之久。这天晚上，太祖因病卧床。到了半夜，太宗叫他，见太祖不应，就乘机调戏费氏。太祖醒过来看到后，用玉斧砍赵光义，于是两人扭打起来。等到皇后和太子来时，太祖已经奄奄一息了。赵光义砍伤太祖，感到十分羞愧，慌慌张张地回到自己的府第。第二天早上，宋太祖崩。有关专家认为，太宗戏妃直接导致了“烛影斧声”的发生。宋太宗好色，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他曾经强抢过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霸占了李煜的后妃小周后，还掠夺北汉嫔妃。



宋太祖赵匡胤

有学者认为调戏花蕊是偶然事件，太宗要杀死太祖的真实原因是二人之间权力分配不均。赵匡胤只知道防范大臣，却放松了对弟弟的防范，致使他权力坐大，超过了皇族集团内部任何人，因此自然地引起赵光义早日登上龙位的欲望。二人在军事、迁都方面主张都不一样，矛盾激化的结果使赵光义最后决定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一般人认为是宋太宗杀了宋太祖，但也有不同的意见，认为宋太祖并非死于暗杀，他的死与太宗无关。明清时期已经有许多人提出了“斧声烛影”的事不可信，在抗日战争时期逝世的宋史专家张荫麟撰文，也说太祖不是死于暗杀。另有人认为宋太宗杀宋太祖事实上不太可能，《湘山野录》是一部笔记，出现已是在数十年之后，最多只能说宋初有这样的传闻。

日本有个学者叫荒木敏一，他认为赵匡胤很爱喝酒，可能是得了高血压

脑溢血之类的急病，抢救不及，才一命呜呼的。这个观点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认为宋太祖的确是喜欢饮酒，但事实上他早在建隆二年(961)，就对近臣说："沉湎于酒，何以为人？朕或因宴会至醉，经宿未尝不悔也。"他对饮酒早已有所节制，所以不可能死于饮酒过度。

另有学者发现赵宋宗室有家族病，主要是由躁狂忧郁症引起的暴亡、早亡、精神病，这些病都会遗传。赵氏家族第一代赵匡胤五人，善终者只有太宗一人，其余不是早亡就是暴卒。第二代太祖四子中，忧死和早亡各占一半，宋太宗九子，得尽天年的只有一人。赵氏一、二代共 28 人，其中夭死 4 人，一个年龄不详，余 23 人平均年龄只有 41 岁，比宋代上流社会平均 62 岁小得多。在《湘山野录》等书中，作者毫无暗示太祖死得不明不白，倒是后人在疑神疑鬼。而且当时夜宴在皇宫内进行，太祖召太宗进宫，太宗根本无法预作准备。宴会间左右不曾离人，太祖入睡时也无异状，又有侍寝守护，说是太宗谋害简直不可思议。赵匡胤的死因是遗传性家族病，是由于躁狂忧郁症愈后，又患了脑动脉破裂症，即通常说的脑溢血。史书中记载赵匡胤死前的许多情形，都是脑溢血的典型症状。

宋太祖死于非命，这是许多人都能够接受的，但到底是病死还是被杀死，目前仍然没有确凿无疑的证据可以使大家都加以信服。但就太宗在此后心安理得地登上帝位而不是让给太祖长子德昭，及此后将具有资格可能承袭皇位的皇族全部借故剪除来看，太祖之死应该与太宗有关。《湘山野录》上的记载多少有点吞吞吐吐，说明了早在宋代就有人开始疑神疑鬼了。自明代程敏政的《宋纪受终考》以来，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研究此事的文章层出不穷，认为这一事件纯属篡弑性质，似已作为定论。至于案情的某些细节，却因年代久远，证人证物早已灰飞烟灭，根本不可能再做出确切的判断，仍可称之为千古之谜。

雄心壮志　　金完颜亮惨死异地之谜

完颜亮有着"提马百万西湖上"的雄心壮志，一心想灭掉南宋。公元 1161 年他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但战事连连失利，完颜亮大失人心。随着金世宗的上台和完颜元宜的兵变，最后落得个惨死异地的下场。这是一

场不合时宜的战争，还是完颜亮咎由自取？

金朝第四个皇帝完颜亮是个十分有雄心壮志的皇帝。他曾经说自己有三大志向：其一是“国家大事皆自我出”，“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其二是“帅师伐国，执其君长问罪于前”，其三是“得天下绝色而妻之”。其中第二个志向主要是针对南宋王朝来说的。他有一首诗，是对这个志向的最好解释：“万里车书盍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他的脑中一直想把美丽的江南据为己有，把南宋王朝一举灭掉。

为了消灭南宋，完颜亮大力加强与南宋的外交，放出了一手接一手的和平烟幕。南宋使臣前来，他一次次做出友好的姿态，松懈南宋君臣的思想。当南宋使节贺允中出使汴京时，完颜亮下令五名原南宋降金汉官陪伴进酒，又“赐花招待”深表友好之意。南宋翰林学士周麟使金时，完颜亮赐给了他大量的东西，并说这些都是自己的意思，以前的皇帝从没有过。使节余唐弼回国时，完颜亮请他转送一根玉带给宋高宗，并说：这根玉带是当年被俘到北方的宋徽宗的，现在送给高宗，使高宗一看到玉带就像见到自己的父亲一样，“当不忘朕意也”。在金宋边境上，他下诏汝州附近 150 里的州县，“量遣商贾赴温汤置市”，设榷场互市，给人一种商贸熙熙攘攘的景象。

和平友好的背后，伐宋南征的准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他利用金人出使南宋的机会，夹杂画工奸细，秘密地把临安湖山城郭全部描下来，刺探南宋京城防守的军事情报。他派左丞相张浩修建汴京宫室，将宋朝原有的宫室台榭全部拆除，片瓦不留，然后全部重建。新建的宫殿，务极华丽，宫柱上装饰以黄金，再在上面设以五采，“金屑飞空如落雪”。为做好侵宋准备，他遣使分往上京及各路，凡年二十至五十的男丁，全部充军。他让工部尚书苏保衡在通州督造战船，又命诸路总管府造兵器，并将诸路旧存的兵器全部集中到中都。民间所有骡马也全部被调征用，各州所贮藏的粮米不得他用，随时准备供给大军。

正隆六年(1161)九月，按原计划金军南下侵宋。大军分成四路，完颜亮亲自率领三十二总管兵，进军寿春。十月，金军渡淮，攻占了海、和等州。这时的完颜亮趾高气扬，企望他的百万雄师，指日即可踏平南宋，到那时，他就可“一醉吴山顶上峰”。

不过海上攻临安的一路并不顺利，在密州胶西县被宋军打得大败。向

川陕进攻的一路，受到了宋四川宣抚使吴璘的痛击。由唐、邓南侵的金军因粮草被宋军烧毁，不得不改攻淮东。

完颜亮在和州赶造战船，筑台江上，准备渡江进攻采石镇。他身披金甲，召都督完颜昂及蒲卢浑说："舟楫已经准备得差不多，可以渡江发动攻击了。"蒲卢浑说："臣观宋朝的战船很大，我们的战船很小而且没有行进速度，恐怕不能渡江的。"完颜亮大怒说："你以前跟随了梁王人海追宋朝皇帝都是用的大船？明日你与完颜昂先渡江冲过去。"完颜昂听了十分害怕，打算逃走。到了晚上，完颜亮派人对完颜昂说："前言一时之怒，不须先渡江也。"之后完颜亮真的指挥金军渡江，受到宋军虞允文的迎击。金军大败，大部分士兵被杀死在江中。完颜亮被迫移军瓜洲，准备夺取对岸的镇江，但这时的金军中已人心动摇，普遍厌战。十月七日，东京辽阳府留守完颜雍拥兵自立，称帝于辽阳，是为金世宗。金世宗称帝不久，又尽率文武进军北京，途中发布新诏令，声讨完颜亮不体恤百姓。消息传来，金兵如潮水般退下战场，弃甲东归。完颜亮欲阻止金兵北退，疯狂地下令焚烧淮河上的桥梁，断绝士兵的归路，顿时引起士兵的哗变。十一月二十七日黎明，兵部尚书领神武军都总管完颜元宜率兵冲进完颜亮的行营所在地扬州瓜洲渡龟山寺，乱箭一阵猛射，再把其吊起处死。之后尸体用衣巾裹包后一把火"焚之"。就这样，完颜亮结束了他的统治，惨死异地，年仅四十岁。兵变过程中，尚书右丞李通等大臣也被杀。

行宜兵变成功后，行左领军副大都督事，令使者杀太子光英于南京。他以金大都督府的名义移牒南宋说："正隆失德，无名兴师，两国生灵，枉被涂炭。已从废殒，见议班师。各务散兵，以图旧好。"退兵三十里，派人到镇江议和，大军北还。

夺权后上台的金世宗对他的前任再踩上一脚，第二年将完颜亮降封为"海陵郡王"，而事实上完颜亮从未履迹过海陵。这还不够，在决定完颜亮的谥号时将他类比成隋炀帝，"谥曰炀"。1182 年，再度"诏降为海陵庶人"，发其尸骨于大房山金皇陵，迁埋于山陵西南四十里外的荒郊。就这样，完颜亮最后落得个凄凉的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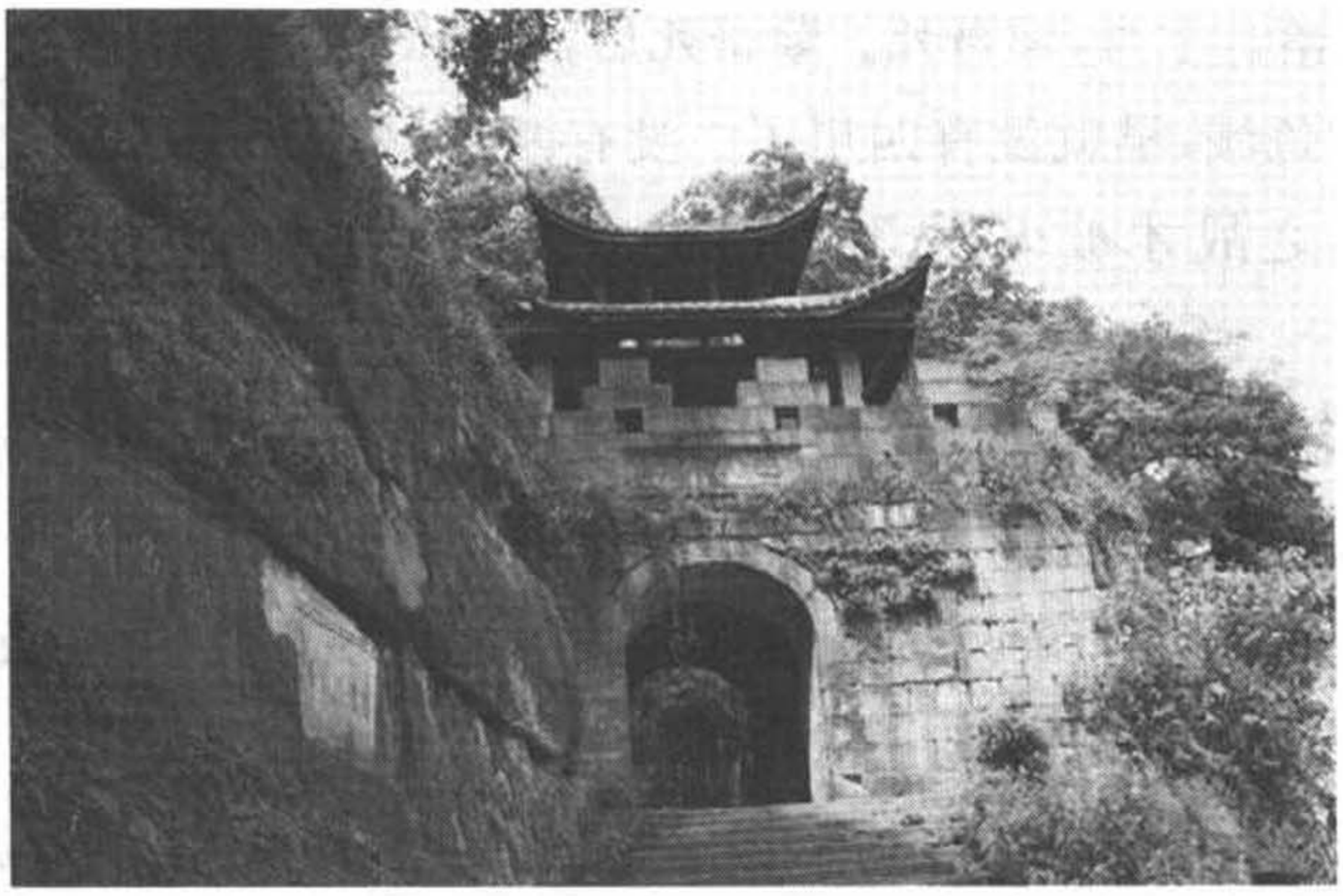
对完颜亮的惨死他乡，金人自不会有什么好的评价。金世宗时，有谁能揭露完颜亮几件坏事的，就可以升个好官，如此谁还会替他说几句真话？今天还有很多人认为完颜亮是发动了一场不合时宜的战争，南宋对金并没有

什么威胁，金熙宗以来两国关系朝着较平和的方向发展，而完颜亮不顾当时金弱宋强的客观条件，错误地作出了伐宋的决策，他的惨死是咎由自取。不过，也有人给以高度评价，认为完颜亮发动了一场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统一战争，只是客观条件不成熟，志大心切，混一天下的事业竟以失败而告终。

完颜亮的统一，不管其的动机是什么，但他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气度。他的死有点悲壮，也有点凄惨。

上帝折鞭处　　元宪宗死因之谜

公元1258年，蒙哥命忽必烈进兵鄂州，塔察儿进兵荆山，兀良哈台由交州、安南附近挥师北上，蒙哥则亲率四万大军进攻西蜀。在进攻合州钓鱼城的战役中，蒙哥大汗突然死去。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后人对蒙哥的死因众说纷纭：中箭说，中炮石说，中炮风说，淹死说，羞愧说，染疫说。究竟是哪一种？



钓鱼城位于合川市嘉陵江南岸钓鱼山上，1258年，蒙哥大汗亲率一路军马进犯四川，在钓鱼城主将王坚的顽强抗击下，却不能越雷池半步。7月，蒙哥被城上火炮击伤，后逝于温泉寺，蒙军被迫撤军北还

元宪宗蒙哥，以善战骁勇著名。1251年，在拔都的帮助下，蒙哥继承了大汗，结束了蒙古自贵由后三年无君的局面。上台不久，他让皇弟忽必烈总

军南侵。次年蒙古将汪德臣、火鲁赤率大军再次犯蜀，进逼嘉定，间断了六年之久的战火重新燃起。1258年，蒙古在远征云南、吐蕃、西南夷成功后，意欲亡宋。蒙哥命忽必烈进兵鄂州，塔察儿进兵荆山，兀良哈台由交州、安南附近挥师北上，蒙哥则亲率四万大军进攻西蜀。

蒙哥军渡嘉陵江至白水，进兵围长宁山，攻克了隆州、阆州。1259年初春，蒙古大军到达重庆的北边门户合州。

合州的州治在钓鱼城，四周峭壁悬崖，易守难攻，成为屏蔽重庆、支撑四川战局的主要据点。宋朝知州王坚在城内加强防御，组织百姓进行抗战。从二月至四月，蒙古军屡次展开猛攻，但宋军凭借钓鱼城的天险，从容防守。虽然蒙古军有精良的大炮、弓弩，但由于钓鱼城“石邑入云”，蒙军“炮矢不可及也，梯冲不可接也”。蒙古军虽有几次攻上城头，也被宋军击退。前后围攻五个多月，钓鱼城还在宋军手里。

六月，天气十分炎热，“山中从前无此热，早禾焦死晚禾枯”，蒙古军中开始流行疫病。由于蒙古军士马匹不耐其水土，军心涣散。汪德臣单骑进逼城下说降，城上飞石抛过来，差一点击中他，以致感疾，不久死于军中，蒙军士气十分低落。七月，蒙哥死。蒙哥死后，征蜀的蒙军陆续北撤。后人评价说：“没有钓鱼城，早就没有四川了。没有四川，早就没有江南，宋朝也不可能要到崖山之战才被灭亡。”当代的一些史书由此就称钓鱼城是“上帝折鞭处”。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后人十分搞不明白，蒙哥大汗为什么会死得如此突然？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后人就此开始进行研究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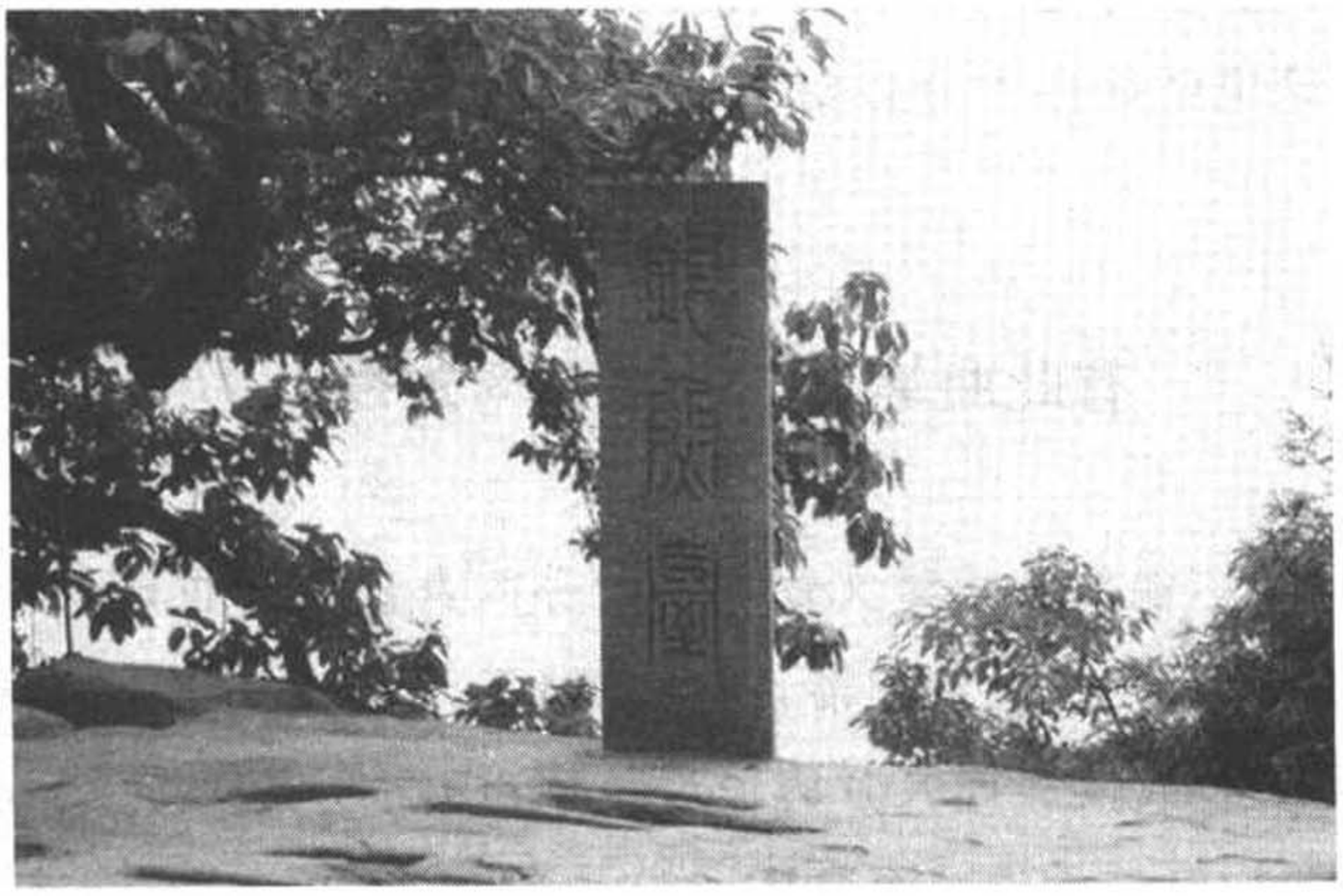
大体上说，对蒙哥的死因有这样几种看法：中箭说，中炮石说，中炮风说，淹死说，羞愧说，染疫说。

中箭说出现得较早。1264年出版的叙利亚人阿部耳法剌底的《世界史节本》认为，蒙哥是被宋军流矢射中而死的。守城的宋军见到蒙古一个大官出现，据高射冷箭，其中一箭射中蒙哥要害。现今保存在四川省合川市钓鱼山忠义祠内的明正德十二年(1517)的《新建二公祠堂记》碑，也说蒙哥是中飞矢死。这种说法为许多史学家采纳，如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在《中国史纲要》中也赞同这种说法。

中炮石说最早出现在明代的《重庆志》中，认为蒙哥是中炮石受伤而死。此后在一些当代的史书中采用了这种说法，认为蒙哥在先锋汪德臣死后，亲

率大军攻城，为炮石所伤，回营后因伤势过重死于军中。有人推测，今钓鱼城脑顶坪，就是当年蒙哥中炮石的地方。

中炮风说也是一种重要的说法。据无名氏的《钓鱼城记》说，蒙古军当时没有什么办法强攻取胜，但又不愿弃城撤军，只好加强对钓鱼城的封锁与监视，等待时机。有一天，蒙军在南城外筑高台，建楼桥，楼上还接了桅杆，修成一个瞭望台，想探知城中虚实，看看究竟有无水源。宋军不慌不忙，等那哨兵攀至桅杆末端，正要抬头张望时，突然发炮袭击，把哨兵抛至百步以外，当场毙命。在一旁督战的蒙哥汗“为炮风所震”，也生起病来。蒙军坚持不下去了，急忙将前军南调，围攻重庆。蒙哥感到自己急需“稍事调养”，行至金剑山温汤峡，便病重而死。据说蒙哥临死时有遗言：“我是因此城而病，我死后如攻克此城，一定要把城中男女杀光。”蒙古军最终没有打下钓鱼城，但在撤军途中，杀害了两万多老百姓，以泄愤恨。这种说法得到了明四川巡按谢士元《游钓鱼山诗序》、民国《合川县志》的支持，后代也有很多史书采纳这种说法。不过总体上看，这种说法与上面的中炮石说比较相近。



钓鱼城被欧洲人誉为“上帝折鞭处”

淹死说也是出现得较早的一种观点。1307 年，小阿美尼亚海屯口授的东方史《海屯纪年》认为，蒙哥在进攻宋军时，乘坐的战船被宋军潜水者凿穿，蒙哥因此被淹死。这种说法没有其他史料的支撑，因而后人很少采用。

羞愧说最早出现在南宋末年黄震的《古今纪要逸编》中。该书认为蒙哥是因屡攻钓鱼城不克，羞愤而死的。《钓鱼城记》也说，王坚为了刺激蒙古军，向城外抛扔了两条各重三十斤的大鱼和几百个蒸面饼，附上一封信，上

面写道:“尔北兵可烹鲜鱼、食饼,再攻十年,钓鱼城也不可能得到手。”蒙哥见到后,羞愧难当,一激动就发病而死。

染疫说是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认为早在钓鱼城之战刚开始阶段,蒙哥命纽璘赴涪州,切断由荆湖西上的南宋援军。纽璘所部因不适应四川气候而首先流行疫病,“士马不耐其水土,多病死,纽璘忧之”。进攻合州的蒙古军也为疫所困,史天泽部“军中大疫”,士兵一个个病倒死去,一度想班师退兵了。由于蒙古人从未预料会得疫疾,军中也没有准备什么防疫措施,但蒙古人知道喝一定数量的酒可以抵抗疫病,而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又有一定作用,所以蒙哥汗决定在部队中推广。《元史·月举连赤海牙传》云,月举连赤海牙随蒙哥汗攻合州,奉命修曲药。酒曲做出后,分发给士兵,“以疗师疾”。1307年,波斯政治家剌施特哀丁的《史集》第二卷记载,当时蒙哥也染上了疾病。他下令全军喝酒来对付疾病,自己也坚持饮酒,但不久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驾崩于军中。

蒙哥死后,蒙古军无法逗留,只得全军北撤,川中的形势顿时缓和了下来,可以这么说,蒙哥之死影响了宋蒙关系的历史进程,那么对于蒙哥汗死因的各种争论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有此曲笔　　明建文帝踪迹之谜

朱元璋死后,他的孙子建文帝以皇太孙的身份即帝位,而各位叔叔在内心并不敬服。建文帝进行的削藩,使他与诸王矛盾公开化。靖难之役,燕王攻克南京,建文帝战败。建文帝的最后下落,或说他自焚而死,或说他被杀,也有说他为僧后浪迹天涯。究竟哪一说为真?

朱元璋建立明朝,制定了一套嫡长子继承皇位、余子分封王爵的制度:“国家建储,礼以长嫡,天下之本在焉。”又说:“居长者必正储位,其诸子当以封王爵。”而且还规定:“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在《明史》中记载了明朝的制度:皇子封亲王,受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就授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为巩固朱姓天下,从洪武三年开始,朱元璋模仿汉高祖,大封诸子为

王。此后又屡有封建，将自己的儿子全部分封到各地为王，辽、宁、燕、谷、代、晋、秦、庆、肃等王是其中实力最强者，诸王成了皇权的重要支柱。

明太祖对自己死后的嗣位十分重视。洪武三十年(1397)，他生了大病，认为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就命足智多谋的李淑妃自尽，以防像唐朝一样出现“武后之祸”。太祖的长子朱标，为马皇后所生，洪武二十五年(1392)因病医治无效死了，再选一个继位者成了朱元璋十分紧迫的事情。朱标子朱允炆生下来时额颅稍偏，人虽聪颖，但仁柔少断，朱元璋觉得不是最适合。燕王朱棣智虑过人，性格像朱元璋，朱元璋十分钟爱他，一度想把皇位给他。朱标死时已有五个儿子，嫡子早殇，次子朱允炆也已长大，朱元璋要舍孙立子，不合自己制定的礼仪。于是他召开群臣大会，以欲立燕王棣之意询问诸臣，学士刘三吾当场反对：“皇孙年富，且系嫡出，孙承嫡统，是古今的通礼。若立燕王，那么秦王、晋王该怎么办?”这样朱允炆就成了皇位的继承人。



南京明故宫遗址

各地分封的藩王，都恃叔父的尊严，看不起侄儿朱允炆，只是因父皇还活着，大家隐忍不发罢了。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死，在遗嘱中他称赞皇孙朱允炆人很聪明，讲究孝道，希望各位大臣尽心辅助，各地诸王驻守原地，不用赴京奔丧。几天后朱允炆即位，称明惠帝，改元建文，所以又叫建文帝。建文帝明白各地藩王实力强大，战功卓著，就以太祖遗诏为由，禁止各位王叔入京。燕王朱棣人已到淮安，只能调头回到北京，内心充满着怨恨。

建文帝上台后，对王叔们不把他放在眼里十分忌恨。特别是力量最强

大的朱棣，入朝见他时竟然立而不拜，令他十分恼火，遂着手作削藩的准备。他先是将周王贬为平民，后接连治代王、岷王、湘王、齐王等罪。接着在自己当年的伴读老师黄子澄等人的谋划下派人到北京去，控制燕地兵权，监督燕王行动。建文元年(1399)七月，建文帝走出了最为冒险的一着，他命北平左布政使张昺等发兵逮捕燕王，但早有准备的燕王把张昺等全部擒杀，以清君侧为名，打着靖难的旗帜，废除建文帝的年号，续称洪武三十二年，正式开始了靖难之役。

靖难之役共历时四年，至建文四年(1402)六月，朱棣兵临南京城下，守卫京城的大将李景隆开门投降，朱棣带兵入城，在任官员四处逃窜。气急败坏的建文帝下令放火烧宫，当燕王来到皇宫时，宫中已是一片火海，建文帝不知去向，所使用的宝玺也随他一起消失。建文帝哪里去了？

正史记载建文帝在宫中自焚而死。当燕王到来时，建文帝自知大势无可挽回，遂纵火自杀。《太宗实录》说，朱棣兵攻至南京城下，文武百官诸王无计可施只能前来见皇帝，建文帝想出去迎接，想不到左右的人已全部散尽，仅有内侍太监数人而已。建文叹曰："我何面目见耶。"就关了门自焚而死。朱棣上台后，在给朝鲜国王的诏书中就谈到："不期建文为权奸逼胁，阖宫自焚。"但建文是否真死于自焚，很多人表示出怀疑。因为事后朱棣命太监在火烧后的余烬中反复搜检，发现了皇后和太子朱文奎的遗骸，却就是不见建文帝。《太宗实录》说朱棣是找到了建文帝，并令以皇帝规格举行葬礼，但明清两代从未有人提到在南京附近有建文帝的陵园。《春明梦余录》谈到明末有人请崇祯帝将建文列入祀典，崇祯叹道："建文无陵，从何处祭？"上世纪三十年代，明清史专家孟森就认为虽然《明实录》载建文帝在宫中起大火时烧死，但明代就无人相信。清朝修《明史》说"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这是因为康熙时朱三太子案搅得人心惶惶，因而"故有此曲笔耳"。

没有被火烧死，建文帝哪里去了？孟森认为在宫中火起之前，建文帝逃出去了。《明史·姚广孝传》谈到永乐十六年(1418)，八十四岁的姚广孝不能入朝，成祖到庆寿寺去看望，问姚有什么事要他办。姚什么也没说，惟独说起僧人溥洽被关了很长时间，希望皇帝赦免他。溥洽是建文帝的主录僧，有人说他知道建文帝的去向，明成祖以其他事情的借口将他关了起来。如果成祖找到了建文帝的尸体，何必还要将溥洽关起来而追寻建文帝的踪迹？《明史》中还说成祖怀疑建文帝出走，所以派了胡濙到天下各地去寻找，还派

郑和下西洋，如果成祖有建文帝的下落，何必还要遍访十余年？

此后有人指出，嘉靖年间郑晓的《建文逊国记》，是明确说建文帝逃出金陵城的第一部书。

照上面的说法，建文帝可能是逃出去了。逃出后的建文帝在干什么？

有人认为他是做和尚去了。《明史·程济传》说："金川门启，济亡去。或曰帝也为僧出亡，济从之，莫之所终。"南京城攻破而程济失踪了，所以人们怀疑他与建文帝一起做和尚了。《明朝小史》对建文帝的去向说得活龙活现：太祖病重时，给了建文帝一个密封的小匣子，让他只有到了危难时才可开启。到靖难兵入城时，建文帝想起了小匣子，把它打开，原来是和尚的一份度牒。于是削发披缁，从地道中逃出。有人认为建文帝城破前与杨应能、叶希贤一起削发为僧，法名"应文"。明成祖曾向天下寺院颁布了《僧道度牒疏》，将所有僧人重新造册登记，对僧人进行过总调查，目的是为了寻找出建文帝。从永乐五年(1407)起，他还派胡濙以寻仙人张邋遢为名四处出巡，一找就近二十年。有人指出，朱棣死后，建文帝才回到北京，迎入西内，死后葬在西山。更有人声称在西山找到了建文帝的墓地。

当了和尚的建文帝到过些什么地方？许多人认为建文帝以僧人的身份浪迹天涯，足迹遍及江苏、浙江、四川、贵州、云南以及缅甸等地。有人指出建文帝曾到重庆三次，住在大竹山善庆里。有人主张，建文帝出亡在近不在远，不是在云、贵、川、粤，而是在吴县的穹隆山皇驾庵，永乐二十一年殁亡，葬于皇驾庵后的山坡上。有人认为徐霞客在贵州广顺东南的白云山间，看到建文手植的巨杉二株，树西半里的古寺，是建文所立。也有人认为建文帝是以滇为家，在最初三十多年中，以躲避朝廷追缉，他行踪不定。《神宗万历实录》记载万历二年，首辅张居正曾说："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帝当靖难师入城，即剃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至正统间，忽云游至云南，邮壁上题诗一首。"明代人就认为他主要在云南活动。《明史》也说："或云帝由地道出亡。正统五年，有僧自云南至广西，诡称建文皇帝。"明清以来流传的许多地方文献，都可说明建文帝曾在滇中、滇西留下了足迹。有人认为建文帝到南洋去了。成祖找不到建文帝，始终有一块心病，他害怕建文帝没有死，会召集人马用朝廷的名义来讨伐他，于是派出郑和下西洋，一方面

当然是为了宣扬国威，另一方面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在随郑和下西洋的人中，有的竟然是锦衣卫的人员，他们主要任务是针对建文帝的。

郑和下西洋是为了找建文帝的说法，为很多人反对。有人指出，燕王朱棣攻下国都南京，火烧皇宫，但没有找到其侄建文帝的遗体。朱棣虽马上自号永乐帝，但对于此事及建文帝遗臣逃散各地，可能仍有挂怀。明朝历史文献里，留有一些建文帝可能没有被烧死而逃亡海外之传言，甚至有说出家二十年后返北京之故事。所以，人们认为永乐帝派郑和下西洋主因之一为追寻建文帝。此种说法不可能成立，因为郑和每次出使海外都是那么浩浩荡荡，建文帝若亡命海外，当闻风而躲藏起来，大规模下西洋寻建文帝绝非有效之方法。目前，绝大多数学者已不相信此说。但历史小说常常为了戏剧化的效果，还在强调这种可能。

文帝出逃做和尚的说法为许多人津津乐道，但也有学者发表了不同的声音，他们认为为僧之说不足信，因为当时京师内宫并无秘密地道或御沟通往城外，所谓剃发为僧、云游四方，都是民间传说而已，是无稽之谈。这大概是明成祖明白自己是抢夺帝位的，“欲曲讳其自弒恶名，故反隐播此说”，这样做想说明他还没有致建文于死地，而后来的文人不明其理，“缘饰其间，遂成千古疑案”。也有人认为建文帝既非自焚，也非出亡，而是被成祖所杀而灭迹。

建文帝究竟哪里去了？如果说建文帝是自焚死了，的确是无法解释史书中的种种矛盾；如果说建文帝是出逃为僧了，但大多是笔记小说所记和民间传说，确凿有力的证据还十分缺乏。郑和下西洋是否全是为了建文帝，应该是很难说。至少这个谜案在目前是不易解决的。

受了刺激　　清顺治帝失踪之谜

顺治皇帝有三位皇后，一废一疏一爱，最宠爱的是董鄂妃。因董鄂妃不是出身于蒙古族，孝庄皇太后并不满意。董鄂妃生的皇子，顺治当作心肝，但没过几月就夭折了。董鄂妃死后，顺治万念俱灰，一直有出家的念头。不久，他就神秘地从宫中消失了，于是众说纷纭。



清顺治皇帝住在养心殿并卒于此

世祖出家被列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是说顺治帝因爱妃董鄂妃之死，悲恸万分，痛苦异常，最后竟看破红尘，跑到五台山清凉寺当了和尚。这一说法流传得十分广泛，后代还据此派生出康熙皇帝五台山认父的故事。那么，历史上的清世祖真的出家当和尚了？要讲清这个问题，还得从他的几个皇后谈起。

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六岁登基，只活了二十四岁，他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福临共有三个皇后，十四个具有名位的嫔妃。当他十一岁时，摄政王多尔衮派亲王阿济格到蒙古为他选聘皇后。满蒙联姻是清初政坛上的一件大事，只有联姻北方才会安定，皇太极有封号的后妃，几乎全是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的女子。多尔衮为顺治选的新娘是孝庄太后哥哥吴克善的女儿，孝庄太后自然是十分赞成。顺治八年(1651)，册立为皇后，举行大婚姻礼。然而顺治并不满意皇后，婚后两人关系不和，长期分居，并未生下一子半女。顺治十年，皇帝下令废后。当时多尔衮已死，皇帝也已长大，孝庄见两人难以和好，遂默许皇帝另择皇后。顺治十一年(1654)，蒙古科尔沁贝勒绰尔济的两个女儿被接进宫中，一个月后，姐姐被册封为后，即孝惠章皇后，妹妹封淑惠妃。这个皇后十分淳朴，又没有什么特长，所以顺治对她横竖不顺眼，态度冷淡，皇后和淑惠妃都终身无子。这时，顺治看上了另一个女子，她就是董鄂氏。

董鄂氏是满洲正白旗人，内大臣鄂硕之女。十五岁那年应选秀女，因她聪明漂亮，知书达理，被顺治同父异母弟襄亲王看中，成为他的妃子。当时的贵族命妇要轮流到宫中侍候皇帝的后妃，这样董鄂妃就有机会接触到顺治，二人彼此萌生出感情。襄亲王知道后，大骂了董鄂妃一顿。此事被顺治听说，竟然打了襄亲王一记耳光。老婆跟别人私通，还要遭打，襄亲王受不下这口气，怨愤致死。顺治乘机将董鄂妃收到宫中，册立为贤妃。

孝庄太后在选择皇后问题上与顺治早有矛盾，她希望顺治在蒙古部落中挑选后妃，但现在董鄂妃的出现，使得蒙古的后妃均受冷落，孝庄的忌恨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孝庄发现了顺治与董鄂妃之间的感情后下令停止命妇入宫，但为时已晚。顺治十三年(1656)底，顺治正式册封董鄂妃为贵妃，并照册立皇后的仪式颁诏天下。次年十月，董鄂妃生下皇四子，第二天顺治宣称皇子是“朕第一子”，弄得宫内宫外都猜测这位新生儿一定是将来的皇太子。孝庄太后忍无可忍，要设计构害董鄂妃。冬天来临，孝庄太后忽称身体不适，住到京郊南苑，谕旨后妃及百官视疾问安。谕令传到董鄂妃所在的承乾宫，她不得不冒着寒冬从京城赶到二十里外的南苑，向太后问安，并朝夕侍奉，很快形销骨立。更为想不到的是，三个多月后，皇四子夭折，董鄂妃一下子受到了打击，此后在忧伤中苦度三年，病逝于承乾宫，年仅二十二岁。

董鄂妃死后，顺治帝悲痛万分，大办丧事，追封她为孝献皇后。半年后，顺治帝也从清宫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了。那么，顺治帝到哪里去了？

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对顺治帝的失踪有许多说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一为出家说；二为生天花而死说；三为出家不成生天花而死说。

出家说认为顺治帝在董鄂妃死后精神受到极大刺激，看破红尘，于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抛弃帝位，躲到山西五台山，削发为僧去了。这种说法在一些野史、文学作品中特别流行。他们认为清初著名文人吴梅村的《清凉山赞佛诗》是为顺治帝五台山进香所作；康熙帝曾四次巡幸五台山，前三次是为了看望顺治，第四次去时顺治帝已逝世，康熙吟诗哀悼，诗中悲痛之情十分动人。顺治帝一向喜佛，宫中有木陈忞、玉林琇两位禅师天天与他谈佛。他曾对木陈忞说：“愿老和尚不要将我看成天子，而把我当作走到你庵中的一个弟子。”他还表示：“人的一辈子最放不下的是财宝和妻、子。我对财宝无所谓，妻、子也是像风云聚散，没什么大的关系。如果不是还挂念着皇太后，就随老和尚出家去了。”顺治帝从宫中失踪的前几天，还叫最信任的太监

吴良辅到悯忠寺削发做和尚。如此，在爱子宠妃先后去世的情况下皈依空门，是相当有可能的。



顺治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

另一种说法是顺治帝生天花而病死在宫中。清朝入关时，天花流行，疫病泛滥，人们并没有很好的办法来对付这种传染病。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二日，京城沉浸在春节的欢庆气氛中，这天顺治帝前往悯忠寺观看他的亲信太监吴良辅削发出家仪式。下午回宫后，顺治帝觉得十分烦躁，伴有高烧，遂卧病在床，实际上已感染了天花病毒。宫女、太监们奉命撤去刚刚挂上的门神、对联、彩灯、彩带。正月初四日，朝廷正式向文武大臣宣布皇帝患了天花病，并“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外界官民始知顺治帝得了天花。初六日，顺治帝感到自己活不长了，“患痘势将不起”，急命太监传谕大学士麻勒吉、学士王熙速到养心殿记录遗嘱。王熙等垂泪从命，在床前草就遗诏第一段，见顺治已累得疲惫不堪，奏请皇帝暂歇，待他们拟就之后，再请皇帝御览。二人赶紧到乾清宫西朝房连夜起草遗诏，然后又赶到养心殿呈皇帝过目。顺治帝勉强挣扎着将遗诏修改了三遍，直到次日才定稿。初七日，病情更重。傍晚，下诏释刑狱。半夜里，“圣驾宾天”，二十四岁的顺治帝崩逝于养心殿。天花夺去了一位正值春秋鼎盛年的皇帝的性命。这种观点认为由于顺治帝年纪很轻，且得天花后发病极快，仅病五天就不治身亡，

所以在民间出现了种种谣言和猜疑，甚至故意渲染他平时的好佛，把他说成到五台山“出家”了。

第三种看法实际上是对上述两种观点的折衷。即既承认顺治帝好佛，也承认顺治帝得了天花去世，但认为他没有出家。1657 年，年仅二十岁的顺治结识了当时的一个高僧憨璞聪，原本就十分笃信佛教的他更加热衷佛事。此后，他又先后结识了木陈忞、玉林琇、茆溪森等高僧，与他们过从甚密，对佛教达到了痴迷的程度，频频召他们进宫讲经说法，而且亲执弟子之礼，还让玉林琇给他起了个法号“行痴”。董鄂妃死，他的感情受到了极大创伤，于是整天沉迷于佛法之中，除召见茆溪森等和尚外，并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 38 次造访他们，时常作彻夜长谈，昏昏欲睡。后来他决意隐遁佛门，摆脱尘世中的烦恼，终于在顺治十七年(1660)的九月底，坚请茆溪森为自己举行净发仪式，准备到五台山当和尚。但这激起了整个朝廷的恐慌，孝庄皇太后为首的诸王贝勒们慌乱不堪，急忙设法阻止。

这时吴兴报恩寺的主持玉林琇接到朝廷诏书，说皇帝出外骑马受到惊吓，让他前来证道。他到了北京，听说自己的弟子茆溪森为皇帝进行了剃度，勃然大怒，在宫外某寺架起柴堆，下令捆缚茆溪森，打算当场用火烧死。顺治见状无奈，只得向玉林琇表示自己愿意重新留发，不再出家了。

痛失爱妃，想出家又不成，顺治整日郁郁寡欢，本来身体已十分虚弱的他再也支撑不住了。不久他又染上天花，在短短的几天中离开了人间。

这第三种说法，应该是综合了上面两种说法的，是否历史真实，尚有怀疑的余地。

顺治帝的死因，的确有点说不清道不明。

谣言四起　　清雍正帝暴死之谜

清世宗雍正即位才十三年就突然去世，使当时人很感意外，他的死因也从此留下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是寿终正寝还是遇刺毙命、抑或是服丹中毒而亡，多种说法交织在一起，似乎都有可信的地方，但又都是在演义戏说。



清世宗雍正

雍正皇帝在与诸兄弟的激烈竞争中夺得皇位，当政十三年，整顿朝政，严肃吏治，对康乾盛世的形成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关于雍正皇帝的死，清宫档案《雍正朝起居注册》是这样记载了他死前几天的情况：雍正十三年(1735)的八月，雍正皇帝住在圆明园，十八日与办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大臣议事，二十日召见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二十一日仍照常办公，说明这时他的身体还挺好。这天虽身体偶感不适，但未曾重视。二十二日深夜，病情突然加剧。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和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应召入寝宫安排后事。二十三日凌晨，雍正帝去世，年仅五十八岁。在一片哭声中，总管太监捧出黄封一函，内藏硃笔亲书传位给弘历诏，并令庄亲王、果亲王等辅政。由于年龄不大，死得很突然，雍正帝到底是怎样死的就始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当时的京师谣言四起，猜测纷纷，后来的谈论者也就各说各的，雍正帝的暴死就始终成了一个谜团，成为清初的一大疑案。

一种说法，雍正是正常病死。清朝的官方史籍，如《起居注册》及雍、乾两朝《实录》大致上都是这种看法。从八月二十一日“不豫”到二十三日子时的“龙驭上宾”，首尾只有三天，二十一日仍处理政务如常，二十二日白天病情加剧，皇子和亲王都来到雍正的床前。到了这天晚上，“上疾大渐”，让诸王、内大臣和大学士接受遗诏，几个小时后就死了。《清宫秘谭》认为，雍正死前，曾嘱咐有两件古玩要放到梓宫内，现在是遵旨放讫，如果不是正常病死，宫中如何在慌乱中会记得这些小事呢？也有人认为，从雍正所得的疾病来看，应当是一种急病，推测是中风。

第二种说法是雍正遇刺而死。这种说法在一些稗官野史，如《满清外史》、《清宫遗闻》、《清宫十三朝》、《清代述闻》、《清代异闻》等书中十分流行。雍正六年，湖南人曾静遣其徒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其反清，结果策反不成反被捉拿。一审讯，曾静说他是受了清初吕留良著作和思想的影响而决定反清的，雍正遂下令掘吕留良及其子吕葆中之墓，戮尸示众，吕留良另一子吕毅中斩首，其子孙们发往东北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传说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女儿，也有说是吕葆中的女儿即吕留良的孙女。案发时，吕四娘携母亲及一仆人逃出，幸免于难。为了替父祖报仇，她拜世外高僧甘凤池为师，苦练武艺，终于掌握了许多过硬本领。这年，她寻机潜入宫中，以宫女身份侍寝，伺机行刺，以飞刀砍去了雍正帝的脑袋，为父祖报仇雪恨。

这种观点很多人并不相信，他们认为发往宁古塔为奴的吕家成员，在雍正、乾隆时都是受到了严格管制的。乾隆时，他们中有的开面馆，有的开药店，还有的行医，甚至还有人成为捐监生。清政府发现后，把他们重又发配到黑龙江去，后移居齐齐哈尔，隶于水师营。吕四娘也不可能逃出，当时办理此案的浙江总督李卫以擅长缉捕闻名，他是绝对不会坐视吕氏人员逃逸的。李卫曾对雍正说：吕氏一门，不论男女老少俱已严禁，就连留良父子的茔地也早遣人监视。至于说吕四娘混入宫中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圆明园虽属离宫，但设有护军营，昼夜巡逻，戒备森严，绝非像稗官描写的那样一个女子就能飞墙走壁，轻易潜入寝宫，砍去皇帝脑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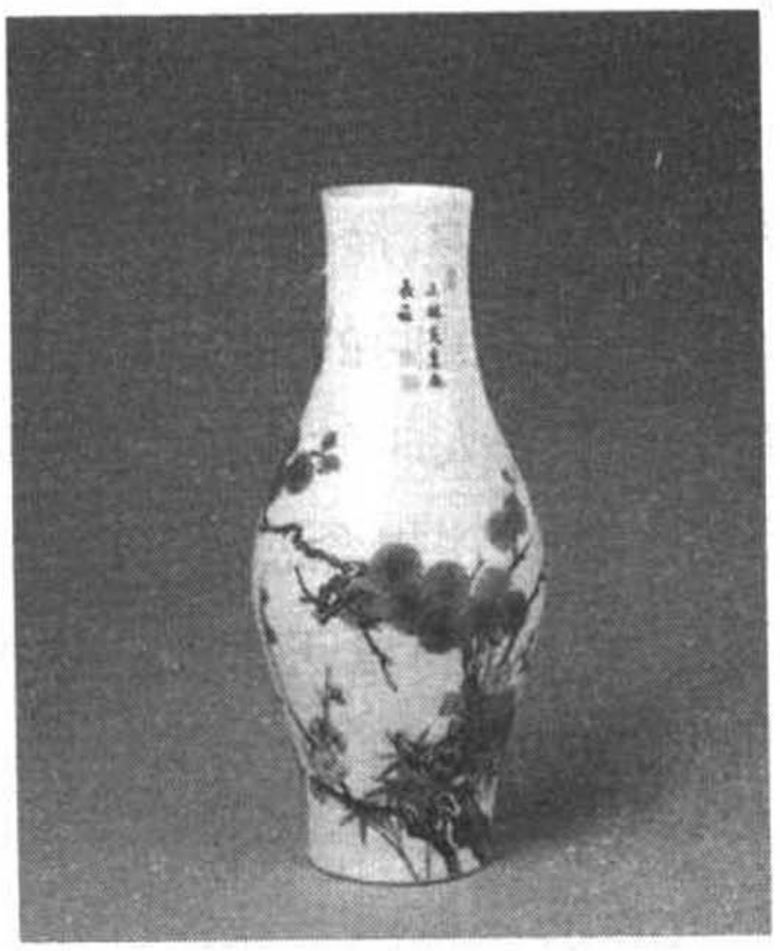
雍正死后，葬在清西陵泰陵，这是泰陵隆恩殿

第三种说法是雍正很有可能服用了丹药中毒死亡。雍正生前喜欢道教神仙，结交的都是剑客力士。在他的文集中，崇颂神仙、丹药的诗句有许多。道士娄近垣因特别会炼丹曾被召入宫内，在得到了大笔赏金后回江西龙虎山扩建道院、购置香田、招选道众。雍正在位第七年时得了一场重病，此病两年后还未根除，经常寒热不定，饮食失常，睡眠不安。虽有太医们日夜诊治，但仍未见好转。他要心腹大臣们替他在各地找名医进京，李卫推荐了河南道士贾士芳。贾士芳的治病是诵经念咒加按摩，起初很有效，但不久雍正便将他杀了，认为贾氏是妖人左道。经此一场大病，雍正觉得自己身体很虚，要补元气，遂召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到圆明园炼丹。

一些人指出雍正登上皇帝宝座之后，曾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把他封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并敕命在张伯端的故里建造道观以做崇祀。据《紫阳道观碑文》记载，雍正特别赞赏张伯端“发明金丹之要”。至迟从雍正四年(1726)开始，雍正皇帝就经常吃一种叫“既济丹”的丹药。他感觉服后有效，还作为特殊礼品赏赐给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河东总督田文镜等一些宠臣。在田文镜的一件奏折上，雍正用朱砂笔写道：“此丹修合精工，奏效殊异，放胆服之，莫稍怀疑，乃有益无损良药也。朕知之最确。”雍正劝自己的宠臣，对御赐丹药放开胆子吃，丝毫不用怀疑，因为他对这种丹药“知之最确”。这表明雍正很注意研究丹药的药性，并且对他所服用的丹药已是确信不疑了。需要说明的是，雍正这时吃的“既济丹”，当是方家术士们在外炼制的，清朝皇宫在这一时期还没有直接的炼丹活动。



雍正粉彩八桃天球瓶



雍正珐琅彩松竹梅图橄榄瓶

雍正八年(1730)的春天,雍正皇帝闹了一场大病。为了治病,雍正命令内外百官大规模访求名医和精于修炼的术士。为此,他给河东总督田文镜、浙江总督李卫、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川陕总督查郎阿、山西巡抚石麟、福建巡抚赵国麟等一大批地方高级官员,分别发去文字完全相同的手谕。手书朱谕的内容是这样的:“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速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朕再传谕该督抚访查,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可留神博问广访,以符朕意。缜密为之!”雍正的这道密谕,中心意思是,让封疆大吏们代皇上寻找会修养的道家术士。他嘱咐官员们,此事属于绝密,千万缜密为之。这道非同一般的密谕,雍正在当时总共写了多少份发给多少人,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今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九份,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着六份。这十五份朱谕,每份内容都完全一样,一字不差。

雍正死后,皇位传给乾隆,按理,新皇帝刚即位,诸事千头万绪,但在雍正死后的第三天,乾隆却下令将道士张太虚、王定乾驱逐出宫,的确耐人寻味。在诏书中,乾隆说道士们“平时不安本分,狂妄乖张,惑世欺民,违犯法纪”,如果此后乱讲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一定要“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乾隆皇帝没有直接承认其父是吃了丹药而死的,也不便马上将道士处死,但他对道士的憎恨说明雍正的死因必定与丹药有关。据此,一些人认为雍正之死是服饵丹药中毒而亡。官方史书虽然为他尽量回护、掩饰,但依然留下了不少蛛丝马迹。

还有一种民间的说法认为是吃了毒药而死的。据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有个恋人叫竺香玉,是林黛玉的化身。这竺香玉后来被雍正强占,成为皇后。曹雪芹想念恋人,便想方设法找了一个差事混入宫中,最终与竺香玉合谋,用毒药将雍正害死。这种说法可能是民间演义而已。

另有野史传闻,说是一个宫女与太监串通一气,用绳子把雍正勒死了。柴萼《梵天庐丛录》记载说,雍正九年,一位宫女伙同太监吴首义、霍成,等到雍正帝睡熟后,用绳子把他缢杀。将要没气时,又把他救活了。看到这则传闻,我们似乎特别的眼熟,原来发生在明世宗嘉靖皇帝头上也有一次宫女缢

杀皇帝的故事，两位庙号都是“世宗”，会不会是同一件事？

雍正帝的死因，扑朔迷离，传说很多。他的死，为史学工作者留下了一个又一个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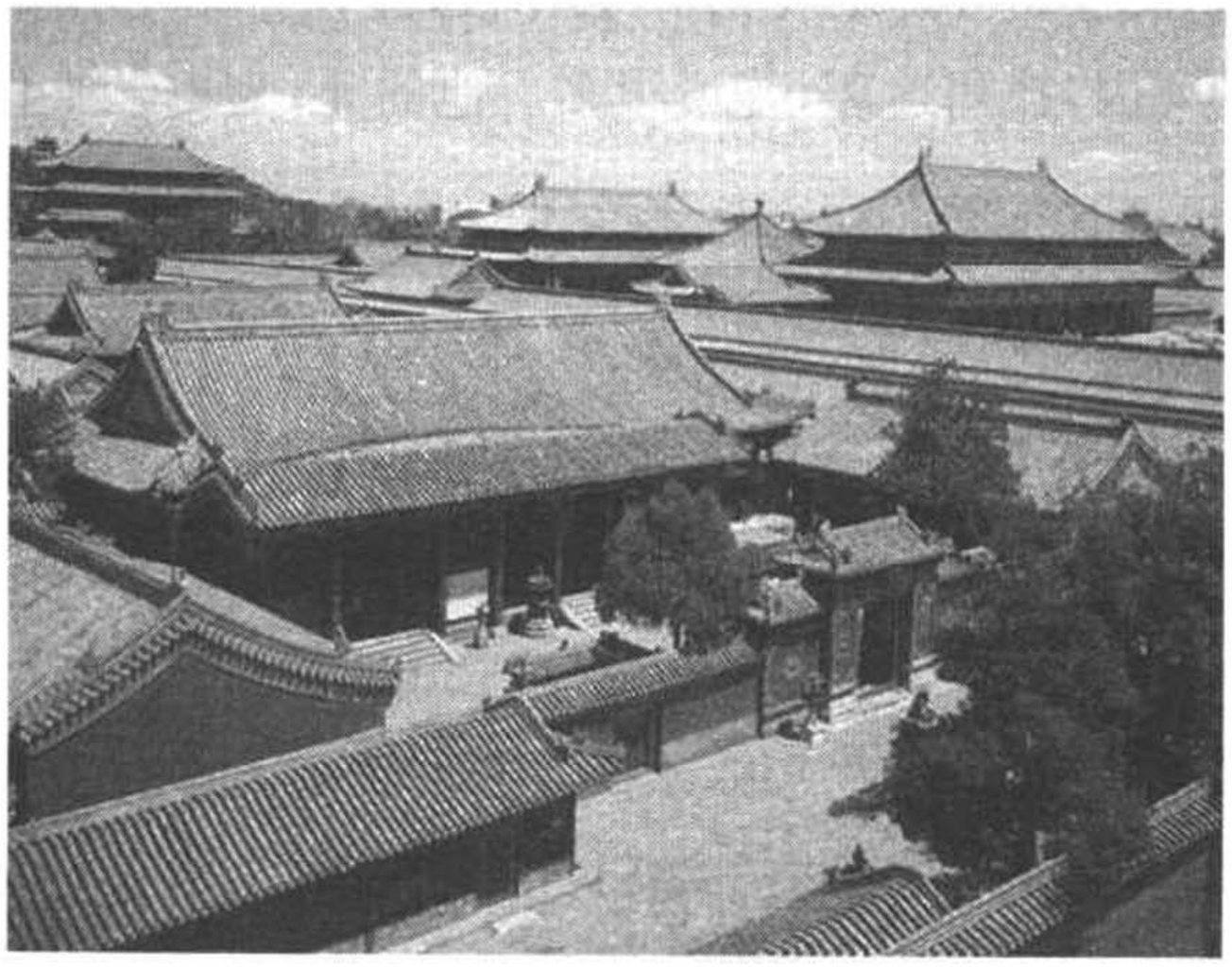
纵情享受　　清同治帝死因之谜

同治是清朝入关后的第八位皇帝，即位时才六岁，而死的那年仅十九岁。这样的一个小皇帝，他是怎么死的？有人说他是嫖妓后得了风流病梅毒而不治身亡；有人认为他是得了清朝人最感到可怕的天花，当时的医学根本治不了这种病；也有人认为他是被慈禧太后害死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同治皇帝，慈禧太后的儿子，1874 年 12 月驾崩，年仅十九岁，即位前后不满十三年。同治死因各书记述不同，一说是得了性病，一说是疥疮，一说是天花，更有说是死于慈禧之手。

同治得性病说，在同治死后流传颇广，《清朝野史大观》叙述得十分详细。书中说同治帝十分敬爱端庄贞静的阿鲁特皇后，但慈禧太后淫威滥施，同治帝和皇后不能款洽相亲。慈禧特别喜欢侍郎凤秀的女儿，想册立她为皇后。凤秀的女儿人长得很漂亮，但举止特别轻佻，同治帝并不喜欢。慈禧强迫同治帝去爱不想爱的凤秀女儿（后被立为慧妃），遂尽失情爱之乐，于是微服出外纵情淫乐，寻花问柳。北京崇文门外的著名妓院中，清朝的官员是常客，同治生怕被臣下撞见，不敢去，只带了一二个小太监在内城与私窑子中卖淫的女子取乐。当时还有太监在东华门内开烟馆，藏垢纳污，导男引女，供其取乐。侍读王庆祺又进春药，同治纵情享受。一些野史记载：“伶人小六如、春眉，娼小凤辈，皆邀幸。”还宠幸太监杜之锡及其姐姐：“有奄杜之锡者，状若少女，帝幸之。之锡有姐，固金鱼池娼也。更引帝与之狎。由是溺于色，渐致忘返。”

同治长期与伶人、娼妓接触，时间一长，就感染了梅毒。开始同治帝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但后来病症发到了脸上，继而发到背部。召太医来诊治，太医一看，大惊失色，知道这是淫乱所致，但又不敢说出来，反而去请示慈



同治皇帝病重后，就一直住在养心殿

禧，询问是什么疾病。慈禧下旨道："恐怕是属于天花。"太医就拿治痘症的药来医治，自然这样的药是不见任何效果的。同治帝得病后内心十分急躁，厉声大骂御医："我得的不是天花病，为什么要当作天花来治疗？"太医奏道："这是太后的旨意呀！"同治帝这才不说话，而内心咬牙切齿地发恨。临死前的几天，同治帝的头发全部脱落，下阴部溃烂，发出极其难闻的臭味，据说溃烂处有洞，能看得见腰肾。该书作者悲叹道："可叹，自古中国之帝王因酒色而致夭亡者不知凡几，然未有死于淫创者，只有法国弗朗西斯一世也患淫创而死，可谓无独有偶矣！"

给同治看病的御医李德立的曾孙李镇曾回忆他的曾祖刚到养心殿切脉，就看出同治得的是梅毒。为了慎重起见，李德立另约了外科御医张本仁会诊，一致肯定是杨梅疮。当时李德立考虑慈禧也略懂医学，如果对她说明病情，她若发怒，指责同治有辱九五皇位的尊严，必定会下令杀了皇帝，所以他们就装作糊涂。当时宫里流传同治得的是天花，他们就按照天花来治。为了不引起外人的怀疑，他们用的都是"益阴清解饮"、"益肾清毒饮"之类的滋阴化毒类药物。如果按照梅毒来治，用剂加重，慈禧必定会出面干预的。现在见到了治疗同治的档案，都是天花病和脉案和处方，原因也就在此。

也有人认为当时的御医误将梅毒当作天花治，结果用药不当。有一个叫唐鲁孙的人抗日战争时期在北京居住，结识了一位清朝的太医张午桥。此人是光绪朝的太医院院判，曾为同治治过病。张太医说，同治病时，许多

太医都只说是天花，只有他所开的药方断定为梅毒。等到同治死后，慈禧太后才知道其他的太医都看不出真正的病因，只有张某的诊断是正确的，因此屡加升擢。

一些专家认为，清朝官方修的史书和一些官员的笔记日记中，无不称同治死于天花，其原因是他们为了皇帝的颜面，不得不对皇帝的死做出合理的交待。如果说当时把梅毒当作天花治，最后皇帝也送命了，这样的消息传到外界，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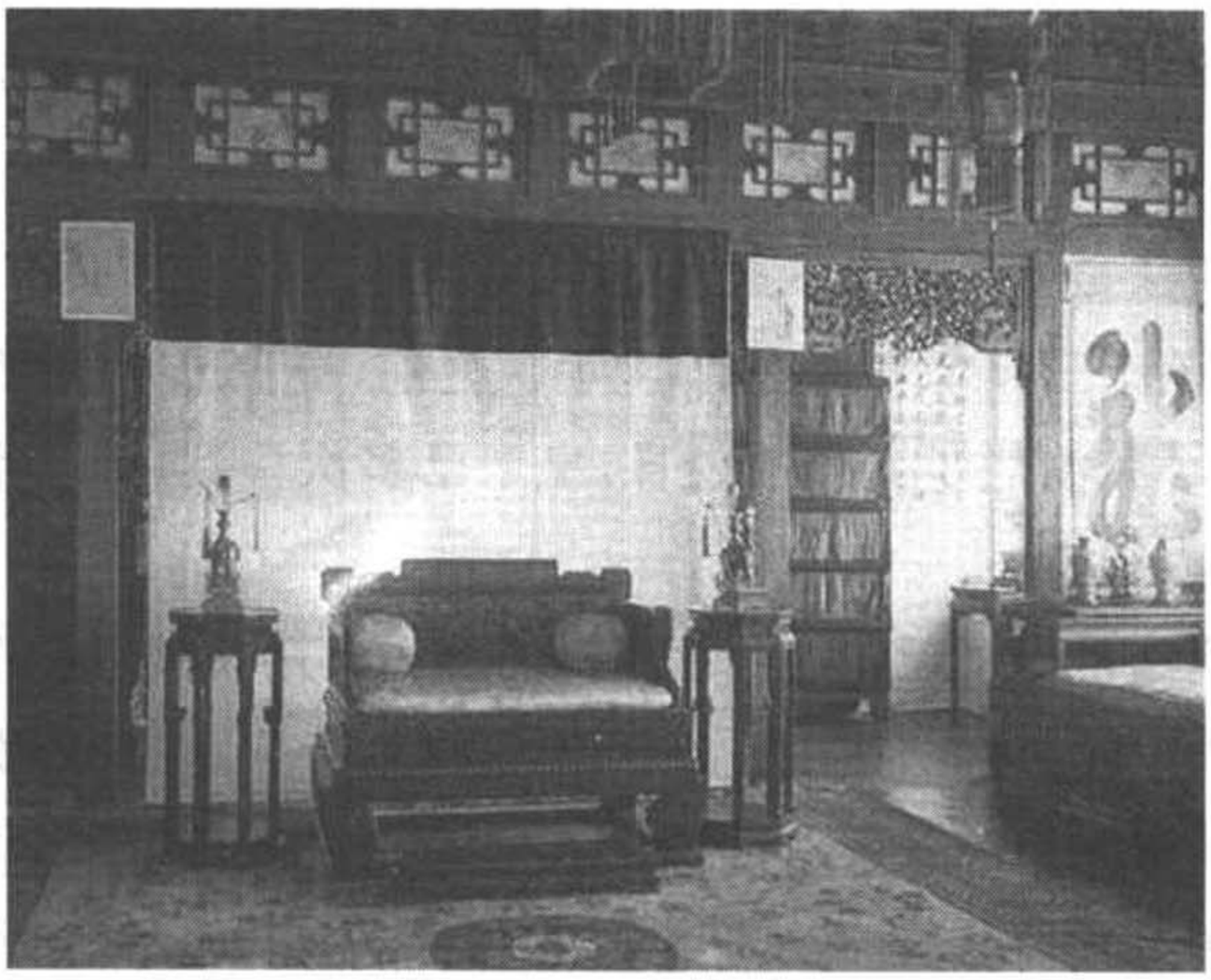
第二种说法是得了疥疮。疥疮也就是俗称毒疮或疔。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说："同治十三年十二月酉刻，上崩。之前，皇上患痈病，头颈和腰部各有一个，都生了脓溃烂了。死前十日，皇上已多次昏到，神志不清了。"这种讲法，采信的人很少。

第三种说法是得了天花而死。当时的官方典籍及其后的正史均持这种说法。而且人们在清代档案中发现了记载同治帝脉案的《万岁爷进药用药底簿》，它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自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同治帝得病，召御医李德立等人宫请脉，直至十二月初五日夜病死，前后 37 天的脉案，完全可以证明同治帝是因患天花而死的。这本脉案是敬事房太监根据当时的御医每天请脉记录和所开的方子，誊抄汇辑成册的。一些专家认为它是今天分析研究同治帝究竟死于何病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同治帝得病是在同治十三年的十月三十日下午。这天，太医院院判李德立和御医庄守知诊断的情况是："系风瘟闭束，阴气不足，不能外透之症，以致发热头眩，胸满烦闷，身酸腿软，皮肤发出疹形未透，有时气堵作厥。"御医的判断十分明确，认为是感染了时行疫毒所致，所以让同治服用益阴清解饮，时行避风调理。第二天早上，药见效，疹形透出，已能看出其中夹杂着瘟症。这天同治帝的症状是"咽喉干痛，胸满作呕，头眩身热，气颤谵言"，御医遂用清解利咽汤调理。在御医们两天的精心医治下，痘颗很快开始表发。然由于瘟热病毒强烈，头部、颈部的痘料发得十分稠密，而且令医家最担心的是，痘料颜色变得发紫。出痘时，如果痘颗灌浆顶平或塌陷，并呈紫色，这是逆痘的信号，很有可能有生命危险，而同治的天花实际上就是如此，所以御医记道："症界于险。"

十一月初二日，病情恶化，同治"腰疼胸堵，懊恼作呕"，御医认为毒滞已熏蒸肺胃，"症势重险"，当日服了利咽化滞汤，效果显著，四天未见的大便有

了，原来很重的症状也多有减轻。初八日，同治“微感风凉”，本来就虚弱的体质使天花向逆险方向发展，“浸浆皮皱，似有停浆不靥之势”，这为痘毒向人体各种器官和神经系统袭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这天至十八日，同治帝每况愈下，气血虚亏，“痘痂干燥，抓皮见血。”



同治和光绪年间，慈禧就是在养心殿东阁垂帘听政的

十一月十六日，同治的症状已十分险恶，“肾虚赤浊，余毒挟湿，袭入筋络”，使得腿痛筋挛，不能伸屈。同时，遗精、尿血也跟着来了，同治一天比一天瘦弱，神情恍惚，任凭御医们用各种各样的药，已是无济于事。十九日起，同治的病情急剧恶化。此后的十多天，是他最痛苦难忍的日子。痘毒潜入各部器官已经全面发作，痘后出现多处痈毒，并发生溃烂，腰间的溃烂几乎像一个洞，脓血不断地流出。全身的痘痈发出钻心般的疼痛，面颊肿硬，口喷臭气，胸满胁胀，大便腥臭。这时的御医已知道皇帝是难有生机了，只能卧以待毙。

从脉案记载来看，集中暴发的大溃烂十分剧烈、快速，到了令人惊异的地步。十九日辰时，“湿毒乘虚流聚，腰间红肿溃破，漫流脓水”，而头脸、胳膊、膝上都见痘痈肿痛。二十二日，腰部溃烂继续蔓延，其他部位的痘痈也出现溃破流脓。二十三日，臀肉左右又出现二处溃孔流汁。二十五日，令御医最为忧心的事情发生了，腰部和臀部的溃烂蔓延到了一起，并且溃口外小内深。二十六日，溃烂加剧，流出的浓汁多达一茶碗。二十七日，“腰肾疮口

微大，浆汁未减，气秽如昨”，御医们试着用“外用熨洗”治疗。二十八日，御医们的努力并不见效，“腰间溃处如碗，其口在边上，揭膏药则汁如箭激”。这时的同治已到了神志恍惚、麻木不仁的地步，神经系统遭到了大破坏。二十九日，同治出现了牙胀面肿的情况，御医也失去了治疗的信心，所以记录道：“正不制毒”，“症势日进，温补则恐阳亢，凉攻则防气败”，认为同治肯定没有救了。

十二月初三日，出现了致命的走马牙疳，同治“面颊红肿见消，各处溃脓尚可。惟乐龈如昨，上唇连左腮颊紫黑硬肿，势欲作脓”。初四日，“上唇肿木，腮紫黑肿硬处敷药，屡揭伤皮不能作脓，时流血水……牙龈黑臭，势恐口疳穿腮”。御医们尽管仍在竭力调理，但已没有什么效果而言。十二月初五日，同治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天，“皇上脉息弦数无力，毒火凝结，神气日耗”，到酉时，“六脉已绝”，“元气脱败”，医生用高丽参等煎成的生脉饮到了他的嘴里已无法下咽了。同治驾崩，命归黄泉了。

除脉案外，谈到同治得天花比较详细的有《翁同龢日记》。十一月初八、初九日，同治召见奕䜣及翁同龢。回家后，翁同龢记述了同治的病情：“诸臣上前瞻仰……伏见天颜温睟，偃卧向外，花极稠密，目光微露。”初九日，他和御前军机大臣们更清楚地看到皇帝的头、面上都是灌浆饱满的痘粒，同治还举起胳膊让大臣看他出的痘颗十分齐足。翁同龢的日记，是私人所记述的当天活动的流水账，应是十分可信无疑的。另外，将同治帝从发病至死的三十七天脉案逐日与《翁同龢日记》核对，两者所记之病情诊断、开方用药也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他还把和当时的一些大臣、太监那里听到的内容也记了下来，十分具体生动，说的都是同治患天花的发展情况，根本没有谈到梅毒。

持这种观点的专家认为，天花是满族常患的一种传染病，所以他们并不隐讳这种事实，而梅毒是一种两性交媾后得的性传染病，名声不好，因此有些人就凭主观猜测皇室是隐晦了同治的得病真相。加上梅毒和天花病症有些地方比较相像，梅毒患者一般先在外生殖器部位出现硬下疳，约两个月后全身皮肤发疹，并且和天花一样，都有脓溃烂症相，所以野史笔记者道听途说，认为同治皇帝淫欲过度，得梅毒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但年仅十九岁的同治帝为什么会身患这“心肾不交、元阳气血俱亏”的重险病症？他们推测同治帝得天花同他平时微服冶游、纵欲过度有直接关系。看来，同治帝虽不是

因性病而死，但毕竟还是与他喜好淫乱的习性有一定的关联。

有人提出同治的确患有天花，而且同时还患有梅毒。他们也根据历史档案和御医的诊断，认为档案上说的同治患病的症状，可能是先患天花未愈而又染上梅毒，或先患梅毒而后又染上天花，这是两种疾病并发，所以当时的御医无论如何是治不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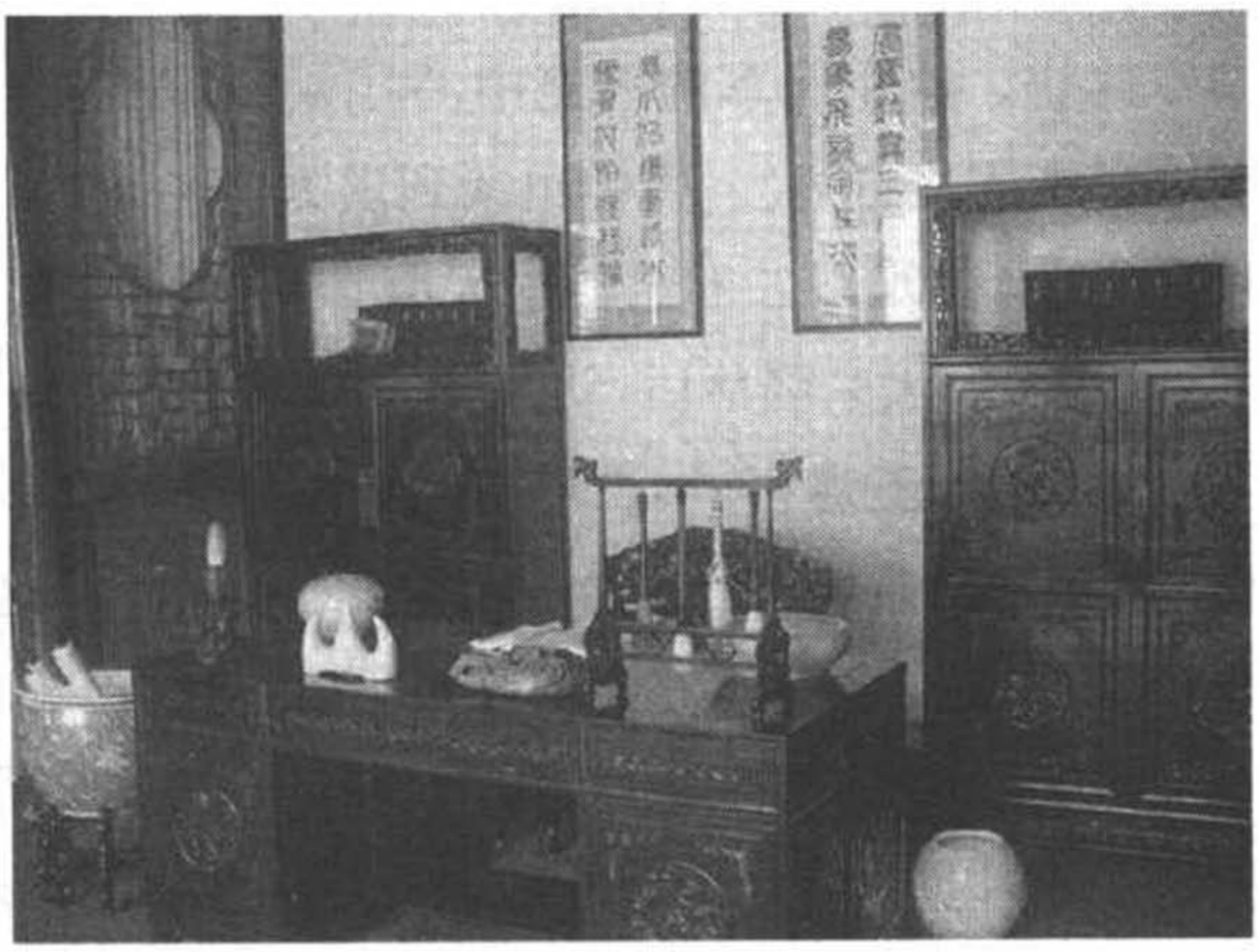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同治帝是被慈禧间接害死的。有一本叫《慈禧传信录》的书中谈到同治帝的师傅王庆祺对人说过，同治帝亲政后，慈禧仍然对政事大加干涉，王庆祺就上书请同治帝专门修一个园子让慈禧在其中颐养天年，实是要让慈禧隔离起来，不再干涉政事，但事情为慈禧发觉，慈禧遂决定加害同治。御医李德立的曾孙也听其祖父说，同治帝得病后，经过李德立等众御医的精心治疗，日见好转。十二月初四日午饭后，孝哲皇后阿鲁特氏来到东暖阁看望同治。慈禧的亲信小太监一见皇后到来，马上前去报告，说同治帝与皇后在窃窃私语。慈禧也来到东暖阁，脱去绣花高跟鞋，轻手轻脚地来到帏幔后偷听。一点也没有觉察的皇后，还一个劲地向皇帝哭诉着备受慈禧刁难的痛苦。讲着讲着，同治帝也大有同感，劝皇后先忍耐一段时间，等到自己病好之后，皇后总有出头日子的。听到这里，慈禧大受刺激，勃然大怒，立刻推幔闯入帷内，一把揪住皇后的头发用力猛拖，可怜的皇后一大把头发连同头皮就被拉了下来。慈禧又劈面一掌，顿时皇后血流满面，惨不忍睹。慈禧又叫几个太监将皇后按倒在地，把拐杖递给其中的一位，让他死命地打皇后的屁股。同治大惊，顿时昏厥过去，从床上跌落到地上，病势加重，从此昏迷不醒。急忙传御医进来把脉，但同治已牙关紧闭，滴药不进，到第二天夜晚就去世了。照这种说法，同治虽不是慈禧直接害死的，但也是被她气死的。

这种说法也得到了一些传说的证实。《清宫遗闻》说同治帝死前曾与军机大臣李鸿藻商量想立贝勒载澍为继承人，并且口授遗诏，命令李鸿藻在病榻边书写。诏书很长，全文超过了一千字。但李鸿藻回家后想想很害怕，遂把这件事告诉了慈禧。慈禧听说后，怒火中烧，遂命太医尽断医药饮食，不久，同治帝就死了。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专家认为这时的同治帝病已很重，人失去知觉，脖项、手膝痉挛，怎能安排这些后事？

同治寿短病故，但到底是死于什么病，却成了一个历史疑案，留给了历史学家去研究和探索。

天京缺粮　　天王洪秀全死因之谜

同治三年(1864)四月二十七日,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死于天王府,年仅五十一岁。太平天国失去了自己的最高领导人,这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根据湘军首领曾国藩向朝廷的奏章和刊刻本《李秀成自述》,洪秀全是服毒自杀的。但随着《李秀成自述》原件的发行,人们发现洪秀全的死因并不是自杀。



洪秀全天朝宫殿陈列室,在南京市总统府内

同治三年(1864)春天,湘军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团团围住,内无粮食,外无援兵,形势十分危急。太平天国的主要将领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但遭到了天王洪秀全的拒绝。洪秀全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表示出了坚决抵抗到底的决心。四月二十七日,洪秀全死于天王府,年仅五十一岁。太平天国失去了自己的最高领导人,这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前面还在说自己"何惧曾(曾国藩)妖",不久却升天离世,这看上去多少有点奇怪。所以洪秀全到底是怎么死的,研究者在不断努力探索。至今为止关于洪秀全的死因,人们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他服毒自杀;另一认为是因病去世。那么这二种观点的根据各是什么?

认为洪秀全自杀身亡的材料有多种。其一是湘军首领曾国藩向朝廷的奏

章。曾国藩在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奏章中说:“首逆洪秀全本年五月间,在官军猛攻时,服毒自杀了。”七月七日的奏章中,他又说抓到了天王府的一个宫婢,这人是道州一位黄姓女子,是她亲手掩埋了洪秀全的尸体。听到这个消息后,曾国藩亲自加以审问。据这位宫婢说,洪秀全生前已常年不见臣僚。四月二十七日,因官军急攻天京,就服毒自杀了,当时决定秘不发丧,但城内城外的太平天国将士却早已知道。十多天后,才将死讯正式宣布。

如果说曾国藩的奏章有故意贬低洪秀全而有邀功之嫌的话,那么太平天国后期主要领导人李秀成、洪仁玕的叙述,可信程度就要高许多,因为他们对天王府的情况是最清楚不过了。李秀成在天京陷落后,走入天京东南的荒山中,被清军俘获。他在湘军的囚笼中,写下了几万字的供词,这就是后来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内中也谈到洪秀全的死亡:“天王这时十分焦急,每天烦躁不安,在四月二十七日这天服毒而亡。”洪秀全死后,长子洪天贵福继位为幼天王。天京陷落后,幼天王突围到安徽广德,与洪仁玕会合。之后,转入江西,幼天王遇害,洪仁玕身陷清军手中,也曾写下《洪仁玕自述》。其中后半部分说到:“天王之自杀,更令全局混乱。”这二个人的叙述,似乎都可证实曾国藩奏章中所言大都是可信的。这样,上个世纪 60 年代以前,人们普遍认为洪秀全是服毒自杀的。郭廷以在《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中认为洪秀全之死“以服毒说为近真”。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虽认为曾国藩奏章中有不实内容,黄姓宫婢的供词也是假的,但认为洪秀全自杀是事实。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认为洪秀全是四月十九日服毒逝世,具体死的日子虽另有所据,但事实的认定是基本一致的。

令人感到欣喜的是,在上世纪的 60 年代初,藏在曾国藩家中长达一百年的《湘乡曾八本堂·李秀成亲供手迹》(即《李秀成自述》)正式影印发行,人们发现李秀成的亲笔供词和原来曾国藩刊刻本有较大的改动,其中关于洪秀全死亡的一段正是改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原稿印行本讲述的洪秀全是因病而死的:“此时大概三月将尾,四月将初之候,斯时我在东门城上,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二十一日而故。”照此说法,洪秀全约在三月底至四月初之间病情已十分严重,四月二十一日时因病逝世。李秀成又谈到洪秀全病重时,坚决不吃医生配的药。他的病时好时坏,人感到不适也不用药,所以四月二十一日就病死了。那么,这个手迹印行本为什么与曾国藩的刻本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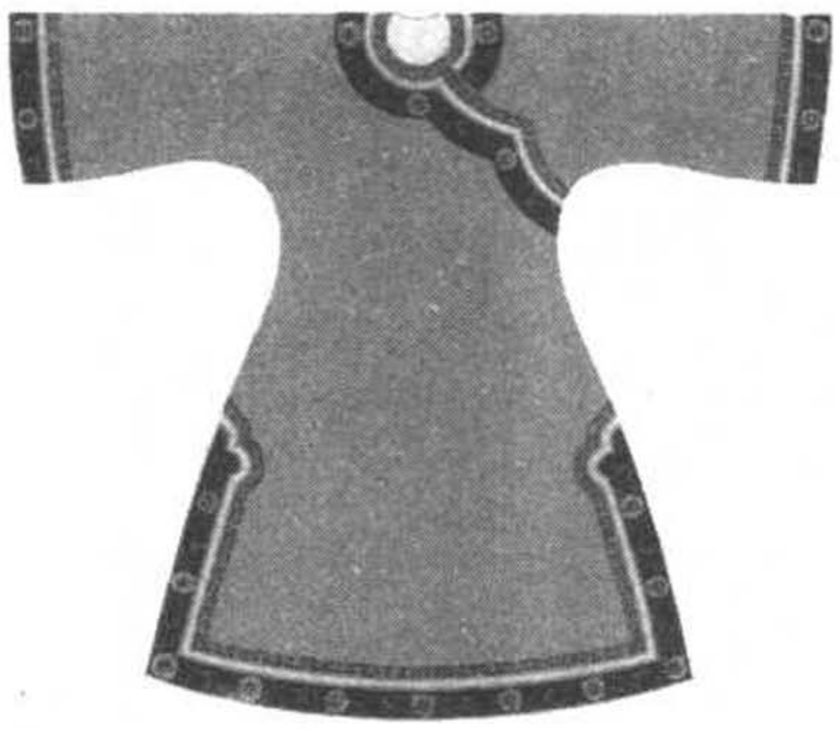


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名天京，在清朝两江总督署原址上兴建了天王府(今总统府内)，后洪秀全病死于此

大多数学者认为曾国藩刻本是经过曾国藩篡改的。因为曾国藩在攻破南京后，他在安庆给朝廷上的奏章中已经说洪秀全是服毒自杀，到南京后他还是这种观点，所以第二次上奏章时他仍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奏章有什么问题。直到李秀成被捕，经审讯，他看到了李秀成的亲供，有关洪秀全的死因与原先自己了解的完全不一样，这时他就无计可想了。除了改动李秀成的供述外，他还能有什么办法？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中谈到七月七日，曾国藩让赵烈文审看李秀成的口供，经改定后送军机处，到傍晚才改完。曾国藩把李秀成的供述送到军机处时说："李秀成的供词，文理不甚通适，而情事真确，仅钞送军机处以备查考。"可知李秀成供述上送时，先经曾国藩和其亲信改动了。为与自己的奏稿在表述上统一，他把洪秀全的病死改定为自杀，这应该在情理之中。

对《洪仁玕自述》后半部分说洪秀全自杀的内容，学者们认为这并非是洪仁玕本意，因为后半部分是外国人译出的，出自英译本，原稿早就不见，今天已无法查证。外人在翻译该部分时，说不定已受到了《李秀成自述》的影响。相反，《洪仁玕自述》的前半部分出自洪仁玕的原稿，曾经谈到："到今年四月十九日，我主老天王卧病二旬升天。"原来洪仁玕也是认为天王是病死的。

能够证实洪秀全是病死的资料还有幼天王洪天贵福(洪福填)被捕后的《洪天贵福供词》。根据《供词》，洪秀全身体本是无病的，"父亲平日常食生



太平天国时宽袖女服

冷，自到南京后以蜈蚣为美食，用油煎食”。《洪天贵福供词》首次披露说洪秀全“于今年四月初十日起病，四月十九日病死。二十四日，众臣子扶我登极。”由发病至死亡周期十天，可见与服毒无关。由此可确证洪秀全乃病死。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五月初六日条也说到：“闻探报禀称，逆首洪秀全已于四月二十八日病死（彼中之四月二十日）。”死的时间略有不同，但双方都认为洪秀全是病死的。

自从《李秀成亲供手迹》印行后，许多研究者改变了自己原先的“自杀”看法，认为“病死”说更有依据。如罗尔纲、周村的《洪秀全论》说：“洪秀全因天京缺粮，久吃甜露充饥，致病发逝世。”在注释中他们对自杀说进行了否定：“曾国藩刻本《李秀成亲供》所说洪秀全因被围急自杀死，乃是曾国藩为着要向清廷报功而盗改的。”

当然，也有少部分学者继续坚持自己固有的观点，认为病死说的证据并不充分。

天王之死仍是一个历史疑谜，彻底解决的方法恐怕只能等到新史料发现的那一天了。

备感绝望　　袁世凯死因之谜

公元1915年底，袁世凯实行帝制，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在天下人的唾骂声中，这位窃国大

盗呜呼哀哉了。有人认为袁世凯是得病死的，也有人认为他是被气死的，民间更有自杀死亡、贪恋女色导致死亡、受吓死亡等种种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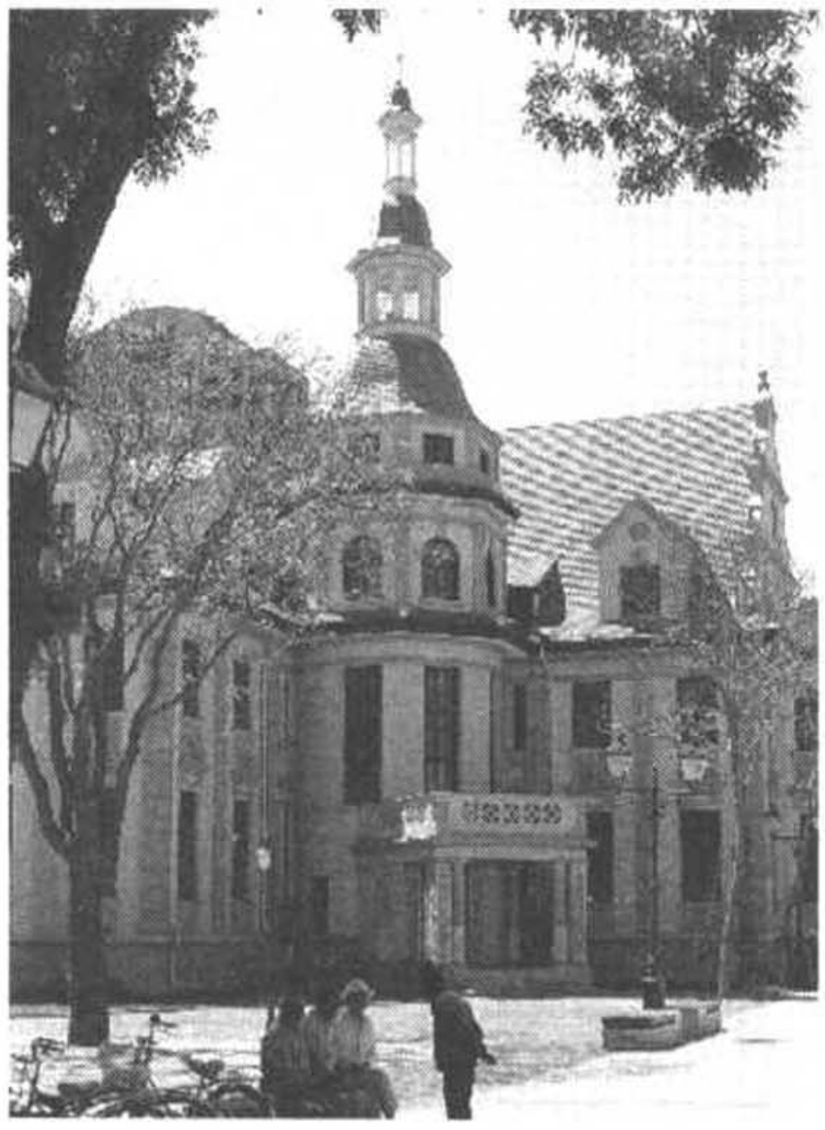


袁世凯像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后，依靠投机钻营、谄上媚外而发迹的北洋军阀总头子袁世凯大耍两面手法，一方面逼迫清帝退位，一方面又利用革命派的弱点，迫使他们交出政权。1912 年 3 月，他接替孙中山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逐步实行专制独裁统治。一年后，他胁迫国会选举自己为民国大总统，紧接着又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不久，他确定了总统职位的终身制和世袭制。为了换取对复辟帝制的支持，他竟然接受了日本提出的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经过一系列策划，他于 1915 年 12 月宣布实行帝制，并在 1916 年元旦举行登基大典，改是年为“洪宪”元年。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就连他的心腹干将也纷纷倒戈。在四面楚歌中，1916 年 3 月 22 日他被迫取消帝制。6 月 6 日，这个只做了 83 天皇帝梦的独夫民贼走投无路，在天下人的唾骂声中一命呜呼，死时仅 58 岁。

袁世凯阴险狡诈，他的短命离世，并没有人会去同情。不过事后人们在谈到他的死因时却讲法不一，有病死、气死等多种观点。

病死的说法，相信的人很多。先是当时官方讣告上说袁世凯是病死的，无法知道内情的外界不由得不信。当时控制局势的一些人如段祺瑞、冯国璋等都是袁世凯的部下，即使袁世凯是其他原因死的，他们也不便说。之



位于天津市的袁世凯故居

后，社会上流传的一些出版物都采用这一种观点，如《袁世凯全传》、《袁氏盗国记》等。前书说袁世凯得的病是尿毒症，“因中西药杂进，以致不起”。即用药不对路子，所以病没有治好。《袁氏盗国记》的记载十分详细：五月二十七日，中医刘竺笙等想方设法进行诊治，但不见效果。病情至六月四日，一下子加剧，马上请法国公使馆的医生前来诊治，结论是得了尿毒症，而且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已病入膏肓，没有什么转机了。两天以后，这个近代军阀的鼻祖就双脚一伸上西天了。

还有一些书说袁世凯的尿毒症病本可以治好，但他的两个儿子对怎样治疗意见不统一。大儿子袁克定主张西医用外科手术治疗，而二儿子袁克文不同意，主张保守疗法。医生们不知如何是好，这样就贻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很多人认为袁世凯不是病死的，主要是当了皇帝后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他又忧又惧，最后是气死的。忧愤之后心情不畅引起病变，或本有病但因忧愤突然加重了病情，所以引起死亡的主要原因与纯因疾病去世并不相同。《袁世凯轶事》说，当光绪、慈禧死后，任摄政王的宣统帝父亲载沣深恐袁世凯尾大不掉，遂打发他回老家养病。在老家时，有一个算命先生对袁世凯说他活不过五十八岁。袁世凯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延长寿命，算命先生说这件事很难，非得有龙袍加身才可以，袁世凯听后默然不语。他招待算命先



孙中山先生

生吃了一餐饭，喝了点酒。等到算命先生刚走出房子，就倒地死了。因为不想把这等重要的事情张扬出去，袁世凯动了杀人灭口的念头。从此以后，为了延长寿命，袁世凯心怀异志。辛亥革命后，袁世凯通过种种努力，总算觅到了称帝的机会，心中十分高兴，认为只要龙袍一加身，就可以平平安安地享受富贵了。谁知事不遂愿，各省纷纷反对，于是积忧成疾。昏迷之中，他常常会见到当年的那个算命先生前来索命。医生们为他开了各种汤药，但袁世凯一概不吃，怀疑药里有毒，他把医生配的药误认为是当年自己给算命先生吃的毒酒。周围知道这件事的人，不敢将内情公之于众，又没有办法，只能改用针灸来医治，但最后不见效而死去。外界传说用针灸是袁克定想出来的鬼主意，不知有什么依据。按这种说法，袁世凯的病是“积忧成疾”，并不是尿毒症之类的疾病。病治不好也不关袁大公子的事情，主要原因是袁世凯自己不肯吃药所致。

袁世凯被气死的说法，也得到他女儿袁静雪的证实。她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中认为袁世凯当时得了膀胱结石症，在内外交攻下，气恼成病而死。袁世凯称帝后，遭到全国上下的一致反对。更令他想不通的是，他的一些亲信也加入到了反对他的行列。如四川督军陈宧，之前为了得到袁世凯的重用，坚决拥护帝制。袁世凯派他到四川镇守一方，陈宧临行前对他三跪九叩，说是袁世凯登基时恐怕无法前来，而现在先行庆贺之礼，奉承阿谀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袁世凯对他满心喜欢，认为从此西南可以无事。随着

形势的发展，5月22日陈宧宣布四川独立，几天后陕西督军陈树藩和湖南督军汤芗铭也反戈一击。焦头烂额的袁世凯本就焦虑不安，这时见到三省的独立报告，出乎意料之外，羞愤交加，原本他还想策划军事挣扎，派四川、湖南军队对付南方护国军，这时倍感绝望，气急败坏，遂一病不起，再也支撑不住。

一些学者赞同袁世凯是被气死的观点，但是否被陈宧等人气死，大家有不同看法。

有人认为是被冯国璋和段祺瑞气死的。段祺瑞和冯国璋本是袁世凯手下的心腹大将，他们都期望在袁世凯之后出任大总统，因此他们对袁称帝表示消极。在袁世凯称帝期间，段祺瑞离开他长期担任的陆军总长职位，托病退隐西山；冯国璋以江苏将军坐镇南京，拥兵观望，两人与袁世凯之间早已貌合神离。之后，冯国璋和江西、浙江、山东、湖南等省将军共同逼迫袁世凯取消帝制，并密电其他各省将军征求同意。袁世凯取消帝制，实是在这样的一种众叛亲离之下的行为。

有人认为是被袁克定气死的。袁克定是袁世凯的长子，为了能成为合法继承人，他极力怂恿袁世凯当皇帝，最终弄得十分狼狈，不但皇帝当不成，连当个大总统也遭到众人的反对。

也有人认为是被杨度气死的。袁世凯敢于做皇帝，是受了以杨度为首的筹安会诸人的影响。当袁世凯生病时，杨度从天津回京来看望袁世凯，这时袁世凯怒目视杨，对自己称帝悔恨交加，但为时已晚。

此外还有几种说法，虽不太为人们重视，流传也不广，但也是一家之言。

有一种说法认为袁世凯是自杀的。袁称帝后，反对他的人越来越多。袁世凯自己后来也知道帝位已很难坐稳，四面八方的人都在反对他，内心压力很大。在悔恨交加中，他吞金自尽。这种说法在民间有一定的市场。

有人认为袁世凯是被女人弄坏了身体。袁世凯生活十分糜烂，特别喜欢女色。他有一个夫人和九个姨太太，每天应付不过来，就服用鹿茸、海狗肾等补药，以提高自己的性欲。时间一长，身体就掏空了。当上皇帝后，他天天喊腰疼，法国医生奉命来抢救，也无济于事，最后死于尿毒症。按这种说法，袁世凯是死于女人之手。

有人认为袁世凯是被章炳麟吓死的。章炳麟被袁世凯软禁于龙泉寺中，一直在想要如何对付袁世凯。一天，他让龙泉寺的住持宗仰和尚向袁世

凯转达他的一个梦。在这个梦中，章炳麟做了阎罗王，要审判袁世凯。但像袁世凯这样的奸贼到底用哪一种刑具还没有考虑好，是让他用自己的内火烧死，还是用铁床铜柱烤死，章炳麟说还没有最后定夺。宗仰和尚把这些话转达给袁世凯听，袁世凯又怕又气，遂被气出病来，不久也就死了。

这几种说法显然可信程度较低，但表达出了人们对袁世凯的憎恨，对封建帝制的厌恶，也说明袁世凯的称帝是利令智昏。因为民主共和已成为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独夫民贼的逆流而动，只能是玩火自焚，人们诅咒、鞭挞袁世凯，也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些传说。

荒唐君主

层层积累　　纣王残暴之谜

史书描绘商代最后一个国王纣王是个残暴荒淫至极的人，后代都将他作为反面教材。通常人们认为商朝的灭亡，完全与商纣的残暴有着因果关系。不过有观点认为商纣的残暴有很多是不存在的，那是有人故意安在他身上的，相反他对中华民族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有过巨大的贡献。究竟哪个为真？

商朝最后一个国王是纣王，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君主。商末，纣王终日饮酒作乐，荒淫无度，他强迫成千上万的奴隶，花了长达七年时间，在都城朝歌（今河南省淇县）建了一座周长 3 公里、高达千尺的鹿台。鹿台上楼观巍峨，亭阁秀丽，传说比夏桀的瑶台还要阔气。他还特别喜欢吃肉喝酒，便学着当年夏桀的样子，在宫院中挖了个大池子，里面灌满了酒。这个酒池很大，据说可以行船。又在池边的林木上挂上肉块，称作“肉林”。纣王和王公贵族们在“酒池肉林”中尽情享受。对广大的平民百姓，却实行残暴的统治，稍有冒犯便施之以酷刑，百姓们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

商纣王这样荒淫残暴，很多正直的人都规劝他。他有个大臣叫梅伯，对商王朝的存亡很担忧，就向商纣王进忠言，可纣王不但听不进去，还把梅伯施于炮烙酷刑。纣王的叔父比干也好言劝说，他却说：“我听别人说你是个圣人，长着七个心眼，今天我要把你的心挖出来，看个明白！”把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大臣给残害了。如此一来，其他的人再也不敢规劝纣王了。

商朝的天下被纣王搞得乌七八糟，再也维持不下去了。这时候，周武王在姜太公的协助下率领大军来到了黄河南岸的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消息传开，邻近部族首领们也纷纷前来助威。武王面对滔滔的黄河，对周军将士和各部族的首领们说道：“我的祖先对上天是有功德的，因此一卜天，天

就命令先王灭掉殷商，拯救万民。先王不幸早逝，归天前将重任托付于我。你们要全力协助，完成先祖的功业啊！”说罢下令渡河，顿时千舟争渡，浪花飞溅。不料周军刚渡到对岸，武王又下令回来。不仅那些前来助战的部族首领们感到纳闷，就连周军武士们也摸不着头脑。

原来，武王很有心计，他想，商朝内部虽然腐败，但到底是个控制着众多诸侯国的大国，只靠周军难以取胜。他今天率兵来到孟津，一是进行一次渡河演习，二是借此机会，探探众诸侯国的虚实。他看了一下，发现周军渡河还可以，而前来助威的侯国首领们，有的带来了参战的队伍，有的只是来观望阵势而已。周武王认为时机还不够成熟，没有马上出兵。回去后，周武王一方面扩充军队，准备粮草，另一方面又派出探子，去探听情况。那商纣王本来听说周武王率军打来，一阵惊慌，正准备组织队伍迎战，却见周军不战自退，以为周武王胆小，不敢与他抗衡。于是洋洋得意，继续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过了一段时间，周国派出的探子相继回来把商国的情况一一介绍给武王。周武王看到时机基本成熟，决定进攻商国。

第二年春天，周武王出动了三百辆兵车，三千名勇猛的先锋，四千五百名士兵，又会集各部落和小国的支援部队，浩浩荡荡地从孟津向商朝的首都朝歌进发。这支讨伐大军士气旺盛，一路上没有遇到多大的抵抗，就到了离朝歌只有七十里路的牧野（现河南省汲县北）。

在牧野，周武王正式竖起伐纣大旗，当众誓师。他站在高高的王车上，大声说道：“尊敬的友邦国君、诸位官员和所有远征的将士们，举起你们的戈，拿起你们的盾，握好你们的矛，为讨伐暴君，我们现在就要誓师了！暴君纣王听信谗言，败坏朝纲，残害忠良，荼毒百姓，现在，我遵照上天的旨意来讨伐商纣了。所有参战的将士们，你们要勇猛向前，但不要杀害那些前来投降的人，以便使这些人为我们效劳。勇敢的将士们，作战有功的，将会得到奖赏；如果有谁不努力作战，我就要把他杀掉！”誓师完毕，武王就挥动旗帜，驱动兵车，向商军进攻。

而此时商纣王正带着他的宠妃和一帮大臣，在鹿台上欣赏歌舞，喝酒吃肉。手下的人把周军进攻的消息告诉纣王，他这才散了酒席，召集大臣们商量如何应战。商朝的军队当时正在东南地区对付少数民族。一时抽不回来，纣王只好下令把大批奴隶和俘虏编入军队，一共七十万人，然后就向牧

野进发。著名的牧野之战爆发了。

牧野之战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激战。论人数，周武王的讨伐大军远远少于商纣王的部队，可是论士气，周武王的伐纣大军同仇敌忾，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商纣王推翻。

大战开始了，周军队伍像一排巨浪，压向商军，一场厮杀就要开始了。就在这紧要关头，商军前排的兵士们突然掉转矛头，朝后排冲去。原来这些都是奴隶和俘虏，他们早就恨透了殷纣王，哪里肯替他卖命。商军前排倒戈，队伍顿时大乱，土崩瓦解。

商纣王正在朝歌城中等待胜利的消息，突然传报，商军大败，周军正向朝歌涌来。商纣王闻讯大惊，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他不想让周军得到他的鹿台和珍宝，于是命人把王宫里的珍宝全部搬到鹿台上，自己用绫罗缠身，躺在珍宝中，点了一把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当周武王带着伐纣大军冲进朝歌时，朝歌的老百姓早已烧好了开水煮好了饭，迎接他们的到来。周武王一进城，百姓齐声欢呼，感谢他从商纣王的暴政下解救了他们。

武王来到鹿台，不禁大吃一惊，鹿台上的琼楼玉阁已成一片瓦砾，未燃尽的巨梁大柱还冒着缕缕青烟。武王断定，商纣王一定畏罪自焚了。不一会儿，武士们果然在灰烬中找到一具尸体。由于尸体四周堆着许多不易燃烧的珠宝玉器，所以尸体的相貌还依稀可辨，果然是商纣王。武王怒不可遏，朝着商纣王的尸体连射三箭，然后用青铜大斧将头颅砍下，悬挂在大旗杆顶上。周武王庄严地宣告伐纣战争胜利结束，商朝已经灭亡。

上述观点，从《史记》以来的主要史书都是这样叙述的，今天在众多当代史学家们编写的历史书和教材中都加以详细的引用。不过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孔子的学生子贡就对史书的写法表示出了怀疑，他认为商纣的罪行并不像史书上说的那样严重，后人大多把当时最恶毒的事情全部堆到了他的头上。清朝有个学者叫李慈铭，他认为杀比干、囚箕子、宠妲己之类的行为，历史上哪个皇帝没有？他的这些事情比起后代的暴君，根本算不上什么。著名学者顾颉刚曾编写了《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对后人认为的商纣暴行一一进行考证，最后他得出的观点认为这些商纣的罪恶其实是后人层层积累所致，时间越后，堆在商纣头上的罪行就越多，但越不可信。1960年，郭沫若在《新建设》上发表文章，公开为商纣翻案，他认为纣王是一个很

有才能的人，对民族发展是做了许多好事，对古代中国的统一有过不少功劳。他曾经平定东夷，所开拓的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成为宋、楚、徐等国承继着的同一文化在南方发展。可以说，中国的统一是纣王开其端，而秦始皇收其果。这种观点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赞同。更有学者指出，战国秦汉之际的一些人，将夏桀的恶行附会到商纣王的身上，因此越传越详。

也有人说，关于商纣的残暴大多是后人编造的。为什么有人要有意地丑化商纣王呢？原因之一是他的政敌在做别有用心的宣传。比如奢侈腐化，暴虐荒淫，镇压反叛，剪除异己，这是一切帝王的共性，并非商纣王独有。这些劣迹为什么表现在商纣王身上就那样骇人听闻，令人发指？应该说，是他的政敌在搞丑化和宣传。原因之二是有人故意地把罪恶之源引到女人身上。妲己本来是纣王剿灭苏部落的战利品，也是纣王的玩物。可是，武王伐纣后一千年的《列女传》把劣迹都归于妲己一人，这就是“女祸亡国论”。在商纣王的故事里掺和着妲己，既是小说家的调味品，也是封建文人为昏君开脱、愚弄人民的阴暗心理的表露。原因之三是有人想抹杀商纣王的历史功绩。据《史记》记载，商纣王博闻广见，思维敏捷、身材高大、膂力过人。他的才智足以对复杂的事情迅速作出准确的判断，他的气力足以徒手杀虎。他一手抓九条牛的尾巴，往后一拉，九条牛只有向后倒退。他曾经攻克东夷，把疆土开拓到我国东南一带，开发了长江流域。当时的东夷常向商朝发动进攻，掳去大量百姓做奴隶，对商朝是个威胁。纣王的父亲帝乙就和东夷大战一场，但没有取得胜利。纣王登基之后，铸造大量兵器，亲率大军出征东夷。东夷各部联合起来进行抵抗，但挡不住纣王的攻势。纣王一方的箭镞是青铜制造的，精巧而锋利、射程远、杀伤力大。两军对阵时，东夷的军队一批批倒了下去。据说，商军如秋风扫落叶一样，一直打到长江下游，降服了大多数东夷部落，取得大胜。从此以后，中原和东南一带的交通得到开发，中部和东南部的关系密切了。中原地区的文化逐渐传播到了东南地区，使当地人民利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了生产。实事求是地说，这一历史贡献应该记到纣王身上。

反对这种观点者认为商纣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肯定的。东夷和夏民族早有关系，并不始于纣，而是始于帝乙。至于长江流域的一些部族和国家在当时已有很高的文化，绝非是商纣伐了东夷以后才开拓出来的。从周朝人的文告里，可以看到纣所以亡国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酗酒、淫佚、任用

非人。

一些观点认为商纣的暴行是存在的，但他并不纯粹是一个暴君。有学者指出，传统的史书对商纣的描写是极其混乱的。商纣的惟妇言是用，并非单纯的君主荒淫，而是根源于制度与习俗中的母权残余，是一种社会现象。《尚书·牧誓》说他“昏弃厥遗王父母弟”，应是商纣的主要罪状，它违背了我国宗法传统中的亲亲原则。而信用“多罪逋逃”，即任用身份低贱的人，并不是纣王的缺点，反倒可以说明他的任人唯贤政策。商纣败亡的原因并非由于他的孱弱，而是商师崩叛所造成的。

看来，对商王暴君面貌的认识尚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关键是我们对传统史料的认识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道古以害今　　秦始皇坑儒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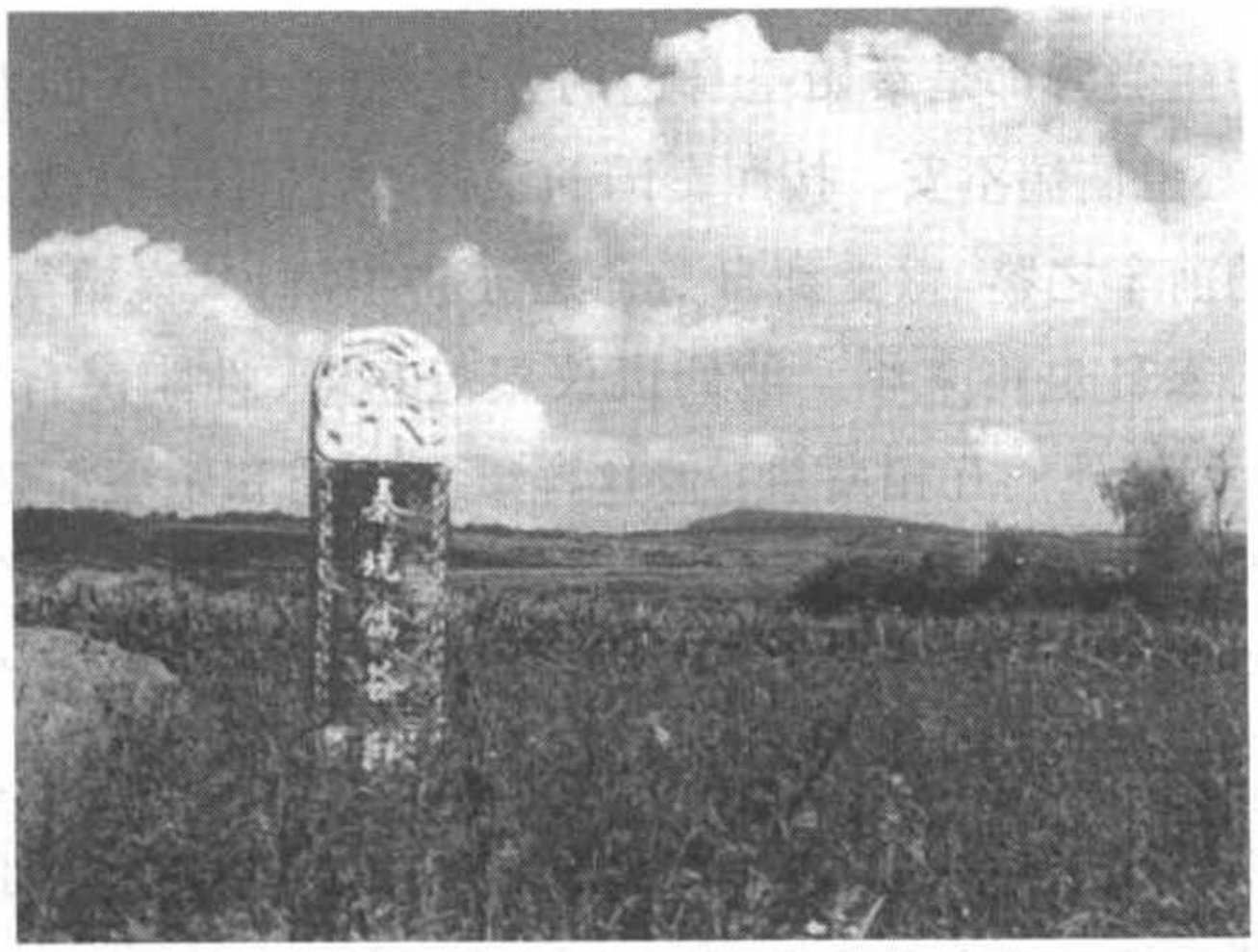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也想统一人们的思想。他不想听一群儒生发表自己对国家政事的看法，于是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焚书坑儒”运动，数以百计的儒生被坑杀活埋。然而，有人不相信这回事，认为秦始皇坑儒地点不明，为什么史书从没有明确的记载？就这样，秦始皇一手制造的千古冤案，给后人留下了众多谜团。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便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当政治上加强控制的举措完成之后，秦始皇便开始了对人们思想上的钳制。但由于受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空气的影响，秦初的儒生们尚保留着敢于直言、相互争鸣的学术传统。他们想不到就是因为这个传统，一场悲剧在等着他们。

秦始皇统一中原以后的第九年，也就是公元前 213 年，有一天，秦始皇在咸阳宫置酒，文武官员全都出席了，有七十个在学术思想上有名望有地位的博士也参加了这次宴会。宴会进行当中，围绕着是否实行分封制，众儒生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丞相王绾、博士淳于越等人主张实行分封，博士周青臣举酒颂扬秦始皇的功德：“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秦始皇听后喜形于色。淳于越听周青臣说分封制不好，郡县制好，心里十分不舒服。他赶快往前走几

步，急急忙忙地对秦始皇说："陛下！我听别人说，殷周两代的国王传了一千多年，他们分封子弟功臣做诸侯，像众星拱月那样护卫着中央，那个制度本来就好得很。如今陛下统一了中原，子弟却毫无地位和实权。将来万一出个像当年齐国田常那样谋篡王位的乱臣贼子，又有谁能挽救得了那种局面呢？我听老一辈人说过：事情不照老规矩办而想要长久，根本就不可能。现在周青臣又当面奉承陛下，加重陛下的过错，我看他不是忠臣。陛下还是应当重新谋虑关于分封子弟的事情才好！"

淳于越重提分封的事情，秦始皇听了心里有些厌烦。而丞相李斯等认为"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主张实行郡县制，并指责淳于越等人"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这一点对秦始皇触动很大。最后，秦始皇赞同李斯的观点，并采纳了李斯"焚书"的建议，下令：除秦纪（秦国史书）、医药、卜筮、农书外，凡列国史籍、私人所藏的儒家经典、诸子著作和其他典籍，一律限期交官销毁。同时，禁止谈论《诗》、《书》和"以古非今"，违者处以黥刑乃至死罪。焚书之后，百姓如想学法令，可拜官吏为师。



秦坑儒谷遗址，在今西安市临潼区韩峪乡

当时焚书的具体办法是：除了那些讲医药、占卜、种树一类的书以外，凡不是秦国史官所记的历史书，不是官家收藏而是民间所藏的《诗经》、《尚书》和诸子百家的书籍，在命令下达的三十天之内，都要缴到地方官那里去焚毁。以后还有偷偷谈论古书内容的，处死刑；借古时候的道理攻击当前政治的，全家都要处死。官吏知情不告发的，判处同样的罪。命令到达后三十天

不烧毁书籍的。在脸上刺字后罚去做四年长城的苦工。凡有愿意学习法令的人，只许跟官吏去学，不许偷偷地照着以前的古书去学。

这样，从都城咸阳到边远的乡村，四处是焚书的烈焰，大批文化古籍在无情的烈火中化为灰烬，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灭绝性的大浩劫从天而降。焚书的恶果不仅使许多先秦重要典籍遭到破坏，同时也给春秋战国以来活跃的思想领域及理论探索者们以致命的打击，堵塞了秦代学术自由探讨之路，阻碍了先秦诸子百家思想文化融合的进程。

焚书的余烟尚未消散，“坑儒”的风波又平地而起。“坑儒”的直接起因是方士侯生、卢生等讽议始皇，继而逃走。

战国以来，阴阳五行之说盛行，一切方术都用阴阳五行来推演。燕、齐沿海地区，出现了一批讲神仙方术的方士。他们宣称，渤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山上的宫阙用金银筑成，住着很多长寿的神仙，山上生长着长生不老的妙药。秦始皇称帝后，为求长生不老，迷恋仙道，不惜重金，先后派徐福、韩终、侯公、石生等人前去寻求仙药。由于多方未果，引起秦始皇的不满。他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乖戾、暴躁，喜怒无常。

侯生与卢生当时都是秦始皇身边的方士，由于长期求仙人和仙药终不可得，他们内心也惴惴不安。按照秦国的法律，求药不应验就会被处死。他们从博士们的前车之鉴，感受到自身命运亦将不济；从秦始皇的暴戾无常，感受到自己的末日也将来临。他们讥议秦始皇“天性刚戾自用”，“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他们互相商量：像这样以靠刑罚和杀戮而建立威势并且贪婪权势的人，不能为他求仙药。于是，侯生、卢生悄悄地带着从秦始皇那里领来的钱财，相约逃走了。秦始皇大为震怒，他认为自己对卢生等赏赐丰厚，待遇尊隆，而侯生、卢生竟然用这样恶毒的话来诽谤自己，还居然逃走了，决定要狠狠地惩治他们。于是秦始皇下了一道命令，叫御史大夫去查办那些在背后诽谤他的读书人。被抓去审问的人，受不了残酷的刑罚，为了给自己开脱，就一个一个的牵出其他人，攀来攀去，一下子查出来有四百六十多个方士和儒生犯有嫌疑。秦始皇一怒之下，也不详细审问核实，就叫人在咸阳城外挖个大坑，把他们全都给活埋了。其实四百六十多人当中，真正反对秦始皇的只有少数人，大多数人都是含冤死去的。始皇的长子扶苏觉得这样做太残暴了，他对秦始皇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尚未安定，“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秦始皇对自己的残暴不仅没有



秦陵附近发现的大瓦当

一点点醒悟，相反还将扶苏贬到上郡。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从史书的记载上看，事实比较清晰。但有人认为这件事情的经过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秦始皇究竟坑的是谁？

章太炎、顾颉刚等大师指出，焚书确是事实，但坑儒是没有发生过。秦始皇发怒是冲着方士的，按情理来说当时坑的四百六十个是方术之士而非“诵法孔子”的儒生，至少可以说四百多人中儒生很少。《盐铁论》说：“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术，于是趣咸阳者以千数。”坑杀者中没有方士，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秦始皇时期，儒士在社会上的地位比战国更有所提高，坑方士后，对儒生的社会政治地位并未造成什么影响。之后始皇东巡，齐鲁地区的七十位儒生被任命为博士，跟了他到泰山举行封禅。到了汉代，儒家对这件事也不十分介意，很少有人谈起。西汉中期时，人们谈到这件事，也仅是说“坑杀术士”，没有人说是坑杀了儒士。

首次将这件事说成“坑儒”的是西汉始元六年（前 81）的桑弘羊，然这时离事件的发生远达一百多年，说法的准确性是令人怀疑的。但这种讲法却为后代许多人继承，而且越传越烈。尽管如此，一些儒学大家对此还是比较谨慎，如韩愈、苏轼等人仍然称其为“坑杀学士”、“屠术士”。

大多数人认为坑儒是存在的，这四百多人中儒士占了大多数。而且从一些史料的记载来看，秦始皇的坑儒好像还不止一次。唐朝颜师古注《汉书·儒林传》和孔颖达《尚书正义》中引录东汉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说：“秦始皇焚书以后，担心天下人不按照他颁布的法令去做，遂召诸生，凡是到咸阳的一律拜为郎，前后有七百人。不久密令冬天在骊山坑谷比较温暖处

种瓜。等到瓜结果成熟，他诏博士、诸生谈论这件事。冬天种瓜，儒生们实在搞不清楚，各人谈各人的观点，乱哄哄的。于是始皇让大家前去察看，预先派人在这个地方设置了一个机关。诸生贤儒来到后，大家仍是互相论难不止，始皇命人触发机关，从上面将土往下填，不一会儿众儒生全部被压在下面，没多少时间就没有声息了。”卫宏的记录，当然是得之于传闻，而且这件事情《史记》没有记载。与前面的“坑儒”不知是否为一件事，今天因没有佐证而无法知道。

骊山温谷从此又叫坑儒谷，汉代又把这里叫愍儒乡，有学者考证，该谷在今临潼县西十公里的洪庆堡，洪庆堡过去又叫灭文堡。又据刘修明先生实地考察认为，坑儒谷当在今距临潼西南五里处的一个狭长幽深的山谷里，其地“温泉水脉纵横，瓜果能不按季节而生”。山谷两边都是高坡峻岭，只要投下黄土石块，守住谷口，进的人，别说是数百人，即便是数千人也同样逃不出来。

也有人认为秦汉时期的儒生兼事方术，方士也可能兼事儒术。侯生、卢生为秦始皇寻仙药，显然他们是术士，但他攻击秦始皇的那段话，口气与儒生一模一样。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始皇迷信方术，单纯的儒术明摆着吃不开，所以儒生兼习方术或弃儒专事方术应是很有可能的。

“焚书坑儒”对社会发展是否有利，也是一个历史之谜。

有许多人认为焚书坑儒没有什么好的作用。郭沫若认为：“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林剑鸣等秦汉史专家指出秦始皇下令焚书，使中国文化遭到巨大损失，先秦许多重要文献古籍被付之一炬。秦始皇为追求长生，大施淫威，肆意杀人。充分表现了他的愚蠢和残暴。有人进一步认为：焚书坑儒乃是秦王朝由盛及衰并迅速滑向灭亡的转折点。焚书坑儒的出发点是错误的，方法、手段既残暴又愚蠢，效果是加速秦王朝的灭亡，所以应该彻底否定焚书坑儒。

有人认为对焚书坑儒要进行具体分析，不能走向评价的极端。著名史学家翦伯赞指出，焚书坑儒对于古文献的保存和学术的传授，造成了较大的损失。但是在当时统一与分裂激烈斗争的年代里，秦始皇用这种手段打击复活封建贵族政治的反动思想，又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事。有学者认为，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其进步作用的，但我们并不应该

毫无批判地讴歌秦始皇的这种措施。采取把书烧掉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毕竟对文化的发展十分不利。

也有部分人对焚书坑儒抱着肯定的观点。著名学者何兹全就认为秦始皇的焚书，不能单纯地从焚的观点上来看。秦始皇焚书是两种思想斗争的结果，是当时进步思想和反动思想斗争的结果，是进步派和反动派政治斗争的结果。焚书是禁止"是古非今"反动思想的手段。为了禁止反动思想而焚掉古代文献，手段是粗暴了些，但它却是有进步意义的。坑儒是焚书事件的延续，它的意义和焚书是一样的。学者指出：秦始皇的政治方向在那一历史阶段是对头的，只是在施行的方法上不够技巧。李斯的"焚书"建议并未完全化为始皇的制度，更未完全付诸实行。"焚书坑儒"之后，有秦一代包括儒术在内的文化学术的师授并未中断，《史记》的真实可信被逐步证实，也就从正面否定了"焚书坑儒"对于古文献的保存和文化学术的传授造成了极大损失的说法。至于"坑儒"事件，那是秦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一个典型表现。

今天看来，秦始皇焚书坑儒，目的是想统一思想，压制那些反对中央集权制的思想和言论，但是他的做法太过分了，太残暴了。焚书毁灭了秦以前长期积累起来的文化财富，而坑儒杀害了许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从此以后，秦朝宫廷里真正有学问的人大大减少，而那些专会阿谀奉承、欺上瞒下的奸贼如赵高之流，逐渐成了秦始皇身边的重要人物，秦朝确实是从此开始走下坡路。秦始皇是一个完成伟大统一事业的了不起的皇帝，同时也是一个对人民实行残暴统治的皇帝。

焚书和坑儒两件大事，尽管留下了不少谜团，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两个再怎么也擦不掉的污点。

游荡乡里　刘邦流氓习气之谜

中国历朝帝王中，出身于流氓者有好几个，建立西汉王朝的高祖刘邦就是其中之一。司马迁是这样描写他的："及长，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他落拓不羁，只以游手好闲、交结同道为正业。他与游士相结合，以游民为骨干，因势利导建立了汉朝，当上了皇帝。



汉高祖刘邦

人们常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可翻看汉高祖刘邦的履历，却会觉得流氓也能得天下，这在司马迁《史记》的笔下记得清清楚楚。司马迁对刘邦不隐其恶，不虚其美，用一种隐讳的笔法刻画了一个流氓的无赖相。

汉高祖刘邦出生于沛县丰邑。丰邑秦未置县，汉兴改称丰县。丰县就是今天江苏省沛县相邻的丰县。

刘邦有兄弟三人，长兄名伯，次兄名仲，他自己名季，伯、仲、季就是老大、老二、老三的意思，以排行取名乃是乡间俚俗。刘邦这个名字颇为文雅，据说那是他当了皇帝后起的名，当皇帝之前一直叫刘季。农民子弟无钱入学，他的两个兄长都是文盲。刘邦比较聪明，父亲把他送入乡间学校，读书不多，略能识字与作文，至今刘邦家乡中阳里还保存着他读书时的书塾。乡间缺医少药，大哥患病早死，二哥是个朴实的庄稼汉，埋头陇亩，辛勤耕作，略有节余，稍置产业。父亲赞扬老二干活卖力，持家有方。刘邦却游手好闲、不治产业，被人看作是个不务正业的人。老太公有时也责怪他于家无利可入，认为他没有出息。

其实刘父也是一个游手好闲之徒，平时不治家产，喜欢饮酒，有钱就打酒与人共饮，经常出入乡间市井，肚子饿了，随便买个汤饼充饥。凡是乡里有斗鸡、踢球的事情，他都要插上一手，而且很在行。这种从小养成的习性，直到晚年还是没有改掉。当时刘邦封他为太上皇，住在长安皇宫中，食宿都很豪华，刘邦以为这下他总该高兴了，但出乎意外他总是一副郁郁不乐的样子。刘邦不解，忙问其故，他答称自己从小就乐与屠夫、小贩之流结交，现在

周围没有这号人，很不习惯。刘邦为逗父欢心，选宫内废址，筑成类似丰沛乡里市井风光街一条，以内监充任屠贩、叫卖其中，乐得太上皇流连忘返。

少壮之年的刘邦很多生活习性与他的父亲相似。他的酒瘾很大，是邑市小酒店的常客。手中有钱就现买现饮，无钱则赊酒记账，但他不会赖账，一旦有了钱，他会加倍甚至加几倍偿还。酒家欢迎这样的酒客，混得熟了，如同一家。当他喝的烂醉如泥时，顾不得什么体统，就和衣卧倒酒家床上，成了醉汉。可是后来刘邦当了皇帝，谁都不敢讲他以前喝酒的事情，相反还有人为他粉饰了一些神奇的色彩，说什么刘邦醉卧时，老板娘常常亲眼看到他身上有龙出现，龙体附身正与刘邦后来当上皇帝相符。传说还有两个老板娘居然不计血本，把刘邦一年欠下的酒账来个一笔勾销，这无非是想证实刘邦龙体附身的神异之事。

刘邦结交的朋友也有屠贩之徒，不过比他父亲稍高一个档次，这可能与他的经历有关。约公元前 216 年，时年三十一岁的刘邦被推为泗水亭长。亭长虽只管辖十里以内的民事、诉讼，是个小小的乡吏，但他有机会与县吏打交道。加上刘邦为人豪爽、不拘礼节的个性，很快与同事、上级混得很熟。

不务正业、游荡乡里，使刘邦染上流气，这个习性直至他补秦吏时还依然故我。当时沛县有一外来户，户主姓吕，因与沛令友善，人们尊称为吕公。那些有头面的县吏、乡吏，得知沛令结识了一位尊客，纷纷准备厚礼往贺。主吏萧何负责收受贺礼、贺钱，送礼人不足千钱，只能坐在堂下低等宴席。刘邦囊中羞涩，不要说千钱，就是十钱、百钱也拿不出来，但他要跻身酒宴，怎么办？他急中生智，假装贺客往见，大言不惭地高声喊："贺万钱！"在座的贵宾大为惊奇，自愧不如。他大摇大摆地闯进大门，手中却空无一物，正当诸吏疑惑不解时，不料吕公从贵宾首座中徐徐起身，跨步相迎，引入贵宾之席。

刘邦好说大话，诳骗众吏，自然使主受贺礼的萧何不满，于是当众数落了刘邦几句。但吕公不以为意，居然对这个捉弄他人的不速之客十分看重，其中缘由，据说吕公相中刘邦状貌将来贵不可言，遂有此举。

刘邦与吕公在贺宴上的邂逅相遇，还引出了他大龄得妻的风流韵事。吕公择婿不以男方的家产、地位为重，而从其将来发展前途考虑。传说吕公精通相术，初见刘邦，大奇其人；再相状貌，贵不可言，到底是他的相术灵验，还是后人有意夸大其词，今天不得而知。但尊刘嫁女是事实，不能说此人没

有眼光。

刘邦好发大言，常常会流露出豪迈大志。有一次，他被征发到秦都咸阳服徭役，目睹秦始皇豪华壮丽的出巡，四周簇拥着威武的侍卫、鲜艳的仪仗和无尽的马队，只见到处都是光亮闪闪的刀枪兵器。事后他大发感慨道："为人应做一个大丈夫，大丈夫当如此出人头地。"也许善于察言观色的吕公正是从刘邦的口出大言、必有大志这个角度去认识刘邦的，才会做出常人难以想像的事来。

无赖成性的刘邦即使当上皇帝后仍改不了本性。吕公的女儿叫吕雉，是个奇女子，为人刚毅、生性泼辣，连刘邦也让她几分，但刘邦不喜欢这个带有几分阳刚之气的女人。吕雉既不能使刘邦得到性爱的满足，又严禁刘邦爱上别的女人，好色的刘邦怎能忍受得了。碍于吕后的雌威，只得躲躲闪闪地寻欢作乐。一天，他进入掖庭织室，就忘了自己的身份。室中的织妇都是穷人或犯罪官员被株连的妻女，她们一入织室，就终生与织机相伴，永无见天之日。这时他偶然看见一个美貌的织女，顿时心花怒放，不顾对方的低贱身份，在情欲的驱使下，先是调戏，后则云雨交欢，遂有身孕。问明女子姓薄，封为薄姬，不久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刘恒。不管其母如何低贱，生下的都是龙子。母以子贵，薄姬告别了永不见天日的织室，搬进了豪华的宫殿。她的儿子后来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汉文帝，她被尊为薄太后。刘邦后又迷恋上了一个比薄姬更漂亮、更称心的戚姓女子，薄姬便遭冷遇了。戚女聪明，善察刘邦心意，颇富女性柔媚之态。刘邦日理万机，回到宫室，劳顿不堪，戚姬便百般温存、柔语慰藉，倦怠之意立即消失，顿觉神情清爽，使精力



汉代妇女曲裾



汉代官吏袍服

日耗的晚年刘邦重有了勃勃生机。刘邦十分眷爱这位女子，遂初封她为戚姬，后又封为戚夫人，后宫地位仅次于吕后。

刘邦起于乡里，出自布衣，结交群氓，思想深处不免打上粗野烙印。他从小不喜诗书，虽然曾进入过家乡中阳里的马公书院读书，但他与书不结缘，甚至有厌恶感。当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消息传来时，他竟幸灾乐祸，庆幸自己没有与读书沾过多少边，用不到担惊受怕。想到书烧成灰了，今后大家无书可读，更是喜形于色。长大以后他不喜欢儒生，时时流露出草莽意趣和粗野作风。登位之后，有不少戴儒冠来求见的儒生，刘邦厌恶之余，随手取下对方所戴的帽子，当着客人的面，撒一泡尿在里头。殃及儒冠外，还波及儒袍。秦博士叔孙通身穿儒袍晋谒，刘邦一脸不高兴。事后叔孙通了解底细，马上变通，脱下儒袍，改穿楚服短衣，刘邦马上高兴起来。他虽贵为天子，但身穿短衣，习于楚俗服饰。如此对士人的轻慢，表面上看无礼至极，实际上是刘邦的流气与粗野作风的流露。

楚汉相争中，刘邦凭他草泽英雄的本色，好谋善断，擢用人杰、胸怀大志，终成一代大业。在他的潜意识中，却难以磨灭他的草莽意趣、流气行为，他不掩饰自己的布衣个性，不弄虚作假，显示了他俗得可爱的纯真品格，成为一个活生生的揉流俗于英雄本色的人物。

流氓习气有时也能成大事！

贾后的心病　　晋惠帝痴呆之谜

晋武帝死，惠帝司马衷继位，惠帝生性痴呆，是个白痴皇帝。当他听到人家说百姓没有饭吃，饿死了许多人，觉得很奇怪，便说："这些人为何不吃肉糜？"真是绝无仅有的大笑话。惠帝身后还有一个性情凶狠的贾后，她心病重重，结果把西晋王朝搞得七零八落。

西晋武帝病死，晋惠帝司马衷继位。老皇帝年老病死，新皇帝接班登位，这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过晋武帝死后，即将继位的晋惠帝司马衷是个生性痴呆的白痴皇帝，这着实给中国历史幽了一默。一个千古流传的大笑话就是由他而来：当时各地闹饥荒，地方官上报给朝廷说，灾区老百姓没有

饭吃，饿死了许多人，他觉得很奇怪，忽然灵机一动说："这些人为何不吃肉糜？"大家听了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他在华林园听到蛙声，问左右蛙叫是为了公家还是为了私人？有人为了讨好他而故意回答说，在官府土地上叫的蛙是为公，在私家土地上叫的是为私。

虽然中国封建社会皇帝是世袭制，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个白痴被立为皇太子，且最后继承皇位者，还是比较少见的，晋惠帝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特例，何况他并不是晋武帝的独苗。皇帝一般都有一群儿子，武帝也不例外，共有二十六个。后来"八王之乱"中的八个藩王，就有三个是他的儿子，即楚王司马玮、长沙王司马义和成都王司马颖。还有一个小儿子（第二十五子）司马炽，继惠帝之后，也做过皇帝（怀帝）。他们都不痴不呆，如能继位为君，总要比惠帝好得多。

但当初武帝为什么还要立他做皇太子？惠帝是武帝头一个夫人杨皇后的亲生子。这位杨皇后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幼时夭折，惠帝是次子，还有一个是秦王司马柬。这时，依次序立太子，当然应该立司马衷。但武帝对于这个儿子的智力水平，似乎既有点了解又不大了解，因而对他进行过一次考核，让他对一些政事拟出批文。他的老婆贾妃让人代起草文稿，此人就引经据典写了一大篇。旁边有个精明的家伙说："这样不行，陛下一眼就看穿了，只能就事论事，不可以引用他书。"贾妃就改命此人起草，他果然写得浅显明白。太子也就照抄不误，交给武帝。武帝看了，心中大喜，觉得这个儿子事理还算明白。

武帝立惠帝为皇太子，还有一个原因。原来在太子要纳妃之前，武帝怕太子年幼不懂男女之事，特地派了一名叫谢玖的才人去东宫侍寝，加以诱导。结果谢才人怀孕生子，这就是司马遹。这个孩子从小就玲珑乖巧，在他五岁时，一次宫中失火，武帝登楼观察火势，这孩子恰好在武帝身旁，他拉着祖父的衣襟，要武帝退到火光照不到的地方，说："深夜发生意外事件，应该提高警惕，你是一国之君，应该格外防备意外的事情发生，不可让火光照见皇上。"晋武帝见此孙儿有这等见识，实在是高兴极了。他认为儿子虽然愚笨，但孙子机智、聪明，以后孙子继位，完全可以成为一代明君。考虑到这些，晋武帝决定立晋惠帝为皇太子。

太子无能，妻子贾南风却是个心狠手辣的人。贾妃性情凶悍，生得又矮又黑又丑，做太子妃时，就曾在宫中杀人。有一次，她发觉一个宫女有了孕，

勃然大怒，拿起一支手戟掷去，致使宫女受伤流产。武帝知道了，大为光火，决定把她废黜。这时，贾妃父宰相贾充早已死了，但杨、贾二氏的党羽仍在，许多人都帮她说话，晋武帝的耳根实在很软，听了他们的话，也就把此事略过不提了。

太熙元年(290)四月，晋武帝去世，太子即位，改太熙元年为永熙元年。武帝临终前，本来想使汝南王亮与杨骏一同辅政，但昏迷之中，诏书被杨皇后做了手脚，变成了命杨骏独自辅政。新皇帝当年改元的做法是不合礼制的，当时杨骏大权独揽，可能就是他的主意。

杨骏是个蠢人，他要专权，又怕人害他。他最怕的是大司马汝南王司马亮(司马懿之子)。汝南王亮怕杨骏害他，在城外安营，要求过了武帝丧事，再到许昌接手早已任命的督豫州诸军事的职务。有人却去报告杨骏，说汝南王要动武讨伐杨骏。杨骏害怕，就告诉惠帝母亲杨太后，要惠帝写一道诏书，命司空石鉴率领守卫武帝陵地的军队讨伐汝南王。这次，若非石鉴稳重，未曾轻易听命，可能就会闹出大乱子。但汝南王亮事先得到了这个消息，他和廷尉何勖商议，何勖说："如今朝野都归心于公，哪有公不去讨伐他人，而怕人家讨伐的道理！"他劝汝南王亮主动夺权。可汝南王亮生性胆小，不仅不敢发动，还连夜赶赴许昌，事情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在此之前，杨骏之弟杨济不以兄长的意旨为然，劝他挽留汝南王亮，但杨骏不听。晋朝宗室强盛，外戚若能与宗室合作，天下就可能安宁。但杨骏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杨济就估计到今后杨家的门户是难以保全了。

杨、贾两家也有矛盾。杨芷(武帝第二个杨后，杨皇后的妹妹)和贾南风在宫中已相处了十多年。杨芷每见贾南风有些过失，为爱护起见，常加劝告。贾南风不知她的好意，还怀疑她会在武帝面前说自己的坏话，反而怀恨在心。杨骏则深知这个做了皇后的女人阴险毒辣，每次拟定了诏书命令，给惠帝看过后，就送到里面再给杨太后过目，然后再施行，中间不让贾后有插手机会。贾后对此当然不满，更加嫉恨杨家。

贾后还有一块心病，那就是她自己没有儿子。谢才人生的那个灵巧儿子司马遹已经十三岁了，被立为皇太子，贾后恨之入骨，更不会同意把他的生母升做淑媛，而她目前能够做到的，就是尽量不让他们母子见面，以待将来再采取进一步的举动。此后，她不断唆使太子走邪路，让太监们在太子面前献媚奉谀，使他整日沉溺于宴游玩乐。一次，贾后谎称皇上龙体欠和，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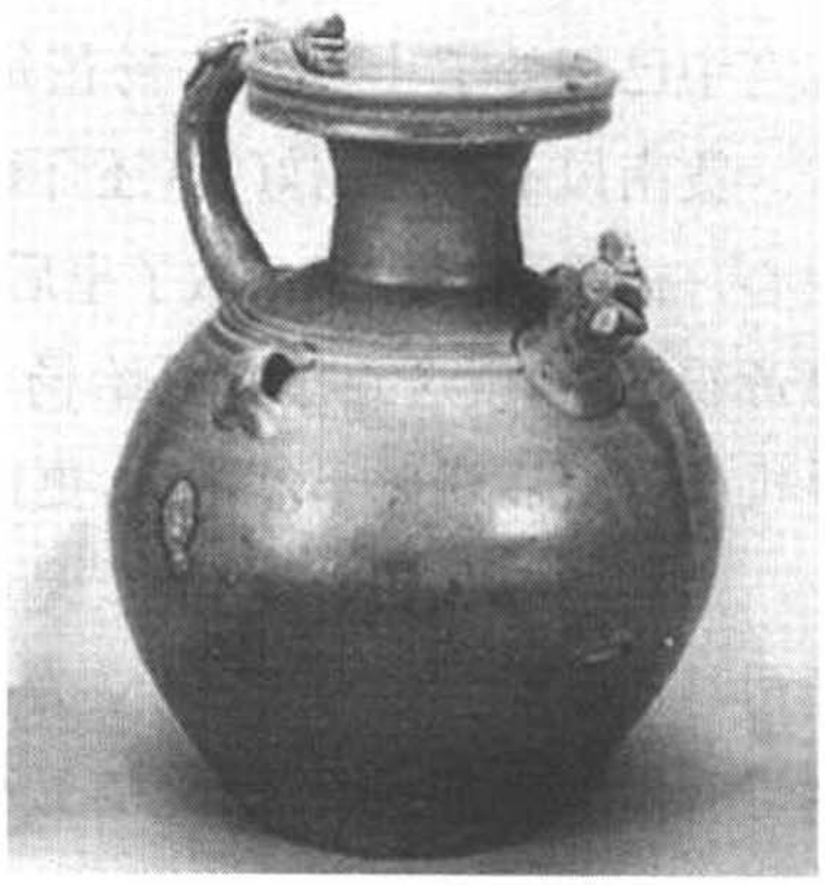
太子入朝。太子到来后，贾后令宫中让太子在别室等候。不一会儿宫女端着酒出来，一诱导太子就喝得酩酊大醉。贾后已事先叫人起草一封用太子口气写的信，内容是逼晋惠帝退位。当太子醉得昏沉沉脑子不清时，贾后骗太子重抄了一遍，上面写道："陛下该自行结束了，不然我会入宫来结果你。皇后也该快自裁，不然我也会来结果你。"

信到了惠帝手中，惠帝虽说是痴呆，但这样的文字还是看得懂的，看完后大为震怒，要治太子死罪。大臣们为太子申辩，认为应该检查传信人，并请求核对笔迹，恐其中有假。贾后拿出太子亲笔写的文件十余张，众臣一比较，无人敢说不是太子所写，但心里疑问不断。贾后恐事有变，先上表让惠帝免太子为庶人，得到了惠帝的批准。太子听说使臣到达，就更衣出领诏书。听完诏书，如五雷轰顶，有口难辩，与妃子王氏及三个儿子，被押到金镛城被囚禁起来。太子的母亲谢才人及宠妃蒋美人被处死。

元康元年(291)，贾后知道杨骏对宿卫将领孟观、李肇一向礼数不周，二人心怀怨恨，她便使宦官董猛与二将密商，准备发动政变。同时让李肇联络汝南王亮，要他起兵反杨骏。汝南王不肯，李肇就转而联络都督荆州诸军事的楚王玮。楚王玮是惠帝的兄弟，年方二十，是个好勇斗狠，喜欢揽权的少年王子。他爽快地答应了，立即向朝廷要求入朝。杨骏了解他的性格，本来对他就不大放心，见他要求入朝，立即同意。他以为楚王玮到了京师，便于控制，却没有想到他是来造自己的反的。



西晋青瓷鸡首壶



西晋越窑鸡头壶

元康元午二月，楚王玮到达洛阳。三月初八晚上，孟观、李肇向惠帝诬告杨骏谋反，贾后立即写好诏书，以此罢免了杨骏官职，同时宣布戒严，命东安公司马繇（司马懿之孙）领殿中兵四百人“讨伐”杨骏，楚王玮领兵守卫司马门（皇宫的外门）。杨骏的外甥段广官居散骑常侍，就在惠帝身旁，他跪下求道：“杨骏没有儿子，岂有谋反之理，请陛下明察！”惠帝听后，呆若木鸡地一言不发。他扮演的是一个傀儡的角色，本来就做不了主。可怜杨骏也是内心虚弱，没有应付非常事件的魄力。众官听了，知道无法挽救，纷纷散走，把杨骏丢在府里等死。杨太后得讯，写帛书射向宫外，号召：“救杨太傅者有赏！”贾后借此声称太后参与谋反，命东安公繇立即领兵出发。他到了杨府，不知虚实，就先放起火来，又命弓箭手从高处向府里乱箭射去。杨骏的卫兵被堵在里面，只能躲起来避箭，不敢抵抗。杨骏逃到马厩里，结果被兵士搜出，乱刀砍杀。孟观等也捉拿了杨珧、杨济以及段广、刘豫等人，全族夷灭，一共杀了好几千人。

第二天，贾后矫诏，命太后移宫，太后母（杨骏妻）庞氏免死，并与太后同居。她一步紧一步，唆使臣下上奏，先是准请废太后为庶人；再准奏庞氏不得免死。可怜这个杨太后，当时抱住母亲，哭哭啼啼地向贾后称妾，哀求免其母一死。可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庞氏终于死在贾后的刀下。次年二月，杨太后也被活活地饿死在金墉城的冷宫里面。

这次政变，可以说是“八王之乱”的序幕。杨氏集团被消灭后，汝南王亮入朝辅政。楚王司马讳因协助贾后政变有功，也以卫将军领北军中侯，在中央握有兵权。亮、玮之间因而发生矛盾。贾后认为亮、玮二人都妨碍了自己专权，便又施展手段，在这一年内，先下诏叫楚王玮杀死汝南王亮，然后又以“矫诏”（伪造诏书）的罪名，杀掉楚王玮。

贾后杀掉亮、玮二王后，大树自己党羽，专断朝政达八九年之久。299年，贾后与太子司马温的矛盾又爆发了。太子是惠帝长子，不是贾后所生，随着年龄增长，对贾后的专横跋扈渐露不满之意，引起了贾后的妒忌。这一年，贾后废掉太子。太子无罪被废，引起一部分拥护太子的朝臣不满。公元300年，他们与当时握有军权的赵王司马伦密谋废贾后，复太子。赵王伦当即答应参与行动。但是，他平素与贾后亲密，害怕太子复立会对自己不利。于是，一面行使“反间计”，挑动贾后用毒药害死太子；一面又借口为太子报仇，领兵入宫，废掉贾后。贾氏党羽也被一网打尽。

赵王伦利用贾后和太子的矛盾，一箭双雕将贾后和太子尽皆除掉，夺得政权。第二年，索性废掉傀儡惠帝，自己做起皇帝来。

赵王伦自己称帝，马上激起其他宗室诸王的反对。齐王司马冏联合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等起兵讨伐赵王伦，赵王伦也调兵遣将迎战。双方的军队在洛阳附近酣战了两个多月，死亡近十万人。结果，赵王伦兵败被杀。齐王司马冏辅政。不久，河间王司马颙联合在洛阳的长沙王司马乂，又对司马冏发动进攻。

303 年，司马颙又联合成都王司马颖，杀掉司马乂，打败司马越，控制惠帝，掌握了中央权力。305 年，东海王司马越再次起兵攻打司马颙。司马颙联合司马颖率军反击，结果战败逃走。次年，司马越的军队攻入长安，把惠帝又劫回洛阳。这年，司马颖、司马颙先后被司马越的势力杀死，惠帝也被司马越毒死。司马越另立惠帝的弟弟司马炽为帝，是为晋怀帝。

一个白痴皇帝加上一个凶悍的皇后，就此把西晋王朝领进了一条死胡同。

狂暴成性　　北齐文宣帝酗酒淫乱之谜

北齐文宣帝高洋酗酒成性，每天脑子昏昏沉沉。他肆意淫乐，连自己的嫂子和老婆的姐姐也要奸淫。他随意杀戮，又屡兴土木，以致公私劳敝，举国骚扰，国库为之空虚，北齐政权渐渐走上衰亡的道路。一个皇帝，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东魏政权建立后，被权臣高欢控制，皇帝实际上只是一个傀儡。东魏后期，国家大权在高欢的大儿子大丞相高澄手里。

高欢小儿子高洋的妻子十分美艳，高澄暗加艳羡。高洋为了不被高澄猜忌，装出一副质朴木讷的样子，还时常拖着两条大鼻涕嘿嘿傻笑。高澄将弟弟视为痴物，对人说："如果这样的人也能富贵，相书上的内容就无法解释了。"从此他不再猜忌高洋。高澄时常调戏高洋的妻子，高洋也假作不知。

高澄被手下刺杀，高洋接兄位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袭封齐王。以前朝中大臣素来轻视高洋，这时高洋指挥若定，处事有条不紊，众人

都十分惊异，从此不敢再藐视他。高洋后又废孝静帝自立，国号齐，史称北齐。当上皇帝后，高洋政治清明，简静宽和，任人以才，驭下以法。他为人果敢能断，外柔内刚，对军国大事规范宏远，有帝王谋略。他练兵甲、筑长城，征然柔、契丹，屡战屡捷，作战时还亲冒矢石，与敌人锋刃相交。当时西魏大丞相宇文泰听到高洋即位后，想乘机发兵进攻北齐。高洋亲自督兵出战，宇文泰看到北齐军容严盛，不禁叹息道："高欢有这样的儿子，虽死无憾了！"于是引军西还。

为帝六七年后，高洋志得气昂，酗酒成性，渐成狂暴，前后判若两人。有士兵在战场上受伤，看来很难救治，高洋索性下令将他们刳挖五脏，令人分食。此后视人如畜，割烹炙，几成为家常便饭。醉醺醺的高洋有时一个人袒露形体，面施粉黛，披头散发，穿着不伦不类的衣服，拔刀张弓来往街市，有时在寒冷的冬天脱去衣服一路狂奔。

喝醉了酒，他又想到了色。他遍召娼妓到宫中，让她们脱去衣裳，与周围的侍卫从官云雨为乐。自己淫兴勃发后，就让娼妓躺卧榻上，任意奸淫，不避众人。甚至将东魏元氏和自己本族高氏妇女都征集起来，视如娼妓一般。他先选择几个上前，逼令脱下衣服供其淫污，诸女稍有不愿，立即拔刀将其杀死。高洋还玩弄男色，他见彭城王容貌俊秀，就把他召入后宫，为他剃去胡须，涂上粉黛，充作嫔御。

纵欲成性的高洋到了失去理智的地步。高澄死后，他的妻子元氏被高洋尊为文襄皇后，居静德宫。一天他突然想到了她，说："我兄曾经奸淫我妻，我今天应该报复他。"于是入元氏卧室用刀相迫。元氏不敢逆意，只能随其玩弄。高洋母娄太后听到这件事，举杖打高洋，说道："你父亲如此英雄，这么生出你这样的儿子，和你那哥哥一个样！"

高洋受杖数下，就起身奔出，回头对太后说："我要把你嫁给胡人！"娄太后大怒，从此后再也不复言笑。高洋也觉得自己过分了，想要引太后言笑，屡次向太后前谢罪，太后怒气未平，始终不正眼看他。高洋自觉无趣，只好饮酒解闷，喝醉后又来到太后宫中，说自己很后悔。见娄太后仍然面无笑容，他举起太后的坐榻，太后没有想到他会这样，突然摔倒在地。高洋大为惭恨，要投入火中自焚。太后亲自抱持，勉强笑了几下，说高洋又喝醉了。高洋因此戒酒，但只戒了十多天，又酗酒如初。

清河王高岳性爱酒色，曾召邺下歌妓薛氏姊妹到家里喝酒行乐。后来

薛氏姊妹入后宫，被高洋宠爱。薛氏姊为父亲求司徒的官职，高洋勃然大怒："司徒大官，岂可求得？"薛氏姊恃宠而出言不逊，竟被高洋用锯子锯死。因为薛氏姐妹曾与高岳一起喝酒有奸情，高洋就以鸩酒赐高岳，高岳无奈只好服鸩而亡。高洋仍不解恨，亲自砍下薛氏妹的头，藏在怀中。酒宴上，群臣列席，大家相互劝酒，气氛很欢洽。高洋突然从怀中取出薛氏的头，放在盘子里，众人大惊。接着命左右取薛氏的尸体，当场肢解，边饮酒边哭泣，说："佳人难再得。"然后载着薛氏的尸体外出，高洋披头散发，哭泣相随，亲自殓葬。

高洋的举动越发不能使人理解，事情做得一件比一件残酷。一次高洋去皇后李氏的母家，后母崔氏出迎，不防高洋突射一箭，正中崔氏的面颊。崔氏惊问何因，高洋怒叱说："我醉时尚不识太后，你一个老婢何事？"接着用马鞭乱击百余下，打得崔氏面目青肿，方才纵马驰去。他又到彭城王高浟的家里，高浟的母亲尔朱氏虽已中年，但风韵犹存。高洋突觉欲火中烧，当下拉住尔朱氏，欲与之交欢。尔朱氏不愿想跑开，高洋大怒，随即拔刀砍去，尔朱氏头破身亡。高洋又去安乐王元昂家，元昂的妻子李氏是皇后的姐姐，颇有姿色，正好元昂外出未归，李氏出迎。高洋入室后，便将李氏拥住，李氏惮他淫威不敢拒绝。从此高洋一再去元昂家里找李氏，并打算纳李氏为昭仪。他召元昂入便殿，引弓射了元昂百余箭，血流满地，当场身死。

这时的高洋狂暴成性，杀人如同儿戏。他将大镬、长锯、锉、碓等陈列在金銮殿上，每次喝醉后动辄以杀人为戏。他从早到晚不停地喝酒，同时从早到晚不停地杀人。左丞卢斐、李庶，及都督韩哲、尉子辉，都无罪遭戮。宰相杨愔被高洋视若奴隶，用鞭笞杨愔的后背，流血盈袍。一次令杨愔露出腹部，欲以小刀剸开他的肚皮，多亏崔季舒在旁边解围，杨愔才免去一死。杨愔因高洋爱好杀人，就挑选邺下的死囚，号为供御囚，给高洋玩乐。如果三个月没有被杀，就赦免回家。

大臣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勇敢的典御丞李集面谏，将高洋比作桀纣，高洋大怒，令人将李集捆起来扔到水里，过了很长时间拉上来。又问李集："我与桀纣是否一样？"李集正色说："恐怕尚不及桀纣！"高洋又将他扔进水里。如此一连三次，李集对答如初。高洋大笑说："天下还有如此痴人！"就挥挥手让李集走了。不久李集又打算进言，高洋看出他的意思，就令左右将李集驱出腰斩了事。高洋幼时，宰相高隆之曾对他不礼貌，突然记起前恨，下令

把高隆之杀掉。他还不够解恨，把高隆之二十多个儿子唤到马前，让卫士群刀齐下，看着人头同时落地，他开心得笑了。

永安王高浚是高洋的三弟，小时候高浚曾因事责备过高洋，因此怀恨在心。高洋即位后以槊刺高浚，被高浚将槊拉断。高洋大怒，把高浚关在铁笼子里，命壮士用槊往笼中乱刺，惨呼声震彻远近。高洋命在笼中点火，然后加填土石。后来掘土起尸，高浚皮发皆焦，遗骸如焦炭。尚书右仆射崔暹屡有谏诤，高洋念他是故旧大臣，格外容忍。不久崔暹去世，高洋亲往吊丧，问崔暹的妻子李氏："你思念故夫么？"李氏随口答说："怎会不思！"高洋笑说："既然思念，何不去看看他？"说着拔刀一挥，李氏头落，高洋拾起人头扔在墙外。

太子高殷儿时由儒生辅导，礼士好学，颇得令名，高洋常嫌他不像自己，以为怯懦不能即位，意欲废之。一天，他登览金凤台，召太子随侍，让太子手刃囚犯。太子恻然，面有难色，不肯下刃。高洋用马鞭抽太子，太子被吓得神经错乱，自此得了间发性的精神病。

高洋因酗酒过度而成疾，他精神恍惚，常自称见到了鬼，或听到怪异的声响。到三十岁时，已经生命垂危了，不能正常进食，每天只能喝酒度日。不久得了暴疾，喉间好像有硬物哽住，不能下咽，去世时三十一岁。

过去，人们认为高洋是酗酒乱性，酒后败德，把这一切狂暴行为用过度饮酒来解释，但也有很多学者对高洋的举动表示出了怀疑，为什么几代北齐帝王都是凶淫荒唐的人物，所作所为让人不可思议？高洋这个最典型的暴君，是否有遗传的精神病因子？有学者采用现代精神分析方法对北齐帝的行为进行分析，断定北齐帝具有精神强迫症。当自己小的时候受到外力的逼迫，性格扭曲，被迫在人前装出一副傻相，躲过了随时会遭受杀戮的危险。长大后，他也能够如同自己的哥哥一样掌握生杀大权，而自己的行为又不受任何制约的情况下，他的压迫症强烈爆发出来。以前他自己曾时刻担心脑袋搬家，现在可以随意让别人的脑袋搬家；以前自己心爱的妻子曾被百般欺辱而自己不敢有丝毫反抗，现在可以任意奸淫他人的妻子，这种种行为都是强迫症的典型表现。

到底是精神病还是喝酒喝成这个样子的，看来的确需要学者们好好研究一下。

看破世相　　梁武帝舍身入寺之谜

梁武帝萧衍纵情佛教，为了希求功德，造福来生，他大事营造寺院佛塔，施舍僧尼，还曾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开了中国历代皇帝佞佛风气之先。这也说明梁朝的政治腐败没落到了极点。最后经侯景一击，梁朝全面崩溃了。



梁武帝萧衍书《异趣帖》

梁武帝，姓萧名衍，字叔达，汉相萧何二十四代孙。于502年代齐而立，建立梁朝。

萧衍年轻的时候崇信道教，希冀长生不老、羽化成仙。后来，在竟陵王萧子良的启蒙下皈依了佛门。萧子良与萧衍同族，喜爱结交四方宾客。在风景秀丽的鸡笼山，他组织了一个文人社团，其中有沈约、谢朓诸名士。萧衍加入后，一共有了八个人，时称“竟陵八友”。萧子良说的：“欲看破世相，洗心灭累，了生死究竟，唯有顿悟成佛。”这番开示，成了萧衍信仰的转折点。

萧衍称帝三年后，便下诏宣布自己舍道事佛。并要求王公贵族，文武百官等“返伪就真，舍邪入真”。从此，梁武帝遵照在家居士的戒律修行，礼佛颂经，吃素念佛，广建佛寺，优待僧人，敕僧译编佛教典籍。他将三宫六院裁去了大半，自觉禁断了一切房事，早晚一心念佛诵经。后来觉得在宫禁中做佛事仍不够虔诚，于是在京城北掖门外路西选了一块风水宝地，敕建同泰寺。城北又别开一门，名大通门，正对同泰寺南门，往来就方便多了。同当时的智度、光宅、法王、开善诸寺相比，同泰寺最为壮丽。梁代仅建康城就有

五百余寺，分别供养数以万计的和尚、尼姑，萧衍将兴建佛寺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萧衍初到同泰寺做早课、晚课，僧人们为示敬意，都要鸣钟击鼓。后来萧衍嘱咐说："佛说众生平等，我虽为皇帝，也是佛门弟子，不应如此标榜。"这项仪式就取消了，萧衍独自静悄悄往来，觉得十分自在。他在寺中博览《涅槃》、《净名》、《三慧》等佛书，写下了很多心得笔记，流传至今的有《人品注解》，《制旨大集经讲疏》，《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等。

寿光殿被辟为全国的译经中心。扶南（今柬埔寨）沙门曼陀罗，僧伽提婆及西印度的真谛法师都不远千里应邀而来。萧衍以国宾礼遇，自称弟子。真谛翻译《摄大乘论》时，萧衍亲临法座，记录口译内容，审核文义，润色字句，天冷冻得手都开裂了，仍照样抄录不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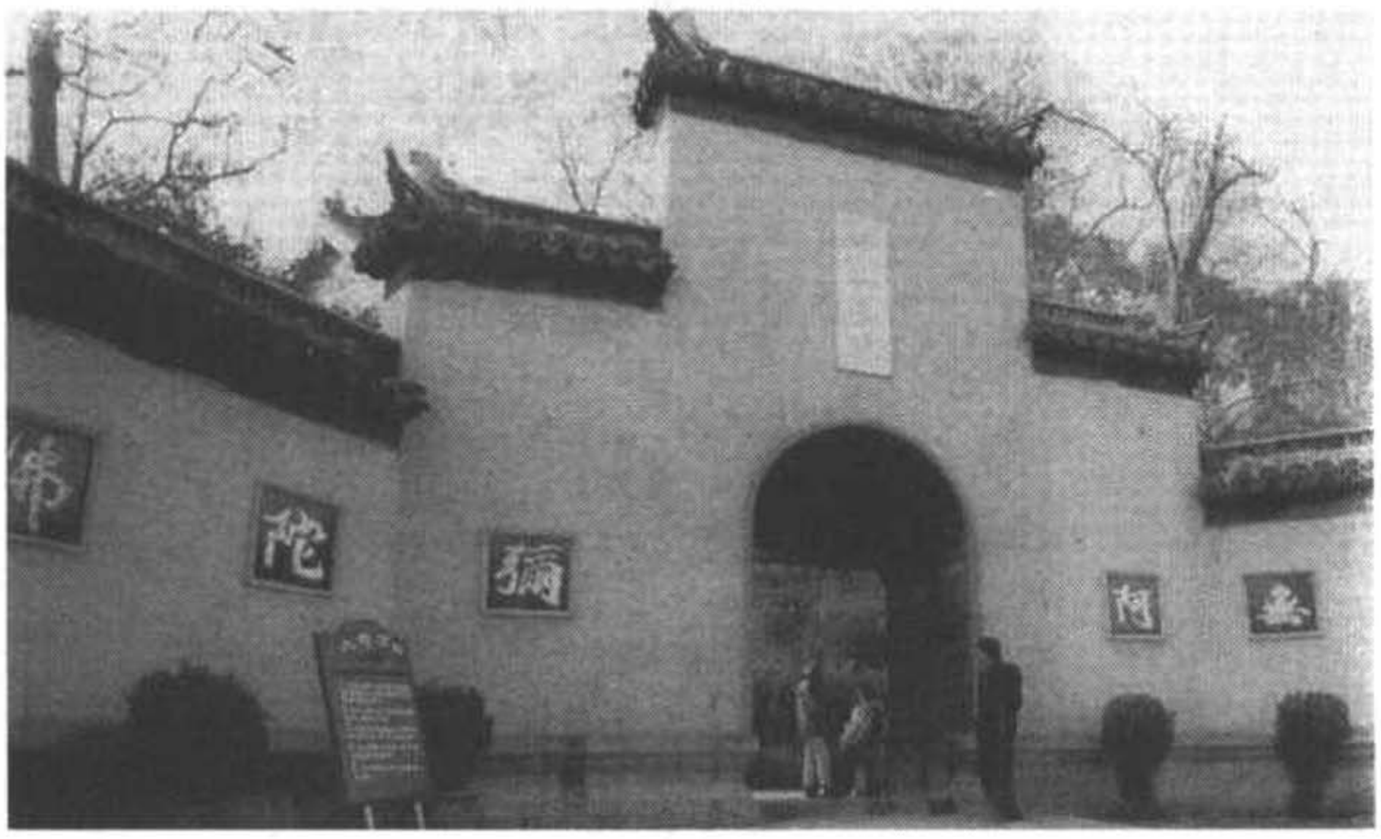


梁武帝像

大臣郭祖深见萧衍大弘释典，不思朝政，深以为忧，便上疏进谏。他说眼下全国僧尼有十余万人，和尚蓄养白徒（男奴），尼姑使唤女婢，天下户口逃亡过半。又占据沃野良田，养尊处优，吃肉饮酒，甚至连寺中婢女也穿绫罗绸缎。理应加以检括，令四十岁以下的人还俗附农。萧衍接奏后亲自撰写了《出要律仪》，重申出家人的纪律，分发境内，要法云监督执行。萧衍受戒后，取法名冠达。又写了一篇《净业赋》，每天只吃一餐，餐餐食素，祭祀宗庙也用蔬果代替了牛羊，生病也不服药，因为照他看来，病菌也有着宝贵的生命，不可随意杀伤。天监十二年，萧衍作《断酒肉文》，集诸沙门，佛前立誓：永断酒肉。由于萧衍的提倡，汉代以来僧徒食"三净肉"的习俗被改变

了，素食成为汉传佛教的一大特色，这对后来佛教徒的生活影响很大。

形与神的相互关系是当时佛教的主要题目之一。宜都太守范缜不信鬼神，认为人死后，心也就死了，佛也就没有了，著《神灭论》攻击佛教。这个观点一传开，建康城内一时舆论鼎沸。萧衍亲自组织了对范缜的反攻，发动名流硕学、王公朝贵六十多人和范缜展开辩论。软硬兼施失败后，萧衍亲自披挂上阵。他写了《敕答臣下审〈神灭论〉》的檄文，让法云放在光宅寺的佛祖前，号令王公朝贵一起声讨。建康城一下子热闹起来了，呼应声援的文章像雪片一样飞到了光宅寺。店肆香烛，抢购一空。与此同时，萧衍大做水陆斋会、盂兰盆斋等布施斋会，举行“四部”（僧、尼、善男子、善女人）无遮大会、无碍法会，动员数万人参加，亲自讲解《大般若涅槃经》、《摩诃般若波罗密经》及《金字三慧经》等，现身说法。一时佛教的光芒重又照遍人间，而且愈来愈炽烈。



梁武帝曾四次舍身的同泰寺，就是现在的南京鸡鸣寺

在萧衍的大力倡导之下，南朝佛教很快达到极盛，仅京城建康一处，寺院就多达五百余所，僧尼十万余人。他亲自敕建的寺院就有大爱敬、智度、光宇、解脱、开善、同泰等等。唐朝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中写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形象地描绘出南朝佛教的盛况。

大通元年（527）仲春，六十四岁的萧衍决心舍身同泰寺。所谓舍身，一是舍资财，即将个人所有身资服用统统施舍给寺庙，一是舍自身，即自愿入寺为僧众执役。整个舍身仪式作了精心安排，十分壮观。

萧衍这次舍身，一共在寺里住了四天。以皇太子萧纲为首的众大臣携了两亿钱来赎皇帝。萧衍概不接见，请慧令带去一封信。上面写道：“众卿

厚意，我很感谢。但我已舍身，奈何奈何。”署名“萧衍顿首”。最后，他几乎硬是被大臣们抬了出去。

二年后的九月，他再次舍身，公卿们以钱一亿万奉赎，十月还宫，这次总共十六天。第三次是在中大同元年(546)，八十三岁的梁武帝再一次舍身。这一次更苦，他连自己、宫人、国土都布施出去了，这一次大臣们用了两亿钱才把武帝赎了回来。太清元年(547)三月，萧衍第四次舍身，又是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四月回宫，这次他在同泰寺前后长达三十七天。群臣奏表上书，都称萧衍为“皇帝菩萨”，这年他已是八十四岁的老人了。一个皇帝却在做这等儿戏般的宗教迷信活动，标志了梁朝的统治已经腐朽没落到了极点。

这年，北魏怀朔镇将侯景归降。二年后，侯景发动兵变反叛，大军长驱直入建康。萧衍被重重包围，气急之下染了重病。可他仍坚持不服药，吃斋不误。粮食吃完了，守兵纷纷逃去，只留下萧衍一人伴守佛灯。几天后，人们发现了他骨瘦如柴的尸体，显然是被活活饿死了。

梁武帝以九五之尊皈依佛门，严持净戒，大弘佛法，广做佛事，实为稀有难得，令人哭笑不得。

千古唾骂　石敬瑭称儿皇帝之谜

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原是后唐皇帝的女婿，拥兵一方，但是他借助契丹的军事力量，推翻后唐政权，建立了后晋。为了得到契丹人的帮助，他甘做儿皇帝，割让燕蓟十六州，遭到人们无情的唾骂。

契丹是五代时期在我国北方出现的一个强大民族。公元907年阿保机建契丹国，938年其子辽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乘着中原地区军阀混战，契丹人在灭后唐、立后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石敬瑭，唐朝沙陀部人，父亲名叫臬捩鸡，据说是汉景帝时丞相石奋的后代，但欧阳修《新五代史》中说不知道这个姓的最初来历。臬捩鸡很勇猛，也善于骑射，辅佐李克用和李存勖，屡立战功，升至刺史。石敬瑭为了表示自己是真正的汉人，就改了现在这个名字。他是父亲的第二个儿子。后唐明宗李嗣源对他很器重，而且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并让他统领自己的

亲军精锐骑兵“左射军”，将他视为心腹之将。

李嗣源是五代时期政治比较清明的帝王，但他没有培养出有能力的继位者。在他死后，他的几个女婿，如掌握兵权的石敬瑭、赵延寿、杜重威等先后一个个向契丹投降，与后唐为敌。继明宗的闵帝李从厚十分软弱，很快被明宗养子末帝李从珂杀掉。李从珂即位不久，就把与他关系不好的石敬瑭刺激了一下。他让石敬瑭从太原调到郓州去，石敬瑭不肯。于是他发兵征讨石敬瑭，并且杀掉石敬瑭在洛阳的子弟四人。石敬瑭要对付末帝，就令掌书记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甚至对于比自己年轻得多的耶律德光“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为献。表至，契丹大喜，复书许俟促秋倾国赴援”。

清泰三年(936)九月，耶律德光率骑兵五万援救被后唐军队攻打的石敬瑭，后唐军队没料到契丹军队会突然出现，被石敬瑭和契丹军队包围在晋安寨。末帝派心怀叵测的军阀赵德钧父子从幽州出兵，而赵德钧却与契丹联系上了，要求支持他自己为中原王朝的皇帝，所以行动缓慢。石敬瑭怕赵德钧夺去他行将到手的帝位，派桑维翰向耶律德光苦苦哀求。耶律德光最后同意了石敬瑭的请求。同年十一月，设坛晋阳，备礼册命，并让石敬瑭“永为我藩”。

后唐军队在晋安寨遭到了契丹军队的痛击，全军解体，耶律德光派骑兵五千送石敬瑭赴洛阳做皇帝。石敬瑭应约割幽、蓟、瀛、莫等十六州给契丹，并且同意每年输帛三十万匹，其他的吉凶庆吊，岁时馈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契丹大小官员处石敬瑭每人都送上一份好处。石敬瑭还称比自己年轻十多岁的耶律德光为父皇帝，事之甚谨。

对于这个出卖国土换来的儿皇帝，历史上还是有人认为是天意使他登上了帝位。有人用一些离奇的传言附会他。石敬瑭是后唐明宗的女婿，在宫中人们称他为石郎。在李从珂进攻洛阳时，石敬瑭从太原领兵赶去，据说当时京城夜里有很多狼乱窜，不少跑进了皇宫里，李从厚便让人射狼。因为“射”与“石”音相近，“狼”又与“郎”同音，因此用这件事影射石敬瑭。还有一件事说在后梁初年，潞州有百姓伐树，树倒后竟分成了两半，里面有六个字：天十四载石进。朱温将树藏到库中，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等到石敬瑭当了皇帝，就有人出来说，从后唐李存勖建国到石敬瑭称帝正好十四个年头，“天”指的是李存勖在天祐二十年继位。而“石进”指的是石敬瑭建立后

晋，“进”和“晋”同音。在古代社会，神灵和迷信盛行，有的是百姓用巧合的事附会，有的却是当权者或者皇帝本人授意他人故意编造的。

石敬瑭这样的做法，从古至今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北宋薛居正在编《旧五代史》时就说：“图事之初，召戎为援，猃狁自兹而孔炽，黔黎由是以罹殃。”今人的评价更是直白尖锐，如范文澜说：“石敬瑭拜契丹主当父亲，并且出卖广大土地，另加岁贡帛三十万匹，换取一个儿皇帝的称号，在五代皇帝中，他是罪大恶已极的可耻人物。”很多人认为石敬瑭使广大的北方地区长期沦为外族统治，这是令人无法接受的，他是出卖中原人民利益的大罪人。

不过一些学者认为石敬瑭之所以甘做儿皇帝，是有一定缘由的，如果仅用“屈辱无耻”与卑鄙来谴责他，并不能圆满地说明问题。像石敬瑭这样甘做契丹附庸的人，在五代时不只石敬瑭一人。石敬瑭勾结契丹自助，只不过是隋唐以来一些方镇军阀的一种故伎重演而已。石敬瑭只图称帝夺权，不顾名节人格，事属可耻，但又须看到，这是与契丹的家长制政治有关。契丹在唐末以前，社会制度比较落后，只是到了阿保机时期，才由部落联盟发展成为奴隶制汗国。这使得新的国家领导人，既以君主的身份，又习惯于以家长的身份实行统治。他要求臣民更多地像一个家庭成员，即儿子、孙子那样服从自己，接受自己的统治。这是契丹主屡次要求屈服于他的中原政权的头目称儿皇帝的根本原因。

年龄问题也是石敬瑭被人骂的一个因素。石敬瑭称儿皇帝时已经四十五岁，而耶律德光仅三十四岁。其实石敬瑭自称儿皇帝的地位，早在他草表求救于契丹主时即主动提出。石敬瑭出身于沙陀族，而这个民族氏族公社遗习相当严重，养子之风很盛，但养了往往并不和养父在年龄上相当。石敬瑭称儿实质上具有耶律德光养子性质，其年龄上的不相称，以氏族养子的习惯来看，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耶律德光多次让石敬瑭上表时称臣，但作书时称儿皇帝，如家人礼，契丹和后晋就成了“父子之邦”。因为历代很多人无法摆脱汉人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对这个问题就十分敏感。封建时代的官员尊君为父，如果是少君老臣，那就不是与石敬瑭差不多吗？

契丹割让幽蓟十六州，责任不全在石敬瑭身上。长城以北的少数民族在东汉末、西晋至北朝、唐代都曾进入长城以南，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当时激烈的民族矛盾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十六州的确是北方藩篱，但胡三省在《资治通鉴》的注文中已经谈到自撤藩篱并不始于石敬瑭。

幽蓟十六州主要影响在北部防线。东部防线因后唐时营、平为契丹所取，早已不守，幽、蓟、顺等州实际上已成为契丹势力范围。石敬瑭割十六州后的影响是比较严重的，因为辽的南扰大体都从幽、蓟与云、应两个方向而来。但总不能把契丹之所以南扰的责任全归罪于石敬瑭。

反对这种观点者认为，石敬瑭遭到千古唾骂是罪有应得。因为其一当儿皇帝是他主动提出的；其二他当儿皇帝的前提条件是出卖领土，他是甘心充当契丹的傀儡；其三他事契丹"甚谨"，克尽了"臣道"。契丹是有一些与汉人不一样的风俗，但这也仅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他们怎么会要求他国君主必须服从于他们的习俗？在契丹与中原几个王朝的关系上，也并非都是"论父子之义"、"为父子之邦"的。为了做个儿皇帝，石敬瑭出卖了幽蓟十六州，这连契丹人自己也认为是这样的，如耶律德光曾说："我无心南来，汉兵引我至此耳。"按这种看法，称儿皇帝是石敬瑭自甘堕落的结果。

另有人认为，契丹人有收继养子及外姓人入族的习俗，辽代皇帝特别喜欢与中原各朝皇帝之间义结父子、兄弟，都可视作这种习俗的外延表现形式。唐末五代之初，阿保机就与李克用结义，约为兄弟。李克用死，其子李存勖向契丹求救，阿保机曾说："我与先王为兄弟，儿即吾儿也，宁有父不救子耶？"尽管除掉李克用时，契丹和后梁是联手发动攻击的，但当李存勖上门，阿保机还是想到当年的结拜。李存勖死后，后唐告哀使至，阿保机装出痛苦的样子大哭了一番，口口声声"吾儿"如何如何。

契丹之所以支持石敬瑭，最能打动耶律德光的是事成之后可割地入契丹。当石敬瑭派人至契丹许割燕云求兵为援时，耶律德光说："我非为石郎兴师，乃为天帝敕使也。"原来是契丹在阿保机时就想得到后唐的土地。石敬瑭当上皇帝后，耶律德光与他"执手约为父子"，表面上是契丹的风俗形成了石敬瑭的儿皇帝，但问题的实质是契丹的心思一直在"雁门以北及幽州之地"上。当上儿皇帝后，石敬瑭对辽帝唯唯诺诺，奉表称臣，辽帝"屡止晋帝上表称臣，但令为书称儿皇帝，如家人礼。"契丹的目的就是想利用这种不平等的"父子国"关系，通过后晋傀儡政权，控制中原地区，以输掠更多的财物入契丹。

石敬瑭死后，其子石重贵继位，是为晋出帝。石敬瑭在世时，后晋朝野上下已对其割让疆土，称儿臣于辽颇多不满。石重贵为了平息众怒，向契丹申明称孙不称臣，使契丹"爷爷"大为恼怒，当着晋使就斥骂石重贵，于是契

丹与后晋绝交，两国关系破裂。三年后耶律德光率大军攻入晋都开封，灭掉了后晋。

这种观点强调，结义是契丹民族传统文化内涵的一种表露，利用了这一点，耶律德光执政期间就恃“册立之恩”，以不平等的“父子”亲戚关系，得到了后晋拱手相让的雁门关以北、长城以南的十六州广大地区，每年还要勒索白银和绢帛，这才是石敬瑭能够当上儿皇帝的真实原因。

但要真正解开“儿皇帝”的来源，看来还得假以时日。

弑君自立　　金完颜亮嗜杀之谜

海陵王完颜亮是金朝历史上的第四个皇帝。他的皇位是通过发动一场政变杀死金熙宗后而夺得的。即位后，他大肆残杀宗室，甚至连自己的母亲也不放过。有人认为他如隋炀帝般好杀淫乱，有人认为弑君杀母都是迫于政治所需，无可厚非。事实到底如此？

金朝历史上，海陵王完颜亮是一位很有影响的君主。《二十四史》之一的《金史》说他是“天下后世称无道主以海陵为首”，把他说成是个一塌糊涂的残酷君主。清朝有个叫赵翼的著名史学家说完颜亮“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而过之”。齐文宣是北齐开国皇帝高洋，以好杀淫乱出名；隋炀帝是隋朝的第二个皇帝，一生穷奢极欲，最后将好端端的隋王朝断送给唐高祖李渊。到了近代，一些人对他的看法来了个彻底改变，有人说他功劳超过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是个杰出的改革家，有人还将他与秦始皇、唐太宗相比较，说他“英锐有大志”。这种走向两个极端的评价，究其原因，其实是历史学家们各取所需得出的，因为完颜亮这个人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是个多面性的人物。他一方面通过政治经济改革，建立起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另一方面他荒淫无度，残忍嗜杀，导致了自己最后的失败。在众多的事件中，完颜亮的弑君篡立和杀母，一直为后人所注意，但大家的看法完全不一致。

完颜亮的上台即位，是通过弑君来实现的。

北宋政和五年(1115)正月，金朝开国。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灭掉辽国，又攻占开封，宋徽宗父子被俘。当南宋建立时，金朝拥有东起淮水、西至秦岭

的北方之地。1135 年，金太宗完颜晟病死，太祖的长孙，完颜宗峻的遗孤，刚满十五岁的完颜亶继位，是为金熙宗。其时宗室权贵争权夺利，发生两次大火并，许多人死于非命。第一次是吴十谋反，包括金太宗子宋国王完颜宗磐在内的许多宗室伏诛。第二次是左丞相完颜希尹等人谋反，又死了很多人。之后，金太宗的子孙们以为完颜宗磐复仇为名，蠢蠢欲动，新的动乱爆发在即。面对宗室大臣暗中举动，金熙宗大伤脑筋，只好借酒浇愁。末年，他精神失常，酗酒妄杀，诛戮忠良，不理政事，偌大的金朝岌岌可危。

完颜亮是阿骨打的孙子，完颜宗干的次子。生母大氏，由于不是女真人，是渤海皇室的后裔，而且还是个妃子，在宗干诸妻妾中常遭歧视，受到宗干正妻徒单后的钳制，大氏每日都是小心翼翼。完颜亮十八岁时到军队中任职，官为骠骑上将军。但第二年完颜宗干突然病死，没有了在朝中极有权势的父亲，完颜亮顿时失去了依靠，此后只能靠自己一步步地往上爬。几年中，他由中京留守升至左丞相、太保兼都元帅。到了这样高的地位后，完颜亮就经常在想，熙宗是太祖嫡孙，嗣为皇帝，自己是太祖长子的后代，同样是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之后，他在中京树立自己的威望，为夺权作准备。猛安萧裕经常与完颜亮议论天下大事，揣知他有野心，便鼓励其策划政变。

金皇统九年(1149)正月，熙宗遣宫中寝殿近侍大兴国送完颜亮生日礼物，悼平皇后也附赐礼物，熙宗知道后大怒，派人鞭打大兴国，夺回所赐礼物。完颜亮由此不自安，疑心日增，产生了杀害熙宗的企图。冬十二月，完颜亮会同左丞相唐括辩及仆散师恭、徒单阿里出虎、完颜秉德等人，经过周密策划，并用犀带及自己所乘的“照夜白马”高价收买了大兴国。大兴国掌管寝殿符钥，因无罪受杖责而怨恨熙宗，他与完颜亮约定，十二月初九夜行事。这天深夜，护卫长仆散忽土和徒单阿里出虎当值，大兴国矫诏开宫门，放完颜亮等众人入寝宫，仆散忽土和徒单阿里出虎举刀便刺还睡在床上的熙宗，熙宗滚倒地上，完颜亮上前再刺一刀，熙宗当即死去。众人连夜让完颜亮坐到皇帝宝座上去，行君臣之礼，三呼万岁。这样金朝第四个皇帝就上台了。完颜亮还立即假传熙宗诏旨，骗杀了曹国王完颜宗敏、左丞相完颜宗贤。

问题是这样的弑君自立，事实比较清楚，后人是否应该认可？有人认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杀死无道国君，向来是被接受的。金熙宗后期皇后干政，不立太子，自己又纵酒放肆，神经兮兮，已失去了治理朝政的起码条件，这种

"弑君篡立"是无可责难的。完颜亮是在被熙宗十分猜忌、个人命运朝不保夕以及金王朝处于风雨飘摇的形势下，铤而走险夺取皇位的。不过也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完颜亮在熙宗即位之时就怀有觊觎之心，他的胸中一直充斥着权力欲望，他的弑君是蓄谋已久的而不是被迫的，更不是为了挽救金朝统治的壮举。此外还有人认为完颜亮弑君是改革派内部的权力之争。金熙宗和完颜亮都是女真族的改革派，完颜亮想取代金熙宗为皇帝是蓄谋已久的，是改革派内部争夺帝位的斗争。究为如何，看来已经很难说得清了，只能留待历史学家们去争论了。

完颜亮上台后，掌握了生杀大权，为排斥异己势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大杀宗室中反对自己的女真贵族，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金熙宗时，对宗室实行比较优厚的政策，金太宗的儿子们都有自己较大的势力。等到完颜亮上台时，太宗的儿子在河朔、山东、真定等地任职，占据着要冲之地，如果一旦有变，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完颜亮在上台后的第二年就向太宗一系子孙开刀，完颜卞、完颜宗哲、完颜京、完颜宗雅、完颜宗义等太宗子孙被杀的有七十余人，太宗后代全部死绝。出于同一目的，久握重兵在外的宿将老臣完颜撒离喝也被杀。此后，他又借故把宗室完颜宗本、完颜宗美、完颜宗懿、完颜秉德等人尽行诛杀，遂使宗翰子孙三十余人、斜也子孙百余人、谋里也子孙二十余人等众多宗室大臣满门除绝。

完颜亮不但杀宗室大臣，而且还把他的嫡母徒单氏也杀了。徒单氏是宗干的嫡妻，完颜亮的生母大氏是妾，在平时的生活中就得看徒单氏的眼色行事，大氏"事之甚谨，相得甚欢"，通过小心谨慎，来换得表面上的平等关系。对此，完颜亮看得十分清楚，对徒单氏耿耿于怀。1161 年完颜亮要调集大军伐宋，徒单太后竭力反对。想想年少时就受其气，完颜亮脱口就骂："非朕母，乃梁宋国王之小妻也。"接着派遣大怀忠、习失、高福等人将太后杀戮于宁德宫，并将太后侍婢十余人一并灭口。杀死了太后还觉得不过瘾，又投其骨于水，几近疯狂的地步。

完颜亮曾经说过自己平生的志向有三条，其中的第三条是"得天下绝色而妻之"。完颜亮特别喜欢女色，他借口要"广嗣续"，为自己大设嫔御，将大批美女纳入内宫。他把人诬杀之后，见到妻女有漂亮的就想占有，不论这个人与自己有没有血缘关系。就这样，一些与他是中表亲与叔伯姐妹的女人先后被他占有，如宗望女寿宁县主什古、宗弼女静乐县主蒲剌及习燃、宗隽

女师姑儿等等，犹以为不足，他连兄弟之女也要位充下陈。这些女人大半是有夫之妇，完颜亮淫欲一起，就杀其夫而夺之。

那么完颜亮到底为什么要杀母杀宗室、纳姐妹？有人认为是改革派在杀保守派，是改革的需要。宗室保守派是以徒单氏为总代表，当她对改革阻拦时，“母子”关系就无法维持了。也有人认为杀母和杀宗室，其实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有人认为这不存在保守和改革的问题，完全是排除异己势力的一种做法。至于把贵族家属纳入后宫，完全是为了防止她们有反抗活动。也有人认为完颜亮酷爱女色，像禽兽一样，承续了女真族处于原始野蛮阶段的祖传习俗。

看来，完颜亮的弑君杀母，是残忍暴虐，还是有种种政治和社会原因，三言两语是很难解决的。对金人来说，他们的伦理道德标准与汉人不大相同，我们如果用金人的眼光和思维来察看这段历史，或许会得出不相同的结论来。

削木构宫　元顺帝昏庸之谜

元顺帝统治后期，不理朝政，整天沉溺于淫乐之中，花天酒地，嫔妃成群，长夜宴饮，不理朝政，战备松弛，成了昏庸不堪的一代亡国之君。不过元顺帝并不是从登上帝位开始就是昏庸不堪的，而是在改革失败后，失去了治理社会的信心，而急剧腐化堕落的。

元朝最后一个皇帝——顺帝奇渥温妥欢帖睦尔，作为一代亡国之君，常被认为是昏庸不堪的帝王，时人评价他是怠于政事，荒于游宴。翻开史书，确也如此。

元顺帝是元明宗的长子，元朝末代皇帝，蒙古语乌哈笃皇帝。元文宗时，他先后被流放高丽和静江（今广西桂林）。至顺四年（1333）六月即位。初期受制于文宗后卜答失里和燕帖木儿家族势力，“深居宫中，每事无所专”。至元间又被权相伯颜挟制。

在顺帝的身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无耻之徒极尽谄媚，尽力投其所好，引导着他一步步走向吃喝玩乐。有一个叫哈麻的官员，原是一个小

小的侍御史，因宰相脱脱的缘故，深受顺帝宠爱，这时他向顺帝推荐西方和尚的揲儿法，说这种叫“大喜乐”的练功法能使人身上的气流或消或胀，或伸或缩，可以达到延年益寿。顺帝听后大喜过望，每天与哈麻等人一起练功。哈麻的女婿秃鲁帖木儿也是一个极尽巴结能事的心术不正分子，他迎合顺帝所好，向他举荐了西蕃僧伽璘真，说这个和尚特别擅长“秘密法”。秃鲁帖木儿开导顺帝说：“陛下虽位居万乘天子，富有四海，但不过就是保有现世而已。人生能有多少长？你要延长寿命，必须学习秘密大喜乐法练习禅定。学习这种禅定法后，才真正会感到其乐无穷。”想不到头脑发昏的顺帝竟然会深信不疑，任命了秃鲁帖木儿等十人为“倚纳”，天天与他们一起演习大喜乐法。

为了在练功时不被打扰，顺帝在上都还修建了庞大的穆清阁，连延数百间房子，每间内都安排一个女人在里面，说是为了练习大喜乐必须这样做。练功时还不忘看女人的艳舞表演，顺帝还特地挑选了宫女三圣奴等十六人天天在宫内演出，起了个名字叫十六天魔舞。在他的倡导下，宫中兴起了演习大喜乐和跳天魔舞的热潮。每天看这些天魔舞女的演出十分过瘾，但又害怕大臣们知道后劝谏，顺帝就让人挖了地道把天魔舞女藏于其中，每天秘密到地道中和舞女们鬼混；男女裸体，聚众淫乐，白天连着黑夜，至于国家大事，这时早不知抛到什么地方去了。

顺帝还独出心裁，不断翻新花样，自己设计，在内苑造龙船，长 120 尺，宽 20 尺，船的上部有五个大殿，全部用五彩金饰装饰，用水手二十四人，皆穿了金紫的衣服。船一动，船头的龙首、龙眼、龙口、龙爪和龙尾都会跟着动起来。每天他和嫔妃、宫女们乘坐这只龙船在后宫至前宫的湖中往来游戏。他爱看舞蹈，在厚载门高阁建起了舞台，经常通宵达旦地在阁里观赏。他的心中这时已没有国家这个概念了，大臣们上朝，他不问政事，却为大臣设计房屋的模型，亲自“削木构宫”。尽管他所做的模型只有一尺来长，但里边栋梁楹槛，样样具备。他还选了一百零八名僧人，大搞游皇城活动，每次涉及的人要好几万，所费财力和国力不可胜数。所以有人说他是一位优秀的建筑师、设计师、发明家。他精通木工设计、制作，通晓机械，极富于智慧和创造力，因此京城人称他为鲁班天子。

在这样一位荒淫腐朽的皇帝统治下，整个国家已是凋残败落，各地起义反抗云涌蜂起。宰相脱脱认为哈麻是引诱顺帝走向荒淫的罪人，希望顺帝

将他革职查办，顺帝听后不高兴了，说当年哈麻是你举荐的，现在又要撤他的职，到底是为了什么？接着他又说："撤职大可不必。人生几何，及时行乐为是。军国大政，有卿主持，朕可放心，你少讲几句，我就能长久地快乐，如此人生知足矣。"说完还哈哈大笑，气得脱脱两眼发直。

脱脱对他说外边的形势现在十分紧张，各种灾害变异不断，农民土匪到处都在造反，顺帝遂派脱脱总管各路人马南征。至元十四年(1354)，哈麻诬陷脱脱，顺帝不辨真假，先是下诏撤了脱脱的兵权，安置淮南，后又命他去云南，所有家产，没收入官。脱脱终于被害死在云南。之后，元军迅速解体，政府中的矛盾也开始激化，各地农民起义乘机蓬勃发展，元朝统治就一发不可收拾，最终为躲避兵锋，率三宫后妃、皇太子妃等仓皇北逃沙漠。几年以后，因痢疾死去，年五十一岁。

这样一个昏庸的帝王，将元朝大好江山拱手让人，按理来说，是丝毫不值得我们有任何同情的地方。不过有人指出，元顺帝的腐朽昏庸并不是他的本质，刚登上帝位时他不是这种样子的，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颇具改革精神的好皇帝。

顺帝即位时只有十三岁，当时拥立他上台的是权臣伯颜，所以从感恩的角度他提拔伯颜为中书右丞相，主管朝中大政。但伯颜执政后，利用手中大权，扩展自己的势力，打击异己，势焰熏灼，顺帝成了他的傀儡。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伯颜的专横跋扈日益不满，逐步产生了改变自己无权的地位和按照自己意志处理朝政的愿望。至元六年(1340)，他在脱脱的帮助下，乘伯颜外出游猎，关闭都城大门，巧妙地驱逐了伯颜。

从至正元年(1341)开始，顺帝任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大刀阔斧地进行社会整顿和改革。他上台后接受了脱脱等人的建议，恢复了科举制度，并亲自考试进士，不问出身和民族。从选拔人才的角度考虑，他还想到了加强对人才的培养这个问题，为此他大兴学校，提倡文化教育，单是中央的蒙古、回回和汉人的三监就招收了贵族子弟三千多人。学校里的学习内容，他规定以儒家经典为主，还多次派人到曲阜去祭祀孔子。伯颜专权的时候，官吏腐败，不务政事，贪污受贿，习以成俗，顺帝明察到了这些情况，就加强了对官吏的考核，加强了对地方秩序的整顿。他对农业生产十分重视，在开设屯田和修筑水利工程方面花费了不少精力。顺帝和脱脱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对社会进行的全面改革和整顿，当时的史书上评价很高，称之为

"至正更化"。

不过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的这些"更化"措施,其实并不见很大效果,社会积弊很深,官吏腐朽并不是短时期内造成的,所以脱脱和顺帝搞的一套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各地也没有认真执行。这时的顺帝一筹莫展了,他再也拿不出救世良方来了,失去了治理社会的信心,不再考虑采取更好的办法去治理社会,相反变得十分消极起来。哈麻之类人物的引导,对心态极不稳定的顺帝诱惑力极大,他的思想急剧地向相反方向发展,整天沉溺于淫乐之中,花天酒地,嫔妃成群,长夜宴饮,不理朝政,战备松弛,成了昏庸不堪的一代亡国之君。

这样说来,和列朝的末代皇帝相比,同样是昏庸,元顺帝与他们是有所不同的。

群奸蛊惑　　明武宗豹房之谜

在明朝十六个帝王中,武宗算不上是个显赫的皇帝,但他却是个另类的皇帝。他特别喜欢狩猎及尚武的生活方式,对喇嘛僧、奇异的音乐、食物、妇女有着特殊的爱好。他不住在宫禁大内中,却建了一个与虎豹相邻的豹房,一住就是十几年。有人说他是个淫荡的大魔头,有人说他是崇尚大明初期的传统。

做皇帝要讲究文治武功,而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留在历史书上的却不是他的治国才能。请看以下这些记载。《明史·武宗本纪》在正德二年(1507)八月条下记载:"作豹房。"翻看《明武宗实录》,上面的记述比较详细:"盖造豹房公廨,前后厅房,并左右厢房、歇房。时上为群奸蛊惑,朝夕处此,不复入大内矣。"从正德三年起,至十六年(1521)武宗崩为止,武宗迁出了紫禁城大内,住进了皇城西北的豹房,豹房实际上成为武宗起居及处理朝政的地方。

豹房到底是什么样的房子?《武宗外纪》有详细的介绍:"乃大起营建,兴造太素殿及天鹅房、船坞诸工。又别构院御,筑宫殿数层,而造密室于两厢,勾连栉列,名曰豹房。初,日幸其处,既则歇宿比大内。令内侍环值,名

豹房祇候。群小见幸者，皆集于此。”从这段记载来看，豹房原具宫殿密室，内有侍卫值勤。豹房的所在地，据有关专家研究在太液池的西北隅，在虎城北豹房的旁边。由于此地接近豹房，故其建筑遂有“豹房宫殿”及“豹房官廨”的名称。

问题是武宗迁出大内住到豹房的目的是什么？从前面记述来看，武宗往往是与“群奸蛊惑”、“群小见幸者”住在一起，古代的史学家对武宗的这种做法颇有微词。很多人认为豹房是个邪恶丛聚的巢穴，是武宗及其堕落的随从们醉生梦死的地方。在豹房中有大量的歌舞音乐人员在为武宗及其随从表演。《武宗外纪》说：“上称豹房曰新宅，日召教坊乐工入新宅承应。久之，乐工诉言乐户在外府多有，今独居京都承应，不均，乃敕礼部移文，取河间诸府乐户精技业者，送教坊承应。于是有司遣官押送诸伶人，日以百计，皆乘传续食。”为什么有这么多乐工在里面，《明史》说武宗主要是受了太监钱能家奴钱宁的诱惑：“(宁)请于禁内建豹房、新寺，恣音伎为乐，复诱帝微行。帝在豹房，常醉枕(钱)宁卧。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密伺宁，宁来，则知驾将出矣。”武帝在豹房中的生活，无非就是听音乐和酗酒沉醉，真正是醉生梦死了。

豹房中还挑选了大量女人供武宗享受。《武宗实录》记载道：有人说锦衣卫都督同知于永“善阴道秘术”，武宗于是把他召入豹房，与语相悦。于永，是色目人，他进言说回回女“晰润而瑳灿”，比中土的汉族女人更漂亮。其时都督吕佐也是色目人，于永就假冒圣旨索要吕佐家里善西域舞的回族女孩，共有十二人，全部进给武宗。十二人在豹房中不分昼夜歌舞，武宗还在叫不够劲。于永又出一个点子，让武宗下令召诸侯伯家中原来是色目籍的女人到内宫，表面上讲是教跳舞，实际上是想见到长得漂亮的人就留下来，不让她们出宫。如此强夺民女是武宗最狼藉的行为。

不过有专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有关武宗豹房中生活的记载，存在着蓄意歪曲的情况，这些记载透过对细节的微妙描述，暗示武宗如果不是堕落，就是无能，因而在记录武宗形象时就会出现虚构，记录中也会出现矛盾的场面。这些矛盾，使我们对其他细节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也不能不产生疑问。《武宗实录》正德十四年载刑部主事汪金上疏谏武帝饮酒过量，疏后附有史臣的一段话说：“上嗜饮，常以杯杓自随，左右欲乘其昏醉以市权乱政，又常预备瓶罂，当其既醉而醒，又每以进。或未温，也辄冷饮之，终日酣

酗，其颠倒迷乱，实以此故。”武宗末年好饮，尤其是带兵巡边时的纵饮，许多书上都有记载，但说他终日酣酗，颠倒迷乱，与真相不符。同是《实录》讲到三年后武宗巡视西北边，从宣府返回北京：“自宣府抵西陲，往返数千里，上乘马，腰弓矢，冲风雪，备历险厄，有司具辇以随，也不御。阉寺从者多病惫弗支，而上不以为劳也。”既然是终日受到群小摆布，只知沉湎于酒的愚人，怎么又成了一个孔武有力、冲锋陷阵的英雄皇帝？

官方记载和民间传说中，把强夺妇女入充后宫作为武宗的丑恶行为，并不能全信，他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引起读者的震惊。在《武宗实录》等许多书上，说武宗曾向太原乐工杨腾索要其妻刘美人，但这段资料记述上各家矛盾较多，有的说刘美人不是杨腾妻，仅是他名下的妓女，与府中他妓同送应召。其实这类皇帝倾倒于民间歌妓的故事，实属异常鄙野，是民间传说和戏剧题材。《武宗实录》这样的记载，主要是纂修官在暗示像武宗这样的人，是不适合做天子的。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武宗住到豹房，主要并不是为了享受。武宗与其父及其族弟有所不同，他对军事极有兴趣，有重振明初尚武传统的企望，并有使兵政恢复到明初时居于显要地位的意向。从种种资料来看，武宗在有意地仿效永乐和宣德两帝，并力图恢复一些早期明朝宫廷的传统，因而他对剧烈运动、狩猎、军事操练、战事等特别感兴趣。但武宗的这种做法，遭到大多数文臣的反对，这是因为武宗若如此行事，以内阁大学士为主的文官集团控制军方及中央政府的权力必被削弱。武宗因为想施政自主，摆脱以大学士为主的文臣们的干涉，从而决定在禁城之外另建宫殿和行政官廨——豹房。在豹房中，他可以从事恢复明朝军事实力的活动而免受文官的牵制。他亲自挑选豹房的随侍人员，所选大部分是外国人和武夫，这些人在他指示之下，开始重练明朝的官军。

居住在豹房中的，除武宗所嬖幸的人之外，人数最多的是当时称为“豹房官军”的一支部队。这支部队中每个人腰间悬一块牌子，牌子上刻有文字说：“随驾养豹官军勇士，悬带此牌，无牌者依律论罪，借者及借典者同罪。”这批人都是勇士，名为随驾养豹，实则兼有驯豹和携豹出猎两种职责，同时又是豹房地区的护卫。这些勇士中有很多是蒙古人及西域人的后裔。据《万历野获编》说豹房官军大约二百多人，喂养上豹九十余只。

武宗这样做的目的，是在试图恢复一种在 16 世纪初已几乎完全消失的

生活方式和政治气氛。他的畜豹行猎，实为恢复明朝军力及帝王的勇武作风，他认为这是大政的一部分。由于朝廷中文官们的反对，武宗决定避开现行的行政体系，另在豹房设立惟己意是从的行政组织。豹房官廨的主要作用，是作为武宗的军事总部和行政中心。从军事上考虑，在豹房官廨的附近地区，由习射之所到御操之地，以及豢驯虎豹的虎城和豹房，都相互毗邻，十分方便。豹房官廨设立以后，大内朝廷形同虚设，内阁大臣们也失去了行政权力，降到了一种类似文书办公室的地方。



豹房勇士铜牌（正背）

持这种观点者认为，武宗对狩猎、豹、外国人、武夫以及尚武的生活方式的爱好，并不符合某些官僚们心目中帝王身份的模式。到了16世纪初，多数文臣认为皇帝不应亲身暴露于任何有危险性的场合，即使是狩猎，也被认为是不适合于皇帝的娱乐。因此许多人对武宗任何与军事行动有关的内容，表现出不赞同的情绪，甚至会加以讽刺。如武宗在万寿山前阅兵，却被有的文臣称为："大要以恣驰骋，供嬉戏，非有实也。"认为此类操练不切合实际，似花拳绣腿一般。

武宗的豹房，其实是朝廷文武双方争夺统治优势，以及皇帝与最高廷臣争持操纵明帝国行政权的产物。武宗建筑豹房殿廨，是为了设立可以推行其重振明朝武力和抑制文臣权力计划的基地。武宗之所以被写作史书的文臣们抹黑，原因就在于此。

明武宗是个特别另类的皇帝，有人说他从未用心于政事，有人说他昏狂无道，有人说他荒淫残暴，而这样的评价都是与他的豹房密切有关。这个特殊的豹房，的确有着谜一般的传说，后人要掀起它的盖头，尚需用第三只眼

才能解决。另类皇帝要用另类的思维才能解释。

醇酒美人　　清咸丰帝好色之谜

咸丰皇帝即位仅十二年，在三十一岁时就短命死了，死前他的身体十分虚弱，咯血不止，这与他喜好女色有关。他不仅后宫佳人难计其数，而且又特别喜爱汉族女子，派出专人四处购买娇媚容悦的美女置于专房。内忧外患，咸丰不思解决的办法，而靠醇酒美女来麻醉自己。

1850年正月道光皇帝死，咸丰即皇帝位，时年二十岁。咸丰皇帝掌权时期，中国是一个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时期。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大清皇朝丢尽了颜面，咸丰出奔热河，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巨额赔款使得国库空虚，入不敷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从南方发生后，势不可挡，横扫大半个中国，一向以天朝上邦自居的中国，逐渐沦落为各国列强所共同角逐的半殖民地。一些学者认为前期的咸丰尚能勤于政事，励精图治以挽危局，但目睹天下大乱的局面，咸丰最终无计可施，终日彷徨，渐渐走向消极颓废。咸丰生性软弱，性好哭，内乱外患，使他常常半夜落泪，每天只能以醇酒美女为伴，观戏、环游、狩猎，纵情享乐，想忘掉国耻。由于荒淫无度，身体日益虚弱，纵欲自戕，1861年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一岁，把江山留给了自己年仅六岁的儿子。

也有人认为咸丰是因病而死的。从小咸丰体质虚弱，经常咯血，当上皇帝后，每天下令杀鹿一头，取血一碗喝下，作为治疗的一种方法，有时还真起到点作用。1861年英法联军攻到北京城下时，咸丰仓皇逃出圆明园。由于逃的时候手忙脚乱，惊魂未定，到密云时吃饭没有粮食，住宿没有被子，狼狈不堪，咸丰帝想想就来气，一到热河就因伤风感冒引发痰喘，呕血不止，一口接着一口。之后，英法联军烧毁了圆明园，咸丰平时最喜欢住在那里，听到消息后，悲痛不已。紧接着英法联军和沙俄强迫中国签订了《北京条约》，咸丰更是悲观无奈，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吐血一天比一天厉害。第二年春天，气管炎已转入肺部，病情加重。咸丰曾将自己的病情宣示给大臣说："咳嗽不止，红痰屡见，非静摄断难奏效。"但这时的咸丰仍不忘享乐，每天仍以

看戏为乐。到了夏天，他旧病复发，又患腹泻。六月九日是他的生日，接受百官朝贺，赐群臣宴，但宴会还未结束，咸丰已支持不住了，命太监扶腋回宫。七月，咸丰仍是每天看戏，一直到临死的前一天，仍在如意洲的一片云小戏楼观戏，并安排了第二天的剧目。十六日夜半时分，咸丰病情突然加重，十七日晨撒手西归。同治帝继位后述说了咸丰致死的原因："上年夏间偶患痰嗽，旋即治疗后痊愈了。秋天到滦阳巡幸，圣体还是像往常一样康健，但因为各省暴乱没有安宁，日夜操劳，至今年春天，风寒感发旧疾，六月间又得了腹泻，以致元气渐亏，到本月十七日龙驭上宾。"死前得了许多病，但说这些病都是由于为国事操劳所致，这是谁也不会相信的。



咸丰皇帝就死在承德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

其实上面两种讲法并不矛盾，咸丰一直体质较弱，在位最后二年，吐血不停，而沉湎酒色其实是引起吐血的根源所在。

咸丰的好色在清代帝王中是出了名的，虽然正史中没有记载，但野史中的记录还是不少。《清朝野史》中曾经谈到圆明园总管大臣文丰迎合咸丰旨意，为他搜求美女的故事，读来对咸丰的好色还是可以了解得十分清晰。野史说：咸丰因为东南太平军起事，心中比较忧愁，心中渐渐怀念战国时信陵君的醇酒美人，也想模仿这样做。他居住在圆明园内，命令太监四出寻觅漂亮的汉族女子，充实到后宫中来，以满足他喜欢女人的欲望。圆明园管园大臣文丰有心腹下人两个，都是汉人，一个到扬州，一个前往金阊，购买到民女四人，都是绝色漂亮，但也有人说四个女子都是出身妓院。咸丰特地为四个女人设立了四个院子来安置她们，院内亭馆十分高大宏敞，隔墙可以互相看

到，院与院之间有复道相连，这四个人就是民间传说的杏花春、武林春、牡丹春和海棠春。杏花春十分妖艳，是扬州方姓人家的女儿，年幼时曾被卖给妓院，文丰的心腹下人物色到这位美女后，用二千大洋替她赎身，将她带到京城。海棠春是从金阊购来的，咸丰看到后十分满意她的姿色，亲自写了诗奖赏文丰的办事才能，至于奖给文丰的钱财就不计其数了。没有过多少时间，心腹下人又献上了牡丹春。这个女子是苏州人，很善于取媚于咸丰，而且能歌善舞。咸丰经常带了那拉妃一起听她唱歌，那拉妃也觉得她唱得很好，给她很多奖励。但是后来咸丰对她特别宠爱，那拉妃就起了嫉妒之心，另外派遣心腹至南方选美女，挑到了一位特别漂亮的，想来离间牡丹春与咸丰的关系，这个被挑来的女子就是武陵春。咸丰后期，四春争妍斗奇，其中文丰进呈的有三春，所以咸丰皇帝在位时，文丰特别得宠，与内府的太监们并没有什么差别。

咸丰所宠幸的圆明园四春，在清代颇负盛名，在严所的《十叶野闻》等书中也有记载，但武陵春写成陀罗春，说她是北京一个浣衣女子，是咸丰自己见到并用重金买到内宫中来的。四春的故事，很难说没有后人添枝加叶的成分，但咸丰喜好美丽女色的特性却是事实，弄坏身体也在所难免。



清帝的妃子

四春之外，后宫美女如云，咸丰也有不少宠幸，但他最喜欢的恐怕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当时的懿贵人，也即前面引述中说到的“那拉妃”。那拉妃幼年随父在南方任官，熟悉南方人的生活习性，又善唱南方小调。由于她天

生艳丽聪明，在咸丰初年挑选秀女时得以被选入宫，得幸后被册为懿贵人。她之所以能得幸咸丰，传说她进宫不久，所唱的吴歌及所扮的汉女装饰，深受咸丰喜爱。不过等到圆明四春先后入园之后，那拉妃被咸丰冷落了，究其原因与咸丰特殊的色情爱好有关。传说咸丰特别喜爱汉族女子，而且最爱看汉族美女的三寸金莲，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是一个典型的恋脚癖者。中国人从五代以来的缠足习俗，多少年来弄得许多色情狂神魂颠倒，如今咸丰也成了这嗜痂成癖的一分子，有这样的皇帝的确是清朝人的悲哀。满族女子是不缠足的，所以那拉妃尽管明艳娇美，是满洲世家贵族的千金，但在这些方面是无论如何及不上四春的，争风吃醋也自然出现了。

咸丰特别喜好纤趺如笋，腰支袅袅的汉族女子，他后期意志消沉，政事更为衰弱。毫无疑问，他的死亡原因，必定与平时的好色有关。

宫中硝烟

一个冤案　　汉武帝杀太子之谜

汉武帝晚年，年弱多病，遂开始宠信方士，信奉巫术。年纪一大，便刚愎自用起来，暴戾恣睢。他指使酷吏清查“巫蛊”，严刑逼供，形成空前的大狱，有数万人受冤致死，最后导致太子被杀。



汉武帝茂陵

汉武帝征和二年(前 91)，六十六岁的汉武帝已到了风烛残年的时候，长年体弱多病，这位在中国历史上素以雄才大略著称的皇帝进入了生命的晚期。他和其他的君王一样，在享受到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后宫粉黛如云的美色之后，就想着如何才能长生不老，永远能享受到天下的荣华富贵。疾病在向他逼近，躺在未央宫中，他开始担心自己是否会因病而死，并且怀疑自己的疾病是否是有人在诅咒他而引起的。武帝信任酷吏江充，任命为直指绣衣使者。江充见武帝年老多病，且多疑，遂妄称武帝病在巫蛊。

当时，京师聚集着许多方士、巫师，大行巫蛊之术。汉武帝时代通行的“巫蛊”形式，大致是用桐木削制成仇人的形象，有的插刺铁针，埋入地下，用恶语诅咒，以为能够使对方罹祸。当时的人普遍相信，如果想让某人患病甚至去世，可以用木头刻画成此人的样子，然后在他身上扎上针，埋在地下，再施以恶毒的诅咒，事情就会变得很灵验。“巫蛊”曾经是妇女相互仇视时发泄私愤的通常方式之一，宫廷妇女和贵族妇女常因嫉妒而使用“巫蛊”之术，使得这种迷信意识严重侵入上层社会生活。因此，在皇宫表面的富丽堂皇与警卫森严的背后，很多颇有名声的女巫们出入其中，为后妃们度厄，为怨妇们诅咒。这些后妃们为了争宠，常常互相攻讦，而最有杀伤力的攻讦就是让武帝相信，某人的宫中埋有木偶，木偶的神主就是武帝。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有两年左右的时间，想永存于世却又疾病缠身的汉武帝一直被这种木偶与诅咒所纠缠得不能自拔，后妃们的谎言与揭发，星象所显示的灾难变异，一日数报的边疆急变，这一切都使得汉武帝越来越相信，自己的病和帝国的病，真的是由于木偶的原因。为此，汉武帝命令江充到处掘地寻找木偶，一旦发现，便大开杀戒。这一时期，由于木偶而被处死的人竟达数以万计。

尤其让国人和武帝感到震惊的是，江充报告说他在太子的东宫中找到的了许多木偶，言下之意，乃是指太子希望用诅咒的方法使父亲早早死去，以便提早接班。之前，江充与太子已经结冤。江充凭着武帝对他的信任，见太子家车马在驰道上行走，就没收车马，并劾奏于武帝。太子请江充宽恕，江充不听，两人遂交恶不和。江充害怕武帝去世后太子将来会迫害自己，遂一直想找到报复的机会，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戾太子刘据，是汉武帝的儿子，卫皇后所生，所以也称为卫太子。后代称他为戾太子，那是刘据死后的谥号。汉武帝二十九岁时，刘据才出生，汉武帝非常喜爱他。刘据长大以后，性格和顺谨慎，汉武帝嫌他才能一般，不像自己，遂渐转向宠爱工夫人所生子刘闳，李姬所生子刘旦、刘胥，李夫人所生子刘髆。于是皇后和太子都感到宠爱递减，心不自安。汉武帝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有一次他对大将军卫青说：“汉家建国匆促，加上四夷侵扰中原，朕不变更制度，则后世无所遵循；不出军征发，则天下不能安定，如此不可能不使民众加重负担。如果后世有人仍然继续沿袭这样的政策，那么，就是在重蹈秦王朝灭亡的覆辙了。太子性格稳重好静，一定能够安定天下，是



汉代陶俑



汉陶俑

我放心的继承人。要寻找守成的君主，难道还有贤于太子的吗?”虽然有了承诺，但不受宠爱是不争的事实。太子的地位原本就岌岌可危，江充的指控和他准备向武帝汇报的威胁使太子更加的胆战心惊，这位已当了三十多年的太子，并一直生活在全能的父亲阴影里的年轻人只得找他的师傅石德商议对策。

石德说:“前丞相父子、两位公主都因此致祸。现在巫与使者掘地得到罪证，不知是他们预先放置的，还是真的就有。现在无以自明，只有假冒皇帝的诏令，收捕江充等入狱，严加审问，追查其奸诈。而且陛下现在甘泉宫养病，皇后及家吏请问都没有得到回音。陛下生死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跋扈，太子难道忘记了扶苏的教训了吗?”

石德用秦太子扶苏的悲剧警告刘据，刘据于是下决心起兵自卫。征和二年七月壬午日，武帝患病，在甘泉宫避暑，刘据派宾客以汉武帝使者名义逮捕江充等人，又调用宫中卫士，取武库兵器，向百官宣布江充谋反。于是斩江充示众，又用烈火烧烤的方式处死与江充联手的胡巫。同时动员数万市人与政府军战于长安城中，汉代最严重的政治动乱于是爆发，一起并不太大的事情终于酿成太子造反的后果。

当时在甘泉宫休养的汉武帝命令严厉镇压太子军，宣布抓获和杀死反叛者，自有赏赐。又具体指示：以牛车作为防卫工事，避免短兵相接，用弓箭尽可能多地杀伤士众。并且坚闭城门，不要让反叛者逃离长安。汉武帝迅速回到长安，居住在城西建章宫，下令长安附近郡县的正规军进发长安，并

且亲自进行现场指挥。太子军与政府军在长安城中大战五天，死者多达数万人。5日后，太子兵败逃走。是年八月，太子在长安城郊自杀，同时遇难的还有太子的两个儿子，即武帝两个未成年的亲孙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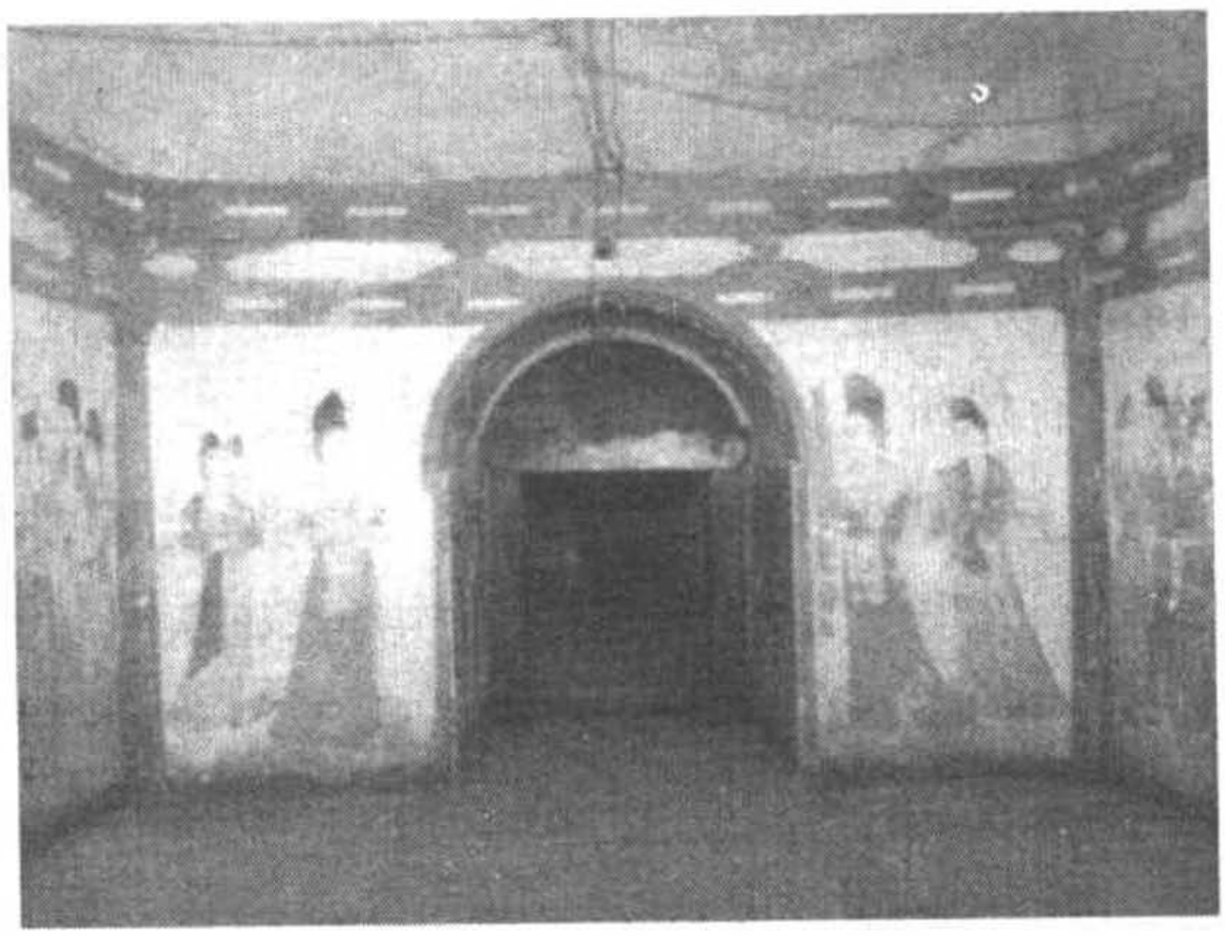
事变之后，“巫蛊”冤案的内情逐渐显现于世。汉武帝知道太子发兵只是由于惶恐，并没有其他意图，又接受了一些臣下的劝谏，内心有所悔悟。他下令族灭江充全家，又将江充的同党苏文焚死在横桥上。他哀怜太子无辜，在刘据去世的地方筑作思子宫与归来望思之台，以示怀念之意。天下百姓听说后，都为太子刘据哀伤。思子宫和归来望思之台，后来也成为诗人吟咏的对象。

事情弄到这种地步，武帝也觉得凄凉，想起太子和两个皇孙竟然活生生地寻了死路，心中越发伤感，脾气也变得更加暴躁。到了晚年，行事十分糊涂，不近情理。有人认为武帝举动不可思议的症结在于他宠信方士，信奉巫术，又兼刚愎自用，暴戾恣睢。如果究其根本原因，汉武帝晚年的糊涂暴戾的性格，主要是因长生无术引起的心烦意乱所致。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汉武帝晚年，临近政权交替，国家政治进入了微妙时期。政治权力的转移，对于最高执政者本人来说显得非常重大。即使是他自己选定的继承人，也是带有极为苛刻挑剔的目光。在父子对政事看法有所不同的情况下，心理裂痕会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极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具有极敏感的政治嗅觉，又有投机之心，受到汉武帝特殊信任并赋予重要权力的江充，利用汉武帝父子政治倾向不同的矛盾，制造了太子宫中的“巫蛊”冤案。

琼萼凋春　　武则天杀孙女之谜

乾陵附近的永泰公主墓，是我国著名的旅游景点。它于1960年被发掘，曾出土三彩骑俑、彩绘木俑、生活器皿、彩色壁画和石雕线刻画等大量珍贵文物。随着这些文物的发掘，尤其是当永泰公主墓志铭的出土，在史学界引起了一场不小的争论，因为志文上对于公主死因的记载和史书上有很大的不同。



永泰公主墓

永泰公主李仙蕙，是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孙女，中宗李显的第七个女儿。死于公元701年，年仅十七岁。初葬河南洛阳，公元706年迁回长安，陪葬乾陵。

关于公主死的经过，《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均有明确的记载。当时武则天年事已高，许多政事都委托张易之兄弟办理。邵王李重润和他的妹妹永泰郡主以及郡主的丈夫魏王武延基在背后偷偷议论张易之，被张发现后，告到武则天处。武则天大怒之下逼令他们三人自杀。由于三部正史都把整件事情写得清清楚楚，所以，永泰公主死于李重润一案，一直以来史学家们都没有什么异议。

然而，自从1960年发掘永泰公主墓，出土了公主的墓志铭之后，逐渐有学者对公主的死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史书与志文的记载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史书对于李重润一案在记载上有许多违异之处。例如关于李重润、李仙蕙、武延基三人的死亡时间，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的记载各不相同，有的记年，有的记年记月，有的则是年、月、日都记，与志文上刻的永泰公主的死亡时间有所出入。因此他们推断永泰公主并非与武延基等同时遇害。又如关于李重润一案遭杀害人数，三本史书也分别有三人、二人、一人三种说法。关于三人之死的方式的问题，三本史书有“杖杀”、“皆逼令自杀”、“令自杀”、“得罪缢死”、“缢杀之”、“杀”等不同的记载。综合以上三大疑点，加上永泰公主墓志铭上有“珠胎毁月，怨十里之无香；琼萼凋春，忿双童之秘药”和“自蛟丧雄镡，鸾愁孤影，槐火未移，柏舟空泛”等字样，学者们

推断李重润一案并未波及到永泰公主，丈夫武延基死后，她还孤单地生活，而最终导致她死亡的原因是难产。

学者们分析道，志文中有关永泰公主死因的隐笔一是："自蛟丧雄锷，鸾愁孤影；槐火未移，柏舟空泛"句。这儿蛟是指蛟龙，喻男性。锷是指利刃，古代名剑干将、莫邪有雌雄之分。鸾是指凤鸾，喻女性。这句是说武延基丧命于利刃后，永泰公主还孤单地生活着。槐火之典，当是取自《庄子》外物篇："本与木相摩则燃，金与火相守则流，阴阳错行，则天地大纰，于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阴阳错行的火焚烧大槐，亦指武延基被杀。柏舟典出自《毛诗·鄘风》、《柏舟》篇，其序称：卫太子共伯早死，其妻共姜作《柏舟》诗，自誓不再嫁。是喻永泰公主守寡。这两句总的是说：焚烧大槐树的火即杀武延基的事，虽然没有波及，但她不久亦死去。同时说明永泰公主绝不是与武延基等同时遇害的。

墓志中有"珠胎毁月，怨十里之无香"句。"珠胎"即怀孕。汉杨雄《校猎赋》有"方椎夜光之流离，剖明月之珠胎。"唐颜师古为之注解说："珠在蛤中，若怀妊然，故谓之胎也。"公主怀胎，自然是贵胎、珠胎了。那么"珠"与"月"又是什么关系呢？当代学者胡道静在《梦溪笔谈校正》中说："月亏而蚌蛤消，露下而蚊喙折。"古人把"珠"与"月"的关系说得清清楚楚。这里指永泰公主怀孕，即"珠胎"遇到的不是"月满"或"明月"，而是"月亏"，故"珠胎"不能全，谓之"毁月"。至于"十里之无香"句，指中国素有伟人降世其胎异香经宿不散的传说，"无香"自然就有"怨"了。

墓志中有"琼萼凋春，忿双童之秘药"句。琼萼即琼花，古代把琼枝玉叶喻皇帝子孙。琼花春天凋谢，当喻永泰公主之早死。双童即二竖（病魔）。其典故出自《左传》，即"成公十年，晋景公病，梦二竖为祟……""秘药"是指一种不可告人的药。这里志文作者用了更深奥隐晦的笔法，喻"双童"将"秘药"带给了永泰公主，使她无可救药。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以上的观点，也有学者坚持正史的说法，认为永泰公主的确为武则天所杀。在他们看来，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在三人死亡时间的记载上，只有详略的差别，没有年、月、日的混乱和矛盾，而且通过计算，史书所记的三人死亡时间（九月壬申，即九月初三）与墓志所记永泰公主之死亡时间（九月初四），相距仅一天，由此并不能推断出公主并非与李重润等同时遇害。关于死亡的人数，三本史书之所以记载会有不同，



唐张萱《武后步辇图》

是由于同一事件在一本书中多次出现，作者为了行文的需要，有主次和详略的安排。所以，这也不能说是史书之间互相违异。至于三人之死的方式虽说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是遭杀害这一点是一致的，而且除了“杖杀”之外，其余记载均属赐自尽的方式。他们还认为唐代就有对罪犯在律外先行决杖的惯例。至于死刑，唐代也有先决杖，后行刑的惯例。所以，李重润以大逆之罪在被武则天赐令自杀之前先行决杖，是符合当时的国情的。而从小娇生惯养的李重润很有可能经不起杖打的痛苦，在行杖刑时就一命呜呼。因此，“令自杀”和“杖杀”也就不矛盾了。

排除了以上的疑点，接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史书的记载为什么会和墓志铭的记载有所不同？学者们认为这与墓志铭的作者在当时的处境有关。给一个遭杀害的死者写墓志，如果直书死因，往往会给死者及其家属、后代带来难堪，尤其被害的人与自己是差不多时代的人，又贵为公主，若写不好，不仅牵涉到整个皇族的颜面问题，很可能自己的项上人头就要不保，所以作者只能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巧妙地避开死亡的真正原因，或者说是关键原因。永泰公主难产可能确有其事，因为她当时毕竟只有十七岁，身心发育也许都还未健全，而且据出土的永泰公主的尸骨看，她的身材也很娇小。但是并不能就因此断定她的死与武则天毫无关系，说不定她就是被武则天或明或暗的手段使得流产而丧身的。相反，难产只是永泰公主死亡的次要原因，其主要原因还是祖母武则天的迫害。

没有想到，一块墓志铭的出土竟会使原本明明白白的一段历史变得扑朔迷离，究竟永泰公主是因何而香消玉殒，可能还要等待学者们更加有力的论证。也许有一天乾陵发掘后，有资料可以揭开这个谜底。

逃过一劫　　明嘉靖宫变之谜

嘉靖二十一年，宫婢杨金英等十六名少女联合起来准备谋杀明世宗。她们趁世宗熟睡，有的用绳子套脖子，有的用抹布塞嘴，有的骑在他身上勒绳，几乎把世宗勒死。宫女要杀皇帝，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二十一日夜里，天气阴沉沉的，刺骨的寒风像利刃一样直刺人的心窝，紫禁城里寂静无声。站在各处的小太监们不安地东看看西看看，跺跺脚，哈一口气，一切似乎在预示着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半夜，当世宗皇帝朱厚熜睡得似死猪一般时，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也就发生了。据《明史·后妃传·方皇后》记载：这天夜里，世宗睡在端妃宫内，十六个宫女联合起来想把世宗杀死。宫女杨金英等商量后，决定等到世宗一睡熟，就用绳索套到他的头颈上将其勒死。讲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平素只干点鸡毛蒜皮事情的宫女们一旦要做这关乎人性命的大事情，不免就六神无主了。十几个人挤在一起，慌作一团，绳子结成死扣，无法勒紧，朱厚熜一度被勒气绝，直翻白眼，连声音也发不出。宫女张金莲一看这等模样，吓得半死，心想看来皇帝是很难杀死的，马上离开现场去告诉皇后，皇后带人急忙奔跑过来，解开绳子，世宗逃过一劫。

同样记录这件事情的《明实录》，事情的经过与《明史》相差无几，十分简单，但罗列了九名宫女的姓名，有蓟州药、杨玉香、邢翠莲、姚淑翠、杨翠英、关梅秀、刘妙莲、陈菊花、王秀兰等。“蓟州药”在有的书中写成“苏川药”。

杀世宗不死，但宫女们全部被抓了起来，关到刑部大狱。皇后下令连夜进行突击审问，一定要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刑部主事张合，将刑部审讯口供的回奏原文抄录了下来，写进了自己的著作《宙载》中。张合记载道：方皇后对刑部官员说：“好生打着问。”即重重地打一顿让她们招供。一用刑，这些女人就吃不消了，常在杨金英招道：“本月十九日，王嫔和曹妃(即端妃)在

东稍间点灯时分，私下在商量说：‘咱们赶快下手吧，总比死在他手里要强。’杨翠英、苏川药、杨玉香、邢翠莲在旁边都一起听着。之后杨玉香就往东稍间走去，将细料仪仗花绳解下，一起搓成一条又粗又长的绳子。至二十二日卯时分，她将绳子递与苏川药，苏川药又递给杨金花，拴成一个套子，大家一齐下手，将绳子套进世宗脖子里。姚叔皋（淑翠）掐住世宗的脖子，边上的杨翠英说：‘掐着脖子，不要放松。’邢翠莲将黄绫抹布递与姚叔皋，蒙在世宗脸上。邢翠莲按着世宗的前胸，王槐香按着身子，苏川药拿着他的左手，关梅秀拿着右手，刘妙莲、陈菊花按着两腿，姚叔皋、关梅秀使劲地拉着绳套。边上的张金莲一看大事不好，跑去请皇后娘娘来。娘娘急忙奔过来，姚叔皋迎上去就是一拳。王秀兰一看皇后来了，马上让陈菊花去吹灭灯。总牌陈芙蓉说：‘张金英叫芙蓉点着灯。徐秋花、邓金香、张春景、黄玉莲把灯打灭了。’芙蓉就跑了出去叫管事牌子来，将各犯拿下了。”

世宗被勒受惊，气息将绝，方皇后召众御医进行急救。平时摇头晃脑的御医临事就吓呆了，人人畏惧获罪，不敢用药。惟独太医院使许绅冒着万死，“调峻药下之”。因为不下药也是死，还不如想办法医一下。辰时下药，过了三四个时辰，直至未时世宗喉咙里发出声响，吐出紫血数升，于是才能讲话。因抢救有功，许绅被赐赉甚厚，但不久他就得了重病，而且难以救治。许绅自己知道患此病的根源，他对家人说：“曩者宫变，我自己想，如果医皇帝无效，一定会被杀，因此惊悸过度，我现在的病不是药石所能治好的。”

上述这个审讯笔录十分详细，从商量起事到具体的经过，描述得十分清楚。这么多纤弱宫女齐心协力想杀死一个皇帝，在中国历史是不多见的。那么，宫女们为什么不顾自己的性命要这样做？杨金英说王嫔和曹妃曾讲过“总比死在他手里要强”指的是什么，难道她们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一些专家认为，宫女害怕得要命的原因，必定和世宗朱厚熜炮炼丹药有关。朱厚熜即位不久，采纳朝臣的建议废佛，下令撤除京城佛寺。但在废佛的同时，他却开始崇尚道教了。嘉靖五年（1526），道士邵元节受召入京，进献“立教主静”之说，被世宗尊为“真人”。邵元节死，方士陶仲文被授予“神宵保国宣教秀士”称号，受到宠信。自此，他逐渐不理朝政，更加沉迷于道学方术之中。他大办祭神仪式，大兴土木建玄帝宫，连政事、刑狱也由方术决定，四方官员为了取宠只能大量进献白鹿、白龟、紫芝之类的祥物。更多的方士如王金、陶仿、刘文彬等纷纷假造秘籍、丹药。世宗还用虐待童女的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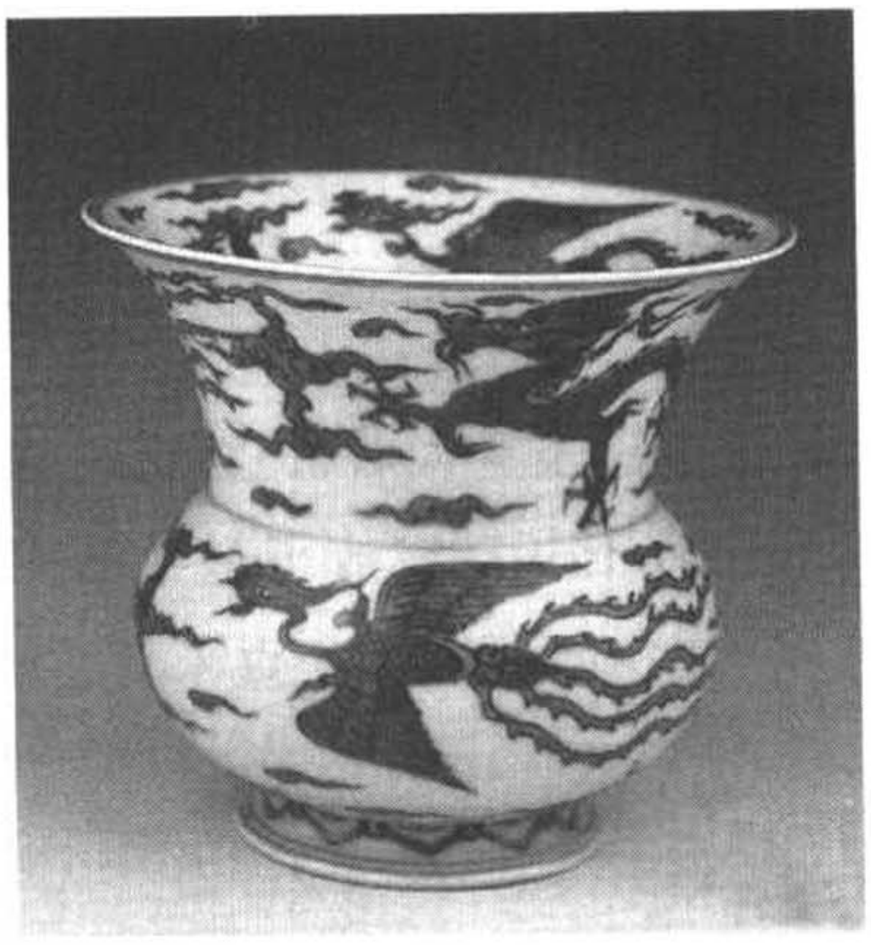


嘉靖宫变就发生在乾清宫里

法来炼取长生不老药，服食后可壮阳强身。大臣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太仆卿杨最上疏谏丹药，竟被杖死。从当时的实际情形看，宫女们发生宫变的原因，必定是因为炼丹药要摧残少女的健康，甚至生命，而杨金英等之前已经看到被虐而死的其他宫女，死时十分凄惨，因而对世宗恨之入骨，为了自己的生命只能铤而走险。这么多宫女立场一致，必定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沈德符《野获编》说："嘉靖中叶，上饵丹药有验。"至嘉靖三十一年冬天，他下令京师内外选女孩八岁至十四岁者三百人入宫。三十四年九月，他又选十岁以下少女一百六十人入宫。少女入宫干什么，主要是"供炼药用也"。有人猜测说是用宫女首次月经的经血制造"红铅"，用童子尿熬炼"秋石"。大量挑选宫女入宫虽是宫变之后的事情，但之前炼丹药要用少女是可以肯定的，这些宫女很有可能在炼药的过程中连生命也保不住。

大难不死，世宗不但没有丝毫忏悔，相反觉得自己的死里逃生是天地神灵的恩遇，变本加厉祭神求仙。他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他整天与方士混在一起，焚修斋醮，装扮神仙。他喜欢用道士醮祀用的青词作谕旨，字句离奇诡异，一般人很难理解。他一心追求真正的神仙方术，到生命最后一年也没有放弃。嘉靖四十五年(1566)冬，因服食丹药后燥性过大，世宗病死。御医最后断定他的死因是"体虚过燥，补救无术"，吃了丹药，必然会发高烧。

行文至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注意，即谁是宫变的发动者？据前引张



明嘉靖青花龙纹渣斗

合的审讯笔录，应是王嫔和曹妃。曹妃当时被封为端妃，世宗十分喜欢她。出事的那天夜里，世宗来到端妃宫，刚和她亲热过，两人睡在一起，说她是主谋似不太可能。一些专家认为，之所以审讯的结果她是主谋，最后把她也杀了，这与方皇后蓄意捏造有关。因为世宗宠幸端妃，方皇后失宠，遂对端妃恨之入骨。宫变发生后，整个事件的善后都是方皇后一手处理的，妒忌使得方皇后乘机把端妃也打成是主谋者之一，结果草草一审判，端妃和其他宫女都被凌迟处死。史书中记载判死刑是奉了圣旨，但其实是方皇后的主意。明人认为宫变“妃实不知也，以宠故及于难”，这的确是事实。世宗头脑恢复清醒后，也马上意识到事情的真相，从此以后他对方皇后又恼又恨。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宫中失火，太监要冲进去救皇后，世宗不答应，皇后也就在这场大火中被活活烧死。

世宗心知肚明端妃是被冤死的，之后他常常觉得端妃就在眼前，越想越怕，认为是宫中闹鬼了。他曾对阁臣徐阶说：“宫变之后，内宫常有冤枉者在闹鬼。”徐阶回答说：“她活着的时候被皇帝宠幸，受了冤屈而死去，能不闹鬼吗？”一场由十六个小女子发动的宫变，就这样夭折了。

出生低贱　明万历帝立太子之谜

万历皇帝的王皇后没有生子，宫人出身的王恭妃生下了长子常洛，神宗

最宠爱的郑妃生下了三子常洵。长期以来，神宗一直不立太子，于是大臣们认为皇帝想立常洵，遂前赴后继不怕被责被贬被杖，一次又一次地上疏劝谏。皇帝与大臣们的纷争前后长达三十多年。

万历六年(1578)，礼部奉慈圣皇太后旨意，选得锦衣卫指挥使王伟的长女王氏为万历皇后，并于二月十九日完成了皇帝的大婚典礼。其时神宗十六岁，而皇后只有十三岁。大婚后，皇后一直未有生育，到万历九年十二月才生下了皇长女。



明万历孝端皇后的凤冠

这年的一天，神宗来到母亲居住的慈宁宫拜见母亲，却想不到被一个亭亭玉立的宫女王氏吸引住了。王氏年方十七，端庄秀丽，体态丰腴，情窦初开，神宗一见，欲火顿炽。等到慈圣太后发现此事时，王氏的体型已发生了变化。万历十年六月，王氏被册封为恭妃。同年八月，恭妃生下了神宗最长的儿子常洛，即就是后来短命的光宗。

这年的三月，神宗又喜欢上了另一个女人，即十四岁就进宫的淑嫔郑氏。郑氏有着倾城倾国、羞花闭月之貌，她聪明机灵，善解人意，是神宗感情的寄托。万历十四年(1586)正月，郑氏生下了神宗第三子常洵。由于神宗对王恭妃和郑氏的情爱不同，长达几十年的“国本之争”由此拉开了帷幕。

十四年二月，鉴于神宗已有数位皇子，首辅申时行上疏请求尽早册立太子以确定名分，神宗以长子年幼为由推说待二三年后再行册封。

郑氏生下常洛，神宗想册封她为贵妃。册封之前，神宗要预先公布礼仪

以便有关部门作必要准备。消息公布后，有一位老臣提出异议："按伦理和习惯，这种尊荣应首先授予皇长子的母亲恭妃王氏。"这一异议虽引起了神宗的不快，但册封典礼仍按原计划进行。

其时常洛已经五岁，其母还未受封，而常洵刚出生，郑贵妃就获殊宠，这不能不使那些早就疑心神宗要废长立幼的大臣的担心。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等先后上言，认为神宗应收回成命，先封王恭妃，而后及于郑妃。神宗大怒，斥责他们是揣摩上意，认为自己册封贵妃和立太子无关，数人一并获罪，被贬到边远地区。

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辅臣申时行、王锡爵、王家屏等再次提出册立太子之事，又被神宗拒绝。辅臣们说："皇长子已经九岁了，应该让他接受教育。"神宗无奈之下只好同意让长子、三子与辅臣见面，却不提立太子之事。十月，群臣上疏请立太子，神宗大怒，将诸臣全体夺俸，申时行告病辞官，王家屏从中调解，神宗才同意次年册封。但诺言到期时，神宗又一推再推，王家屏只得辞官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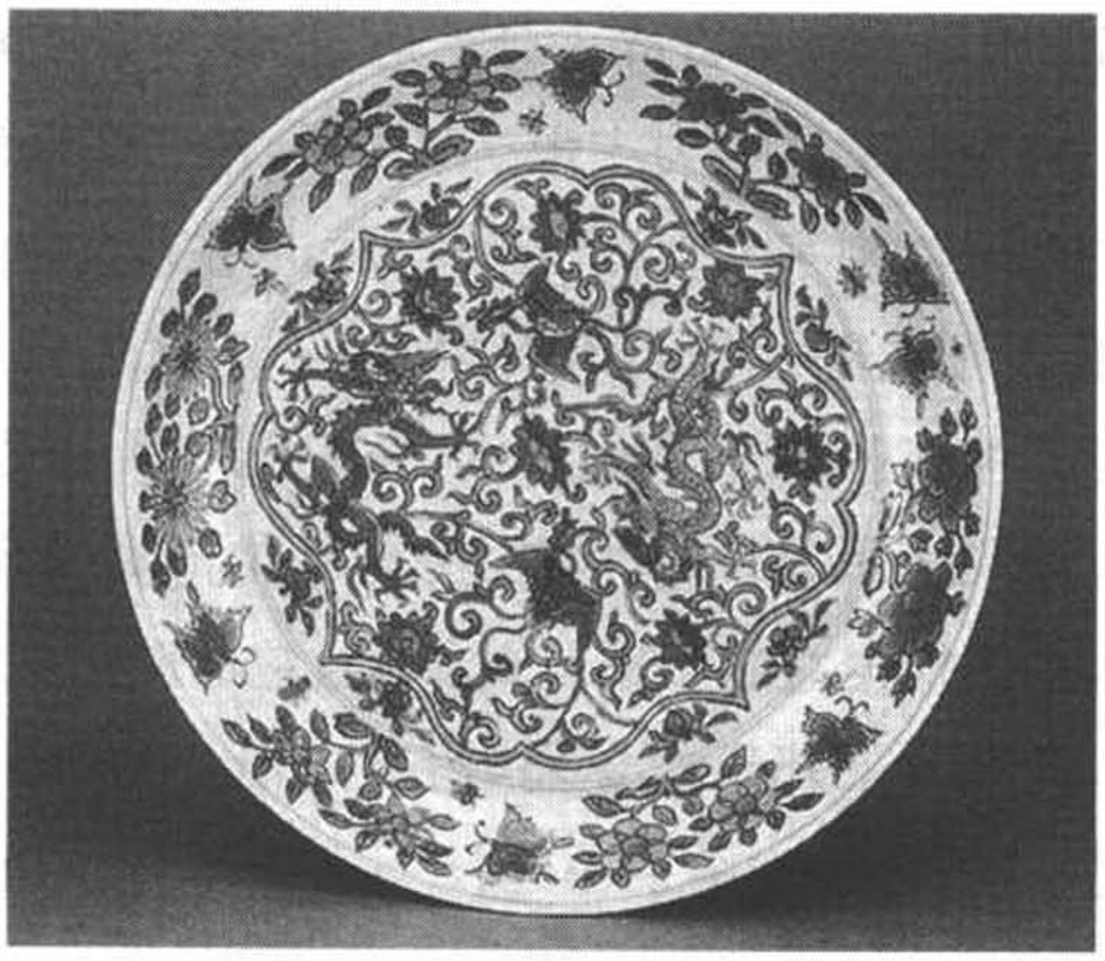
按照明朝大臣们的思维，太子的设立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神宗一再推托的目的无非是不想立长子而立三子为太子，而百官们当然是不能坐视不见的，他们不愿自己只食俸禄而不为国家的根本大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否则后世肯定会觉得朝中无忠君爱国之人了。于是请求立皇长子为太子的大臣前赴后继，一个接着一个。万历二十一年(1593)辅臣王锡爵归省回朝，密疏请立太子。神宗命他起草了两篇上谕，前者大意是立嫡不立庶，后者大意是先立庶子。神宗不听王锡爵的劝阻，坚持采用前谕，廷臣闻讯后大惊失色，当即前去诘问王锡爵，工部郎中岳元声等言辞十分严厉，王锡爵只能默默无语，一边摇头一边叹气。此后王锡爵多次极力主张立皇长子，神宗都未允准。

因为王氏出生低贱，神宗对其母子的态度近乎虐待。朱常洛长到十四岁，神宗还未给他指派老师。长到十九岁，也不为之成婚，又不立为太子。王恭妃被打入冷宫，神宗根本不见她一面。不久，有大臣发现了一个秘密，王皇后常常生病，神宗之所以一拖再拖，其实是在打算一旦王皇后病逝，就册郑贵妃为皇后，这样根据立嫡不立长的原则，常洵就可成为太子了。给事中王德完听说后，认为如果郑贵妃遂愿，写进史册，后人必定会嘲笑明朝无忠臣，当即写了奏章送给皇帝，结果被廷杖一百后除名。尚书李戴等连疏力救，忤旨被责。

万历二十六年(1598)五月，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弹劾山西按察使吕坤所着《闺范图志》逢迎郑贵妃，于国本有碍。当时市面上流行一本讽刺国戚郑承恩及吕坤的《忧危竑议》，于是有人告发此书与戴士衡等官员有关，这些人全部受牵连被贬。三年后，大学士沈一贯以“子孙无穷，天伦之乐”劝神宗册立太子。在深宫中颐养天年的慈圣太后对立储问题一直密切关注着。这时，她觉得自己已到了非出面不可的地步了。当神宗前去请安时，她问：“为何迟迟不立常洛为太子?”神宗由于没有想到其母也在关心这个问题，遂脱口而出：“彼宫女子也。”然而神宗最大的错误是她的母亲其实当年也是宫女，这话一出口，太后大怒，马上说：“你自己也是宫人的儿子。”神宗这才一下子醒悟，史书说他惊恐到“伏地不敢起”。讲出的话难收，神宗只有认命的份了。



明万历青花五彩云龙纹盖罐



明万历五彩龙凤大盘

看来太子不立已不行了。无奈之下，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神宗十分勉强地立常洛为皇太子，郑贵妃所生常洵封为福王。至此，争吵了十五年之久，无数大臣被斥被贬被杖，而且使得神宗皇帝身心交瘁，整个帝国不得安宁的国本之争终于告一段落。不过，这件事情还没真正地完结。

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有人用假名撰写《续忧危竑议》，指责神宗心在第三子，沈一贯有靖难之计。神宗大怒，命东厂、锦衣卫严密侦查搜捕著书之人，牵涉了许多官员被捕入狱。最后也在被捕之列的顺天生员皦生光自己承认书是他写的。皦生光说："朝廷捉到我就能结案了，如果我不承认，各位先生何处逃生？"次年年初，皦生光被处死，事件逐渐平息下去。不过，书是否是皦生光所写尚是一谜。

常洵封藩，应该离京住到自己的封国里，非奉旨不得入京。但郑贵妃却让儿子十多年住在京城不赴封国洛阳。大臣们屡次向神宗劝谏让福王离京，但神宗一再强调客观理由。神宗先是说福王府第没有建成，迫使工部加紧修建。王府建成后，神宗又称寒冬腊月，行动多有不便，等到来年春天再上路。可到了第二年春天，却说如要去，非给他四万亩田庄不可。大臣们上疏说，根据《大明会典》规定，亲王禄米为一万石，并且不能随意增加。明朝土地有限，而圣子神孙不断，如果每位都要数万亩土地，朝廷是拿不出这么多土地的。万历四十一年(1613)六月，锦衣卫王曰干报告郑贵妃的内侍与方士王子诏等谋害太子，又加上两年后"梃击案"的发生，神宗终于下令福王离京就藩。

王恭妃在常洛册为皇太子时双目已失明，渐渐卧床不起以至无翻身之力。此后神宗允许太子去看望她，但已是奄奄一息。万历四十八年(1620)，枯瘦如柴的王氏凄凉地死去，举朝为之震惊。首辅沈一贯和大学士叶向高上言神宗按照礼仪应厚葬，神宗反应十分漠然，没有答应。在大臣们的一再要求下，才给王恭妃谥号为"温肃端靖纯懿皇贵妃"，准许埋葬于天寿山东面左侧的平岗地上。同年十月，才由她的孙子熹宗朱由校把她迁到神宗的定陵寿宫中。

国本之争前后历时三十余年，明朝的皇帝和大臣们就是这样争论得难解难分。

疑云迭起　明光宗与三大案之谜

朱常洛为太子时，有人受了指使冲入东宫想杀他，这不由得让人怀疑他在被立为太子时的艰难，两者之间有联系吗？朱常洛当上皇帝后，龙椅还未坐热，二十九天就死了，他吃的两颗红丸引起了一场纷争。朱常洛喜欢的李贵妃在其死后，想挟太子垂帘听政，结果被赶出了乾清宫。三个与光宗相关的案件，竟是如此的复杂。

明神宗晚年，明朝国运日蹙，争端纷扰。明神宗宠爱郑贵妃，更是将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后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所杀）视若掌上明珠。因此神宗便有废长立幼的想法。他先是违反了古制册封郑氏为贵妃，而没有册封长子的母亲。不久又提出了三王并封的主意，将众皇子都封为王以降低长子的地位，为朝臣所阻没有成功。在朱常洛和朱常洵两人择一而立的问题上，因双方争夺激烈，拖延了十余年，直至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在朝臣的极力谏争和慈圣皇太后的支持下，朱常洛才被册立为皇太子。这一事件，史称为“国本之争”。国本之争后，神宗带着万分的不情愿与异常的愤怒立朱常洛为太子，立自己最喜欢的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福王，但从此以后，他以顽强的消极方式与群臣继续作斗争，时间长达十余年之久。在这十多年时间中，他起先以无可奈何的方式坐在龙椅上酣然入睡以面对喋喋不休的大臣，他既不强迫大臣们接受自己的主张，也不对臣僚的奏折表示意见，后来干脆不视朝，开始了罕见的皇帝不理朝政的时期。从此，文武官员很少面见奏事，作为亲信顾问的内阁大学士也难得受到召见。罢朝之后，对于太庙祭祀的大礼他一概不予过问，研读经史、讨论时政的经筵讲席几乎全部免除。大臣的奏疏，大多搁置不批。神宗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造成万历一朝政治的严重败坏。

神宗不上朝在内宫干什么？有专家进行研究后发现，他在内宫做的事情无非就是放纵作乐。御史冯从吾在一份奏疏中讲到神宗是每餐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他后宫有上千淑女，神宗整日周旋其间。郑贵妃与他恩爱如漆如胶，是感情的寄托，却并未独占他的枕席。神宗共有八子十女，却是八个女人所生。大臣们一再上疏让他远离酒色财气“四病”，但他根本不

当一回事。

太子朱常洛生于明万历十年(1582),生母恭妃王氏原为慈圣皇太后的宫女。他的身世和父亲明神宗差不多,都是父皇偶然临幸宫女而生。不过虽然都是临幸,明穆宗要比明神宗负责任。明神宗认为这个皇子的出生是他的一件丑事。这一观念持续了三十九年,直到明神宗去世。因此朱常洛一生得不到父爱。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以太子为目标而发生的梃击案,让整个朝廷都大吃一惊。

梃击案的过程相当简单。这天,有一个不知姓名的男子手持枣木棍闯入太子所居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直至殿檐下,被太监擒获交给禁军。次日,皇太子常洛上奏此事,神宗命刑部等官审问。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奏报,该犯名张差,似假装癫狂,建议详加追究。审问中,张差自己说是蓟州井儿峪人,柴草被烧,愤而进京告状,因不识路误入慈庆宫。刑部主事王之寀表示怀疑,一用刑,张差供认是被亲戚带给两位太监,让他到皇城中打杀太子。户部郎中陆大受提出案件中有许多疑问,请求详查涉案的太监,而神宗不理会陆大受的奏疏。蓟州知州戚延龄奏报张差确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于是诸臣将张差定为"疯癫"。刑部的官员希望重审这一案子,最后十九人合审张差,张差供出亲戚姓名及太监庞保、刘成,于是疏请从郑贵妃宫中提问庞、刘。朝中大臣一致要求重审此案,阁臣也催促神宗详审,无奈之下,神宗谕告三法司会审。三法司会审的结果是,指使打人的是庞保和刘成,两人还许诺只要打杀了人,他们将保张差安然无事。会审中还带出了国戚郑国泰,郑国泰连忙自我辩白。给事中何士晋上奏弹劾郑国泰仓皇自白大有疑问,要求穷究细查,把矛头直指郑贵妃。眼看火已烧上身,郑贵妃在神宗面前流起了眼泪,表明自己是清白的,望着依然楚楚动人的贵妃,神宗决定再也不能让美人伤心落泪了。

神宗在慈庆宫召见百官,责备群臣因审理张差一案弄得全国议论纷纷,造成不好的影响,实际上在离间他们父子的关系,要求罪止张差、庞保、刘成三人,不要再让事态扩大了。朝臣们不依不饶,又想继续辩论,眼看一场君臣交锋又起。太子一看事情不妙,而从没有碰过他的父亲这时一直握着他的手表示出父子的深厚感情,这分明已向他低下了头,再不表态是不行了,于是他说:"我父子是何等亲爱,外廷有许多非议,使尔辈为无君之臣,使我

为不孝之子。庞保、刘成是张差乱诬陷的，只将张差治罪就罢了，不要株连他人。”大臣们一听太子的话，都低头不语了，为了太子他们不再争辩了。神宗这时也向大臣表示自己与太子非常亲密：“皇太子是国家的根本，今年已三十四岁了，我很器重他。你们疑心我有他意，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如要换太子，我早就可以做了，何必要等到今天。福王在外，没有圣旨，他是不能回京的。”如此一表白，大臣们还有什么好说？不久，张差处斩。据说张差临刑前，大喊冤枉。三法司再审庞、刘二人，均拒不认罪，后二人被秘密处死于内宫。事件结束后，曾力主详审的王之寀被废为平民。梃击案的发生，使人多少会联想到案件与郑贵妃有关，或至少与拥护福王的势力有关。一个疯疯癫癫的人，是绝不可能直闯皇宫，一无阻拦地盯住太子的。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崩。八月，太子即位，是为光宗，年号泰昌。朱常洛登极后，面临着其父遗留下的严峻形势，朝纲腐败，经济凋落，宫内纠纷无休无止，军力日衰，边疆吃紧，后金崛起，封疆残破，大明王朝的江山摇摇欲坠。而体弱、孤僻、压抑而又好色的朱常洛又无力挽回即将崩溃的局面。光宗在东宫长期以来无所事事，耽于淫乐，即位后更不注意身体，没过几天就阴虚火旺，卧病不起。经内医崔文升用药，病情反而加重。光宗召见群臣，辅臣方从哲推荐鸿胪寺丞李可灼有自制的红丸仙药。于是光宗召见李可灼，服用了他进的红丸药，起初病情略有好转，光宗还直夸李可灼是个忠臣。睡了一觉，再服一粒，没过几个时辰光宗就死了。这时他即位仅二十九天，成了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这个“红丸案”在朝廷内外引起大哗，首辅方从哲因为推荐李可灼进献红丸受到抨击，而李可灼误进药方可能早有预谋。给事中惠世扬上疏弹劾方从哲交通郑贵妃、李可灼及内医崔文升谋害光宗，希望详加查究，而刚即位的熹宗朱由校均不予批准。

天启初年，很多大臣的目光对着郑贵妃。早先，她给太子进美女，害得他身体空虚，接着崔文升用药全是她指使的，后又发生李可灼进药，虽不能发现有什么直接关系，但大臣们觉得郑贵妃似有图谋不轨倾向。大臣们纷纷要求处分方从哲，诛杀李可灼。熹宗在大臣们的压力下终于下诏，将李可灼逮捕审讯后流放充军，崔文升发配南京。

光宗最宠爱两个妃子，由于都姓李，人们称其为东李、西李。相比较，二李中光宗更喜欢西李。即位后，念及西李抚育皇长子朱由校有功，传谕封她为皇贵妃，并欲立为皇后，因群臣反对而未果。光宗于是在乾清宫召见群

臣，正式谕封李氏为皇贵妃。这时李氏召皇长子入内，不一会皇长子出来说，她要封皇后，光宗只能默然不语。

九月初一，光宗死，李氏住在乾清宫里不肯出来。按理，老皇帝一死，老皇帝的皇后、贵妃应该搬出乾清宫让位给新皇帝，但由于朱由校年纪很小，李氏与太监魏忠贤勾结起来欲专权，使得群臣不能见到皇太子。给事中杨涟和尚书周嘉谟觉得李氏居心不良，就带着众大臣直奔乾清宫要面见太子。李氏虽想阻拦皇太子不让他出去见大臣，但边上的太监王安看不下去了，一直催促，李氏只好将太子送出，群臣当即口呼万岁。大臣们与王安等扶着太子往文华殿，定于初六日接位，下诏令让李氏迁出乾清宫。至初五日，李氏仍没有移宫的意思，杨涟上疏说："登极已在明日，移宫之事，得之也必在今日。"太子于是下诏逮捕魏忠贤，并传谕李氏"气凌圣母"，挟持太子要封皇后，让她马上移宫。这个案件就是通常说的移宫案。

天启中期，太监魏忠贤编《三朝会典》篡改史实，重翻三大案，王之寀、杨涟等人都受到迫害，受刑惨死于狱中。天启四年(1624)，李氏当初被勒令移宫，没有封号，此时被封国康妃。崇祯初年，思宗朱由检诛杀魏忠贤阉党，毁《三朝会典》，又为三大案中受到迫害的王之寀、杨涟等人平反昭雪。

围绕着光宗的三大案，有许多环节在当时就没有深查清楚，因此使得案件疑云四起。三大案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反复起落，隐秘众多。因为如此，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明朝后期朝廷政治的腐败和混乱，它的灭亡也就成为必然。

真假难辨　　明崇祯帝皇子命运之谜

崇祯死的那天，太子及永王、定王遵父令四处逃命。他们的命运后代有很多人极为关心，明朝的遗老遗少想利用他们登高而呼，打出复明灭清的旗号；清人面对一次又一次假冒崇祯儿子的事件，很想把崇祯儿子彻底铲除。那么，这些皇子的归宿何在？

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城时，皇宫中的崇祯帝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太监曹化淳开彰义门投降，外城已经攻破。消息传来，崇祯急忙在宫中鸣钟

召集百官，而这时的官员们早已四散逃命，竟然没有一人应诏。走投无路之下，崇祯命众后妃立即自尽，又狠一狠心亲自用剑砍死自己的女儿。三个儿子也被召来，他们是十六岁的太子朱慈烺，十三岁的定王朱慈灿，十二岁的永王朱慈照。崇祯无论如何是不舍得杀自己儿子的，他让三个儿子随便找件老百姓的衣服换上，在几个太监的护送下，赶快逃出宫中，希望有朝一日能为自己报仇。三个儿子走后，他的心里也安定了许多，遂登煤山上吊身亡。

那么，明朝灭亡后，崇祯帝的三个儿子逃出去了吗？他们的归宿何在？从明末清初以来，人们不断地在猜测。

太子朱慈烺是崇祯和周皇后所生的长子，出生一年就被封为太子。崇祯死后，他是复明抗清最好的一面大旗，因而关于他的下落消息很多，但各不相同。

据《明史》记载，李自成攻破北京后，马上派兵搜索崇祯的儿子。太监栗宗周看到大势已去，就将太子朱慈烺和其他二位皇子一起献了出来，李自成遂把太子等交给刘宗敏部监管，后来封为宋王。李自成战败后，他的部队挟带了太子等向西撤退，此后朱慈烺等也就不知下落了。

有人说李自成没有带朱慈烺西撤，而是在山海关失利后，把朱慈烺交给了吴三桂。山海关一战，带了清兵前来的吴三桂打败了农民军，双方谈判，吴三桂提出要归还太子作为议和的前提。李自成答应了，就把太子朱慈烺交给了吴三桂。不过，关于李自成交给吴三桂的年轻人的身份，很多人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这的确是太子，但他从吴三桂军中逃脱了，与太监高起潜回到天津，浮海南下。有人认为太子从吴三桂部队中逃出后，死于战乱之中。更多人认为这个太子是假的，李自成没有把真太子交给吴三桂。《明史·李自成传》和《明季遗闻》等说李自成撤出北京前，烧毁了宫殿及九门城楼，“挟太子、二王西走”，如此太子及二王一直在李自成的手中，交出去的必然是个冒牌货。

《清世祖实录》云顺治元年十二月，有一个年轻人自称是崇祯太子，内监杨玉为他换了衣服，送至明周后的父亲周奎家。据《国寿录》、《甲申传信录》等书记载，这个自称是太子的人在京城攻破时逃到李国公家，李家无人，就越墙离去，为一个卖豆腐的老太看到，可怜他就给他东西吃。年轻人说是太子，老太婆就不让他讲，隐匿起自己的姓名。但老太婆很穷，养了他三个月，

实在养不起他了，就送到周奎家。周奎一开始很高兴，但时间一长觉得不对劲，就怀疑他是假的，上疏奏明。清政府的有关人员速将太子拘留了起来，下令后宫传明朝贵妃袁氏及东宫官僚内监前来辨视，几人看后，都称不认得这个人。他们问他宫中以前的事情，年轻人也答不上来。袁贵妃说太子有四虎牙，牙根很黑，还有疤痣，眼前的这个太子什么都无，因而他们认为这个人是假的。但是花园内监常某、进节指挥李时荫等认为这个人是真太子。最后清廷下法司覆勘，断定这个人是假冒的。

还有人认为太子在与李自成西撤的途中，和东宫侍读李士淳一起偷偷逃脱了。二人一逃就逃到粤东嘉应州灵光寺，削发做和尚了。传说李士淳是嘉应州人，北京攻破时，他与太子一样被俘遭罪，所以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太子救出来逃走。逃出来后，觉得自己的老家是个最好的避难地，遂走了这条路。李士淳的后代中有个叫李大中的，在《二何先生事略》中说李士淳带了太子逃命时已六十岁，“顾势已无可奈何，乃请某王削发为僧”。《三柏轩集》说寺庙是当时新筑的，在半山腰人迹罕至处，名为紫殿，也叫圣寿寺。还为太子取了法名，叫龑和尚。李士淳此后还在中秋节，与龑和尚一起登塔赋诗，两人写的应答诗，还刻在石碑上。至今，在广州梅县一带还传说着“太子菩萨”的故事。

关于太子的传说，影响最广的就是南明王朝建立后，有一个年轻人到达南京自称他就是太子。弘光帝十分惊慌，因为弘光帝是明朝福王的儿子，本无权继承帝位。如果太子为真，他必须让位太子，否则必将受到来自舆论及其文臣武将等各方面的压力。所以弘光帝极力想证明这个太子是假的，以保住自己的帝位。根据《明季遗闻》、《明季南略》等书的记载，弘光帝想了许多办法证明出这个太子是个假冒的。太子事情最后还未结束，南明灭亡，弘光帝只顾逃命，也就不管太子死活了。或说太子在清军攻入后不见了，或说被清军带到了北京，从此没有声息，想必是被清军害死了。这个太子有人说是真的，也有人认为他的确是个假的。

崇祯的另两个儿子，即定王和永王，《明史》等认为被李自成俘获后，下落不明。但清代也有一些真假难分的记载，讲到了二人的踪迹。

康熙十二年(1673)十二月，有人在北京自称是朱三太子，改元广德。朱三太子，为崇祯帝第三子朱慈灿，封定王。当时响应朱三太子者用白布裹头，约以举火为号，准备在京城起事。举事者聚集在明遗臣周全斌家中，为

清兵知道后，派兵包围周家，广为搜捕，擒获数百人，全部被处死。后据调查，这个朱三太子其实是一位名叫杨起隆的人假冒的。五年后，杨起隆在陕西被擒，押解至北京，终被处决。与此同时，两广一带有人自称是朱慈灿，响应吴三桂反清，被清政府捕获。

康熙四十七年(1708)，浙江人张念一等在大岚山起事，打着朱三太子的旗号，改元天德。不久，清兵进行了围剿，被拿获。清政府派侍郎穆丹前往审问，让他一定要查清朱三太子到底是谁。四月，山东上疏在蓬莱缉获已改名王士元的朱三太子，奉旨将他解往浙江一起审问。据这位朱三太子招供，他是崇祯皇子，名叫朱慈焕，曾封为定王，是年七十五岁。明亡之际，年方十岁，逃出京城后，辗转流离，改名王士元，在山东蓬莱县退职县令李方远家教书，与张念一等素不相识。由于当时称朱三太子的人实在太多，为平息不断出现的武装暴动，张念一等一百多人全被处死。五月，王士元及其子孙六人被押到北京，由刑部详细审问。十月，王士元及其子孙全部被处死。崇祯第三子应当是朱慈灿，王士元自称是朱慈焕，封定王，而慈焕应为崇祯第四子，曾封为永王，明亡前已死，故清人认为王士元的供词是有问题的。

康熙年间，自称是朱三太子的案件一个接一个，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不得不承认，以朱三太子号召起事者数不胜数。由于朱三太子成了明朝继统的象征人物，很容易被反清复明人士利用。而朱三太子这个人在当时是否活着，或者他本人是否参与起事，实在是很难说得清楚。

除上述三子外，崇祯帝的其他儿子也时不时地冒出一二个。《尧峰文抄·书张缙始末》记载在顺治十六年(1659)六月，河南柘城有一个头戴缨笠，身着汗裤，骑着高头大马的年轻男子，与旅店主人发生了争执。周围的人们看不惯他的盛气凌人，就将他抓了起来，在他的背囊中发现了铜印一枚。这个人被送到县衙后，坚决不肯下跪，自称是崇祯帝第四子朱慈焕，生母是周皇后，并详细地讲述了他当年是如何跑出宫殿的。县官听得稀里糊涂，但不敢自作主张，就把他送往巡抚处。巡抚一看，事情很棘手，马上又将他送往北京，清廷命兵部审查。事后据这个人交代，他叫张缙，浙江金华府人。假冒崇祯的儿子，并不会有好结果，最后被处死。

崇祯诸子的最后归宿，即使在清初就成了历史之谜，一个个人自称是崇祯儿子，只能说是反映了人们反清复明的愿望，可以肯定的是真实性很小。

年轻之人　南明弘光帝亲审太子之谜

明朝灭亡，一些大臣在南京又建立了一个小朝廷，后世称之为南明，即位的皇帝是宗室朱由崧。不久，一个自称是崇祯太子的年轻人来到了南京，使朱由崧神经高度紧张，因为他的皇帝宝座就要不保。于是一场接一场一定要把这个年轻人说成是假太子的审问开场了。

当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城后，崇祯帝杀妻砍女，并且召来了自己的儿子让他们各自逃命。随着崇祯帝在煤山老槐树上吊死去，统治了中国二百七十七年的明王朝宣告灭亡。

崇祯帝自杀的消息传到陪都南京，城中官员一片慌乱。一些臣僚为再树明帜，商议拥立新君。当时思宗的从兄福王朱由崧与从父潞王朱常淓正避难于淮安。按世系序次，福王当立，但福王为人昏庸。凤阳总督马士英认为福王易于控制，遂联合刘孔昭等，力主拥戴福王。翰林院詹事姜日广等人认为福王品行不端，不宜拥立，主张立较贤明的潞王。双方相持不下，各请兵部尚书史可法定夺。

史可法到南京后，提出福王有七不可立：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干预有司，他也主张立潞王。马士英闻讯，立即密约江北各总兵，致书南京诸大臣，说已传令将士奉福王到南京即位。马士英等握有兵权，声势较大，在既成事实面前，史可法无奈地同意了。

五月初一，福王至南京，百官入贺。史可法提出，崇祯太子存亡未卜，如果现在称帝，太子一旦南来，打算怎么办？他不主张福王马上称帝。五月四日，福王上监国之位，建南明政权。十天后，福王改即帝位，以是年为弘光元年，史称南明弘光政权，福王为弘光帝。

弘光政权建立后，极为腐败。他们天真地幻想清兵在消灭李自成后能停止南侵，并且派使携带大量金银去酬谢清军。弘光皇帝不理朝政，天天在宫里纵情声色，只知道在民间选择淑女供自己享受。

根据《明季遗闻》等书记载，1645 年初，有一少年从北方南来，经南京至杭州，住进了南明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侄子高成的家中，自称是崇祯太子朱慈烺。高梦箕不敢隐瞒，密奏弘光帝和大学士马士英。弘光帝得知消息后，

慌张不安，他虽然昏庸，但知道自己的皇位是怎么得来的，如果真的太子来了，必定会危及自己的皇帝宝座。于是命太监李继周将少年迎到南京。

李继周在金华见到了太子，太子说："朱由崧想把皇位让给我吗？"李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太监前来迎太子，顿时在金华传开，许多官员纷纷前去参见太子，一路上招待太子的官员接踵而至。太子到南京后，先被安置在兴善寺。弘光帝十分忧虑，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件事。他先派两个原在北京皇宫里当差的太监前去观察动静，想不到两人一见太子就大哭起来。见太子衣衫单薄，就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披在太子身上。太监一回来，就遭到弘光帝一顿臭骂："太子是真是假都难搞清，就把他当成皇帝看待。就是真太子，我也不会让位的。"两个太监和李继周都被秘密处死。

太子到来的消息传到民间，引起轰动。南京百姓争相要一睹太子的风采，官员们也想先见上太子一面，将来能有个升迁的好机会。弘光帝一看此事已无法禁止，就传旨太子的身份必须确认，不便见百官，把太子关进了大狱。

兵部有个官员上奏说，他知道太子的底细。太子名叫王子明，高阳人，是驸马都尉王昺的侄孙，外貌酷似太子。北京陷落后南奔，遇见高梦箕家人穆虎，是穆虎让他假冒太子来到南明的。弘光帝一听，激动万分，因为太子很有可能是假的，这样他的皇位就不会出现任何动摇的机会。他马上传旨要亲自审讯太子，这时他也有胆量让见过太子的官员前来辨认。曾教太子读书的刘正宗和李景濂被召到武英殿密谈，在一番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后，刘正宗马上表态："听说太子已经死了，这个冒出来的太子我一定能够看出点问题的。"

大明门辨认正式开始。刘正宗拿出地图问图上的承华殿和坤宁宫是什么场所，想不到太子一一回答，说是自己的东宫和皇后的住所。接着刘正宗问自己以前教的课目，太子对答如流。问题问了一个又一个，都没有问倒太子。太子笑着说："如果你以为我是假的，我就算是假的。我本来就不想来争皇位，是皇伯让人接我到京的。"刘正宗知道也问不出名堂，最后对弘光帝说："样子很像太子，但回答的问题都不对。"

有个姓苏的太监忽然记起太子的胫骨上有个特别的记认，一看就知是真假，连忙向弘光帝报告。这下弘光帝就不敢让人看了，万一是真的，就很难收场了，与马士英一商量觉得还是让人辨认比较好。他们想到了被关在

监狱里的方拱干，方当年曾为太子讲过一段时间的课，如果他说不是，就很有权威了。

三月初八，刑部会审太子，方拱干前去辨认。审问官让太子跪下，太子不答应。一个官员指着方拱干问太子这个人是谁？太子说是方先生。方拱干一见太子，既不敢说是假的，也不敢说是真的，因为这个人太像太子了，真假实在难辨。一个官员见到辨认失败，干脆直截了当地说："你不是太子，你真名叫王子明。"太子说："我又没有自吹自己是太子，你们不想认也就算了，你们一年前不就是站在我父皇的朝廷上吗，如今为什么这样健忘，连一个人也不相认了。"大臣们被他讲得哑口无言。最后内阁官员王铎说："太子肯定是假的，不要再审了。"

这时，百姓间流传开来了马士英和王铎要杀太子的消息，一些大臣纷纷上疏责问。将军黄得功说："假冒太子的结论是官员奉承皇帝的结果。是谁下结论认为太子是假的？依据是什么？应该向天下百姓交待清楚。先帝的儿子，也是陛下的儿子，怎能关进大狱？"

弘光帝看了奏本，气得要死，下旨烧掉黄得功的奏本，但迫于舆论只能再审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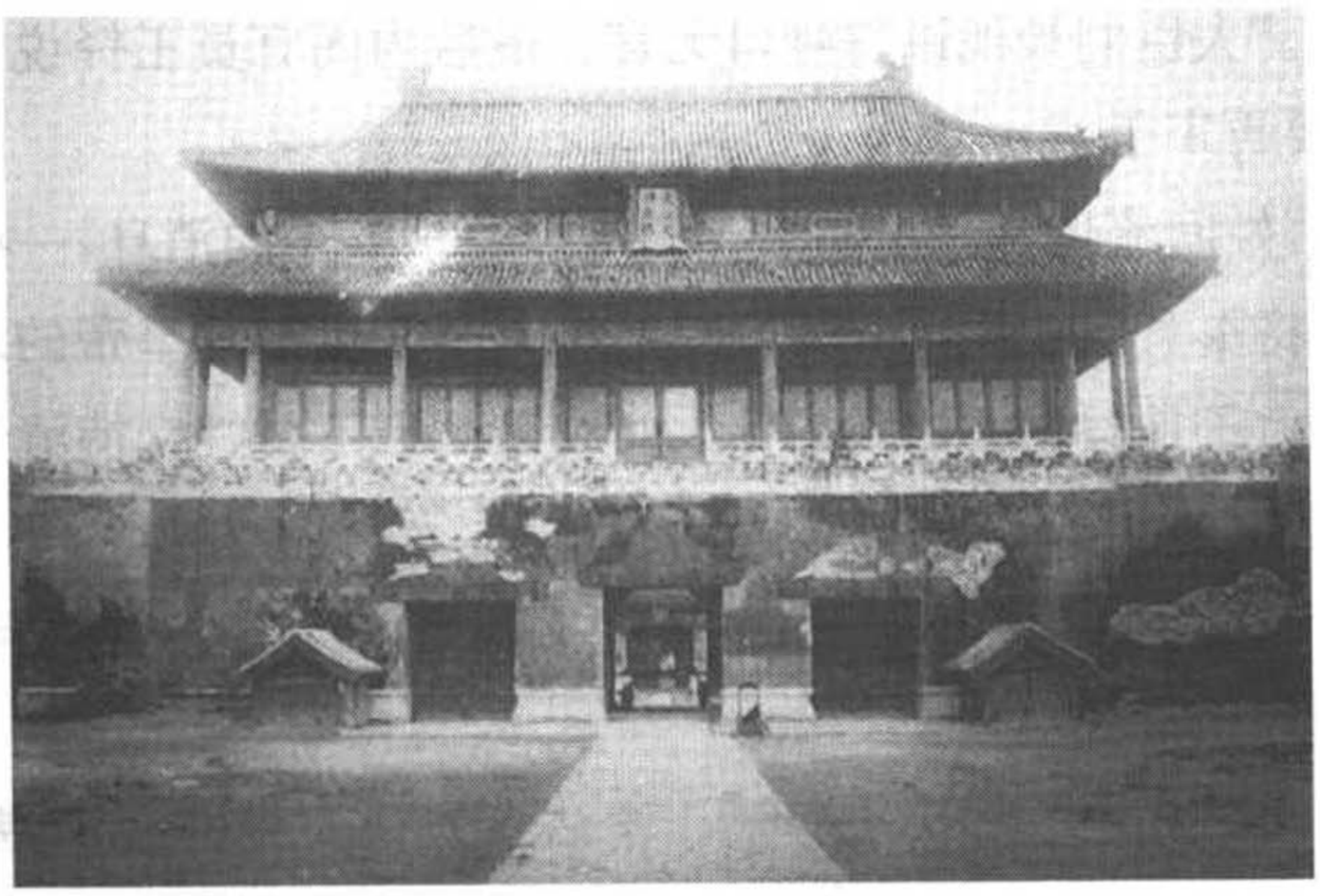
这次审问官员是左都御史李沾。李沾事先让人告诉太子，要他自认是王子明。开审时，李沾直呼王子明，太子不应。李沾命人上刑罚，太子痛得大呼小叫。当年东宫伴读的丘致中实在看不下去了，抱着受刑的太子大哭，当即被关入大狱。

外面舆论越传越厉害，南明一些大臣对这件事也十分关注。弘光帝无奈之下只能作出对北来之人"好生护养"、"勿骤加刑"，待正告天下后再行申法的决定。太子案真假还来不及搞清楚，南明小朝廷出问题了。先是驻守在江北前线的四镇总兵为争夺地盘互相开战，接着驻武昌的左良玉部以奉太子密诏"清君侧"为名起兵，直指南京。弘光帝、马士英急调各部入卫南京，无暇再理此案，使太子案不了了之。

五月十日，清军渡江，弘光帝、马士英连夜逃出南京。混乱中，有人拥太子登武英殿，群呼万岁。清军入南京，太子不知去向，有人说被清军俘虏，有人说在乱军中被杀。太子是真是假？当代有很多人进行了考证，有人说是伪太子，也有人说是真太子，双方各说各的理由。其实，太子的真假不要说今天我们是难以知道，就连当时的人们也无法搞清，这早已是一个千古历史之谜。

一条黑影　　清嘉庆被刺之谜

清朝皇帝碰到的第一次行刺事件发生在嘉庆八年(1803)，一个叫陈德的人于紫禁城神武门内、顺贞门前持刀行刺嘉庆皇帝。官书野史上有许多话不便讲，所以记述极其简单，且有许多不实之处和附会之谈，使这一事件隐晦不清，遂成为千秋疑案。有人说这件事与白莲教也有关系，是真的吗？



清末的神武门，就是现在故宫博物院的后门，
嘉庆皇帝就是在这里遇到刺客的

嘉庆八年(1803)闰二月二十日早晨，一个叫陈德的人身藏小刀，带着长子陈禄儿在东安门内酒铺喝过酒后，父子俩就进入东华门，穿过东西牌楼门，从西夹道绕到神武门，仔细观察了护卫士兵的站位和巡视路线，便隐蔽在西厢房南山墙后，等待嘉庆的到来。没过多少时间，嘉庆帝乘轿进了神武门，将进顺贞门时，陈德猛地冲出，手持小刀，直扑嘉庆帝。眯着两眼的嘉庆帝本在休息养神，这时只见一条黑影向自己奔来，知道大事不妙，吓得魂不守舍，脸色煞白，话也讲不出来，轿夫们见状加快脚步，抬着嘉庆急忙逃入顺贞门。一百多位守卫在神武门内东西两侧的侍卫、护军章京、护军校、护军，从未碰到过这样的紧急情况，一个个呆若木鸡，竟然没有谁想到要冲上去拦阻捉拿，只有御前大臣定亲王绵恩、固伦额驸拉旺多尔济，御前侍卫扎克塔尔、珠尔杭阿，乾清门侍卫丹巴多尔济、桑吉斯塔等六人迎前拦截，将陈德包

围了起来。陈德挥刀一扑，连嘉庆的轿子边也没有刺到，这时见嘉庆轿子已钻进了顺贞门内，他手挥小刀，左冲右突，想赶到轿子的前面。绵恩等六人将陈德团团围住，陈德挥舞着小刀到处乱戳，将丹巴多尔济连刺三刀，并将定亲王绵恩的袍袖刺破。几个回合下来，陈德已经没有力气了，周围的人拿了刀枪也围了上来，陈德的一把小刀也被大家打掉，最后力屈被缚。

惊惶失措回到宫中的嘉庆帝，想想十分害怕，命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连夜审讯，第二天又加派满汉大学士和六部尚书会同审讯。二十三日再派都察院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使和六部尚书组成九卿会审，要让陈德先尝尽各种刑罚的折磨，再分尸毙命。深感事情重大的官员们不分白天黑夜，运用疲劳战术，不让陈德吃睡，使陈德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力。当看到陈德态度十分硬悍，审讯人员对他大施酷刑，如掌嘴板责、刑夹押棍、拧耳跪炼等，无所不用其极。

那么，这个不怕死的陈德是个什么样的人？陈德，原名陈岳，或称成得、成德，原为镶黄旗人，时年四十七岁。陈德父陈良是山东青州府海防同知松年的家奴，在行刺发生前其父母亲都已先后去世。青年时的陈德流落在山东，因生活没有着落，才想起京城有个堂姐的儿子在内务府正白旗当护军，三十一岁那年进京让这个叫六格的护军为他找工作，后来在侍卫绷额布、内务府包衣达常索、跟官孟明等人家里打工。嘉庆七年二月，陈德老婆病死，丈母娘张宋氏已经八十多岁了，摔了一跤后瘫在床上，全要靠陈德赡养。陈德有两个儿子，叫对儿的十三岁，叫禄儿的十五岁，原来一家住在孟明的家里，因陈德喜喝酒，而且又叫又唱，遂被孟明辞退，就暂时借住在朋友黄五福的家里。

什么原因促使陈德要行刺嘉庆呢？陈德自己说他穷苦没法过了，往后的日子是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又被辞退，心里气恼，于是想行刺嘉庆，把事情搞大，从而因祸得福。又说自己以前曾做过一个梦，一个朋友领他走到东宫的地方；后来又有一梦，梦见自己躺在无水桥下，后跑到桥上，身上穿着蟒袍，因此认为东宫是皇宫之地，蟒袍是黄龙袍，在桥底上睡就是虬龙，自己将来肯定有朝廷福分。这几年来他一直胡思乱想，十六日那天知道嘉庆在二十日要进宫，于是起意要行刺。据此看来，陈德是个穷人，日子艰难，因而一直幻想要改变自己的处境。被孟明解雇后，生活没有着落，残酷的现实使他越想越气，因自己熟悉宫廷门禁、宫内路径以及皇帝护卫的情况，遂决定进

宫行刺。

对陈德的审讯连续进行了四天四夜，最后大体也搞清了为什么要行刺的原因。嘉庆皇帝为了杀一儆百，在二十四日下旨将陈德凌迟处死，陈德的两个儿子处绞刑。陈德受刑时，临危不惧，从容自若。《满清野史》对处决陈德的场面进行了详细描写，说陈德临刑前不看刽子手一眼。行刑者先割下耳鼻，再割下双乳，又从左臂呈鱼鳞形一点一点地割下肉来，再割至右臂、后背、前胸，上身的肉全部割完了，陈德突然张开双目说快点割，但刽子手凶恶地说："皇上命令，让我们慢点割，让你多受点罪。"事实是否如此，尚待查证，但陈德表现出了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气势，的确让人敬佩。



嘉庆皇帝

有一种说法，认为陈德行刺嘉庆是天理教反清活动的一部分，陈德是受天理教头领林清主使的，在一些野史笔记上记载陈德曾于这一年与祝现、支进才到山东金乡县崔士俊家住了一个月，二人在后来因加入天理教而被捕，都是林清的党徒，所以陈德实际上和他们是一伙的。对此，有人认为是绝不可能的，因陈德在嘉庆八年根本不可能到山东去。陈德二月二十五日之前一直在孟明家做工，之后又在为住房而奔波，闰二月十日向黄五福借房子。中间的半个月要到山东金乡，一千三百多里路半个月打来回恐怕是来不及的。再说，即使到了崔家，也不能说明他是林清党徒。林清自己本人于嘉庆十一年才入教，而他的手下祝现等人在嘉庆八年时很难说已是天理教的人。

陈德的行刺今天从全部审讯档案来看，是一个人的行为，并无同谋和主使者。实际上当时朝廷也想找出主使人和同谋者，想看看是否有同党，为此用尽了酷刑，还将前几天与陈德接触过的人全部逮捕，再三推鞫，严刑究问，结果也没有问出个名堂，最后断定是陈德一人“起意惊驾”。

陈德行刺嘉庆，是清朝皇帝碰到的第一次行刺事件，反映了一部分劳动人民由于生活贫困想通过行刺皇帝来达到改变现实的目的。行刺虽然失败，但它提醒统治者已经到了缓和社会矛盾的时候了。

违法剃头　　清乾隆孝贤皇后丧葬之谜

乾隆即位十多年后，出现了丧妻失子的家庭悲剧，内心痛苦万分，情绪不稳。在对待皇后的丧葬问题上，乾隆处罚了大量办事不力的官员，弄得官员们人心惶惶。但实际上，这件丧葬案件却是整顿朝政的开始。

乾隆的第一个皇后，名富察。当乾隆御极之前，尚居于皇子之位时，富察氏经世宗册封为乾隆嫡福晋。乾隆登极后的第二年，他立富察氏为皇后，两人关系十分融洽。

乾隆十三年(1748)正月，富察氏奉皇太后随驾东巡，前往山东祭祀孔庙，登临泰山。由于旅途劳累，到济南时感染风寒，休息了几天，病情略有好转，就匆忙赶路回京。途中病情复发，于三月十一日死于山东德州运河中的御船上，年仅三十七岁。乾隆与结发妻子的感情极为深厚，富察氏的晏驾，他心中十分哀恸。他曾说自己十多年来能专心国事，有空闲的时间游览书籍，主要是“皇后之助也”。他还写了一篇十分感人的《述悲赋》，来哀悼皇后。

皇后之死给乾隆精神上极大打击。在这之前，皇后所生的两个儿子都先于其母去世，这两个儿子都深得乾隆钟爱。一个是皇次子永琏，聪明贵重，气宇不凡，乾隆曾将他的名字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秘密立他为皇太子。不料永琏突患寒疾，很快就死了。另一位是七皇子永琮，才两周岁却因为出痘死亡。皇后死的第二年，年幼的皇九子又死，这又给乾隆增添了不少哀伤。



“卢沟晓月”四个字是乾隆的御笔

乾隆中年失妻，又连续失去几个儿子，一连串的家庭悲剧使乾隆陷入极度痛苦之中，心情渐渐变得暴躁易怒，乾隆的执政风格从此发生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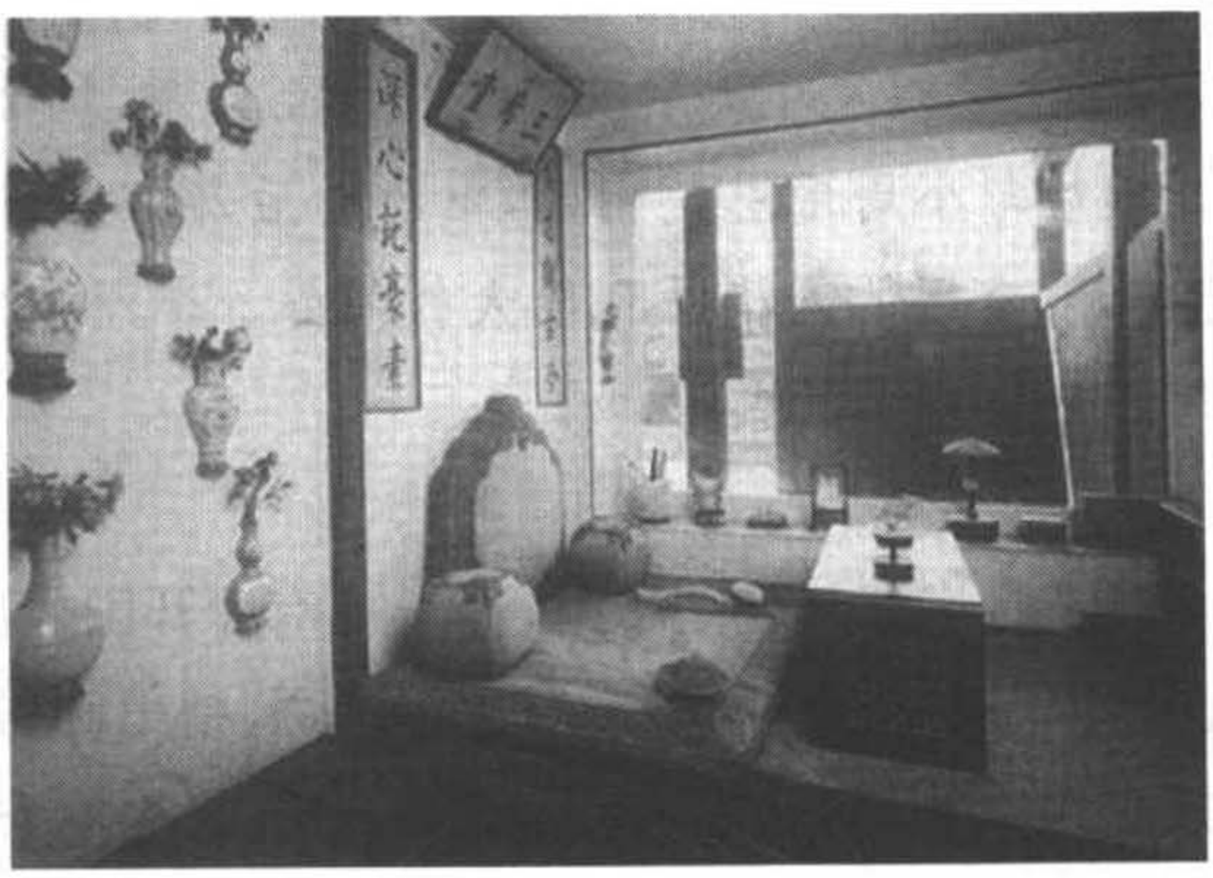
皇后刚死时，皇长子永璜年轻不懂事，因死去的不是自己的生身母亲，没有哀伤的表示。乾隆责备他在孝道礼仪方面“未竟尽处甚多”，而永璜的师傅俺达因为教育不力也受到处分，和亲王弘昼、大学士来保等各罚俸数年。一个月后，乾隆发现皇后的册封文书在译为满文时，误将“皇妣”译成“先太后”，乾隆勃然大怒，指责翰林院大不敬，说管理翰林院落的刑部尚书阿克敦心怀怨望，交刑部治罪。刑部的官员见到乾隆这副样子，遂加重了对阿克敦的判决，拟绞监候。但乾隆认为刑部是在故意庇护阿克敦，将刑部的满汉尚书、侍郎全部革职留任，而可怜的阿克敦因“大不敬”斩监候，秋后处决。

闻知皇后崩逝，地方上的多数官员为了表示对皇帝的忠心，博取皇帝的恩宠，纷纷呈递奏章，要求“跪请圣安”，并请“叩谒大行皇后梓宫”，参加追悼仪式。乾隆知道大臣们大多并不是真心实意，所以并不同意汉族官员入京，但他认为满族官员应该要奏请入京的，如果各省的满族都抚、提督、将军、都统、总兵官等知道皇后去世没有奏请来京的，各降二级留任或调用，有的要销去军功记录。湖广总督塞楞额、浙江巡抚顾琮等三十四名满族大员由于未奏请赴京而被降二级留任。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十九人分别被销去加级、军功记录。

为了筹措皇后的葬礼，乾隆不惜钱财，大兴土木。官员在兴办葬礼中有

功的人获得晋升，反之就革职问罪。吏部侍郎德通、翰林大学士塞尔登办理孝贤皇后册文，乾隆认为二人草率从事，结果被免职留任。孝贤皇后灵前的祭品是由光禄寺承办的，但乾隆认为不合礼仪，结果主办的光禄寺卿沈起元被降一级使用。工部在办孝贤皇后册宝时草率粗陋，右侍郎索柱被降三级调用，左侍郎涂逢震被降四级调用。七月，恭进孝贤皇后谥册之日，礼部官员办理过程中出现舛误，礼部尚书海望、王安国被降二级留任，侍郎木和林被销去二级，沈德潜被销去记录四次，还被降了一级。

皇长子永璜前已受到责备，此时他和皇三子永璋仍没有表露哀伤而再次遭斥责。乾隆公开批评说："看这个大阿哥已经二十一岁了，皇后过逝这样的大事情，他的一切举动尚堪入目吗？父母一块儿到山东去，回来时只有父亲一个人了，稍具人子之心，应该哀痛得受不了，而大阿哥全不介意，还是和往常一样干他的事情，没有一点哀痛的意思。三阿哥已经十四岁了，一点也不懂事体。"从没有哀思又想到了立储问题，乾隆断然说："此二人是一定不能承续大统的。他们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心把他们杀掉，他们应当知道我保全活命的恩德，安安分分地过日子。"这时皇后死了也有一百日了，乾隆也没有想立储君，把二人痛骂一顿后突然一下子话锋一转说到这个问题，乾隆实在是有点小题大做。



故宫养心殿三希堂里存放着乾隆皇帝最喜爱的珍宝文物

清朝国制，碰到国家丧事，百日之内是不能剃头的，倘有谁违犯，立即处斩。然而，皇后丧服未满百日而违法剃头的屡见不鲜。山东沂州营都司江兴汉是第一个被告发，乾隆得知后气愤异常，当即下令山东巡抚将江兴汉马

上押解到京，交刑部治罪，险被杀头。紧接着锦州知府金文淳也不把国制放在眼里，尽管手下人正言规劝，他还是照剃他的头，刑部依律处斩立决，只是由于后来违制剃头的人甚多，乾隆才改为秋后处决，最后把他释放了。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在皇后死后二十七天剃头，其所属文武官员跟着一块儿剃，乾隆听说后万分愤怒："周学健丧心悖逆，不单单一个人敢于犯法，而且所属官员都效仿他，违法乱纪，上下成风，令人惊骇。"当即下令将他拿解来京，交刑部治罪，后赐以自尽。又过数日，发现大官中剃头的还有很多，湖广总督塞楞额、湖北巡抚彭树葵等也均剃头，乾隆怒不可遏，大骂这些人"丧心病狂"，下令塞楞额交刑部治罪，后被赐以自尽，彭树葵等被革职留任。

因皇后的丧葬引起的政治风波，有人被革职留任，有人被降级调用，有人险被斩决，有人被赐自尽，形成清朝历史上的一个大案。这从表面上看是乾隆心情不佳造成的，但实际结果却造成了乾隆对国家机构的整肃。乾隆刚即位时，政局宽松，使官僚机构逐渐废弛，违法乱纪者层出不穷，凭借皇后的丧葬，乾隆的政策渐趋严峻，对官员的处罚越来越重。

失魂落魄　　李煜小周后侍奉宋太宗之谜

南唐灭亡后，后主李煜及小周后被宋军押解至开封，过着与犯人相差无几的囚禁生活。李煜与小周后恩爱相亲，但小周后却常常被宋太宗召进宫内，一住就是好多天，李煜的人格受到极大的侮辱。李煜被宋太宗毒死后，小周后带着缠绵哀怨也离开了人间。

南唐后主李煜十八岁那年就结了婚，妻子是南唐开国老臣周宗的长女、十九岁的娥皇。李煜不是一个好皇帝，但他善诗词、精书画、知音律，十分富有艺术天赋。娥皇凤眼星眸，朱唇皓齿，冰肌玉肤，骨清神秀，她通书史、能歌舞、工琵琶，与李煜有着相同的志趣和执著的追求。两人婚后恩爱无比，如胶似漆的情感有增无减，生了两个活泼可爱的儿子。可惜好景不长，乐极生悲，结婚十年后的一天，娥皇突然病倒，久治不愈。病魔将娥皇折磨得形体枯槁，神态木然，终日昏睡。忧心如焚的李煜，情绪随着娥皇的病情而日益恶化，从希望到失望，又从失望走向绝望。

此时，有一位风姿绰约、妖艳欲滴的芳龄少女突然闯到李煜的身边。这位阴差阳错的少女，是李煜爱妻娥皇的胞妹，因为史佚其名，加之娥皇死后李煜续弦将她立为国后，所以时人称她为小周后，以示与她的胞姐周后相区别。

小周后比她的姐姐小十四岁，听说姐姐得了重病，就专程从老家扬州前来金陵探视。想不到李煜一见这位小姨子就被她迷上了，之后他主动作词给她，说自己见到她是“相看无限情”。又特地让有关衙门在清辉殿举办歌筵，让她看歌舞表演，欣赏宫中名花。一来二去，小周后就倒入了李煜的怀中。娥皇死后，小周后就代替自己的姐姐与李煜生活在一起了。

968年，也就是娥皇死后一年，李煜重新用皇家最高规格的仪仗迎娶小周后，接着又接连数日举行庆贺仪式。其时南唐内外交困，久被国事折磨的李煜只有在小周后的柔情和妩媚下才感到自己的生活仍有乐趣可言，但这使他更加不理国政，整日与小周后等女宠混迹在一起。

975年，北宋向南唐发动了全面进攻，由宣徽南院使曹彬率领的部队没有遇上什么强有力的抵抗就把金陵攻克了下来。李煜为了不使金陵成为涂炭战场，按照宋兵的要求，率领王公后妃、百官僚属在江边码头集结，登上宋船北上。数月后，李煜来到开封，朝觐赵匡胤，得到了一个带有极大侮辱性的封爵“违命侯”，还要违心叩头谢恩，高呼万岁。

宋太祖赵匡胤不明不白地死后，赵光义称帝。当年十一月，他废除李煜的爵位“违命侯”，改封“陇西郡公”。表面上看，似乎意味着李煜身份的提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常常用言语侮辱李煜，使李煜感到十分难堪。尽管面对太宗的羞辱还要强颜欢笑，而内心却感到无限的伤痛。

最使李煜痛苦的是，“江南剩得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小周后跟他降宋后虽然被封为郑国夫人，但李煜却连自己皇后也无力保护。宋太宗常召小周后和其他南唐命妇一道入宫陪宴侍寝，一去便是多日，使得一往情深的伉俪，咫尺天涯，难以相聚。小周后每次入宫归来，都要扑在李煜的怀中，向他哭诉宋太宗对她的无耻威逼和野蛮摧残，为了李煜的安全，小周后只能满足宋太宗的任何要求。李煜望着小周后那充满屈辱和痛苦的泪眼，唉声叹气，自惭自责地陪着她悄悄流泪。还能有什么办法？他深为自己无力保护爱妻的身心而内疚，更对宋太宗的残忍而愤恨。但这个时候，南唐君臣的命运操纵在他人手里，李煜对亲人遭受的这种难以启齿的凌辱也就无能为

力了。他除了强忍心灵深处创伤的剧痛，长时间同小周后抱头饮泣之外，只有强压怒火，加以回避。每次小周后应召入宫，李煜就失魂落魄，坐卧不宁，彻夜难眠，望眼欲穿。小周后巧笑顾盼的可爱形象，总是如梦似幻般地萦绕在他的眼前。尤其是暮春之夜，他惆怅无言，倚枕遥望宫殿。想念之中，窗外似乎又响起了他熟悉的小周后夜归的脚步声。他赶紧起身，凭窗环顾深院，却不见小周后飘飘欲仙的倩影，只有满地落红。随手拈笔，即成一首《喜迁莺》："晓月坠，宿云微，无语枕频倚。梦回芳草思依依，天远雁声稀。莺啼散，余花乱，寂寞画堂深院。片红休扫尽从伊，留待舞人归。"

从金陵的安富尊荣的享乐生活，到开封的萧索凄凉，李煜和小周后满腔都是悲愤和怨恨。978年的七巧节，这天恰好是李煜的四十二岁诞辰，后妃们为李煜拜寿，她们在庭院中张灯结彩，备置几案，摆上酒食瓜果。这天月色朦胧，大家的心突然感到无比茫然和凄凉。酒过三巡，沦落在异乡受人凌辱到几乎麻木的李煜勾起了对不堪回首诸多往事的苦思苦恋，想到自己的江山故国早已物是人非，巨大的失落感就使得他心力交瘁，无穷无尽的愁恨，就像泛着春潮的大江流水，在他的胸膛里翻滚激荡："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煜这边又是牢骚又是情绪激昂的填词，消息传到了赵光义的耳中，他暴跳如雷，宋朝的皇帝怎么能容忍亡国之君在大宋京师怀念故国？于是决定除掉李煜。他知道自己的弟弟赵廷美与李煜过从甚密，于是他让毫不知情的赵廷美代表他前去祝寿，并赐一剂"牵机妙药"，供李煜和酒服后扶摇星汉，观赏织女牵机织布，以解胸中郁闷。李煜服下后当即中毒身亡。

李煜死于非命之后，小周后失魂落魄，悲不自胜。她整日不理云鬓，不思茶饭，以泪洗面，终因经不起愁苦与惊惧的折磨也于当年离开了人世。小周后虽然悲惨地死了，但她却为后世文人墨客留下了一个吟咏爱情题材的美好形象。直到清代，还有人在作画吟诗，赞美她与李煜的那段浪漫往事。

忍气吞声　　宋仁宗曹皇后的道德殉身之谜

北宋仁宗曹皇后和仁宗的感情并不深厚，她不和其他嫔妃争宠，不干涉朝廷政治，却对违反道德的行为要坚决处置。为了丈夫，她对皇太子宗实过

分冷酷，以致宋英宗上台后与她关系十分冷淡。她为了儿子走上政治前台实行垂帘听政，但从不自作主张，几乎到了软弱无力的地步。有人认为这是“夫死从子”的观念在她脑子里作怪。

曹氏(1016～1070)，真定(河北正定县)人，宋初大将曹彬的孙女，宋仁宗赵祯的皇后。史书说她性慈俭，重稼穑，“庆毓令淑，望蔼高华，而性禀柔，体含仁厚，援图史以自鉴，节环佩而有容”，是个公认的标准好女人。仁宗第一位皇后是郭氏，明道二年(1033)，仁宗母亲章献刘太后死后，他废郭后为尼，幽居长宁宫。十八岁的曹氏是个大家闺秀，就在这时奉诏入宫。大臣们认为国家不可一日无皇后，但仁宗喜欢的女人大臣们从道德规范上认为是不够格的，于是仁宗不得不从道德高门人家中找一个皇后。第二年九月，曹氏被册为皇后，事实上他和仁宗之间是不会有多少感情的。

曹皇后出身将门熟读经史，善飞白书(书体之一)，谦谨节俭。她亲自带领宫嫔们在苑内种植谷物，采桑养蚕。尤其是郭皇后的事情在前，她以此为戒，小心翼翼，决不不和其他嫔妃争宠，不干涉朝廷内政，对仁宗的话言听计从。康定元年(1040)，仁宗喜欢上了专宠和跋扈的张贵妃，曹皇后以宽容大度相对，而内心只是默默忍受着张贵妃给她的难堪。仁宗生三子，均已早夭，所以大臣们从国家要有接班人的角度一再上书干涉仁宗的私生活。有人说：“陛下春秋鼎盛，皇嗣未立，御后宫应当按着秩序先后来，这样可以上下有制，不相逾越。要下诏给后妃，习知谦退和柔之懿，无令僭妒得萌其中。”实际上大臣对张贵妃天天霸着仁宗看不下去了，认为要生太子的话也得从皇后开始，希望仁宗多点时间和皇后在一起。

庆历四年(1048)正月，仁宗宿于曹皇后宫中。至半夜，一阵杂乱的响声将他们惊醒，仁宗要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曹皇后劝仁宗不可轻动，免遭毒手。曹皇后把内监宫人集中起来，分别把守宫门。并亲手为每人剪下一绺头发，叛乱平息之后，以发为记，论功行赏。曹皇后临危不惧，应变有方，指挥若定，不愧为将门之后，仁宗大为佩服。

曹皇后以遵守、维护道德伦理为己任，以牺牲自己的幸福为代价，她自己是这样做的，她认为人家也要这样做。后宫有个婢女偷偷与一个士兵好上了，事情被发觉后罪当诛。婢女向张贵妃求情，张贵妃把这件事向仁宗说了，仁宗也想赦免她。这时曹皇后穿戴整齐找到仁宗，说一定要杀死她，仁

宗说重重地打一顿算了。皇后认为不可，说如果这样就不能整肃后宫。仁宗说你坐下说吧，皇后就是不坐。这样坚持了两个时辰，仁宗只能下令将婢女诛杀。表面上看皇后所做是为了当时的道德规范，但透过这件事情我们看到的是皇后冷漠、阴险的一面，为了成为社会妇女的懿范，皇后必须冷酷地对待一切违反伦理的事情。

仁宗一直无子，大臣心里很急。在大臣们的一再催促下，仁宗将濮安懿王四岁的儿子宗实（即后来的宋英宗）接入宫中。仁宗一心想生一个自己的儿子出来接班，所以宗实进宫后也没有被立为太子，仁宗对他的生活是不问不管，宗实原来家里的人没有一个敢和他通音讯，宗实吃用的东西也不能正常供应。史书上说宗实主要的养育任务落到了曹皇后的身上，曹皇后对他是掬育备至，但实际上曹皇后看到仁宗这样，她也没有太多的举措帮助宗实，她与仁宗所想的其实是十分一致的，因而宗实从小对仁宗和曹皇后是一肚子的气。仁宗想急于生子，以致纵欲过度身体衰弱，直到嘉祐七年（1062），知道自己不可能再有儿子了，才正式立三十一岁的宗实为皇太子，赐名曙。次年三月，仁宗驾崩。赵曙进宫即位，是为英宗，尊曹皇后为皇太后。

作为皇后，曹皇后和仁宗生活了二十多年，她千方百计以维护君权和夫权为己任，处处忍让，事事以严格的道德标准自虐和虐人，但她并没有得到仁宗的感情和信任。仁宗临死前脑子不清了，但嘴中却说皇后与张茂则要谋逆，使曹皇后有口难辩，竟然不敢走到仁宗面前，谁知道他一看到皇后会乱叫出什么话来。

仁宗死，宫中乱作一团，曹皇后冷静镇定地应对，把英宗捧上了皇位。本以为夫死从子，政权顺利过渡给儿子，自己也完成了任务，想不到以前吃尽了冷落苦头的英宗对曹太后并不领情，说自己身体不好不想听政，请太后权同处分，这分明是拿捏皇太后一下。就这样，曹太后无奈地走向了政治的前台，开始了垂帘听政。

曹太后的听政，得到了古代史书的一片赞扬。据说宰相大臣们上奏的事情有疑义而没有定论的，皇太后就说："公辈更议之。"从不独断专横，以自己的个人意见来决断军国大事。曹太后熟读经史，批答章奏时常援引古事来说明。她垂帘期间，对自己曹家的亲戚和左右大臣都一视同仁，决定任何事情都很讲究策略，宫内外一片肃然。

古史上的赞扬代表了古代男人世界的观点，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不一定全是好事。有人就不这样认为，他们说曹太后没有自己独立性的政治生活，其实是失败的政治，她的垂帘听政是处处忍让英宗和宰臣的听政，根本没法和真宗章献刘皇后强硬的垂帘听政相比。曹太后认为女人应该依附男性，顺从道德，以维护夫权、子权为己任。既然是为儿子听政，所以要以国家大局为重，女人不应有任何僭越，因而她处处受到辅臣们的牵制，她的听政其实是无力软弱的，一定程度上是凄凉的。

英宗病情好转后，曹太后在大臣们的逼迫下撤帘归政。英宗自小开始的一肚子怨气发不到仁宗身上，这时全发到太后和仁宗女儿们的身上了。刚上台，他就说要减少太后出入仪卫。名义上是为了减少宫廷开支。司马光竭力反对，说："万一使者懈惰，有司泥文，不能应时而至，迁延经日，有伤慈母之心，则非陛下以四海奉养之意也。"枢密使富弼也说英宗想让仁宗的女儿们搬家给他自己的女儿住，这实际上是不讲天人之道了，意即不能伤天害理，欺负孤母寡女。更有甚者，曹太后生活拮据也就算了，英宗还要下诏将自己的亲生父母合葬，打算追封父亲濮安懿王为皇，母亲为后，这还得到了韩琦等人的支持。司马光认为封个高官也就算了，你英宗能子孙万世相承都是仁宗先帝的恩惠。翰林学士王珪认为濮安懿王是仁宗的兄长，你英宗该称皇伯才是。一再讨论后，曹太后在英宗和宰臣们的逼迫下，只能下令尊濮王为皇，夫人为后，皇帝称他们为亲。至此，仁宗和曹太后的名分也被英宗剥夺了。仁宗在地下已经不知道了，而曹太后的心可想而知是彻底的碎了。

治平四年(1067)，英宗病逝，其长子赵顼即位，是为神宗。尊曹太后为太皇太后。神宗改变了他父亲英宗对太后的敌视态度，下令曹太后所需的物品可先行支出，然后补办手续。还打破惯例，让太后的弟弟曹佾入宫与曹氏叙天伦之乐。他将濮安懿王和夫人的封爵改称王和王夫人，恢复了仁宗和曹太后的皇、后的名分。神宗重用王安石变法，革除许多弊政。曹太后认为"祖宗法度不宜轻改"予以反对，但神宗没有采纳。1079 年，苏东坡以"乌台诗案"下狱，由于曹太后出面求情，苏东坡方才免于一死。同年冬，曹太后病逝，终年六十四岁。谥号为慈圣光献皇后，葬永昭陵。

一些学者认为，北宋中期，许多人开始攻击唐朝开放的社会风气，要求妇女讲道德、讲贞节，重回传统角色。曹太后出身于贵族高门，在这种社会



宋神宗赵顼

思潮的影响下，她选择了恪守传统道德的道路，顺应了社会观念的需要，她是自愿迎合这条道路的，放弃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尊严，放弃了自己对幸福的追求，她一味地想依附男性，维护夫权和子权，最后通过道德自虐和虐人，将自己当成男人的附属品。她和一些士大夫一起捍卫了这个男人世界，但同时自己也就牺牲了幸福，这就决定了她的一生是个悲剧。一方面她成了男人歌颂的妇女的懿范，但另一方面她对北宋中后期宫廷女性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用这样的观点来解释曹皇后特别的一生，不知读者你认为是否可以？

后妃秘闻

婀娜曼妙　　汉成帝皇后赵飞燕之谜

赵飞燕原名宜生，出生在江南姑苏，是汉代著名的舞蹈家。因其身材最为苗条，姿容最为秀丽，舞姿轻盈如燕飞凤舞，故人们称其为“飞燕”。久而久之，人们渐渐忘记了她的本名，而把她叫做赵飞燕。

唐代诗人李白歌颂杨贵妃的艳美时，曾有句云：“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看来赵飞燕的美是历代公认的。唐末诗人徐凝有《汉宫曲》说：“水色箫前流玉霜，赵家飞燕侍昭阳。掌中舞罢箫声绝，三十六宫秋夜长。”赵飞燕精美绝伦的舞蹈技艺，人们一直在广为传诵。

赵飞燕母亲是江都王的女儿，嫁给中尉赵曼，暗中与舍人冯万金私通。冯万金是一个对音乐颇有造诣的音乐家，他编制的乐曲十分优美动听，自称是“凡靡之乐”，有它的独到之处。赵飞燕和她妹妹合德是一对双胞胎，姊妹都姿色超人。传说赵合德风姿迥异，生得体态丰腴，玉肌滑肤，美艳妩媚与赵飞燕不相上下。人们还传说她家有“彭祖分脉”之书，“善行气术”，穿着单薄的衣服，在风雪严寒的夜晚，站在露天闭上眼睛“顺气”，不但毫无冷缩之态，还全身热乎乎的。

赵飞燕姊妹从小就接受音乐熏陶，与歌舞容易结缘。不幸的是父母亲早亡，她便同妹妹一同流落长安，沦为官婢，后被送入阳阿公主府，开始学习歌舞。她天赋极高，学得一手好琴艺，舞姿更是出众，一时名满长安。

汉成帝刘骜喜欢游乐，经常与富平侯张放出外寻欢作乐。成帝与张放年纪相若，情趣相投，原本就是极为要好的朋友。虽然在公开场合要顾到君臣之礼，然而在寻欢作乐时，却放浪形骸，彼此了无拘泥。张放时常应召陪汉成帝在宫中宴乐，自然也不时怂恿汉成帝微服出游，以领略宫廷之外的长安风月。汉成帝有一次微服出行，来到阳阿公主家。公主召歌伎为成帝助

兴。赵飞燕勾人魂魄的眼神、清丽动人的歌喉、婀娜曼妙的舞姿，一下子就倾倒了成帝。汉成帝将她带回宫后，大为欢喜，极为宠爱。

赵飞燕能歌善舞，通音律，晓诗书，妖娆媚艳，是一个天生的人间尤物，进宫没多久就封为婕妤。其时后宫议论纷纷，都认为她只不过是个惯于蛊惑的货色，难登大雅之堂。而赵飞燕一味地谨言慎行，对皇后很恭谨地执婢子礼，从而消除了皇后的戒心，待之如姐妹。她又刻意低声下气地与宫中粉黛结好，也逐渐松弛了后宫佳丽对她的敌意。为了打破形单势孤的局面，她有计划地在枕边进言，终于在进宫半年之后，妹妹赵合德也被引进宫来，受到汉成帝的宠幸。赵合德入宫数日，也被封为婕妤，两姐妹轮流承欢侍宴。不但后宫莺莺燕燕被抛诸九霄云外，就连原先宠爱有加的许皇后与班婕妤，也被冷落一旁。成帝后又废了许皇后，立飞燕为后，赵合德亦被立为昭仪，两姐妹专宠后宫，显赫一时。

赵氏姐妹虽得专宠，但从未怀孕，她们害怕别的嫔妃怀孕生子，威胁后位，就疯狂地摧残宫人。“生下者辄杀，堕胎无数”。当时，民间就流传着“燕飞来，啄皇孙”的童谣。一位姓曹的宫女生一男孩，竟被逼死，皇子也被扔出门外。许美人生一子，赵合德哭闹不已，逼迫成帝赐死母子。色迷心窍的汉成帝，年已不惑，膝下尤虚。为讨好赵氏姐妹，竟两次杀子，置江山社稷于不顾。

绥和二年(前 7)汉成帝死，哀帝刘欣立为皇帝，哀帝的即位是得到赵飞燕支持的，故封为皇太后。哀帝没过几年就死了，汉平帝刘衎即帝位后，就有朝中大臣指责赵飞燕“失妇道，淫乱宫闱，不生育，断了皇室的后代”，故贬皇太后为孝成皇后，迁居到北宫，过了一个多月，又废之为庶人，被迫自杀身死。

当时民间曾流传有这样一首童谣：“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木门仓琅琅，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说的就是赵飞燕，“燕燕尾涎涎”说的是赵飞燕的美貌，“木门仓琅琅”说的是她将当皇后。

关于赵飞燕的舞蹈艺术，《赵飞燕别传》中有这样的描述：“赵后腰骨尤纤细，善踽步行，若人手执花枝颤颤然，他人莫可学也。”“踽步”是赵飞燕独创的技巧，据说人走起来好似手执花枝，轻微的颤动。可见其舞蹈功底深厚，并能控制呼吸。赵飞燕为了讨汉成帝的欢心，她把单人舞逐渐发展为群体舞，各种舞姿的变化时有新招。由于赵飞燕“善行气术”，传说她“身轻若

燕，能作掌上舞”，可见其轻功极好，且可能她已能在空中做高难度的技巧，轻盈飘逸，挥洒自如。传说汉成帝曾为她举行舞技表演，设在后宫太液池中瀛洲高榭上。成帝以玉环击节拍，冯无方吹笙伴奏。赵飞燕跳起《归风送远曲》。一阵风起，赵飞燕险些跌入池中，多亏冯无方抓住她薄如蝉翼的云水裙，才有惊无险。汉成帝又命宫女手托水晶盘，令飞燕盘上歌舞助兴，赵飞燕的绝妙舞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给汉成帝带来全新的视觉享受，成帝对她十分迷恋。

明朝艳艳生的小说《昭阳趣事》有幅木刻《赵飞燕掌上舞图》，是赵飞燕站在一个太监的手上，挥袖回首而舞的姿态。当然，汉、明两代相去一千多年，这也只是古人所作的臆想而已，带有夸张的性质，却也来源于生活的真实。明代著名画家仇十洲作《百美图》，画历代美女一百个，其中就有赵飞燕舞姿图。画面上的赵飞燕盛装披巾，在一小方毯上起舞，她平展双臂，翻飞长袖，右腿微屈而立，左腿屈膝轻提，头部微倾，表情温婉。这是明代画家想像中赵飞燕的一个舞蹈场面。所有这些，都反映了赵飞燕在古代舞蹈上的惊人成就。

赵飞燕不仅是位舞蹈艺术家，也是位出色的琴家，她有一张琴名为“凤凰宝琴”。当时长安有一位少年音乐家名叫张安世，自幼习琴，十五岁时便名满天下，后入宫为汉成帝和赵飞燕演奏了一曲《双凤离鸾曲》，其出色的技艺和优美的音乐令皇帝夫妇如痴如醉，赵飞燕尤为激动，令人取来她的琴奏了一曲《归风送远》，飘逸逍遥，令张安世惊叹不已。赵飞燕爱惜张安世之才，特求成帝允其随便出入皇宫，并给他一个侍郎的官职，还送给他许多礼物，其中包括两张名贵的琴，一曰“秋语疏雨”，一曰“白鹤”。

除舞蹈外，人们对赵飞燕姐妹两颇有微词的是在房事上的特别之处。据传赵飞燕家有“彭祖分脉”之书，因而她会配制一种助阳兴的春药。她将这种秘制的春药丸供汉成帝吞服，结果汉成帝的死就与这件事有关。也有人传说赵氏姐妹把一种叫做香肌丸的药丸塞入肚脐。这种药丸确实功效显著，用后肤如凝脂，肌香甜蜜，青春不老。撩人的香气更令汉成帝不能自持，不施云雨绝不罢手。成帝精力耗尽，就服补药满足淫乐。为取悦成帝，方士们争献丹药。汉成帝起初服食一粒丹药，即可精神亢奋临幸美人，好似恢复了青春活力。汉成帝长期服用，不断增加剂量，后来竟连服十丸丹药淫乐，结果泄阳为血而亡，最后死在赵合德的床上。

一些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这是后人演义上去的。赵飞燕的确有淫乱宫闱的事实，但不是指她有造春药这样的事情。

有人说，赵合德体态丰腴，汉成帝对赵合德特别感兴趣，冷落了赵飞燕，宫槐秋落，孤雁哀鸣，青灯映壁，衾寒枕冷。于是诱使心腹太监把一些年轻力壮的美男子，暗地里引进宫来。初时还躲躲闪闪，一方面为了享受青春，另方面也期望借以生育一男半女，日后承继皇家香火，好永葆富贵尊荣。日子久了，她就变本加厉，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与一些男宠在宫内饮酒作乐，甚至白昼宣淫。汉成帝发现后，派人夜搜东宫，捉住了几名美俊壮硕的男子斩首了事。但不久赵飞燕便又找来一批，白昼掩窗行事，淫声浪语溢于户外，宫廷之中，尽人皆知。朝堂上下，也窃窃私议。光禄大夫刘向看到赵皇后如此秽乱，实在忍无可忍，但又不便明白指出，只好费了许多功夫，引经据典，搜罗昔时贤后贞妇兴国保家之事，写成了一册《列女传》，呈献汉成帝作为讽劝，盼望朝廷有所警悟。

还有人说赵飞燕的淫秽主要与当时生不出子嗣有关，所以与侍郎、宫奴中生子多者私通。其妹赵合德知道成帝一旦知道就会出发怒，所以就对成帝说："我姐姐性格刚烈，如果被人陷害，则赵氏无种矣。"汉成帝对这句话深信不疑，后来有人告发赵飞燕与人通奸，都被成帝处死。

一个绝顶美貌的女皇后，因为私生活的不检点，使得后人有这么多的传说和演义，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通病。因此关于赵飞燕的传说，必定是真真假假纠合在一起，其实后人是很难分辨得清楚的。

浓妆艳抹　　胡太后乱魏之谜

魏孝明帝的母亲是胡太后。按北魏制度，生下儿子后来成为太子的嫔妃都要被处死的，胡太后却是个例外。丈夫宣武帝死后，她控制了朝政。十几年以后，她把一个兴盛的北魏政权拱手让给了尔朱荣。那么胡太后是怎样把一个国家搞得一塌糊涂的？

北魏世宗宣武帝元恪是孝文帝之子。由于皇叔元禧叛逆一事，对拓跋姓（元姓）皇族很不信任，对舅舅高肇言听计从。高肇又娶宣武帝的姑姑高

平公主为妻，弟弟高偃的女儿又得为宣武帝皇后，一时间权倾内外，朝野之人对他都又恨又怕。

胡太后是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南）人，河州刺史胡国珍之女，十几岁时选入宫中。胡后的姑姑是个职业尼姑，很会讲论佛经，在魏宣武帝初年进入宫中，逢人到处说自己侄女十分美丽聪明。宣武帝得知后，把这位小姑娘召入内庭，封为承华世妇。根据北魏旧制，后妃如果生男孩，以后立为太子，生母要赐死，因而宫内的嫔妃们都暗中祈愿自己不要生育，怀孕后就往往进行堕胎。胡氏进宫后，后妃们把制度讲给她听，希望她生公主而不生太子，偏偏胡氏胆识不凡，对旁人讲："我的志向不同，天子怎么能没有继承人呢，我不怕自己死掉，也要为皇上的家嗣着想，最好能生太子。"当她怀孕后，周围人都劝她想办法堕胎，免得生下太子被杀掉。由于宣武帝和皇后仅有的儿子已夭折，胡氏所生如果是男孩的话肯定能当太子，她不仅不惧怕，反而在夜深人静时对佛发誓："希望自己能生下皇子，即使由此身死，在所不辞！"果然，胡氏生下皇子元诩，进封为充华（妃嫔名称之一）。

延昌四年（512），魏宣武帝病死，时年三十三。大臣崔光、于忠、王显等急忙迎立六岁的元诩为帝。高皇后忙与左右计议，要把小皇帝的生母胡氏杀掉。大臣崔光、于忠等人知道消息后，马上派人把胡氏安置到别处，并派兵严加守卫。崔光等又假借高太后的名义，任命带兵在外的高肇录尚书事，小皇帝也写信向高肇告哀，恳请他率军回朝。当高肇回到太极殿时，高阳王元雍与于忠等人设计把他除掉。大臣们遂尊胡氏为皇太妃，又废高太后为尼，迁至冷宫瑶光寺。没过多久，又尊皇太妃为皇太后，并奏请太后临朝称制。

胡太后初临殿堂后，第一个举措就是封自己的父亲胡国珍为安定公，加侍中官衔。为了试探群臣反应，她又称独生子太小不能亲自祭祖，想代行祭祀典礼，就问大臣崔光是否可行。崔光马上援引汉朝旧例加以赞同，胡太后大悦，在大祭典礼上亲自主持一切。胡太后一家人好佛，兴建了宏伟的永宁寺，极尽奢华，其中有高一丈八尺的纯金实心佛像一座，如同真人一般大小的实心金像十座，玉石巨佛两个；又建九级浮屠，挖地筑基，深及黄泉。浮屠高九十丈，上刹复高十丈。夜深人静之时，浮屠风铃飘动，声闻十里之外的地方。

518年，胡国珍没享几年福，就一命呜呼。胡太后对其父竭尽哀荣，赠假

黄钺、相国、太师，赐号太上秦公。又把死去的母亲赐号为太上秦孝穆君，移柩与父合葬。接着，她又为死去的老爹专门建造寺庙祈福，和永宁寺一样壮丽奢华。

此时，胡太后把魏王朝的大权全部揽于自己一人之手，做事开始无所顾忌。天文官奏称天象有变，需一贵人之死以应之。胡太后马上想起自己的对手高太后，派人黑夜杀掉她，按尼姑的礼仪把她下葬。她又派许多使臣和和尚远涉沙漠，到西域去求佛经，耗财无数。她不停地下令营造庙观，各个州都要兴建五级浮屠，民力为之疲惫。洛阳城内，诸王、贵人、宦官、公主等各建寺庙，还相互斗比。太后又常常设立斋会，大加施舍，动以万计。

北魏王朝经过几代努力，全盛时期府库充盈。胡太后有一次去盛放绢布的仓库巡视，对从行的王公嫔妃一百多人下令，可依自己力气，随意取绢。尚书令李崇和章武王元融贪心十足，负绢过重，颠仆在地，一人伤腰，一人伤脚，太后又笑又怒，让卫士把两人赶出仓库，一匹绢也不给他们，当时被人作为笑柄。

这时的胡太后大约三十多岁，难熬没有丈夫的寂寞，因而私生活十分腐朽。清河王元怿长得俊美潇洒，胡太后逼而与他私通。堂堂一个王爷被自己的嫂子逼淫，闻所未闻。胡太后妹夫元乂是当时掌管禁军的领军将军，他和太监刘腾都因卖官弄权受过元怿申斥而怀恨在心。两个人密谋后，指派平日伺候小皇帝进膳的太监胡定告发说元怿派他毒杀皇帝，自己称帝后许诺胡定荣华富贵。小皇帝当时才十一岁，对此话信以为真。当夜，元乂和小皇帝等人把胡太后关在永巷门内，把元怿秘密杀害。又诈称胡太后诏旨，说自己得病，还政于皇帝。

正光四年(523)四月，太监刘腾病死。元乂已执政三四年，觉得天下已完全由他一人所掌控，对胡太后的防备之心也渐渐松弛。胡太后趁着与小皇帝相见的机会，怨恨地说自己要去嵩山当尼姑。之后母子一同住在嘉福殿几天，互诉衷肠，觉得元乂十分可恶。两年后的一天，皇帝母子忽然解除元乂禁军统帅之职，封他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侍中等一系列虚衔。之后群臣趁机纷纷请求要处理元乂，毕竟是亲妹夫，胡太后犹豫再三，最后下诏赐元乂与其弟在家中自尽。

几年幽禁后的胡太后虽然徐娘半老，但仍然非常喜欢浓妆艳抹，不停外出到贵臣亲戚家游幸。她宠幸父亲胡国珍的参军郑俨，拜其为谏议大夫，昼

夜宫中伺候。郑俨休假回家，太后让几个太监和他一起去，使郑俨见到自己的妻子，也只能匆匆聊上几句，马上被催促回宫。郑俨和一个叫徐纥的中书舍人狼狈为奸，把持内外，时称“徐郑”。此外还有一位黄门侍郎李神轨，宫内外盛传也和太后关系暧昧。另据《南史》记载，大将杨大眼的儿子杨华勇武过人，相貌堂堂，被胡太后见后逼幸。虽然获蒙太后宠幸，杨华心中惧祸，怕事泄被灭族，趁机率部曲逃至南朝梁国。胡太后追思不已，亲自创作歌辞一首，让宫女们昼夜踏足歌唱，忆念情人。

在这种朝廷荒淫、奸臣当道的局面下，北魏形势开始混乱。西北边镇造反后，南方的蛮族也纷纷占据山头，接着安州三地的戍兵又纷纷造反，齐州、东清河郡、东郡、广川、陈郡等地兵民四处响应，整个国家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在镇压叛乱过程中，军阀尔朱荣日益强大，被封为安北将军，驻守晋阳，都督恒、朔讨虏诸军事。他带兵路过肆州，刺史尉庆宾不开城门迎接，他竟然派兵袭取肆州，自置刺史。

自胡太后再临朝以来，奸臣擅权，政事紊乱，纲纪松弛，恩威不立，国内盗贼蜂起，封疆日蹙。孝明帝年纪渐长，胡太后知道自己丑行总会有人泄漏给儿子的，所以凡是皇帝所爱信的人，就想方设法把他们外放、除掉，不让皇帝知晓外间事务和朝事。小皇帝对这一切心知肚明，母子之间嫌隙日深。

孝明帝非常嫌恶郑俨、徐纥两个人，但由于有胡太后撑着，他又势力孤单，不能除掉此二人。情急之中，他秘密下诏给尔朱荣，让他举兵到都城来，想以武力威迫太后归政。尔朱荣受诏大喜，马上派高欢为先锋，直杀洛阳而来。郑俨、徐纥两人害怕祸事临头，与胡太后密谋后，下毒杀死了年仅十九岁的孝明帝。没有皇帝怎么办？胡太后马上立潘嫔所生皇女为帝，但很快改变主意，迎立临洮王世子元钊即位。元钊当时才三岁，胡太后的目的无非是想要长久把持国政。

尔朱荣闻讯大怒。他对左右说：“肃宗晏驾，虽然已经十九岁，国内都说他还是幼君。现在扶立一个话也说不清楚的小孩来管理天下，想要国家太平，怎么可能呢！”于是他命令军队直接杀向洛阳，一面自己迎立长乐王子攸为帝。

胡太后听说尔朱荣起兵的消息非常恐惧，召王公大臣商议，众人都心中暗恨太后所为，没人肯献计策。只有徐纥说：“尔朱荣小小胡人，竟敢兵锋直指朝廷。我们以逸待劳，肯定杀败他。”胡太后信以为然，派李神轨统大兵抵

御。李神轨军行至河桥，还没有见到人家的军威，就吓得回马逃走。徐纥矫诏连夜从御厩中取最好的快马十匹，东奔兖州，郑俨也吓得连夜逃回老家。胡太后剩下孤家寡人一个，只好连夜下令孝明帝的嫔妃全都剃发出家，自己也亲自落发，剃个光头，以示愿意为尼赎罪。尔朱荣召集百官，让他们拜见自己新立的皇帝元子攸（魏敬宗）。又派兵直扑宫内，抓住太后和小皇帝。胡太后已失往日威风，费尽口舌，向尔朱荣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尔朱荣一概不听，拂袖而去。随即，他让人把胡太后和三岁的小皇帝扔进黄河淹死。

一个行为放荡的太后，把北魏政权断送给了尔朱氏军阀集团的手中。

谁的儿子　北魏孝文帝生母之谜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初即位时，由冯太后临朝称制。拓跋宏本后宫李夫人所生，由冯太后抚养成人。冯太后坚守子贵母死之制，除赐死储君拓跋宏的亲母李氏以外，甚至诛戮了李氏全族。拓跋宏终生都不知自己为谁所生，但他自幼在冯太后身边长大，视祖母如生母一般。然后有人说冯太后其实就是孝文帝的生母，真是这样吗？

孝文帝拓跋宏是北魏历史上最有名的皇帝。他五岁时从其父亲献文帝拓跋弘手里接过皇位，国政由其祖母冯太后主持。太和九年（485），他颁行均田令。次年以后，他开始亲自草拟诏策，较多参与政事。太和十四年冯太后死，孝文帝独揽朝政。他的汉文化修养很深，十分器重出身江南高门的王肃，认为鲜卑族必须汉化才能巩固政权、统一南北。他改鲜卑姓氏为汉姓，禁止使用鲜卑语言和服饰。又因为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无漕运之路，而且僻处北边，不利于控制中原，便向南发展，他不顾鲜卑族人的反对，太和十八年迁都于东汉以来的政治、文化中心洛阳。迁洛以后，更多地亲近中州儒士，拓跋氏宗室和代北旧人益加不满，在平城发动叛乱，被镇压下去。迁都的次年，他即以齐明帝萧鸾篡夺政权为借口，亲率大军南伐，从东路渡淮水向寿春进军。他有意南临长江，但淮南三大重镇寿春、盱眙、淮阴都未攻克，只得遣使臣临江责骂萧鸾。二十一年又从西路南下攻南阳、新野，亲自率军攻悬瓠（今河南汝南），沔北大震。次年萧鸾死，他以礼不伐丧而退

军。二十三年再从西路南伐，进到马圈城（今河南邓州北），因病班师，死于军中。

孝文帝拓跋宏的父亲是献文帝拓跋弘，他的母亲一般认为是李夫人。通常认为北魏皇室有一个奇怪的习惯，从开国皇帝道武帝开始，凡是储君之母即被赐死，北魏历史上先后有八位帝母做了此种制度的牺牲品。北魏道武帝的宠妃刘氏，生长子拓跋嗣，后拓跋嗣被立为太子，刘氏受命自杀。拓跋嗣思念母亲，悲伤泣哭。道武帝安慰他说："过去汉武帝将立太子，先杀太子的母亲，主要是担心女主干政。现在你为太子，我不得不效法汉武故事。"北魏皇室把赐死储君之母，明定为一种制度。这样很多聪明的皇帝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是谁生的。

由于北魏一直执行着这样残酷的子贵母死旧例，使得皇后妃嫔们"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这样的局面，往往使妃妾成了嫡妻的代孕工具，更成了嫡妻的替死鬼。北魏各代皇帝中，就是连赫赫有名的孝文帝的生母也躲不过悲惨的命运。魏孝文帝拓跋宏本是后宫李夫人所生，由冯太后抚养成人。拓跋宏即位时只有五岁，冯太后临朝称制。冯太后为了让自己家族累世贵宠，坚守子贵母死之制，除赐死储君拓跋宏的亲母李氏以外，甚至诛戮了李氏全族。拓跋宏英明过人，冯太后恐怕于自己大权独揽不利，曾幽禁拓跋宏，想把他废掉。拓跋宏终生都不知自己为谁所生，但他自幼在冯太后身边长大，视祖母如生母一般。冯太后死前，拓跋宏这个皇帝在



北魏时期开凿的云冈石窟雕像

更多意义上是名义上的。

传统史书上这样的讲法，引起了一些历史学家的怀疑。著名的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认为孝文帝的生母根本不是李夫人，而是其祖母文明太后冯氏，他是冯太后的私生子。吕思勉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曾编著过一部《两晋南北朝史》的断代史，在这部史学名著中，他对孝文帝的生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孝文帝诞生在献文帝皇兴元年(467)，而这一年献文帝才十三岁，十三岁的男孩是否生得出小孩是很令人怀疑的。其次，冯太后是个权力欲极强的女人，文成帝死后，她就临朝听政，最后逼着献文帝让出帝位。就是这样一个人，在《魏书》卷十三《文明皇后冯氏传》中记载说，拓跋宏出生后，她亲自抚养，并且还为此而罢政。权力欲望如此强烈的一个女强人，竟然到了停止临朝听政的地步，说明她与孝文帝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吕思勉一连三句反问道："岂有因生孙而罢政？且亦何必因此而罢政？岂高祖实后私生之子，后因娩乳，乃不得不罢朝欤？"吕先生提出了疑问，但并没有解决这个谜案，是否是冯太后所生并不算是定论，更何况父亲是谁他没有提及。

自从这一问题提出后，日本学者大泽阳典和我国台湾学者郑钦仁先后表示支持。大陆也有学者认为吕先生提出的问题是值得思索的。他们认为冯太后平时对衣食住行都很注意节俭，所好惟有一个"男色"。她当时三十不到，年轻守寡，不耐孀居，看中了朝臣中的三个美男子，他们是吏部尚书王睿，南部尚书李冲和宿卫监李奕。太后常以奏事为借口，召他们入宫，轮流陪伴她。这三人同为太后男宠，几乎外廷内朝人人皆知。后来李奕为献文帝斩杀，这使得冯太后内心十分毒怨，直接导致了母子失和，最后献文帝被迫禅位。因此从这些情况来看，冯太后与人私通生下孝文帝是有可能的。照这种说法，孝文帝的确不是献文帝拓跋弘的儿子。

不过上述说法毕竟没有十分可靠的史料来支撑，依靠的全部是似是而非的推理，因此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这样的说法不可信，也不严谨。周一良先生发表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的《〈魏书〉札记》中认为北魏人一直有早婚习俗，如北魏太子晃生文成帝时，年仅十三岁；文成帝生献文帝时，也仅十四岁。现代医学认为男性生理上的发育并没有很严格的时间，十三四岁发育是十分正常的，稍早的十周岁就会发育，因此古代皇帝十三岁左右生孩子是完全有可能的，不应对献文帝十三岁生孩子有什么怀疑。人们指出，如果说

冯太后因为生了私生子要坐月子哺乳而罢政，那么他的名义上的儿子献文帝是决不会放过他的。事实上，献文帝在政治上与冯太后观点不一致，献文帝的亲生母亲是李贵人，太后也不是他的亲生母亲，他曾周密计划后将太后的情人李奕诛杀，向太后的权威挑战。如果太后生的的确是私生子，后宫之中是无法保密的，渐渐长大的献文帝怎能容忍这样的事情，而不借机打击太后？《魏书》上记载，冯太后对拓跋宏一直存有戒心，拓跋宏聪慧早熟，冯太后担心他长大后会对自己不利，所以并不喜欢他。有一次，她听信谗言，杖罚了幼小的拓跋宏。又有一次，冯太后在大冷天里，把穿着单衣的小皇帝关在一间空屋子之中，三天不给饭吃，还打算废掉他。后来因为大臣穆泰的劝阻，拓跋宏才保住了皇位。祖孙间的关系如此这般，怎能是冯太后的私生子？

然而，毕竟我们还有一些问题无法得到很好的解释，如冯太后为什么一定要亲自抚养这个和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孝文帝？冯太后四十九岁时病死，拓跋宏哀痛异常，一连五天不吃饭也不睡觉。群臣极力劝谏，才喝了一碗粥。但据冯太后生前与孝文帝的关系，拓跋宏的孝行实在让人不理解。此后丧期已过，拓跋宏还是整日像个妇女一样哭泣不休，群臣都私下议论而略有不齿。司空穆亮进谏说："天子以父为天以地为母，儿子悲哀过甚，父母必定不悦，今年冬天极寒，想必是陛下过哀所致，愿陛下穿平常的衣服，吃平常的食物，以使天人和谐。"拓跋宏却下诏辩驳说："孝悌至行，无所不通。现在天气反常，是因为诚心不够，你所说的话我不理解。"一个没有血缘的皇帝对名义上的祖母表现出超乎常人的感情，难道不值得怀疑？

看来，要找出孝文帝的母亲，还真是有很大难度的。

李商隐的诗　　武则天出生地之谜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关于她的身世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据两《唐书》记载，武则天的籍贯是在今山西文水。她的出生地，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后代人进行研究后得出了几个不同的观点，使得武则天的出生地有好几个，至今仍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后人常常抱着特殊的感情研究这位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但往往看法相左，争议颇多。有一个长期悬而不定的问题，武则天的出生地究竟在哪里？



皇泽寺是武则天的祀庙，这是五代刻成的武则天石雕像

一些人认为武则天出生于四川广元。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郭沫若先生，主要依据是唐朝李义山的一首诗和利州出土的半截石碑。李商隐诗集中有《利州江潭作》诗一首，诗题下自注“感孕金轮所”五个字。这句话什么意思？宋朝初年编的《太平御览》曾经谈到：“顺圣皇后庙，在州西告成门外。旧碑云：‘其母感溉龙而生后，庙号则天金轮皇帝。’”这样说来，金轮是指武则天，感孕是指武则天的母亲怀孕的经过，地点在利州告成门西的江潭。到了明代，在一本叫《唐音癸签》的书中引了《蜀志》的一句话：“则天父士彠为利州都督，泊舟江潭，后母感龙交，娠后。”原来当时民间传说武都督的夫人杨氏曾到潭边玩，忽然潭中跃出一条金龙与她交欢，杨氏因此受孕生下了武则天。李商隐的诗其实就是根据民间当时的这个传说创作的。这个传说出现于什么时候，已没有办法考证，与龙交欢，大概也因为后来武则天成了皇帝，后人就将天人感应之类的东西加了上去，但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从唐朝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武则天出生的时候的确是在利州。

1954年修建宝成铁路，在皇泽寺遗址附近，出土了半截石碑，碑名为《利州都督府皇泽寺唐则天皇后武氏新庙记碑》。碑立于五代后蜀广政二十二年(959)，是后蜀国主孟昶所撰。碑文云：“贞观时，父士彠为都督于是

□□□(顶格)后焉”。郭沫若进行了详细考证,以为三个缺字似可补作为“州始生”,并且指出:“全文凡‘后’、‘天后’字均提行顶格。”这样就为武则天生于利州又找到了一条极其重要的根据。

郭沫若之后,唐史学者们对武则天出生于广元的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有人提出了六大论据:其一,全国惟独广元世代流传“江潭感孕娠后”,正月二十三是“天后生日”的故事。其二,全国仅见广元有祀武则天的寺庙皇泽寺,事历千年而不泯。其三,唐宋以来众多名人学者都公认武则天生在广元。其四,除县志、省志外,宋代《九域志》、《舆地纪胜》、《方舆胜览》等全国性的志书在长安、扬州、荆州条目中未见记武则天的出生,惟独在利州条中记“武士彟任利州都督时,生武后于利州”等文字。其五,正如湖北有“屈原里”、“明妃村”那样,广元自唐末五代以来,就有以武则天命名的“则天坝”、“则天乡”。其六,李商隐自注“感孕金轮所”的诗以及《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铭》、《唐利州刺史毕公柏堂寺菩提瑞象颂》、《攀龙台碑》等,均为唐人所作,既排除了武则天生在他处的可能性,又参补了正史疏忽之处。

考察今日之四川广元,的确留存着部分武则天的遗迹,既有以武则天名字起的地名,又有武则天孩提时的梳妆楼、武则天常去进香的千佛崖,以及皇泽寺内五代刻成的武则天圆雕石像等等,这一切无不说明从唐末五代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武则天与广元有着特殊的关系。

对影响日益增大的“广元说”,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质疑。

他们认为李商隐《利州江潭作》是指此诗写作的地点,而“感孕金轮作”中的“孕”字并非专指“怀孕”讲,它有“成长”和“发育”的意思,所以这句话的原意应该是“感怀武则天生长的地方”。至于那半截石碑,他们同样也从它的字里行间找到了证据,因为石碑第四行至第五行上刻着:“天后武氏其人也,事具实录,此不备书。贞观时,父士彟为都督于是□□□后焉。寺内之庙,不知所创之因。”由此可以判断武则天并没有生在那里,否则创庙的原因,即为纪念武则天的出生地,没有隐瞒的必要。而且刻此新碑的时间,距武则天之死只有二百五十多年,建庙原因不该不知,建旧庙时距武则天之死不会超过百年,他们推测可能是当地士绅为了谄媚取宠,趋炎附势,而不好“泄露天机”,故意隐之。至于三个残缺字,仅按主观推论其可靠性是令人怀疑的。

如果武则天果真出生于四川广元,即是她父亲刚刚迁任至此(贞观二



千佛崖位于广元城北的嘉陵江畔，据说这里是
武则天的故乡，而且崖上也有武则天的造像

年，628)，她就出生，那么她贞观十一年十一月(637)被选入宫中给太宗当妃子时只有九岁，这显然不合情理。而且，《资治通鉴》和新旧《唐书》皆写明她入宫时为十四岁，两者相差五年。武则天死于神龙元年(705)，《资治通鉴》写明享年八十二岁(新旧《唐书》分别为八十一和八十三岁)，以此上推，则皆可以算出武则天生于武德七年(624)，实际和武后父亲初任利州都督时相差五年。

持非广元说者曾详细考证过武后父亲武士彠的履历。他们引用《攀龙台碑》中“江沱立祠”句，证明“利州皇泽寺”原来是给武士彠立的祠堂，而并非为了纪念武则天出生地。这也给上面所说的碑文中“寺内之庙，不知所创之”作了注解，即撰此碑的人知道武则天不生于此，但又以《唐则天皇后武氏新庙记》命名，因为她不知道旧庙是武士彠的祠堂，所以自然就发出了疑问。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对广元之所以会有许多关于武则天传说的原因进行了一番探究，认为原因不外有三：其一，武则天曾在广元度过五至七岁的幼年，她当女皇之后，缙绅难免要献媚取宠，以后便以讹传讹留传了下来。其二，武则天父亲在此当过都督，为政清廉，得到百姓们的爱戴，在此给他立过祠堂。其三，原来的祠堂于武士彠去世三百多年后倾倒，重建时，撰碑文者已是“寺内之庙，不知所创之因”，只好根据传说，牵强附会而命名。而且名义上是为崇拜武后，实际却是借题发挥，为后蜀皇帝孟昶和昭武军节度使太傅李奉等歌功颂德。纵观残碑的全文，不但没有提及有关武后出生的线索，

而且从“不知所创之因”，可得到否定的根据。

不同意武则天出生在广元，那么武则天出生在哪里？有人认为出生在长安。据史书记载，武则天大约生于高祖武德七年(624)，那时他父亲的官位是工部尚书，与夫人杨氏在长安过着宽绰悠闲的生活。武则天的出生地最大的可能应该是在长安，而不大可能自己父亲还未任利州都督就出生在那里了。

上面两种对立的观点，各有自己的依据，但又无法说服对方。究竟孰是孰非，还有待今后学者们作新一轮的努力，不过继续发现新资料恐怕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太白题诗　　杨贵妃荒淫之谜

杨贵妃和唐明皇的一场另类爱情，导致了大唐王朝从鼎盛走向衰落，后人遂将这一切罪过归向了杨贵妃。红颜祸水，很多古人坚信亘古不变的这一道理。而且人们还发现杨贵妃是个淫妇，她和安禄山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在一首据说是李白的诗中，杨贵妃被比作妲己、褒姒、汉祖吕后、秦皇太后和赵飞燕。



位于马嵬坡的杨贵妃墓

唐玄宗多内宠，即帝位后专宠武惠妃。武惠妃病死，玄宗思念武惠妃，视后宫三千嫔妃中没有一个中意的。有人说寿王妃杨氏美艳绝代，唐玄宗看见后大为爱悦，就说王妃自己要求，入寺观为女道士，号称“太真”。随即他为寿王别娶了一位妻子，暗中将杨太真接入宫中。

杨妃是隋朝梁郡通守杨汪的四世孙。自幼丧父，在叔父家养大。杨妃入宫后，深得玄宗宠爱。她善歌舞，通晓音律，而且聪颖机智，善于迎合玄宗心意，所以得到专房之宠，有皇后之待遇。其兄妹也贵盛起来，冠绝一时，杨妃的三个姐姐可以随意出入宫廷见玄宗，连睿宗女玉真公主也不敢和她们并起并坐。杨氏姐妹奢侈豪华，十分惊人。

自有了杨妃后，唐玄宗就纵情声色，追求享受起来，军政大事交付宰相处理，自己怠于政事。到了天宝后期，政乱刑淫，社会矛盾激化。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看到玄宗春秋渐高，不理政事，纲纪废毁，遂罗致了一大批文臣武将，于范阳筑造雄武城，贮藏了大量兵器，又从少数民族中精选了八千强健者作为假子。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九日，安禄山率领十余万大军南下，以诛杨国忠为名，发动了武装叛乱。

“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大梦中初醒的玄宗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只能仓皇向蜀中逃窜，使唐朝的半壁河山陷入了兵荒马乱之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繁盛的都市变成了废墟，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大唐帝国从此由盛变衰。

安史之乱中，杨贵妃的确是有不能推卸的责任。不过古代史书中出现了一个问题，有很多人把安史之乱全推到杨贵妃身上，认为是他惑乱了玄宗才导致了这一切。一些人甚至把杨贵妃与夏末的妹喜、商末的妲己、周末的褒姒并列，认为这几个美女都是殃民祸国的源头。宋代乐史的小说《杨太真外传》上，把杨贵妃过分受宠及其亲属过分受恩，以及得到超常地位后的越轨行为都作了详细的描述。杨贵妃和唐玄宗对安史之乱果然都有责任，但用今天眼光来看，主要责任当然在玄宗身上。不能把男性喜爱女性当作一种罪恶，更不能把女性长得艳丽漂亮作为一种罪过。

不过，把杨贵妃作为安史之乱“祸水”的人却是有一定依据的，因为他们认为杨贵妃曾经和安禄山私通，是一个淫妇。李白曾作过一首《雪谗诗赠友人》，内中说到：“妲己灭纣，褒女惑周，天维荡覆，职此之由。汉祖吕氏，食其在旁；秦皇太后，毒亦淫荒。”宋代一些人根据这首诗，认为李白在在揭露杨

贵妃的淫荡。

宋人有个叫洪迈的人，在他的《容斋随笔》中是这样说的："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唐史言高力士以脱靴为耻，摘其诗以激杨贵妃，为妃所沮止。今集中有《雪谗诗》一章，大率言妇人淫乱败国。"他又说："余味此诗，岂非贵妃与禄山淫乱，而太白曾发其奸？不然，则飞燕在昭阳之句何足深怨也！"

杨贵妃和安禄山有什么关系？安禄山原为平卢节度使。每次朝廷派使者到平卢巡视，他就进行贿赂，连使者身边的人也厚给金帛。得到好处的官员回到朝廷，在皇帝面前拼命地夸奖他，玄宗信以为真，让他兼任范阳节度使。安禄山骗一些契丹人来喝酒，喝醉后把人家的脑袋砍下来送到朝廷，说是战场上斩获的，使玄宗觉得他很会打仗。安禄山知道玄宗宠爱杨贵妃，就到处搜罗奇禽异兽，珍宝玩物，派人送到皇宫。每次见到杨贵妃，尽管比杨贵妃大十多岁，却厚着脸皮要做她的干儿子。见到杨贵妃和玄宗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先拜杨贵妃，后拜玄宗。玄宗问他为什么不先拜皇帝？他说："我们胡人都是先母后父的。"杨贵妃听了十分高兴。安禄山生日，杨贵妃和玄宗送给这位干儿子大量的衣服器物。三天后，杨贵妃又召安禄山进宫，要为他做洗儿礼。于是宫女们用锦绣做了一个大襁褓，把安禄山包起来，用彩车抬着走。安禄山丑态百出，宫中一片嬉戏欢笑声。就这样玄宗允许安禄山随便出入宫中，宫人们都和他混得很熟，亲热地称他为"禄儿"。不久，玄宗把河东节度也给了安禄山，使他身兼三镇，控制了唐朝北方边境大部分地区。这里，无论是正史还是杂史笔记，似乎都很少提到杨贵妃和安禄山之间有什么淫秽的关系，只看到安禄山为了骗到三镇节度在低头哈腰地装人家的儿子。

不过宋朝人根据李白的诗认为这里面真有问题。刘克庄《后山诗话》说："史言明皇欲官太白，为妃所沮。余观飞燕在昭阳之语不足深憾。《雪谗诗》自序甚详。略云：'汉祖吕氏，食其在帝。秦皇太后，毒亦淫荒。'时妃以禄山为儿，史云宫中有丑声，而白肆言无忌着此。他人于玉环事皆微婉其词，如云'养在深宫人不识'，又云'薛王沉醉寿王醒'，又云'不从金舆惟寿王'。白独倡言之，可见刚肠疾恶，坡公疑其以此名怨力士，因借此以报脱靴之辱。岂飞燕之句能为祟哉？"宋朝人认为李白作诗是针对了杨妃和安禄山之间的私情。

至清朝，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怀疑这首诗不是李白所作，他认为李白胸怀磊落，不屑于个人恩怨，不可能对这件事作诽谤的。

当代人瞿蜕园、朱金城为李白诗作校注时认为如果李白此诗作于在长安时或出长安后，在杨妃势盛的时候不可能写诗雪谗的。如果作于杨氏已败之后，那么此诗就没有必要写了。而且此诗“语浅而庸，不与李诗风格相类”。他们认为此诗不是刺淫乱败国。

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指出，前人认为李白骂的是杨贵妃实是“异解”。诗中提到妲己、褒姒、吕后、秦始皇的母亲，但转语是“万岁尚尔，匹夫何伤?”是侧重在“匹夫”，而非侧重在皇室。他认为李白的妻子刘氏和李白离异后，向李白的友人到处搬弄是非，所以李白要雪谗自辩。

一些人认为安禄山的升迁与被信宠与杨妃无关。天宝元年杨妃专宠时，李白于天宝三载离京东去，而这时杨妃还没有认识安禄山。直到天宝六年，安禄山才与杨妃相识。天宝九载杨贵妃忤旨，送归外第。玄宗让中使张韬光赐御馔，杨妃边哭边说：“妾忤圣颜，罪当万死。衣服之外，皆圣恩所赐，无可遗留，而发肤是父母所有。”于是用剪刀剪下一缕头发，让中使献给玄宗。玄宗看后，十分“惊惋”，遂让高力士召杨妃回宫。杨妃和玄宗的关系当时处在这样一种境地，杨妃怎么可能有其他的恋情？而玄宗能忍受杨妃有这样的恋情？



《唐代宫乐图》

史书记载安禄山和杨妃相见，只有天宝六载正月和天宝九载十月两次。李白这个时候与宗氏结婚，离开了长安，很少知道朝廷的事情；即使知道，也是过了很长时间之后的小道消息。宫闱秘事，本来外面就很少传闻，如果辗转传到他人的耳朵，肯定已是很长时间了。李白诗中说“五十知非”，知李白作诗时是五十岁，在安禄山第二次入朝前，所以此诗与安禄山和杨妃没有任何关系。

安禄山拜杨贵妃为母，本意在固宠而暗藏祸心，故乘入宫之机，做出种种怪相，以博取欢心，而宫内三千全是女性，所以见到禄山躯体肥胖，腹垂过膝，体重三百余斤，外若痴直，如此丑怪模样，令人大笑不止。倘两人果真有私，宫中耳目众多，无从隐蔽，左右供奉伺候周到，严密如此，何敢妄为？

持这种观点者认为，野史捉影捕风，无中生有，人人乐闻隐私，谰言因而泛滥。史传采之，本失严谨，讹传既广，附会滋多，遂使千百年来，杨妃地下蒙垢，而人莫之白也。

照笔者看来，《雪谗诗赠友人》是否为李白所作，仍然是个悬而未解的问题。如果承认为李白所作，那李白讲的什么意思恐怕后人在理解上也还不能统一。如此，关于杨妃是否荒淫的确很难说“是”还是“不是”。

回回女子　元顺帝生父之谜

顺帝是元朝的末代皇帝，按《元史》记载他是元明宗的长子。不过元明宗的弟弟元文宗却说顺帝不是明宗的儿子，而且还将他流放到边疆。在明朝人的一些作品中，对顺宗是南宋恭帝赵显的儿子、元明宗的养子的说法得到了充分肯定，并且进一步搜集资料加以丰富论证。

《元史》记载，元顺帝奇渥温妥懽帖睦尔，生于延祐七年(1320)，是元明宗的长子。至顺四年(1333)，他只有十三岁，被权臣拥立为帝，成了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顺帝的生母是罕禄鲁氏，名迈来迪，居于金山之北，明帝到北方时，见到了貌美品端的她，就收纳为妃子，之后生下了顺帝。照理说，关于元顺帝生父母的记载是比较明确的，不该有什么疑问。然而，从元朝开始，有许多人对元顺帝的出生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并且提出了一些令人意

想不到的看法。

首先提出顺帝不是元明宗儿子的是元文宗图帖睦尔。元泰定帝死，图帖睦尔在权臣燕铁木儿等人的支持下，自江陵入居大都，被立为帝。但文宗考虑到其兄和世㻋是武宗的嫡长子，应让位于他，所以派人到漠北迎和世㻋还京师，即皇帝位，是为明宗。明宗即位数月，就被燕铁木儿投毒害死，这样文宗第二次即皇帝位于上都。次年四月，明宗皇后八不沙被谋杀，妥懽帖睦尔被迁徙到高丽，居大青岛中，不与人接触。在这样的一种皇位争夺背景下，至顺二年(1331)，文宗诏告天下，说明宗在生前一直声称妥懽帖睦尔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因而将妥懽帖睦尔移到广西静江(今广西桂林)去了。这件事由于影响较大，所以宫廷史册《脱卜赤颜》和明初修的《元史》均有详细记录。不过就事实来看，文宗说妥懽帖睦尔不是明宗的儿子，主要的意图恐怕是为了保住皇位，因为明宗的长子应是皇位最有力的竞争者。

自文宗提出后，再加上顺帝是元朝最后的一个皇帝，历代文人对他的出生就格外关注。元末明初有个叫权衡的人在《庚申外史》一书中，从文宗的诏书着手，将顺帝的出生妙笔生花成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顺帝的父亲变成了宋恭帝赵显。书中记道，德祐二年(1276)，元军入临安城，幼帝赵显、皇太后全氏与宗室、宫人、文武官员及太学生等数千人被俘北上。这年五月，赵显来到上都，忽必烈封他为瀛国公。之后赵显在白塔寺中为僧，天天念经吃斋，后又奉诏迁居甘州山寺。有一位赵王可怜赵显上了年纪，但仍孤身一人，遂将一个回回女子送给他作为侍妾。延祐七年(1320)，这位女子生下一子。当时元明宗正好前往北方路过此地，突然见到寺庙上面有五色云气缓缓上升，像一条龙的形状，遂走上前来察看。他来到赵显的居室，得知他刚生下一个儿子，一看，很招人喜爱，就收为养子，并将母子二人都带进了宫内。

权衡《外史》的传说，引起了后人对顺帝生父的探索，各种各样的传说猜测越来越多，细节越来越清晰，内容更加丰富，故事特别生动。在明朝人的一些作品中，对顺宗是赵显的儿子、明宗的养子的说法得到了充分肯定，并且进一步搜集资料加以丰富论证。明朝史家谈迁更是将这则故事当作史实载入他的名著《国榷》中，余应、何乔新、程敏政、钱谦益等人对此也津津乐道。

与此同时，明朝也出现了一种稍有不同的说法，称元顺帝确是赵显的儿

子，但是个遗腹子。元明宗北上见到赵显的妻子时，十分喜欢，强行将她纳为自己的妃子。赵显的妻子此时已有身孕，嫁给明宗不久就生下了顺帝。这种说法见诸于袁忠彻《符台外集·纪瀛国公事实》中。从所述内容来看，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在将前面的传说进行修正，以使它与《元史》的记述互相没有矛盾。

清朝及近代的一些史学家仍然认同顺帝是赵显儿子的说法，方斯同、全祖望及王国维等都有专门文字进行考证。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如辽、金等都有收继养子及外姓人入族的习俗，元人也同样是如此，元明帝收养赵显的儿子在当时是符合蒙古人的风俗习惯，因此可能性较大。至于说顺帝是赵显的遗腹子，从出生年月上看，有许多地方不相符合，这种说法很难使人确信。

当然更多的人并不相信上面的传说是真的，他们认为元顺帝的生父确是元明宗，根本不可能是赵显。毕沅的《续资治通鉴》是一部重要的编年体史书，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他认为文宗的诏书并不足信，《庚申外史》和明朝余应之等的诗文是"委巷俚鄙之谈"，根本不足为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二对《庚申外史》这本书评价较高，但对其中称顺帝是瀛国公的儿子这一条进行了辨证，认为是无稽之谈。指出明朝袁忠彻、权载之、程敏政、钱谦益、余应之的诗文中谈到的这件事，发端都是《庚申外史》，经对事实核查，"渺无可据，实为荒诞之尤，非信史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传说，主要是直到元朝中叶，仍有一些宋朝遗民对元朝灭宋十分愤恨。当他们见到元文宗说顺帝不是明宗的儿子，就乘机编造故事进行发泄。明人恨元朝蒙古人，于是也附和上去加以渲染流传，使这件事传播得很广，影响较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所以清末民国初年的一些有关元朝史书，如魏源的《元史新编》、柯劭忞的《新元史》等，都没有将赵显是顺帝的生父作为信史采用。

照笔者理解，明人提出的赵显是顺帝的生父，从目前所占有的史料来看，还难以使更多的人坚信。因为正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所有的观点其实是来自一源——《庚申外史》，因而资料并不充分。但我们又如何面对元文宗说顺帝不是明宗儿子之类的话？说他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帝位而采用的伎俩是否讲得通？元顺帝的生父是谁说不定将永远是一个历史疑案，人们无法得到满意的答案。

小小玩笑　慈禧太后出生地之谜

清朝后期，在政坛上影响最大的女人应该说就是慈禧。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在满洲镶蓝旗一位八品官员的家里，出生了一名女婴。她就是清朝入关后第七位皇帝咸丰的贵妃，第八位皇帝同治的生母——慈禧太后。历史对她出生地留下的这段空白，给后世想了解她的人带来了许多遗憾和困惑。从清末到今天，围绕她的家世和生平有种种传说，对她的出生地更是众说纷纭。

道光十五年(1835)慈禧出身于满洲镶蓝旗一个官宦世家。慈禧的曾祖父吉朗阿，曾在户部任员外郎，负责中央金库。但就在他卸任十几年后，在查账时，查到了库银亏空几十万两，道光接到奏报以后，非常气愤，下旨不管是谁，不管什么时期，凡是在银库的工作人员都要一查到底。但经过反复的调查，最后竟查不出个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道光下令，从亏损的那一年一直到现在，所有工作人员平摊这些亏空的银两，已经去世的，由他的儿子、孙子偿还。道光命令发布时，吉朗阿已经去世。

慈禧祖父景瑞，在刑部山东司任郎中。道光二十七年(1847)，因没能按时退赔其父吉朗阿在户部任职时的亏空银两而被革职，并被官府抓了起来。事情一出，家里立时乱了。年少的兰儿(慈禧)却表现得非常镇静，她劝自己



慈禧曾住在储秀宫，这是东暖阁

的父亲惠徵，将家里仅有的一点银两拿出来交了出去，又让父亲带着她去亲戚和朋友家，借了一些银两。但她没有让父亲将这些银两全部交上去，而是用这些钱去上下通融。因为慈禧的祖父景瑞曾任刑部员外郎，认识很多的朝廷官员，有许多老关系，她的父亲也时任安徽的候补道台，也有很多朋友关系。在年少的慈禧指点下，惠徵打通了上下关系，很快将她的祖父营救了出来。

慈禧父亲名叫惠徵，在吏部任笔帖式，是一个相当于人事部秘书、翻译的八品文官，后不断升迁。根据清政府对京官考察的记录《内阁京察册》记载：惠徵在道光十一年(1831)时是笔帖式，道光十四年(1834)考察被定为吏部二等笔帖式。十九年(1839)为八品笔帖式。道光二十三年(1843)再次考察定为吏部一等笔帖式。二十六年(1846)调任吏部文选司主事。二十八年(1848)、二十九年(1849)因为考察成绩又是一等，受到皇帝接见，被外放道府一级的官职。同年四月，任山西归绥道。咸丰二年(1852)，调任安徽徽(徽州府)宁(宁国府)池(池州府)太(太平府)广(广德州)道的道员。

由于慈禧特殊的家庭地位、身份、影响与作用，对她的身世有多种异说。慈禧之父惠徵曾先后在北京、山西、安徽等地任职，这使得慈禧的出生地可谓众说纷纭。现在概括起来主要有六种说法：(1) 甘肃兰州；(2) 浙江乍浦；(3) 安徽芜湖；(4) 内蒙古呼和浩特；(5) 山西长治；(6) 北京。

第一种说法认为慈禧出生在甘肃兰州。其主要根据是慈禧的父亲惠徵曾任过甘肃布政使衙门的笔帖式，因而人们认为慈禧出生在兰州。传说慈禧出生在当年他父亲住过的兰州八旗马坊门。可专家查阅了《满文八旗文职官员俸银册》和《汉文官员京察册》等文献档案，发现惠徵虽然做过笔帖式，但其地点是在北京的吏部衙门，而不是在兰州的布政使衙门。这一期间他没离开过北京，更没去过甘肃，所以慈禧生于兰州说轻而易举被击破了。

第二种说法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徵曾在浙江乍浦做官，认为慈禧出生在浙江乍浦说。1993 年 8 月 22 日《人民日报》曾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史界新发现——慈禧生于浙江乍浦》。这篇文章说：慈禧的父亲惠徵，在清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1835～1838)间，曾在浙江乍浦做过正六品的武官骁骑校，而慈禧正是在这段时间出生的，所以她的出生地在浙江乍浦，应该是“浙江平湖市乍浦城内的满洲旗下营”。这篇文章又说：在现今乍浦的老人当中，仍然流传着关于慈禧幼年的传说。当时的规定，京官每三年进行一次考

核。有人查阅清朝考核官员的档案记载，发现这时的惠徵被考核为吏部二等笔帖式，三年后又被“懿妃（慈禧）遇喜大阿哥”档案作为吏部笔帖式进行考试，可见这时惠徵在北京做吏部笔帖式，为八品文官。这种说法有值得怀疑之处：其一，惠徵不能同时既在北京做官又在浙江做官。其二，官职也不对，在京师是文官，在浙江是武官。其三，品级也不合。有专家根据清政府对官员的考核档案，查清道光十四年官员考核时，惠徵被定为吏部二等笔帖式；道光十九年，定的是吏部八品笔帖式。他们认为如果按“乍浦说”的说法，惠徵在这几年之间在乍浦当过骁骑校的话，他从一个京城二等文官，忽然连升几级成为正六品武官，不合常理；再由正六品官，无缘无故一下又降回八品官，更讲不通。

第三种说法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徵曾做过安徽徽宁池太广道的道员，道员衙署在芜湖，因此有人说她出生在芜湖。慈禧生长在南方，擅长演唱江南小曲，因此得到咸丰帝的宠幸。有很多小说和影视作品都是这么认为的。不过我们认为不能以慈禧擅唱南方小曲，就得出她出生在南方的结论。倘有北方人会唱黄梅戏，能证明他出生在安徽吗？惠徵任徽宁池太广道员是在咸丰二年(1852)二月，正式上任是在同年的七月。而慈禧已经在咸丰元年(1851)入宫，被封为兰贵人，档案中还保存有兰贵人受到赏赐的赏单。可见慈禧不可能生于安徽芜湖。

第四种说法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徵曾任过山西归绥道的道员，认为慈禧出生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慈禧的父亲惠徵当年曾任山西归绥道，道署在



储秀宫寝宫，同治皇帝就是在这里出生的

归化城。传说在呼和浩特市有一条落凤街，慈禧就出生于落凤街的道员住宅里，甚至传说慈禧小时候常到归化城河边玩耍。但道光二十九年(1849)惠徵任山西归绥道道员时，慈禧已经十五岁，所以说慈禧出生于归化城是有问题的。

不过，慈禧有可能随父惠徵在归化城住过，因为慈禧的外祖父惠显从道光十一年至十七年(1831～1837)间，在归化城做官，当过副都统。慈禧可能在外祖父家住过。一般而言，慈禧的母亲不可能从北京回娘家生孩子，因为这在当时既路途遥远，也不合礼法。所以，慈禧出生在今呼和浩特市的可能性不大。有关专家认为慈禧的确在归化城住过三年，如果说呼市是她第二故乡，并不为过，但不是出生地。

第五种说法认为慈禧出生在今山西长治。这是近年来的一种新说法。山西长治市地方志办公室刘奇曾经出过一部叫《慈禧童年》的书，根据当地老百姓的口传和他自己的了解，认为慈禧不是满洲人，生父也不是惠徵。今山西长治当地传说：慈禧原是山西省潞安府(今长治市)长治县西坡村王增昌的女儿，名叫王小慊，四岁时因家道贫寒，被卖给上秦村宋四元家，改姓宋，名龄娥。到了十一岁，宋家遭到不幸，她又被转卖给潞安府(今长治市)知府惠徵做丫头。一次，惠徵夫人富察氏发现龄娥两脚各长一个瘊子，认为她有福相，就收她作干女儿，改姓叶赫那拉氏，取名玉兰。后来玉兰被选入宫，成了兰贵妃。人们提出的根据是：(1) 王姓家谱从乾隆五十九年(1794)，一直续谱到现代。王氏家谱上写着慈禧的乳名及“王小慊后来成为慈禧太后”等文字。不过人们也发现，这份家谱不是原家谱，是后来重抄的。(2) 当地还传说在长治县西坡村外边的山脚下，还有据说是慈禧生母的坟。坟前有碑，原来是木牌，后来竖立石碑。说慈禧是宋家的女儿，人们提出的根据是：(1) 在上秦村里至今保存着一处娘娘院。慈禧进宫当“朝廷娘娘”后，村里人就将慈禧入宫前住过的院落称为娘娘院，并一直流传至今。(2) 在宋家的炕上曾刨出了当年慈禧给宋家写的家信和慈禧本人的单身照片等，据说她娘家六代侄孙还保存着这封信。(3) 在上秦村居住的宋家老人说：“慈禧太后是咱家的。”(4) 上秦村宋六则和宋德文家祖传的光绪、宣统年间清廷制作的皮夹式清代帝后宗祀谱。为此，宋家曾联名写信，要求政府调查澄清这件事。

此外刘奇还提出了其他的一些证据，如慈禧用长治七里坡村韩印则的

二老奶奶当奶妈，用长治小常村陈四孩作御厨，安排长治史家庄村原殿鳌担任御前侍卫，并袒护他。原殿鳌任御前侍卫期间，因触犯刑律，本当处斩，慈禧念其是同乡，免其死罪，并让他到江西做官。慈禧特别关照长治籍官员、长治地方官和山西商人。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8月29日，慈禧与光绪逃至大同，在此留住三日。”兵荒马乱中，仍“召见潞安知府许涵度”，“擢冀宁道”。慈禧喜食长治人常吃爱吃的萝卜、团子、壶关醋、襄垣黑酱、玉米掺粥、沁州黄小米等；好吸长治人爱吸的水烟，不吸关东烟(旱烟)；爱看上党梆子。《壶关文史资料》记载，光绪二十一年(1895)，壶关上党梆子戏“十万班”进京为慈禧太后祝寿演出，轰动一时。慈禧看后亲笔题词“乐意班”，并钦旨不支官，不纳税。慈禧善唱小曲，且多是山西民歌。一次，咸丰皇帝问慈禧：“为什么山西等地的民歌唱得好而满歌却唱不了?”她说：“我幼年随父在潞安府长大，对那里的民歌熟悉。”

这种观点得到一些人的附和赞同。史学界有专家认为刘奇的成果为中国历史研究填补了一个“百年空白”。有人认为慈禧出生地众多说法中，只有山西和北京说能站得住脚。

慈禧出生于山西的说法遭到慈禧四世曾孙那根正的反驳，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一些人认为这一说法太富于传奇色彩了，物证里也有许多地方是失实的。一些专家进行了考证，在这段时间，历任潞安府的知府共有七个人，但是没有惠徵。既然惠徵没有在山西潞安府做过官，那么慈禧的出生地似乎是难以确定在潞安府的。

第六种观点是传统的北京说。《清史稿》、《清代全史》等清史专著中，虽然具体说法不十分相同，但都基本肯定她是生在北京，确认慈禧是满洲叶赫那拉家族惠徵的女儿。近年来，一些学者从清宫档案中找到了新的史料，就是清朝皇帝选秀女的名单，这在档案中叫做“排单”。其中有咸丰五年(1855)慈禧的亲妹妹被选为秀女的记录。慈禧的这位妹妹后来成了醇亲王奕譞的侧福晋，光绪皇帝的生母。“排单”上明确记载慈禧的妹妹属满洲镶蓝旗，姓叶赫那拉氏，父亲名叫惠徵，最高官职做到五品的道员。一些学者主要根据这份“排单”认定，咸丰五年之前慈禧的娘家住在北京西单牌楼北劈柴(辟才)胡同，这里应该是慈禧太后的出生地。按照京师八旗分城居住的规定，乾隆三十五年(1770)，镶蓝旗满洲都统衙门在阜成门内华嘉寺胡同；到民国初年，镶蓝旗满洲都统衙门旧地在阜成门内华嘉寺十四号。劈柴

胡同距华嘉寺胡同很近。慈禧的父亲属于满洲镶蓝旗，应当住在劈柴胡同一带。不过慈禧入宫时选秀女的“排单”至今没有发现，使这种说法逊色不少。

慈禧的后裔也曾著书认为他家的家谱上记载着慈禧出生于劈柴胡同。自他记事起，其爷爷就是这样说的，其父亲还曾带他亲自到劈柴胡同实地察看过。

此外，还有人认为慈禧出生在北京东城方家园。有本《清朝的皇帝》的书记述：“慈禧母家在东城方家园，父官至安徽徽宁池太广道，时当道光末年，洪杨起事，惠徽守土无方，革职留任，旋即病殁，遗妻一、子女各二，慈禧居长。”书中说恭亲王曾慷慨有言云：“大清天下亡于方家园！”并注云：“方家园在京师东北角，为慈禧母家所在地。”

慈禧的出生地究在何处？上面的一些说法表面上看都很有理由，但常有经不起推敲的地方。慈禧只可能生在六个地方中的一个，剩余的五个地方，想来大概是历史在它的流传中无意间和人们开了个小小玩笑而已。